

秦城

战犯改造纪实

邢克鑫 编著

揭开秦城神秘面纱
再现犯人改造详情

中共党史出版社

秦城战犯改造纪实

邢克鑫 编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城战犯改造纪实/邢克鑫编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11

ISBN 7-80199-128-1

I. 秦... II. 邢...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701 号

书名:秦城战犯改造纪实

作 者:邢克鑫

责任编辑:吴 江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大 32

字 数:300千字

印 张:12.5

印 数:1-5000册

版 次:2005年1月第1版

印 次: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99-128-1/D·38

定 价:28.00元

目 录

引子：神秘的第一监狱

| | |
|-------------------|---|
| 1. 秦城印象 | 1 |
| 2. 苏联援助的第 157 个项目 | 3 |
| 3. 犯人待遇有高低之分 | 5 |
| 4. 审讯、接见与医疗 | 7 |

一、第一批进入秦城的是战犯

| | |
|----------|----|
| 1. 接受失败者 | 10 |
|----------|----|

- ◆ 首批战犯名单
- ◆ 第二批战犯名单

| | |
|----------|----|
| 2. 战犯的确定 | 14 |
|----------|----|

- ◆ 怎样确定战犯
- ◆ 三类战犯
- ◆ 处理战犯的原则

二、由功德林到秦城

1. 战犯汇入功德林 27

2. 由秦城农场到秦城监狱 29

- ◆初入秦城
- ◆再入秦城
- ◆“文革”中的秦城

三、监狱中战犯的改造制度

1. 转变犯人的思想 39

- ◆战犯的生活待遇
- ◆监狱中的“自我教育”
- ◆思想改造难
- ◆虚心接受,存心不改
- ◆“顽石点头”,服从真理

2. 劳动改造为辅 56

- ◆大将军脚踩缝纫机
- ◆秦城农场无一人逃跑
- ◆劳动才知农民苦
- ◆羊倌·兔爷·鸡长官
- ◆监狱里的劳动能手

3. 改造靠“参观”,社会当学校 77

- ◆ 新旧对比,改造有成
- ◆ 参观容易,准备难
- ◆ “群虎图”风波
- ◆ 在天津有人下跪

四、狱中的生活和情感

1. 战犯的日常生括 89

- ◆ 沈醉领做广播体操
- ◆ “财主”和“拾烟族”
- ◆ 学习组长难当

2. 恶习难改 99

- ◆ 杨文瑛仍爱粉面油头
- ◆ 战犯依然“惹不起”

3. 狱中人的情感世界 105

- ◆ 念娇妻和想故乡
- ◆ 秦城农场的春节

五、沾了女儿光的杜聿明

1. 成为阶下囚 113

- ◆ 蒋介石集团的主要成员

- ◆被俘,拒绝见陈毅

2. 在狱中 118

- ◆不想活,死不了
- ◆满纸新词,爱摆架子兜圈子
- ◆一笔好字,无极电机
- ◆四肢不灵,五脏不全
- ◆参加劳动
- ◆有个好女婿杨振宁
- ◆第一批获特赦

3. 全国政协常委 135

- ◆周恩来的座上宾
- ◆邓小平参加追悼会

六、在狱中也会做人的王耀武

1. 王耀武会做好人 141

- ◆一步一步不容易
- ◆好人做到俘虏营
- ◆用进口手纸露出破绽

2. 监狱生活 147

- ◆立有一功

- ◆在解放军官训练团
- ◆有人想搞垮王耀武取而代之

3. 被吓死 152

- ◆文史专员
- ◆重组家庭

七、“黄埔大哥” 曾扩情

1. 总是不得意 158

- ◆年龄比周恩来大
- ◆十三太保之首
- ◆为人十分天真

2. 在狱中有点温情主义 162

- ◆以为死期将至裤裆全湿
- ◆粗中有细带点温情主义
- ◆坐定又还起,无风门自开
- ◆特赦后定居沈阳

八、陈赓常去探望的宋希濂

1. 国共两党都有好朋友 169

- ◆黄埔高材生
- ◆有共产党朋友

2. 送终将军

174

- ◆ 谁是国民党的“送终”将军
- ◆ 兵败川西

3. 狱里狱外

179

- ◆ 湖南骡子脾气
- ◆ 出狱之后

九、不原谅傅作义的陈长捷**1. 成为阶下囚**

187

- ◆ “他成了起义将领，我成了战犯”
- ◆ 怒斥傅作义的代表

2. 秦城春秋

190

- ◆ 学习劳动
- ◆ 傅作义为他说情
- ◆ “文革”中自杀

十、三天不说两句话的康泽**1. 由特务到中将**

197

- ◆ 本质是特务

- ◆ 台词未唱完解放军已攻进
- ◆ 王近山要活的

2. 在解放区战俘营中

202

- ◆ 学达摩面壁
- ◆ 妻子大闹
- ◆ 在解放军官训练班读书
- ◆ 写了自省录

3. 安家功德林

211

- ◆ 由平山县到功德林
- ◆ 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
- ◆ 以身试“针”

4. 特赦获释

218

- ◆ 欣闻特赦令
- ◆ 终获特赦

十一、死不认账的黄维

1. 淮海败将

225

- ◆ 性情刚烈
- ◆ 双堆集之夜

2. 俘虏生涯

229

- ◆不服输
- ◆不认账
- ◆要发明“黄维永动机”
- ◆报仇和报恩

3. 突然病逝

241

- ◆愧对爱妻
- ◆未能成台湾之行

十二、军统中将文强

1. 特务生涯

247

- ◆先入共产党
- ◆踏入泥潭
- ◆文强与林彪

2. 秦城岁月

252

- ◆随遇而安
- ◆是个好组长
- ◆分西红柿风波
- ◆监狱里也有“探长”

3. 晚年生活

258

- ◆以诗寄情
- ◆拒收补偿金

- ◆ 著书立说

十三、被轻视的文官

1. 职级最高的文官庞镜塘 266

- ◆ 职业政客
- ◆ 很少发脾气
- ◆ 剃胡子事件

2. 李帆群爱耍笔杆 270

- ◆ 比庞镜塘更厉害的笔杆子
- ◆ 时来运转, 选调北京
- ◆ 柿子要找软的“吃”

3. 李佩青爱充进步 273

- ◆ 李佩青充进步过了头
- ◆ 卖力不讨好

十四、“杀身”未成的将领们

1. 爱开玩笑的范汉杰 279

- ◆ 逆来顺受
- ◆ 假装写遗嘱
- ◆ 骨灰存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2. 自命不凡的廖耀湘 285

- ◆ 失败后,准备自杀
- ◆ 狱中逸事

3. 真歪心正的张严佛 289

- ◆ 军统特务,白忙一场
- ◆ 重提旧事,转押北京

4. 名聪实不聪的胡临聪 292

- ◆ 我名聪实不聪
- ◆ 设想逃跑,当了俘虏
- ◆ 学习组长当得好

5. 邱行湘以力服人 296

- ◆ “邱老虎”守洛阳
- ◆ 当学习组长,毁誉参半
- ◆ 无愧大力士

十五、“军统三剑客”的狱中生活

1. 死于狱中的徐远举 303

- ◆ 军统特务
- ◆ 血手染红岩
- ◆ 心灵的忏悔

- ◆方言误会闹笑话

2. 赴美定居的周养浩 313

- ◆拼命为自己辩护
- ◆自暴自弃
- ◆峰回路转

3. 深明大义的沈醉 322

- ◆起义投诚
- ◆安度晚年

4. 军统“三剑客”内讧 326

- ◆祸起萧墙
- ◆引火烧身
- ◆明争暗斗
- ◆宋希濂说,我愿跟徐远举握手言欢
- ◆沈醉说,希望周养浩不要再发生问题

十六、战犯七批特赦出狱

1. 特赦前的准备 339

- ◆毛泽东建议特赦国内战犯
- ◆政治协商战犯处理

2. 战犯大批出狱 349

- ◆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3. 战犯的反映 354

- ◆一谈未来就色变
- ◆颁布特赦令
- ◆第一批特赦

4. 我比他要强得多,为什么不特赦我 361

- ◆官大罪大先特赦
- ◆不请自来的第二批特赦

5. “文革”中战犯特赦中断 365

- ◆“文革”中的遭遇
- ◆福将刘嘉树

6. 准备全部特赦 371

- ◆周恩来亲自批示
- ◆最后的准备
- ◆释放全部战犯

引子：神秘的第一监狱

1. 秦城印象

“秦城”这个名字，一听起来就让人有一种神秘的感觉。那个“秦”字，恰好与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相联系。在人们印象里，这个“秦”字包含了一种威严、一种铁腕、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也许是偶然的巧合，“秦人”服饰“尚黑”，秦城监狱囚犯的服装也是黑色的。

秦城位于北京市北部的燕山东麓，西面靠着重叠的群山，北、东、南面则是一望平野。其实，在秦城监狱建立之前，秦城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名。不仅人人可以出入，自古也有百姓居住。

在这里朝阳的山坡上，依稀可见古战场的遗迹，它标志着这一带自古就是战场和边防重地。半山麓，有一座龙泉古寺，碑碣犹在，但庙宇已不知毁于何时。从败瓦颓垣来看，原先是一处颇具规模的建筑。登临其上，景物宜人。山间有一道清泉，据说是自燕山一个天然石湖中冒出，涓涓温润，汇流成湖成渠，直下小汤山，温泉由此而得名。后来，小汤山建为温泉胜地，苍松翠柏掩映，亭台楼阁簇立，成了历代帝王、达官贵人享受沐浴的场所。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国务院各部委沿着燕山山麓划定了许多绿化植树基地。公安部则以龙泉古寺遗迹为核心，沿龙泉水汇成的东去溪流建立了自己的绿化植树基地。由数十间平房构成的场部，就建立在昔日龙泉古寺遗址上，秦城监狱则座落在这个农场之中。

有缘去过秦城监狱的人，对它的描绘莫衷一是。有人把它描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式的院落；有人把它比作县城里的二、三流招待

所；有人说它阴森，有人说它明媚。

所有的一切传闻、回忆，给这个座落在如同“神仙境界”的山麓，雄伏在大自然温柔雾纱下的中国第一监狱，罩上了一层又一层面纱，让你愈是知道得多，愈是陷入一层新的神秘、新的诡诘之中。

按理说，秦城监狱的生活单调乏味，千篇一律，几十年如一日，文人墨客应该没有什么可多着墨之处。但是由于人性的丰富，更由于犯人情况的千差万别，所以，在秦城监狱的围墙中，隐藏着无数精彩纷呈的故事。

2. 苏联援助的第 157 个项目

建立于1958年的秦城监狱，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同中国处于“蜜月”关系时，援助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与国防建设的产物。当时，苏联与中国订立的援助项目共有157个，其中之一便有秦城监狱，但因秦城监狱属秘密工程，对外不便公开，所以外人一般只知道官方公开的156个。

当时的秦城监狱，是由苏联专家设计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是工程负责人之一。富有戏剧性的是，冯基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投入这座他亲自主持修建的监狱，而且是同批犯人中最迟一个被释放者。

“文革”前监狱盖有4幢带审讯室的白色楼房，排号为甲、乙、丙、丁。楼房一律三层，砖结构，坡顶。每幢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楼前有一大片用墙围起来，专供犯人放风的空地。每间监室有20平方米，内有单独的洗手间，其中设有坐式马桶和脚踏式冲水，并配有当时属十分先进的洗衣机。

牢门是铁皮包着的木门，房门上方与厕所马桶齐腰部有“窥孔”，供哨兵对犯人24小时监视之用。房内的常置设施只有一张距地面一尺左右的矮床。需要写材料时，管理人员才会送进一张小学生式的单人课桌临时使用。但凳子永远是永远没有的，床铺就是犯人平日坐的地方。重犯囚室内的墙壁是特制的，囚犯撞墙也不能自杀。

牢房的窗户约一平方米大，距地面两米多高，窗台向上倾斜，窗户向上向外开启。窗户共有三层：纱窗、铁栅和磨砂玻璃窗。室内所有永久性设施都被去掉棱角，打磨成圆形。

铁丝、碎玻璃片、绳索，甚至布条，以及易燃、易爆物品——总之，一切可能被用来行凶、自杀、越狱的工具都在这里绝迹。在大约有3.5米高的天花板上，安有一个光源微弱的灯泡，那模样就像“一个

倒挂的小人头”，它被磨砂灯罩罩住，而且灯罩外边包有铁丝网。如此层层包裹，灯光自然是十分暗淡。犯人没有控制这个昏暗光源的权力，因为它的开关在牢房外，由看守操纵。

1967年，又加盖了6栋楼阁、6座监狱大院，6座新监舍的排号顺序为戊、己、庚、辛、壬、癸。

3. 犯人待遇有高低之分

犯人的代号由数码组成。数码分为两个部分，前面的数字标志该人的人狱年份，以公元纪年表示。后面的数字表示该年份入狱的序号。如“6901”，前两位数代表1969年，后两位数代表收监的顺序是该年度的第一人。

犯人按“级别”不同有单独和集体囚禁两种。这种“级别”划分一般是根据犯人在入狱前的官职，有时则根据这名犯人在某一事件的涉及程度。

犯人每月的主食定量为16公斤，一日三餐（周日和节假日只有两餐）由管理员统一送到各监室门前。不过，在伙食标准上，又根据犯人的年龄、入狱前的地位，或是案情的不同进展程度等等，分为高低两种。

高级囚犯20世纪70年代每月的伙食费为60元，到90年代随着物价的上涨，有所提高。高级囚犯伙食待遇较好，一般对那里的伙食比较满意。低级囚犯正餐为“一菜一汤”。主食一般是米、面、杂粮搭配，菜是最廉价的蔬菜，少有油水；早饭是玉米面窝窝头和一块拇指大的咸菜。

在高级监区，狱方备有统一的饭盒，不使用窗口，而是打开牢门将饭菜送入。菜有两素一荤，有“真正的汤”。每周一次配送牛奶、水果；特殊犯人或即将出狱的高级犯人则有更好的待遇。囚禁在低级监区的犯人需自己保管餐具，开饭时，食物通过一个离地面约一尺高的送饭窗口递入。

秦城监狱与普通监狱不同，实行单独放风制度，犯人初到秦城时并不能立即享受放风待遇。每次放风时间20分钟至1个小时不等，时间依当时狱中犯人的数目而定。放风地点为一块用砖墙围起的放风圈，一道高墙又将这个放风圈一分为二。两个放风圈可以同时使

用,看守站在高高的中墙上,可一览无遗地观察两边格子中的情况。犯人一个一个地被单独放出来,一人一格,隔着高高的墙,谁也看不到其他犯人。

至于秦城囚犯的最高刑罚和体罚,毛泽东曾在1957年说过这样的话: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能杀错人。……第三条,消灭证据……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即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对这些人的死刑实际上被废除。但这些“废物”还是要利用,所以他们除写自己的检查外,还要协助调查其他案件(通称“外调”)。平时,除国民党战犯接触过重体力劳动外,犯人在秦城监狱也有轻微的劳动,如做火柴盒,用麦秸编织草帽,这类劳动一般在囚室内进行。

4. 审讯、接见与医疗

秦城监狱的犯人在接受审讯时，先由一名看守通知，然后将他带出囚室，前往审讯室。来到审讯室门前，将犯人送入室内，看守即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在室外等候。

进入审讯室后，犯人被带到一张凳子前。据国民党战犯沈醉回忆，这张凳子与一般的凳子相比，有着特殊的讲究。它的形状像一个腰粗、两头细的圆鼓。根据国民党审讯的经验，他认为，做成这种形状，是为了防止犯人拿它当武器，袭击审讯人员。

在犯人被允许坐下之前，提审员首先向他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文革”期间，则代之以朗读墙上贴着的毛泽东语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等等。

在犯人的对面，有个半圆形的平台，台上有几张由木桌拼起来，上面铺着白布的审讯桌，审讯员和记录员分别坐在桌子两边。在这里，犯人还可以在有靠背的椅子上就座。

犯人接见家属的地方设在同一幢监舍的接见室中。那是一个被中间的一堵墙隔断的两个小房间，中间的墙上开有一个小窗口。在一般情况下，接见者和被接见者在这里被分处两室的小窗口处交谈，犯人身后自然有管理人员监听。

犯人家属送给亲人的物品必须在审讯室内交给管理人员，在一本接见人送物单上登记。被审定不能交给犯人的东西，在会见结束后立即责令带回。接见完必须有管理人员在会见单上签字，否则就不能走出监狱的铁门。

秦城监狱设有专门的医务室，配备保健医生和护士。他们只是负责犯人的一般疾病；定期检查“高级犯人”的身体。内容有询问身体一般情况、量血压、抽取血样检查各种指标等。此外，还特别设立

了一个小小的牙科诊所。

据称，秦城监狱的医生对医治因长期单独囚禁导致的“单身牢房综合症”最有经验。

秦城监狱的医护人员对这种病症了如指掌，他们只是听取犯人的简单介绍后，便知道其病根在哪里。因为只要把这名犯人放入人群中，病很快就会好起来。

如遇大病，疑难病，或需要动手术时，监狱医务室就把犯人送到秦城监狱犯人的专用医院——复兴医院。

复兴医院座落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上，是公安部的下属医院，虽然这家医院远离秦城，但在那里住院的犯人仍是处于与世隔绝状态。所以，它是秦城监狱牢房的延长。

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集中在一幢建筑的二楼，病区内有看守把守，每间病房都装有铁门，有监规，也实行放风制度，放风地点在医院大楼的楼顶上。病房约有十平方米，内有一张至两张病床、一个自来水龙头、一个马桶。窗户的玻璃不透明，窗外装着铁栏杆。

一、第一批进入秦城的是战犯

秦城监狱的修建非常神秘，而秦城监狱接收的第一批犯人则更加特殊，主要是国民党战犯。这批战犯进入秦城，使这个本来就令人捉摸不透的监狱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新政权巩固后，处理战犯问题提上日程。日本战犯罪孽深重，国民党战犯与国内社会各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他们的处理必须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处理不当将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和国内的声誉。

针对战犯处理问题，中国共产党广泛听取了各界人士的意见，最后确定了对日本战犯，一个不杀，宽大处理；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方针。

1. 接受失败者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接受失败者,惩办战犯已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公开宣布要惩办内战罪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国共两党和谈八项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1948年12月25日、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发表文章,两次提到了战犯名单。这一切都表明,战犯一定要得到惩处。

◆首批战犯名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发动了全面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进行了坚决反击,并取得了节节胜利。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在宣布解放军的政策时规定:“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同时规定“对于罪大恶极的内战祸首蒋介石和一切坚决助蒋为恶、残害人民、而为中国人民所公认的战争罪犯,本军必将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这是第一次公开宣布要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内外战犯总政策的一部分,也是后来中国共产党制定战犯政策的根据。

1948年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正规军144师,非正规军294师,共154万余人,蒋介石的主力已基本被消灭。与此同时,新华社刊登了陕北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问题的文章,把蒋介石作为头等战犯正式公布于世。这则电讯如下: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陕北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问题：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勱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地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

这是第一个权威性的战犯名单。列出的是最重要的战犯，虽然很不完全，但这个名单的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处理日本战犯和国内战犯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历史意义，它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共产党提出惩办战犯的必然产物。

紧接着，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正式发表。这个声明是针对蒋介石1月1日声明而提出的，由此可看出处理战犯的历史渊源。其核心内容便是有名的国共两党和谈八项条件。八项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自此开始，惩办战犯的政策已经确定并一直延续到1975年特赦

释放全部在押战犯。

但有一点要声明,中国共产党对战犯的政策是一贯的,“惩办战犯”应具体解释如下:惩办不等于要消灭战犯本人的肉体,而是要清算他们反人民的罪行;不杀也不是一律立即释放,而是要经过教育改造,使他们成为新人,走改恶从善的道路;而改造好后也不是不管他们的工作、生活,而是给出路。后来实行不杀不判、分期释放就是这种政策的具体体现。

◆第二批战犯名单

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发表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广泛欢迎毛泽东主席声明的消息。这则消息,反映了各界人士对战犯名单的基本态度。其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受到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广泛欢迎。登载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14日声明全文的上海某报,一天销售了12万份。工人、学生、市民和中下级公教人员对于这个声明的普遍意义认为是:八条不论哪一条都是人民大众所要求的。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也有同样看法。一个在国民党内有相当地位的公务人员说:有人说国民党不能接受八条中的第一条,即惩办战争罪犯。我看这些家伙共产党不杀他们的头,我们也要杀他们的头。一个不愿透漏姓名的教授说:中国事情弄到如此之糟,如果中共所宣布的战争罪犯不负责任,还应该由谁负责任?一个老同盟会员说:天网恢恢,这些战犯总不会漏网。对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正在纷纷议论。有人说:这个名单中的四十三个人一个也不冤。更多的人感觉名单遗漏了许多重要战犯,例如军事方面的朱绍良、

郭忏、李品仙、董钊、陈继承、张镇；政治方面的谷正纲、徐堪、俞大维、洪兰友、董显光、刘健群；党特方面的邓文仪、黄少谷、陈雪屏、贺衷寒、张道藩、蒋经国、郑彦棻、郑介民、叶秀峰；反动小党派方面的左舜生、陈启天、蒋匀田。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必须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动者胡适、于斌和叶青。北平人认为许惠东、吴铸人应列为战犯。上海人认为潘公展、宣铁吾应列为战犯；广东人认为张发奎、罗卓英应列为战犯；四川人认为王陵基、王赞绪、杨森、潘文华应列为战犯。

从以上两次所提到的战犯名单来看，惩办内战分子的问题已迫在眉睫，这是全国人民翘首企盼的。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它都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

正因如此，国民党反动派，尤其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批战争罪犯百般抗拒。为了延长战争时间，讨好美国，利用日本，打击共产党，以求卷土重来，在1949年1月26日，即新华社公布的第二批战犯名单的同一天，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复审，结果将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当庭宣判无罪，予以释放，并将冈村宁次等260名日本战犯宣判无罪后送往日本。

但这已无济于事。平津战役的结束，北平的和平解放，蒋介石在军事上大势已去，统治地位也岌岌可危，释放冈村宁次也只是黔驴技穷，无法阻挡国民党反动统治末日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举动予以针锋相对的还击，中共中央提出把重新逮捕冈村宁次、惩办日本战犯和惩办国内战犯作为当时与国民党和谈的先决条件，并从各方面为八项条件的第一条作准备，积极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商定战犯名单，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犯。

2. 战犯的确定

战犯是怎样确定的？规定战犯有无统一的标准？各国是否有各自的标准？为什么在押战犯中有的职务高，有的职务低？战犯与战俘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问题，曾是国内外舆论和广大在押战犯们特别关注的焦点。处理好战犯问题，必须首先解决这些疑问。回答这些问题，才能平息国内外舆论的纷扰，才能令在押战犯们心服口服。定罪量刑，他们确实当以战犯论处。

◆怎样确定战犯

战犯的确定是有国际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所规定的三类犯罪。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六条规定：

对下列表现为犯罪的各种行为，或其中的任何一种行为，法庭均有权进行审判和惩处。犯有此类罪行者均应负个人责任：

- (一)破坏和平罪；
- (二)战争罪；
- (三)违反人道罪。

凡参与拟订或执行旨在犯有上述罪行之一的共同计划或密谋的领导者、组织者、发起者和同谋者，他们对为执行此类计划而犯罪的任何一个人或一切行为负有责任。

有了这个标准，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在押战犯中，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有的职务高，有的职务低，不少战犯多次提出，

他们不是战犯，论罪不应以战犯论处。而这一条说得很明确，“凡参与拟订或执行”上述三种罪行之一者都应负个人责任。这就不论职务高低，只要构成三种罪行之一都在其列。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经常困扰战犯，并为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的，那就是战犯与战俘的区别问题。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不少在押战犯应是战俘。如果真是战俘，那境遇大不相同了。因为按照国际法和战争惯例，战俘一般应予以释放或交换，而且在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上都要比战犯好得多。那么，究竟怎样划分呢？让我们先看看战犯与战俘到底有什么区别吧。

战犯与战俘的主要区别是：在战争中是否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也就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的三类犯罪。

再具体点，战犯是指犯有战争罪行的人，战争罪行是在把战争当作国家权利的情况下，违反公认战争法规和惯例的行为。

战俘是在战争或武装冲突中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交战人员，不违反公认战争法规和惯例的行为。

无论战犯还是战俘都有国际法上的意义和国内法上的意义，战犯违反国际法，也违反所在国的刑法，应负个人刑事责任。战俘不负有这种责任。

“只有公罪，没有私罪”，是战犯们拒不认输服罪的又一观点。对此，管理干部针锋相对地指出：

你们所说的只有“公”罪没有“私”罪，跟日本战犯的说法一样，但也都只能是为自己的罪行开脱而已。所谓“公罪”，你们确实都有，尤其是兵团司令一级的军人、特务站长等，都犯有参与发动内战、违反人道的罪行。比如，蒋介石召集的高级军事会议，包括制定内战方针、发动内战、内战进行时的重大决策等，在押的就有不少人参加过，这些人都是蒋介石的“中坚”，是最可靠也是最有力的实力人物。

所谓“私罪”，包括杀人、抢劫、强奸等野蛮行为，均属个人行为，你们几乎都干过，只是程度不同。在国民党军队里，连长以上的军官

就有权杀人。例如：有一位国民党少将师长，在一次战斗中俘虏了中共女医务人员和女干部、战士若干人，他将她们全部奸污，并一律杀害。他的兽性与残忍跟日本战犯有什么两样？！他在交罪认罪过程中谈到这种行为的根源时说：我除了生我者和我所生者不好以外都奸，杀害这些女俘虏是怕战地部下受影响，灭口了事。这就犯有严重的私罪。

既然划定战犯有统一的国际标准，那么，各国是否有自己的标准？其实严格说各国对战犯的划定，是没有统一标准的。因为战犯犯罪是最严重、最特殊的犯罪，各国处理战犯均按各国的刑法执行，而不同的国家其刑法是不同的。没有刑法或刑法不完善的国家只有按照该国制订的政策、决定等，对战犯实行处理，这种处理一般根据国情而定。

以中国处理战犯问题为例，当时中国还没有一部刑法，对战犯的处理只有靠党的政策和决定等为依据，而这些政策和决定与国际法原则是一致的，在基本原则一致的情况下，又发挥了更灵活的创造性。

中国的审判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完全符合国际法。事实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在当时和以后没有一个人不承认自己的战犯身份。国内战犯的职务相应地比日本战犯高得多，最低的都是校级军官，也都有具体的战争罪行，所以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曾短期内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过，战犯与战俘之争的问题圆满解决，国内外的舆论普遍赞扬中国政府的宽宏大量和处理战犯问题的重大历史意义。这一问题解决以后，在当时就是制定处理战犯的方针政策 and 法律，以及如何处理了。

◆三类战犯

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主权国家，对于在侵略

战争中犯有战争罪行的日本战犯实行了关押、处理和改造。同时，中共中央对国内战犯也实行了关押、处理和改造。国内战犯包括三部分：

一是以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为首的伪满战犯共61名，有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及八大部15名大臣和溥仪的弟弟溥杰。他们是1945年8月17日被苏军俘获、和日本战犯一起于1950年7月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的，先关押于哈尔滨，后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二是以伪蒙疆自治政府主席、伪蒙军总司令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为首的10名伪蒙战犯。其中，4名是1950年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引渡回国的，6名是在国内逮捕或俘获的，关押在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

三是国民党战犯，这是相当复杂的一部分，也是国内战犯的主要部分。1948年12月25日，陕北权威人士提出的43人名单，1949年1月26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讨论这个名单时又提出的37人名单中，后来被关押的只有杜聿明、黄维和王陵基3人。国民党战犯主要是指在解放战争中被俘获的，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逮捕的。从战场上俘获的，当时关押在济南、南京、沈阳、兰州和北京5个军区的军法处及所属解放军官训练团；从地方上捕获的关押在全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公安机关，全国只有福建、青海、宁夏、西藏没有收押战犯。

1955年12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公安部发出《关于将现押军区的蒋匪战争罪犯移交公安机关管理的联合指示》，战犯统由公安机关管理。

由于被俘或被捕的国民党人员极为复杂，为确定战犯身份，公安部提出了一个战犯标准，即在解放战争期间，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长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可列为战犯。但是，也有符合这个标准而地方已判刑的，未算战犯，而作为一般反革命分子处理，这就是继刑

满释放后又于1975年全部宽大释放的那批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

经审定,列为战犯的总数为926名,其中军队系统736名(中将72,少将388,校级276),政府系统46名,党务系统27名,特务系统117名。为了便于管理教育,从1956年以后,将他们分别集中关押在秦城监狱以及辽宁抚顺、山东济南、陕西西安、四川重庆和内蒙古6个战犯管理场所。

以上国内三类战犯总计997名。到1959年第一次特赦时,由于在此之前刑满释放、病亡和其他处理释放等原因,正式听候处理的战犯总数为856名。

◆处理战犯的原则

如何处理日本战犯和国内战犯是新中国的一项重大事宜。而能是否正确制定处理战犯政策,则是新政权是否有力度的标志之一。在对战犯的犯罪事实进行全面了解和详细掌握之后,中国政治协商部门和公安政法部门针对这一事宜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党组,更多地是征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

在此基础上,1956年3月14日至15日,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9次会议(扩大)在北京召开。会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作了关于战犯问题的专门报告,周恩来总理对处理战犯的方针政策作了重要讲话。到会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有程潜、蔡廷锴、傅作义、龙云、卫立煌、黄绍竑、张难先、张轸、刘斐、黄雍、王芸生、翁文灏、李书城、侯镜如、邵力子等著名人士,他们对罗瑞卿和谭政文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对如何处理战犯问题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罗瑞卿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关押的国民党战犯、日本战犯和伪满伪蒙战犯情况,并提出了处理的方针政策。总的方针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要不要杀一些战争罪犯？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在押战犯的表现，以及放与不放的利弊后，中央的倾向意见是可以考虑一个不杀，对他们继续进行改造。理由是：国家的政权基础更加巩固，治安更加安全；那些直接站在人民头上、有严重罪恶和血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已为数很少，况且在1950年到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对那些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也是一律不杀；我们对罪犯实施的劳动改造办法已取得显著成效，可以把他们改造成成为新人。

同时，对于战犯来说，他们的罪恶虽说很大，但已关押多年，多数人已经认罪交罪，决心自我改造，要求立功赎罪，逐步得到广大人民的谅解，这也是可以不杀的一个条件。即使是对有严重罪行、甚至已经判处死刑的也可以不处决。实行不杀的方针无论是对国际的影响，还是国内的社会同情，都是有好处的，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和瓦解敌对势力，都有益无害。

二是可不可以无条件地把所有战犯一概予以宽赦？鉴于他们的战争罪行，当然不能无条件地一概予以宽赦。根据战犯的实际情况和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对日本战犯中的和国内战犯中的大多数采取宽赦的办法，对少数人应当依法量刑，让他们在服刑期间努力改造自己，争取立功赎罪，重新做人，最后取得人民的宽恕。

根据上述原则，罗瑞卿分别对日本战犯和国内战犯提出了处理意见，供与会者讨论。

对于日本战犯，当时考虑到他们有较大罪行，提出对近100名战犯拟判重刑。另外，还有900多名，罪恶较轻，而且考虑到已关押10年以上（包括在苏联关押5年），也有悔改表现，所以准备宽赦释放。

对于国民党战犯，当时拟定先释放少数较低级军官和某些将级军官，也曾考虑释放些特务分子。在释放前，让他们明确以下事宜：释放后有行动自由，可以去台湾，也可以去香港。出去以后如果能够做一些对国家有益的工作，人民是会欢迎的。如果再做坏事，也有自由，没什么大不了；如果做了坏事感到不好又愿意再回来，我们照样

欢迎。

为了做好分批释放的工作,罗瑞卿还提出先让他们到社会上去参观,并允许所有的家属亲友探视和通信。

无论是准备释放的还是待以后释放的,对全部战犯都实行“惩罚管制和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政策。这是改造一般罪犯的政策,也是改造战犯的政策。具体概括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在会上作了《关于侦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主要介绍了前述日本战犯的基本情况,以及自1951年起开始对日本战犯的调查情况,和从1954年起组织大规模的侦讯队伍系统审查所有在押日本战犯的情况,报告所提出的处理意见与罗瑞卿的观点大体相似。

紧接着,周恩来作了权威性发言。与会者对周恩来和罗瑞卿的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在与会者深入、坦诚的讨论的基础上,周恩来最后作了总结发言,宣布了处理战犯的方针政策,即:总的政策是宽大。

对于日本战犯,参照国际法,但不属于国际法庭,用国内的军事法庭来审。在以后审理和改造日本战犯的工作中都是按周恩来指出的这个方针进行的。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这是处理日本战犯的主要法律依据。这样,审理日本战犯成了中国审判史上的一件大事,改造日本战犯也成了中国改造罪犯史上的一件大事。

对于国内战犯,当时主要提出了两个设想:一是判刑,甚至判死刑。按他们的罪行而言这是罪有应得,合理合法,而且也符合广大人民的心愿;二是“一个不杀”,这是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个不杀”的原则下,采取逐步宽赦的办法。周恩来系统地分析了杀与不杀的影响,权衡利弊,提出采取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原则。最后确定对于国内战犯,采取逐步释放,分批特赦的办法为好。

整个会议在民主协商、活跃的气氛中进行。各界人士,各抒己见,可谓是讨论得热火朝天,这种祥和氛围在以往国民党的会议上是不曾有过的。当时,“释放战犯,对台湾有促进作用”这个问题一度是讨论的焦点。有的主张把战犯释放后让他们都去台湾,或部分去台湾;有的则主张让他们去香港;有的主张只能去香港,不能去台湾,认为去台湾是送死,蒋介石不会放过他们,就是去香港也不保险。周恩来对大家说,蒋介石养不起这些高级将领,让他们去蒋介石消受不了,同时他会狐疑鬼猜,会认为我们放一个人去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连美国人稍微勾引一下孙立人他都要干掉!当然,台湾的工作是要做的,如何做可以跟这些“将军”们谈谈,在座的各位可以去访问他们。

周恩来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如此重大、复杂的政治、政策问题,他讲得深入浅出,到会者无一不为之折服。周恩来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

毛主席曾指示应跟他们讲清楚,放他们出去,允许他们来去自由,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愿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可以骂我们,连海外的人在内,骂我们的有那么多人,这几百人数目很少,如果你们骂完了,又想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会不会回来再把你们抓起来?不!我们保证。我们不跟你们绝交。

这样,问题讲得更加透彻,而且也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最后,周恩来强调:

这个话,我们说了算数,我们大家都赞成就这样做。今天公安部长、总检察长都在场,政协、人大常委都有人,大家都在场,这个话我们说了,就算数,来去自由,言论自由,骂完了我们,高兴回来,我们欢迎。这是有言在先,我们说

了这个话，不光这一代，下一代也算！

这一政策，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风亮节。

总的精神出台后，中共中央于1956年4月11日发了个专门通知，向各地各部门传达。这一精神传达下去，在党内、党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要宽大处理这批战犯，不但民主人士想不通，共产党员更想不通。事实上，当时的宽大政策，在党内、党外思想准备并不是很充足的。简单地说，上面与下面比，下面的意见多，党内与党外比，党内的意见多。其实，宽赦战犯，不仅是个政治、政策问题，里面还有一层感情问题。要放他们，宽大他们，从感情上是说不过去的。这些战犯，过去多半是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家伙，许多人的亲人、朋友死在他们手上，自己也因为他们常年提心吊胆，苦度岁月。如今终于翻了身，抓住了这些罪人，却要对他们实行宽大，确实情理难容。

但是，从整体看，大多数人同意中央的精神和“从宽处理”方针，认为党的政策英明、伟大，体现了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史无前例”、“值得载入史册”的。有的说：“宽赦他们一个人，他们周围有许多人感激；杀他们一个人，他们周围有许多人愤怒。我们虽不怕他们愤怒，似不如使之感激为好。”有的说：“我们宽大处理战犯的消息，如果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听到也会后悔早没有做俘虏”，“只要稍有一点人性的人，就不能不从心灵深处受到感动”，这是“不杀而教”、“以德服人”的“仁政”。

当然，也有个别组织或个人对宽大处理的方针表示怀疑、不满，甚至有抵触情绪。怀疑过去镇反是否正确，现在宽大是否右倾。针对中央的精神和罗瑞卿的报告，各界人士对几个重大政策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对国内战犯处理的具体意见：

一是杀不杀的问题。意见不一致，多数同意“一个不杀”；一部分认为“一个不杀”值得考虑，这些人比直接杀人的刽子手更可恨，一个不杀就是宽大无边，不符合“首恶必办”的既定政策。当时福建厦门有个党外人士说：政府不宽大时就严厉镇压，要宽大时就宽大无

边,罪越大官越大的反而处理越轻。还有一个民主人士说,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一个不杀太便宜。也有一些人比较偏激,认为这么处理说明干事就要干大的,做官就要做大官,官越大罪恶越大越没有事,小的就糟了,还杀了,还是“存者庆更生,死者凄不平”,“窃国者侯,窃钩者诛”,到底哪些人称“首恶者”?

有人提出,对康泽、王陵基、徐远举、杜聿明、范汉杰、王耀武、黄维、孙楚等国民党战犯和伪满战犯张景惠(伪满国务总理大臣)、伪蒙战犯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伪蒙军总司令)等,主张要杀。当然,由于战犯的任职和活动遍及全国各地,各地对他们的了解和态度也就不尽相同,所以各地熟悉谁就提谁,不熟悉的即便是罪恶重大的也没有提,这是很不全面。

二是关于释放问题。对国民党战犯,普遍认为中央的政策是符合实际的,应该放。至于放多少,如何放,看法不一:有的主张应根据战犯的罪恶大小,悔改表现、立功情况分别处理;先放小的,后放大的;放小的,不放大的;放文的,不放武的;个别党外人士主张全部释放;还有的认为对抗日时期的战犯要宽,对解放战争时期的要严,放的时候应严格掌握。当时,对伪满伪蒙战犯也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他们都是傀儡,主张放;一是认为他们“认贼作父,欺凌国人”,不能放。无论是国民党战犯,还是伪满、伪蒙战犯,主张杀不杀可以从宽,放不放应该从严。

关于释放的步骤,一般同意先放少数,看看反映,然后再继续放。有的主张先定罪判刑,再考虑宽大释放;有的主张为防止死硬分子伪装悔改,先放一些以观后效,如果效果不好的就要慎重考虑一个时期,效果好可将在押的宽大处理;有的主张“假释”等等。

三是关于考虑群众的情绪问题。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制定处理战犯的政策时就有考虑,不杀、放人,都应反映群众的情绪,体现人民的意志。所以不少地方和部门提出,要向人民群众作好宣传教育和解释工作,这个工作要做得深入、细致、耐心,特别是对“苦主”的工作更应该做好,不能有丝毫的疏忽。

国民党战犯的成员比较复杂，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与有关的人的关系，都是千丝万缕、纵横交错、纷乱复杂的。同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即与台湾的关系，它涉及到国家统一的大事，所以对国民党战犯的处理是比较困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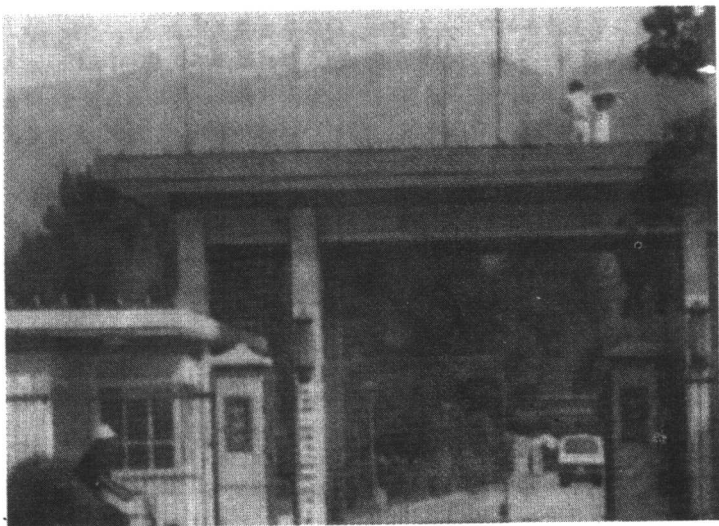
从上层人士、各地各部门和人民群众的反映和意见看，在当时要提出一个明确而立即可行的处理国民党战犯的政策和步骤，难度较大。而要处理日本战犯和伪满、伪蒙战犯难度较小。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而且周恩来在接见日本有关访问团的时候曾答应尽快处理日本战犯，所以本着先易后难的精神，决定对日本战犯先行处理，对国民党战犯待机再议。由于伪满、伪蒙战犯属国内战犯，所以将他们与国民党战犯同时处理。在集中力量处理日本战犯的同时，加紧对国内战犯的调查工作。

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征求处理战犯意见告一段落以后，根据毛泽东“一个不杀”的主张和罗瑞卿提出的“不审不判，集中管教，分批释放”的意见，根据全国政协周恩来“宽大处理”的政策思想，以政协常委扩大会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建议：对国民党战犯实行“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的处理方针。

同时，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由罗瑞卿、孔原、徐冰和徐子荣组成的“处理战犯专案小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处理战犯日常工作由当时的公安部凌云局长主管，由处长姚伦全面负责。有关省、市也成立了处理战犯的专门班子和专职人员。简单地说，对战犯工作，包括在押的每个战犯的身体、生活情况，直接由中央领导，主要由周恩来领导，以公安部为主要办理单位，罗瑞卿部长、徐子荣副部长和凌云局长亲自抓。1964年凌云任公安部副部长后继续主管。

随后，经过“专案小组”的分析研究和大量调查摸底工作，不断给中共中央出谋献策，形成了中共中央处理战犯的总方针，即：对日本战犯，一个不杀，宽大处理；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二、由功德林到秦城



秦城监狱

研究秦城监狱的历史，首先就得从功德林监狱说起，它是秦城监狱的前身。

功德林监狱曾经作为北京战犯管理所，关押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战犯，即国民党战犯。

说秦城监狱是特殊监狱，源于1960年。首批特殊犯人由功德林迁往秦城，成为秦城的第一批囚徒。自此，秦城监狱作为中国第一个监狱开始它的特殊使命。

1. 战犯汇入功德林

功德林监狱位于北京城北的德胜门外，这一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当地曾有一座叫做“功德林”的庙宇。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时，当时的执政者在这座庙宇的位置上兴建了一所“模范监狱”，又称“京师第二模范监狱”，1913年被改名为宛平监狱。1914年开始，由当时监狱中的囚犯对监狱进行重建，1918年竣工。这座监狱占地百亩，四周围有丈余高的围墙，墙头灯火通明。

进入监狱，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广场，南面三幢房子，前两幢是二层楼房，后一幢是平房，三幢房屋之间有两个花园。大门东面是一排排平房，共16座，呈放射形围绕在一幢几十公尺高的八角楼四周。这座八角楼实际上是一个十六面亭，每面都对着一栋监房，亭上的哨兵可以把八条胡同、十六个监房的情况尽收眼底。十六面亭下有两个小八角楼，它们的大门都正对着胡同，每个胡同都有一个铁栏，打开铁栏，便是一个个由两壁胡同围成的三角形地带。每座胡同都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的顺序编名。功德林的16座监房共有350多间，能容纳犯人一千人以上，内部设施举凡厕所、浴室、放风庭院等一应俱全。

1956年1月，公安部陆续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近两百余名战犯集中到功德林监狱。具体负责管理这些战犯的是公安部十三局。秦城监狱从成立到今天，始终都是由这个局分管，而局长则陆续换了数任。

1949年，中共公布战犯名单。到1956年，战犯这一名称，扩充到被俘的高级军政人员。最初公布的两批战犯，均为国民党内的上层决策人员。文官是省长、部长以上，武官是中将级以上。1956年成立北京、西南、西北、抚顺等战俘管理所的时候，便把被俘的文官降到行政督察专员和厅长级以上，武官降到少将级以上，个别上校一级

的也“提升”为战争罪犯进行集中学习改造。这些人中有的地方大吏，有的是握有军权，可以指挥大批军队的高级指挥官，有的是杀人眨眼的特务头子。

当时被集中到此的文官有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天津直辖市市长杜建时、山东省代理主席牟中珩、国民党山东省主任委员庞镜塘和极少数的厅长以及其他国民党省党部的书记长。战犯中武官人数最多，但上将级的只有王陵基、金汉鼎两人。王陵基在抗战时任过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后任四川、江西省主席时，曾兼省保安司令，一直保持上将军衔。金汉鼎是原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风纪视察团上将团长，他和朱德是云南讲武堂第一期同班同学。

中将级的有几十名，如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统率大军几十万的杜聿明，国民党川、湘、鄂三省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山东绥靖主任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兵团司令黄维、廖耀湘等。特务中有与戴笠齐名的康泽，军统局副局长秘书张严佛和将官级的大特务文强、沈醉、郭旭、成希超、董益三等。

就监狱而言，功德林的条件是不错的。尽管监狱规定了明确的作息时间，但在院墙内相对管理较松，白天夜晚房门都不关，上厕所时也没有人站在窗口盯着，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对此常说：“这才算是解放了！”战犯们可以在花园庭院作各种体育活动，如打太极拳、做操等。在娱乐方面，有围棋、扑克牌、乒乓球等。每逢重大节日，他们还举行文艺联欢会，表演自编自导的节目。此外，他们每个星期都有一个洗澡的机会。

战犯们对监狱内的设施也很满意。监狱中有一个图书室，除了将战犯们的私人图书集中到图书室外，狱方还为战犯们购置了大量书籍和报纸，其中最主要的自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其次是社会科学、各种传记及文艺小说等。战犯还可以请示购买自己喜欢阅读的东西，廖耀湘就买了一些法文书，津津有味地一看就是一两小时，许多人为此取笑他是“一本正经”。

2. 由秦城农场到秦城监狱

初次接触秦城,是到秦城农场参加劳动。在那里,战犯们享受到了在功德林监狱里难以想象的自由空间,呼吸到了功德林监狱所没有的大自然的空气。再入秦城,欣喜若狂的战犯们本以为又回到那朝思暮想的农场,结果来到了以前管理员向他们解释为“体育学院”的秦城监狱。

◆初入秦城

1958年10月,战犯管理所开始组织身体强壮、有劳动能力的战犯陆续到公安部绿化基地——秦城农场参加体力劳动。

秦城农场相对于功德林监狱而言,管理要宽松得多。犯人们住的是干部们劳动时住的宿舍,宿舍前面是一片空地,对面是厨房。住在那里,不但没有围墙,就连大门都没有,窗上也没有铁条,只是把房子后面朝北那面的窗子临时用砖封起来。

劳动是在离住地不远的山坡附近,基本上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这就可以经常到外面走走,让人多少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当战犯们正在秦城农场劳动时,一座监狱正在他们身边悄悄地兴建,虽然狱方不会向战犯们坦告实情,但还是引起了战犯们的注意。

曾任国民党将级军统特务的文强回忆说:在我们劳动经过的地方,有一片地围起了高墙,里面正在盖房子,而且看起来很讲究。我们曾向管理人员询问其用途,回答说是一座很先进的体育学院。不久后,这座“体育学院”的高墙上又架起了电网,再次引起战犯们的议论。得到的答案是现在一切都在学苏联,搞正规化,而且这里地处山区,必须加强保卫等等。

即使当时的战犯们猜出这里修建的是一座监狱,也很难将其与自己的命运连在一起。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功德林,况且当局正对他们采取越来越开放的管理做法。

1959年11月底,在秦城农场劳动的全部战犯回到功德林。在这之前,战犯们已经知道政府将特赦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政治犯。这一消息,令每个人都兴奋不已,因为“改恶从善”的标准很难把握,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觉得自己合乎条件,应获特赦。在最初回到功德林的日子里,狱方没有安排学习和劳动,只是让犯人们洗衣、理发,把个人卫生搞好,这就更平添了他们的信心。

但是,特赦的结果令大多数人失望。只有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曾扩情、陈长捷、杨伯涛、邱行湘、周振强、卢俊泉十名战犯获得第一批特赦。功德林只送走了十名“改恶从善”的先进分子。真是少人欢喜多人忧啊!毕竟大多数人还留在功德林,互相比较一下,很容易找到心理平衡。喧闹了一阵后,功德林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再入秦城

第一批战犯获特赦后,也就是1960年春天的一天,狱方突然宣布全体战犯集合,管理员说:“明天,全体搬往秦城,所有的东西都带走,老弱病残全部都去,望大家赶快准备好。”话音刚落,院子里立刻骚动起来,许多人都十分高兴,他们以为又要回到那个曾经住过的农场干部宿舍,既有好的伙食,又有相当范围自由的那个秦城农场。有人高喊:“别了!功德林!”“别了!监狱!”有几位佛教的信徒更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这回总算是功德圆满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战犯们便整理好行李,眼巴巴地等着汽车的到来。但直至吃过午饭也没有消息,急得廖耀湘站在二门口不停地张望,不时用手拍着大腿。

下午3时,大巴和卡车终于出现在监狱大门口,管理员打开通向

八角亭胡同的第二道铁门,大喊一声:各组按顺序带好行李准备上车。虽然没有任何告别仪式,但每一名战犯都不自觉地最后看功德林一眼,沈醉默默地说:“永别了!这辈子我决不愿意再光顾你了!”

汽车经过小汤山温泉转弯向秦城驶去时,看到小汤山温泉浴室流出的水在空中冒出的热气,战犯们都高兴地谈论着上次到秦城农场劳动时,用温泉洗澡的乐趣。过去在功德林留守没有去农场劳动过的人听了更是乐不可支,相信将来也会每星期来享受一下温泉的滋味。

战犯们正兴高采烈地议论温泉浴,汽车已开到了公共汽车的终点站——秦城站的小桥上了。经过这座小桥向右转,便是他们曾经劳动过的葡萄园,再往前走不远就是农场宿舍。但汽车没有右转,而直接向前驶去,进入一个由庞大楼群组成的大院,四面高墙上布满电网。这就是去年他们在农场劳动时日夜施工,颇具神秘色彩的“体育学院”。

正当许多人对此充满疑虑时,管理人员宣布:这里是秦城监狱,有四座楼房,你们住在最后一座的楼下。休息时可以在楼前后空地上活动,但不能到别的院子里去,也不准上楼……希望大家遵守狱规!这时,犹如当头泼了一瓢凉水,战犯们除了沮丧,就是无奈。

作为一座新建的监狱,秦城的设施比功德林好得多,每个房间都很大,玻璃是白色的,只能透光而室内的人看不到外面;室内设有卫生间,有洗脸盆和抽水马桶。不过,水龙头的开关是用脚踩的那一种,每层楼都有淋浴设备,并配有洗衣机。上述设备按照当时的条件,可称得上是一座第一流的高级监狱。更为特殊的是,少将以上军衔者,还有专人为他们洗衣。

与秦城监狱的其他犯人相比,战犯们享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他们不仅可以在上监区内行走,如遇需要,如劳动等,还可以到监狱外活动。由于监狱大门到牢门,前后需要通过九个大大小小的铁门,对此,有战犯戏称自己是“九门提督”。可能是由于新建监狱的缘故,监狱中竟没有监规,而是由战犯学习组长自己制定。

1960年11月28日,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东北剿“共”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罗历戎,以及胡临聪、陈金城、李以勳、宋瑞珂、庞镜塘、沈醉、夏建绩、董益三等11人成为第二批获特赦的战犯。此后,1961、1963、1964、1966年又先后特赦了四批战犯。由于特赦一批接一批,没获释放的战犯并不心急,知道早晚会上轮到自己,谁知剩下的一等就是九年。

◆“文革”中的秦城

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陷入一片混乱,特赦战犯的事自然无人过问,秦城的战犯们开始还可以过一种颇为悠闲的生活。

监狱被军队接管,军管人员的到来,使原管理处的干部们都靠边站了,有的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都是要批臭打倒的对象。他们在反省、在写检查、在交待、在劳动改造。军管人员所住的大门口,用白石块砌起一座大标语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字样赫然在目。

战犯们经常可以听到军管人员粗暴地对待“走资派”,一阵怒吼,一阵拍桌摔凳,一阵怒骂,一阵拳打脚踢,令人不寒而栗。秦城在此之前可以堪称一座模范监狱。一旦一切失去准绳,被乌云笼罩,也就变成一座愁城了。

军管后的新规定:战犯之间,不准互称“同学”,要称“同犯”。一天,一名战犯外出挑水归来,痛彻地告诉难友,战犯管理局苏局长、姚局长、孙副局长等等老干部都靠边站被打倒了,他们住牛棚,作苦工,挂牌游街。他们被戴上脚镣手铐,昼夜遭审讯。

战犯们听后非常难过,有的人低声哭泣。为什么好人被折磨?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军管人员找战犯们谈话,要求交待这个,揭发那个。作为战犯,自知要远离是非,环境迫使他们学会了一套避祸方法。在被问及对一些政治事件的看法时,战犯们自称自己是一介武夫,只知在战场

上拼命,不懂历史,不懂哲学,更不懂政治,和文盲差不多。无论军管人员怎么说方的是圆的,圆的是方的;或者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战犯们既不反对,也不拥护。让学习就学习,无非是照本宣科。监狱中只能读到《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阅读下来,更是心乱如麻,彷徨终日。

随着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永远健康”喊得愈响,被投入秦城的“走资派”也越来越多,最多时达500余人。战犯们住在白楼上,可以居高临下,四下眺望;也少不了要外出打扫清洁卫生;还要经常外出劳动,栽花种树、整修农田。因此,可以看到“文革”中秦城监狱的一片混乱现象。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有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外调人员和审讯人员,忙忙乱乱,有时通宵达旦地提审,大吼大骂,拍桌瞪眼,声震屋瓦,不仅被审者胆战心惊,旁听者也是人人自危。

在这场“浩劫”的年月里,监狱的军管人员前后调换过多批。尽管粗暴无知者占多数,但其中也有明白事理者。有一位姓贾的指导员就很熟悉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和改造政策,煞费苦心地在暗中帮助一些遭难的“走资派”。

一次,他找一名战犯谈话,很严厉地说:“你希望早日特赦,你的心情容易理解。其实,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是在保险柜里,又何必急于出去?”这名战犯听了这两句有头无尾的话,真不知如何回答。一个阶下囚还谈得上“福”么?争取新生怎么不必“急于出去”呢?为什么把监狱比做“保险柜”啊?

事后,另一名战犯劝解说:“我们确实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且不说在外面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日子不好过,你看看在楼下各院里关押的‘走资派’,每周只有一小时‘放风’,剩下的时间就是受审,挨骂,挨打,受折磨。比起他们,我们不是生活在‘保险柜’吗?”

战犯们的确是坐在保险柜里,有时军管人员也对他们说:“你们不必担心,你们是历史罪犯,是‘名牌’的,不同于党内‘走资派’,他

们是暗藏的。”

1968年5月，“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运动的组织者称，这场“斗争”是“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悠闲”了两年时间的战犯们意识到这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势必被卷入漩涡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专案人员，为了制造“走资派”的莫须有罪名，便在战犯身上打主意，希望他们出面证明这些“走资派”谁是叛徒、谁是特务。写吧，违背良心，捏造事实，等于助纣为虐，岂有此理；不写吧，大刑等候，大搞逼供信。

一位年已八十挂零、姓卢的老战犯每次提审回来，都垂头丧气，两泪交流。他说：“提审的法官命令我注意三不准：一不准流泪；二不准倚老卖老，自称年过八十；三不准提‘走资派’中任何一个人，只准提‘走资派’。天啊！我泪不准流；我年过八十不准提，请问他们一开头就问我的姓名、籍贯、年龄……我该怎回答呀？什么‘革命派’、‘走资派’，我知道谁‘革命’、谁‘走资’啊……”不久，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与战犯们隔离，不知去向。

贾指导员对这些乱七八糟的提审，也是很不以为然。他担心战犯们受不了逼供信，受不了疲劳轰炸，便轻声细语对被提审者说：“实事求是，有啥说啥，前途总是光明的，要相信党。”时光转入20世纪70年代，林彪题写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党的基本路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两个大标语牌不见了，大得出奇的林彪画像也不见了，墙壁上奇谈怪论的语录也不见了。这立刻引起敏感的战犯们议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军管干部也如同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这次换得彻底，而帽戴国徽、身着蓝色裤子的公安人员又多起来了。令战犯们万分安慰的是，战犯管理局的孙副局长、李处长和汪大夫、李护士相继复职了。

战犯们开始胡乱猜测，谜底终于在1971年10月5日被揭开。那天上午9时，管理处干部领着战犯们到电视室集合，连城里住院治疗的

也被接了回来。这次没有首长讲话,却是由一位管教干部拿起一张纸条,一字一字地念起来:“林彪里通外国,坐飞机向苏联国境仓惶逃跑,于9月13日坠落于蒙古温都尔汗毙命。”

1973年6月9日,狱方又宣布“废除法西斯式监狱制度”,指示:不许虐待、不许辱骂、不许殴打犯人,如有违反者,准许犯人上诉,“保证下情一定能上达”。随之而来的是,学习恢复了,图书馆重新开放;象棋、围棋等娱乐活动重新被允许;温室花圃被恢复;也允许接见家属及通信。

1975年3月,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监狱内似乎政治气氛也有些解冻。姚伦局长复职了,仍兼任全国战犯管理处处长。3月9日,监狱举行特赦典礼,293名战犯被全部特赦。

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留在北京的大都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考虑到这些人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政协每个星期都派汽车接他们去学习半天。在“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下,这些人都成为全国知名的爱国人士,并被陆续安排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三、监狱中战犯的改造制度



被特赦的战犯们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这是中国政府改造战犯的基本政策。公安部针对国民党战犯的自身特点在具体执行中，采取了“思想改造为主、劳动改造为辅”的方法。

通过思想改造，使战犯彻底摒弃旧有的反动思想，从根本上扭转错误的思想认识；通过劳动改造，使战犯由一个养尊处优的剥削者逐渐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通过参观考察，使战犯们亲自感受共产党将一个百废待兴的旧中国建设为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的伟大力量。

在共产党人道主义政策的感召下，有的放矢改造的教育下，顽石点头，铁树开花。

1. 转变犯人的思想

对战犯们的思想改造必须彻底,尤其是这些国民党战犯情况比较复杂,改造的难度很大。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反动思想根深蒂固,认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之所以成了战犯,就是因为打了败仗。对于战败“不服气”,“不认输”,认为“君子不事二主”,既然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就不在共产党面前低头。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改造政策也极为不满,抱着“有生之日即坐牢之年”的顽抗态度。因此,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细致的思想教育,促使他们转好思想弯子,是进行思想改造的关键。

◆战犯的生活待遇

1956年是战犯们被关押后,平静生活中掀起波澜的一年。昔日的将军,今日的囚徒,从各个监狱、劳改农场和看守所等处调集到一起,重逢于北京的功德林监狱。过去的显赫地位,今日的特殊身份,使这些熟人再次相见,无一不感到无比的惊讶和万分的感触。

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被击溃后,被俘虏的高级军官,大部分是被分别囚禁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即使囚禁在同一地区同一监狱中,但因彼此都住单人房间,隔壁是谁,根本就不知道。再加上当时谣言四起,曾传说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已被“枪决”,如淮海战役下令施放毒气的杜聿明,以及高级将领康泽、范汉杰、廖耀湘等。所以,一旦与这些以前不知下落的人见面,或见到了已“死去了”的人时,无不兴奋异常。

一些先去的,看到后去的熟人,见面第一句话便是用惊诧的口吻高叫一声:“你也来了!”如若见了老朋友、老同学和老同事、老长官、老部下,都禁不住说上几句这样的话:“真想不到我们还能见

面！”或十分感慨地说：“想不到我们都还能活着！”

战犯们集中后，谈得最多的便是自己被俘后的生活情况。由于他们被分别囚禁在不同的地区，当时关于战犯的待遇又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地区的管理办法也有很大差异。就物质生活而言，各地待遇就参差不齐。有的生活条件非常好，吃的是与解放军高级军官一样的“小灶饭”；有的就比较差，做了名副其实的“犯人”，每天还要劳动十来个小时，吃的还是和解放军战士一样的“大锅饭”。

物质待遇尚且如此，精神上的待遇更是千差万别。有些地方，对这些战犯很照顾，如集中在山东的被俘的大小军官，一律和解放军战士一样，按时发衣服和日用品，穿与解放军士兵一样的衣服，但没有帽徽、领章，每月还有5元津贴。有些地方就把这些被俘的高级军官当成要犯，不但要带上脚镣手铐，就连晚上起来解小便，甚至翻一个身，都要先喊：“报告！”并要等到站在窗口的战士同意，才能去做，否则就是违犯狱规，没准还要受到严重处分。

当然，从整体看，对这些战犯的管理还是比较宽松的。一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可以在指定的范围内散步，犯人间也可以聊天，没有极特别的情况，从不随便打骂。但是，各个看守所为了防止犯人越狱，在夜间管理都是相当严格的，不准随便走动，也不允许聊天，作息时间也是一定的。

战犯管理所成立后，由公安部统一领导，将各地的战犯集中起来进行管理，这样，战犯的待遇就完全一致了。战犯集中后，公安部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提高犯人的生活待遇，各地区统一划齐，每月生活费16元。这一标准的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不但如此，在管理上较之过去也宽松多了，房门不再加锁，只要不离开管理所，犯人间可以自由往来、交谈。而且规定了合理的作息时间，每星期还安排看一次电影，以前若有脚镣手铐的都统统去掉。因此，战犯们心情是比较愉快的。

不可避免地，这些宽松的生活，优厚的待遇，令一些级别较低的被俘中下级国民党军政人员不服。他们发出各类“反动职务越高，罪

恶越大,待遇越好,罪行越小,生活越苦”的牢骚。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对此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明,称:这些人过去的生活都比较讲究,现在当然不能让他们再过那种腐败生活,但为了改造的需要,先得在生活上让他们感到满意,才能使他们接受改造。何况这些人一般都年岁比较大,身体比较差,而且他们的改造时间要比一般人长,所以要提高一点生活待遇;相对而言,一般被俘的军政人员,改造时间要短些,身体较好,因此没有必要使他们的生活条件超过战士和一般人民的生活。

对于这样解释,当然不能使他们满意。但那句“改造的时间要短些”的话,让他们找到了心里平衡。关在监狱中的人,都希望早点恢复自由,谁也不愿意因为提高生活待遇而延长改造时间。所以闹过一阵儿之后,自然也就平息了。可是一些老百姓却不理解,这里就发生了一件令人捧腹的事情。

故事发生在重庆原属中美合作所范围的、军统局缫丝厂办事处改成的战犯管理所。这个管理所对战犯管理比较宽松,犯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走动,且生活待遇很好。当地许多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人,和收入不多的人,便去打听,这是个什么训练班,要什么条件、什么手续和什么单位保送才能进去。但是得到的答复总是一句话,你们不够条件参加这个训练班。百姓对此也没有疑问,因为训练班待遇这么好,要求的条件当然高了。于是有不少人暗自努力,希望能创造条件,争取参加这个训练班。

直至他们当中一些人发现这个训练班的受训人员中,有过去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廖宗泽,以及四川军阀中某些司令、参谋长一类的大人物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受训的是这些作恶多端的人。难怪说我们条件不够,看来这一辈子自己也没法创造出这种条件了。

但是这也引起了许多麻烦。因为这些人当年在四川,杀人无数。难免会有家属前来兴师问罪,公安部考虑到这一点,便把王陵基、徐远举等人送到北京。但是沈醉却未能幸免,有一次,沈醉在散步,被

一群人撞见，其中有人认出了他，上去一把将其抓住，逼问沈醉把他们的父、兄抓到后怎样处置，并提出：“生要人，死要尸！”沈醉感到左右为难，幸好管理所的负责人闻讯带了几名解放军战士赶来解围。过了几天，沈醉便和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渡、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参谋长王靖宇以及曾任江阴要塞司令的孔庆桂4人一齐被送到了北京，进入了功德林。

解放军“不搜俘虏腰包”的政策对战犯同样适用。在功德林监狱中，还允许战犯保留私人物品，带在身上的钱物也不需缴公，但如属于公款则应没收。解放前夕，当时的国民行政院院长阎锡山曾一次给王陵基8万两黄金，宋希濂等人，都带有几千两黄金，这自然是在没收行列，而带在身上的黄金、美钞便归个人所有。因此，在战犯管理所中，也有一些“财主”，财大气粗。

政府考虑到这批战犯年龄大多在六十上下，少数在七十以上，像王陵基、曾扩情、范汉杰等人还患有多种疾病，1957年管理所将其分批送到复兴医院进行一次全面身体检查，医院不仅为他们补牙、镶牙、医治牙病，还为他们进行视力检查，并重配眼镜。

当时，中国还不能生产链霉素，为了治疗杜聿明、范汉杰等人严重的结核病，国家曾专门到香港、澳门采购各种药品，可称得上是用心良苦。在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杜聿明等人对政府的敌意慢慢消除，最后变成了感恩戴德，以后为国家做了不少好事。

◆ 监狱中的“自我教育”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对战犯改造方面是相当成功的。毛泽东曾为这批战犯专门制订了“改造政策”，其中有一条就是“经过劳动改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于国民党的中、低级军政人员，各地劳改农场都明确执行了这一政策。而作为管理战犯的公安部，对于关押在各地战犯管理所中的战犯，则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政策，以思想改造为主，劳动改造为辅，所谓的劳动也只是象征性

的。功德林监狱只是宣布战犯要在每个星期中,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而且是轻微的劳动,如缝纫、理发、洗涤、挑饭等,纯属“自我服务”性质。即使如此,也采取“自动报名,量力而为”的方式,完全由战犯自己选择。

就是这样,这些一向养尊处优,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昔日“大人物”也不乏逃避劳动者。对于六十上下年纪的人,找一点毛病并不是难事,有些身体健康的,在去医务所之前,先喝上一大杯滚热的开水,马上去试口含的体温表,温度一下子就会升到摄氏38度,这样全体或是半体的证明就到手了。当时监狱中的几名医生对战犯们也是尽力照顾,即使没什么病,只要说晚上失眠,起床头痛,除可以免除劳动外,医生还要安慰几句:不要背包袱去胡思乱想,好好学习,注意身体等等。

这些过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惯了的人,要一下子把多年养成的习惯改掉,难度太多,必须慢慢来。而且主要是靠他们自动自觉接受改造,其次是别人的帮助和适当的一点压力,这就是管理干部按政策给予教育。

功德林监狱将近200名战犯被编成11个学习小组,从战犯中选派正、副组长。采取战犯互相帮助批评的方式,而不是由管理人直接来批评犯了错误或不接受教育改造的人,更绝对禁止打人或骂人,这有助于减少一些战犯的思想顾虑,便于改造。

当时,战犯改造有一条主要原则,就是要让这些战犯们自觉接受改造,而不是采取强迫方式。这里讲的自觉,首先是学习认真。而学习认真,除了在学习时能积极发言,在批评别人时能真心诚意帮助,检查错误时能挖真实思想和虚心接受别人意见并改正等之外。还有一项是要经常写墙报,讲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暴露自己的思想等。

战犯“自我教育”的一种方式,是在墙报上发表自己的思想。当时功德林有一块“新生园地”墙报,谁想写什么,都可以贴上去,有错,自然会有人来纠正。因此,打笔墨官司的事常有发生,而且有时

还很激烈，可谓相当民主。每学一篇重要文件，重要社论，或者听了首长一次讲话、参加一次国庆观礼，甚至看过一次电影，都可以写一张墙报贴到“新生园地”。

这也引来了一些问题，有些“识时务者”便总结出一套“监狱八股”，说形势时，便是“当前形势很好，而且越来越好”；读文件时便写“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等等。也有一些心存不满者，借“新生园地”发泄内心的郁闷和不满，这样，往往会引来一群“同学”对他的批评，唇枪舌战就在所难免了，偶尔还会以这片“园地”为战场，双方各抒己见，这也成为管理所人员发现战犯思想苗头，进行教育的最好时机。

首长讲话，是战犯改造的另一种方式。公安部曾不定期地邀请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校等被认为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到战犯管理所讲话，讲政策，讲形势。由于不便向战犯们公布真实身份，所以便一概称为“首长”。按照规定，对每个战犯写的东西，自己不愿意公开的，别人不得强迫他公开。此外，功德林的战犯彼此都以“同学”相互称呼。这种做法是为了维护战犯们的自尊心，让身居狱中的战犯，忘记自己是在坐牢，而是像在什么训练班学习一样，这也算是对没有得到自由的战犯们的一种“安慰”吧！

1957年，政府将功德林关押的战犯名单通报给北京的各界民主人士，组织他们中的自愿者与战犯们交谈，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向战犯们讲述党和政府的宽大教育改造方针和新中国的大好形势。当时的许多著名人士，如程潜、张治中、邵力子、卫立煌、傅作义、章士钊等都来过，他们大多是战犯们的老师、上司、同事或亲友，其中更有人是社会公认的德高望重的长者，所以这种方式效果颇佳，受到战犯们的广泛欢迎。这项活动历时数月，使功德林空气为之一振。

战犯中的杜聿明和张治中、邵力子有师生之谊；程潜、傅作义等曾是他的长官或同僚；郑洞国、陈明仁等则是黄埔第一期同学，因而他接待的来访最多。特别是他的大女儿杜致礼的公公、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授的来访，杜聿明实感意外。

功德林中的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除杜聿明外，还有宋希濂、刘家树、韩浚、周振强。作为黄埔军校的教官，张治中以老师的身份与他们侃侃而谈。据郑洞国等人回忆，张治中说：

诸位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和我风雨同舟，相处多年，公谊私情深厚，我是很怀念诸位的。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交待了处理你们诸位的政策，对你们一律宽大，进行教育改造，而且是认真耐心的教育改造。让你们明辨是非，认识真理，给你们重新做人的机会，能继续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贡献。

你们所犯的过错和罪恶，绝大部分是旧社会历史条件的影 响造成。……对历史影响造成的罪恶只要认识到了，而且彻底悔改，便不咎既往，一律宽大处理。

◆ 思想改造难

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犯人能真正在思想上认罪服法，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劳动锻炼与思想改造相结合”的改造罪犯政策。在这一原则下，对战犯的改造，采取了灵活的方法，即思想改造为主，劳动改造为辅。这些人过去都是国民党上层统治者，许多人曾亲自参与制定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不少人是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或统率重兵的将军。位重权高，对国民党政府极其依恋。

对这些人来说，单靠从事劳动是无法改造好的，必须从思想上彻底扭转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让他们在灵魂深处有一个彻底的醒悟。但，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思想改造比劳动锻炼要难得多，让这些过去的国民党将军和大官们从事一些简单的劳动，并不十分困难，而让他们一下子放弃几十年的信念，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却是难

上加难,且曲折、复杂。

困难,主要是由于他们对蒋家王朝效忠的思想根深蒂固,要想从根本上扭转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曲折,主要是由于犯人在思想改造过程中的反复;复杂,主要由于这些人过去在国民党各部门都占据显赫的地位,他们的罪行总是纵横交织在一起的,在认罪过程中,难免会有上推下卸的现象。而且,思想改造不像劳动锻炼那样一目了然,干了就是干了,没干就是没干,思想存在于人的头脑当中,对于善于伪装的人来说,是很难洞察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的,这就给思想改造增加了难度。必须经过细致的观察、正确的分析,才能逐渐了解犯人的真实思想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沈醉的思想改造在战犯中可算突出一例。据他自己讲,在11年的改造过程中,他有不少思想问题,有的已解决了,有的解决得不彻底,有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他还举了三件事为代表,说明自己思想改造的难度及复杂程度。

第一,对认罪问题有过不少抵触。据沈醉自己回忆,那还是在重庆学习时,几个和他同在军统局的老同事指出,他在军统中,曾长期从事逮捕、绑架、暗杀等工作,而且还培植出大量从事这类工作的学生,他们认为死在沈醉手中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爱国青年等是数不胜数的。

一开始,沈醉不认为那些事是罪行,他的观点是,那些人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反国民党的工作,如果他落在他们手上,也是死路一条,这是各为其主。如果非说有罪的话,那么双方都有罪。现在只说他有罪,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打了败仗,否则,他不但无罪,反而有功。

他还申辩道,至于在他手中杀死过多少人,他是有数的,虽然记不清姓名,但大致数目是清楚的。他认为,说死在他手上的人数不胜数,太夸张了。他当时特别强调,他长期是奉命而行,只有在云南快解放时,由于情况很乱,来不及请示,也不容许迟疑,才自己决定杀过一些人。

对认罪问题有抵触情绪,是战犯改造过程中一个普遍现象。罪

越大,问题越严重,这是谁都清楚的。所以在认罪过程中,能推则推,能赖则赖,直到证据确凿,万不得已时,才不得不承认。对于这一问题,只能一方面说服,一方面搜集证据,在证据面前,令其口服心服。

第二,不承认阶级斗争。在沈醉的心目中,他的所做所为,不是为资产阶级效力,与无产阶级斗争,而是为了国民党政权的整体利益和自己的私人利益。针对这一思想,战犯管理所曾专门给他开了一个帮助会。会上,沈醉举出了1949年9月9日晚上,在云南省昆明主持的一次大逮捕来作说明自己的观点。

那次沈醉预计要逮捕400多人,都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一开始,他叫昆明警察局看守所长腾出十多间大房间准备关人。指挥由刑警大队队员、保安警察和宪兵混合组成的20个小组,按名单去搜捕。不一会儿看守所长来向他报告,说十多间房间已经满了,睡下去连身都不能翻,他桌子一拍:“我抓他们是来坐牢的,坐牢就是坐着,谁叫你让他们睡大觉的?”所长低着头走了,一会又来报告:“坐也坐不下了!”“站!”他只回答他一个字。不一会儿,他又来报告:“站也站不下了,不能再抓,没地方可以关了!”

沈醉略一考虑便叫他把所有的强盗、小偷、流氓、扒手等刑事犯全部释放,腾出房间来关政治犯,他站着不走,嗫嚅地说:“要是那样做,整个昆明的社会不是乱成一团糟?”沈醉猛地站了起来,大声呵斥他:“快照我的命令去办,释放刑事犯只是乱了社会,乱不了国家!强盗抢不了你也抢不到我,政治犯是要我们的政权,要我们的命的!不执行马上枪决你!”

沈醉说完之后,站在一旁听他讲的管理员立即指出:“你不承认有阶级,也不承认有阶级斗争,这就是最生动最具体的一场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激烈斗争,你可以好好想想。”对此,沈醉是不能完全理解的。管理员让他“好好想想”,至于怎么想就是他自己的事了。但是,紧接着发生的事却将他的思想暴露无遗。

当天晚上,沈醉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今天我也变成无产阶级

了！”

“放屁！你也配做无产阶级！”

“你还胆敢诬蔑、侮辱无产阶级，你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大资产阶级。”

当即，就有几个同学厉声反驳他。

沈醉也毫不示弱，大声喊道：“今天我洋房、汽车、黄金，甚至一家老小都没有了，只剩下光棍一个，筷子一双，还不算是无产阶级吗？”

这在改造所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也是一个很严重的思想问题，有一位管理员耐心地向沈醉讲解了两个阶级的区别。他从两个阶级的不同出身、人生观代表的不同利益方面谈起，一直谈到他们在国内革命和世界革命中的不同立场、观点及表现等。

沈醉当时不以为然，但在多年之后，他逐渐明白了，自己确实称不上是无产阶级。

沈醉的第三个思想问题，是对多年培植过他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私情未能忘怀。沈醉也意识到戴笠带着他干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事情，这是不易得到人民的原谅的。但是戴笠毕竟曾经对他很照顾，有提拔、奖掖之恩，这种私人间的感情他是无法割舍的。当年，戴笠的飞机失踪后蒋介石决定要派一名将级人员持他的手令到解放区去营救戴笠，别人不肯去，只有沈醉愿前往。

因为当时已无任何信号显示飞机的具体位置，所有的联络都已中断。据估计，飞机一定是被迫降落在解放区。在国共两党关系十分紧张的年月，去解放区是有危险的，况且要从高空跳伞下去就更危险了。抗战胜利后，已抢到了大城市的洋房汽车的沈醉，完全可以不去。但出于私情，他不顾家人的拦阻，毅然决定要去。后因发现戴笠就摔死在南京附近时，他才没有去冒险。

狱中的沈醉仍没有忘记戴笠的所谓恩情，每到戴笠摔死那天，他常提醒在一起改造的军统老同事：“今天是3月17日。”其目的不言而喻，是为了纪念戴笠。

管理员知道这件事后,没有批评他。相反,还站在他的角度,指出他没有称赞戴笠反共反人民的做法,只是在私情上怀念他,没有太大的错误。还拿共产党允许子女对反革命父母在思想上划清界限后,私人间可以往来一例作比较。同时,管理员告诫沈醉,以后自己怎么想,放在心里,不要去提醒别人:“今天是3月17日。”这样影响不好。

这件事对沈醉的思想改造触动很大,他亲身体会到了共产党对战犯的宽大政策,在以后的改造过程中,他的态度明显好转了许多。

◆虚心接受,存心不改

战犯思想改造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希望通过对马列主义理论的了解和掌握,使这些人逐步放弃错误的旧思想、旧理论,用马列主义重新武装他们的头脑,达到思想改造的真正目的。

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是学习的一个重要途径。战犯所的图书室中,摆放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供战犯们参考、学习。

有一位战犯编号0053,原是大家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他所借的马列主义著作,是最多最全的。然而这位“政治权威”,经过多年的钻研,却得出了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认为: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和月球绕地球、地球绕太阳一样,循环不停,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后,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又再升到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当然,也和地球绕太阳一样还得继续前进,便又回到了原始公社一样的社会,即没有阶级和国界,社会财富十分丰富,比各取所需更方便,基本上消灭了财产的所有权,并且又恢复到母系社会,儿女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了。

其谬论刚一出笼,大家没有太在意。当他的发言记录被退了回来,管理员要求大家研究一下他的发言到底有什么错误时,小组长才意识到:“大事不好!”

当时在学习会上，有专人做记录，会后，由小组长签字，再交给管理员审阅，管理员对每一份发言记录都要认真看，有时还要摘一些送到上级部门去。当他发现0053号的发言有严重问题后，便将发言记录返回给小组长。

管理员问道：“这个记录你看过没有？”

“看过！”

“0053发言后，有没有人提意见？”

“没有！”

“你为什么也不提意见呢？”小组长已意识到一定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了。

小组长当即宣布，整个上午的学习时间研究0053的发言。经过仔细推敲，大家才搞清楚。原来0053借谈社会发展规律，诬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到最后，便成为“共产共妻”。

像这样原则性的错误，马上便由小组批判升级到小组批判，最后便提高到全所批判。“新生园地”顿时成了战场，几乎人人都写了墙报，批评其人观点。0053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还写墙报反驳别人对他的批评。

有一段时间，“新生园地”火药味极浓。尽管这样，所领导并没有给0053处分。他既没被关进单人房，也没被带镣铐，而且同其他犯人一样，照常进行学习和劳动。

这件事闹了一阵子后，处长亲自在大会上作出结论，让他不要背包袱，照常生活、学习，什么时候认识到错误，可以在小组学习会上或墙报上表达出来。

类似于这种思想相当顽固，不肯认错的人不在少数。管理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总是以博大的胸怀和坚毅的耐力一点点感化、教育他们。

还有些人存心不改造。如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在改造所中就是“落后分子”。他不仅自己不求上进，还经常用一些不三不四的言语去讽刺那些“积极分子”。以至于生活检讨会上，常常成为主角。

遭到批评后，他不服气，经常是牢骚满腹，再加上他整天吊儿郎当，胡说八道，挨批评受教育便成了家常便饭。

有一次，他挨了批评之后，在厕所内，又唱起他在狱中最爱唱的《四郎探母》，来发泄自己心头的不满，一句“……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再一个“我好比”还没有唱完，就被刚刚走进厕所的一位集团军司令当场质问：“这样一个严肃的改造机关是‘笼子’吗？你是什么样的鸟？你要展翅飞回台湾吗？”

汤尧这个人谄于事故，十分圆滑。经过多年的监狱生活，他已摸透，对待批评的最好办法是装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对于别人的指责全部接受，然后再变本加厉地大骂自己一通，便可平安过关了。用他自己的话可以概括为“虚心接受，存心不改”。他还很会钻空子，管理所的负责人经常向战犯们讲到，批评与被批评的人，应当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因此，他每次挨批后，小组长照例要他自己表表态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回答：“我诚心诚意地，愿意加勉。”显然，是说别人的批评错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有些犯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思想比别人“进步”，常常挖空心思抓别人的小辫子，借批评别人来博得管理所领导的信任和称赞，以求提前获得释放。而负责战犯管理的每一个干部，几乎都是经过仔细挑选来的，他们每天都要研究这些战犯们所使用的那一套一套的新旧手法，决不会因为在一次批评会上有什么“进步”表现，就轻易作出什么好与坏的结论，而是要在长期、全面、仔细、认真的考察中去看每个人的表现，决不轻信任何一个战犯的一面之词。

汤尧早就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从来就不把批评当回事，常常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这次他见被人撞了个正着，想赖也赖不掉，便痛痛快快地承认错了，但对方却不肯轻易放过他。

次日上午，便召开了对汤尧的批评会，主题是让汤尧检讨唱《四郎探母》的思想根源。知趣的汤尧一开场就认错，而且态度也显得很诚恳，表示“决心痛改前非”，“保证不再重犯”。很多人都知道他又在

耍花招，便坚持“一切要提高到原则上”，一定要“深挖思想根源”。

汤尧见实在躲不过去，便有条不紊地把夜晚想好的一套新的东西，搬了出来。他不慌不忙地先咳了一阵，方才慢吞吞地检查起来。他承认自己对“同学”的批评有抵触，想仿效“阿Q精神”来一个自我安慰，把自己比作被“同学”囚禁在笼中的小鸟，希望能展翅飞到人民行列中去，为祖国建设作贡献。

当然，这种检查是无法过关的。在一直被追问受什么反动思想支配下，汤尧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承认了他想早日脱离战犯管理所，逃回台湾去继续与共产党作对。这样，那些磨拳擦掌的人才偃旗息鼓，将其言论整理上报。

此后，汤尧整日提心吊胆。不只是他，几乎所有的犯人都认为这次汤尧肯定要受重罚，就算不把他打入单身牢房，起码也会给他带几天脚镣。然而，处理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但没有对汤尧惩罚，连一句批评的话都没说。相反地，还对汤尧的检讨，大加称赞。说汤尧肯这样大胆暴露思想，是值得表扬的。

一位管理人员在谈这件事时，对大家说，你们当中有这种思想的人很多，只是没有人敢这样暴露。没有这种思想的人，可能也有，但不会很多，政府是鼓励大家要敢于暴露思想，暴露了就会慢慢地去改；不暴露的人，不等于就没有。

这位管理人员又说：有这种思想，一点也不奇怪。一点没有，才是怪事。不过，这种思想会一天天减少、一天天转变，慢慢地由多到少，由少到没有，还得经过一段很艰难的过程。但我们相信最后一定会有绝大多数的人，能完全去掉这种思想。也会有个别的人，要长期甚至永远保留着这种思想，这就是我们经过很久的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顽石点头”，服从真理

国民党战犯思想改造难度相当大，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论框架，而这些人又都是反共、反人民的，必须改造干净。这些人自命为蒋介石的信徒，信仰蒋氏哲学。他们认为蒋介石是中国的“正统”，是“为国为民”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没有阶级之分，阶级斗争是共产党制造的。”形式的理论、思想一套一套的。

针对这些观点和思想，战犯管理所决定集中解决对蒋介石的认识问题，组织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以及其他理论书籍和参考资料。通过自己看书学习，进行思考和辩论，战犯们最后在大量的事实面前终于得出了正确的认识：蒋介石违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蒋介石统治下，中国进一步沦入半殖民地深渊。与此同时，他们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去认识中国共产党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的光辉思想，以及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思想开始转变弯子，认识有了提高。

作为国民党的上层统治者，这些人大都犯下滔天罪行，他们自己也有认识。针对种种犯罪事实，通过学习、思考、认识、体验、鉴别，战犯们渐渐萌发一种自我改造的内在动力，重新认识自己的过去，以致否定过去的所作所为。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经历了由对抗、观望、迟疑、动摇到主动认罪改造的复杂过程。

许多人，像杜聿明、黄维、文强、宋希濂等，通过学习，内心里感到自己“万死不足以蔽其辜”，行动上愿意自觉接受改造，开始相信共产党确实说话算数，不记旧仇，逐渐由不认罪到能够正视过去，由被动认罪到主动认罪，对马列主义书籍和毛泽东著作也感兴趣了，并且开始领会其精神实质。并逐渐由崇拜蒋介石认识到蒋介石的罪行，最后到批判蒋介石，并自觉地与之划清界限。在1958年的“交罪

认罪,检举揭发”活动中,全体战犯向政府写了“请罪书”。他们说:“1949年是国民党反动武装缴械的一年,1958年是我们反动思想缴械的一年。”

1959年10月13日,杜聿明在写了一份《十年思想改造转变过程》的总结中,这样评价自己:

9月18日特赦令发表之后,我感到特赦令是党的宽大政策恩惠到我们一切罪犯,特别是涉及我这个罪无可赦的罪犯,真是天高地厚恩同再造,感恩图报之情罄笔难书。这是党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伟大胜利给我带来的光明前途,是无产阶级伟大人道主义的体现。我衡量自己在改造过程中,改恶从善之心是有的,可是由于学习改造的不够,尚经不起事实的考验。

所谓改恶,就是要改资本主义之恶,特别要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之恶,改私有制之恶,改剥削压榨屠杀人民之恶,改腐朽前生生活之恶,改个人主义之恶,这一切必须深恶痛绝!

所谓从善,就是要从社会主义之善,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善,从党领导社会主义道路之善,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之善,从争取世界和平反对战争之善,从勤俭建国简单朴素生活之善,从集体主义之善。这一切必须一天天增加信仰和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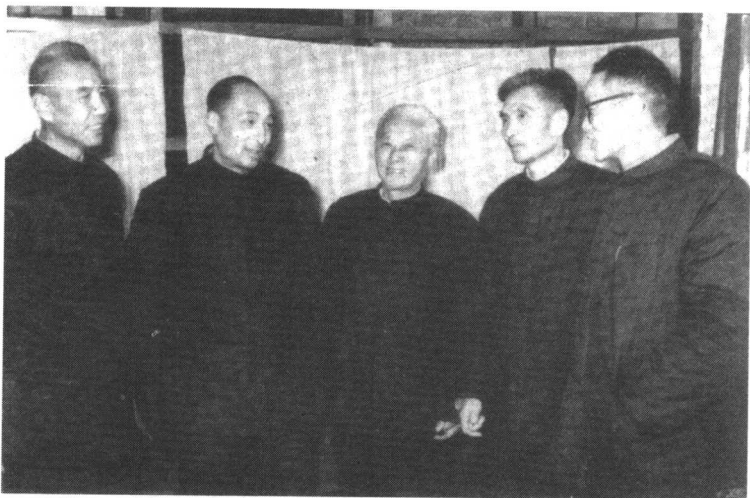
对于改恶从善,杜聿明的想法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说的都是真话,他也是身体力行地去做,所以基本达到了改恶从善的标准,第一批获得特赦,是有一定的示范作用的。

在改造过程中,战犯普遍对共产党的改造政策感恩戴谢。有的说:“我已经70多岁了还依然健在,要不是党的人道主义的优厚待遇,早已化为尘土。”有的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就是在这种恩

情感动下才使这颗冰僵已久的心复活起来了。”

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曾这样说过：“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东西，但革命真理比人的生命还宝贵。我这个过去长期与人民为敌的战争罪犯，今天能改造成成为新人，完全是毛泽东思想对我教育的结果，真是‘顽石点头’真理服人。”中国共产党人从思想上改造战犯的措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 劳动改造为辅



1960年11月30日,董益三(右二)、沈醉(右一)等在北京

中国党和政府所制订的“改造政策”中有这么一条,即“经过劳动改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一政策在实际的贯彻中有一定困难。因为这些国民党高级战犯,过去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大老爷。让他们一下子从被人服侍的“贵族”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谈何容易。

◆大將軍脚踩縫紉機

实行“思想改造为主，劳动改造为辅”的政策，一方面，让战犯参加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既锻炼身体，又培养他们的劳动意识；另一方面，主要从思想上对战犯进行改造，使他们真正从思想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管理干部们经常组织战犯们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而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扭转犯人的思想，让他们放下架子，拿起劳动工具，做一名真正的劳动者。做到这一点，改造所的领导费尽口舌。因为在改造战犯的过程中，采取的是自愿改造，而不是强迫改造的方式。不能以强制命令胁迫战犯劳动，而必须让他们真正从心底里愿意参加劳动。

为此，改造所的领导反复给战犯们讲：人活下来，不只是为了自己，还得做一些对人类、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事。不仅如此，改造所的工作人员以身作则，无论领导还是普通工作人员都从事一定的劳动。刚开始，他们对于参加劳动很反感，但耳濡目染，战犯们也逐渐接受了这一观点，后来经过一段实践，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被迫参加劳动到自觉参加劳动，不少人改变了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错误观点。

最初，他们只是进行一些象征性的劳动。后来，宣布每人要在每一星期中，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如缝纫、理发、洗涤、挑饭菜、烧开水等，并采取“自动报名，量力而行”的办法，任凭自己选择一项或两项，自己认为不能或不感兴趣时也可以不参加。

当然，个别想不通的人还是有，特别是年龄较大，一向有抵触情绪的人，往往会这样的产生想法：没有几年活头了，再争取也还不是一名战犯！针对这一问题，犯人间展开了相互帮助的活动。杜聿明曾帮助过有这样思想的一位“同学”，他讲：

人没有不犯错误的，只要错而能改，总会得到人们的原谅，对于我们来说，战犯只是一个过渡的名词，今后肯定还有一段时间让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历史写好，都还没有到盖棺论定的时候，应当分秒必争才不负此生嘛！

所以在劳动锻炼中，虽有些人拣轻避重，但也没有发现一个公开表示不接受劳动锻炼的。

这些人都是人精，当他们真正放下架子，劳动起来时，竟然都是学一门会一门，而且还干得有模有样。曾经统率过几十万大军的杜聿明，不但能剪裁缝制衣服，还是嫁接果木修剪葡萄的能手；代理过山东省主席的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牟中珩是技压群芳的理发员；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都是干活的多面手。

他们被释放以后，凡有劳动能力的人仍然努力工作，受到所在单位和群众的好评。有的用自己在改造期间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积极为改变家乡面貌作贡献。比如，特赦的原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建军会少将课长白玉昆，回山西原籍后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和技术为改变家乡的贫穷落后面貌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称赞，1975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部特赦人员时，特邀他参加了接见。

成立缝纫组，是符合多数人心愿的。但缝纫组刚成立时，当管理员搬来几部旧缝纫机时，大伙都傻了眼。对于这些大男人，尤其是地位显赫的大男人来说，使用缝纫机简直是天方夜谭。正当众人为此犯难时，却有人主动要求试试。大家一看，此人竟是统率过几十万大军的杜聿明。

杜聿明因病摘除了一个肾脏。按规定，他是可以免除劳动的。但是，他却自告奋勇参加缝纫组，并说他会使用缝纫机。这当然令大家难以置信，多数人认为他在吹牛，也有不少人替他捏把汗。杜聿明似乎看出了众人的心态，他不紧不慢，非常自信地坐到缝纫机旁，动作熟练地上好针、穿好线，安上皮带，放好一块布，双脚一踩，便“跑”了

起来。谁也没想到,这位精通坦克车的保安司令长官竟然对缝纫机也能运用自如。

事后,杜聿明告诉众人,说起学会使用缝纫机,还得感谢他的妻子曹秀清。他在担任机械化军军长时,曾办过一个缝纫工厂,曹秀清任厂长,他就是在那时学会用缝纫机的。

杜聿明鼓励大家,这很好学,并主动当师傅。因为主要是缝补战犯穿的衣裤,好坏都没关系,所以大家也都大胆地跟他学习。但就在缝衣服过程中,也出了一个小插曲。有一次,沈醉在缝裤子时,机器刚一踏动,只听到“啪”的一声,针折断了!他急得满头大汗,杜聿明也连忙跑过来,急得连连摇头,现在看来这真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在那时却是大事一件,即使不被扣上“破坏公物”帽子,起码也是“损坏公物”。

当时一部机器只发一根针,断了就得写检讨去补领。沈醉写好检讨,说了一大堆,什么粗枝大叶,不爱惜公物……自请处分。等送上去之后,管理员只说了一句:“下次留心点。”沈醉和杜聿明才如释重负。此后,大家就开始琢磨怎样才能不折断针,后来才搞清楚主要是不能让机器向相反的方向倒转,只要皮带轮是朝自己的方向转动,就可以避免断针了,以后便很少出现“损坏公物”的事了。

缝纫组经常闹出笑话,四川老军阀王瓚绪的儿子王泽浚军长参加缝纫组时,主要是负责钉钮扣。几个昔日舞枪弄炮的将军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拿起针线钉扣子。对于这些人来说,一根细针简直比一个大铁锤还沉,而且插针、抽针力度都要合适。

有一次,王泽浚好不容易才把针从衣服的反面刺进了扣眼,抽针时,比刺进去要用力些,不料用力太猛,他把针刚一抽出,只听到坐在他旁边的人大叫一声,原来那一针正刺在那个人脖子上,血顿时流了出来,这一下可把他吓坏了。经过这次“流血事件”,大家又开始总结经验,抽针时,针尖一定要对着自己,这样即使碰到别人身上,也是小指和无名指,不会刺伤别人。经过一点一点摸索,缝纫组的技术越来越精,这给战犯带来了许多便利,结束了战犯穿破衣裤,

盖带洞被子的历史。

理发组成立之初，只有以前稍会一点理发的牟中珩一人报名参加。经过他的一番动员后，几个胆大的人便拜他为师，跟着学了起来。

刚开始理发的时候，几位“大师”笨手笨脚，也不懂得使用旧推剪易把头发夹在剪子里，没有剪断，必须一边推，一边把推剪慢慢提起来，才不致把别人头发连根拔出来。结果，经常是一边剪，一边听到不停地“哎唷”声。剪头发还好点儿，只是将头发连根拔出，刮脸就惨多了，被割破嘴唇、鼻尖已算轻伤，有一次沈醉差点把别人的耳朵割下来。熟能生巧，一点不假。经过一段日子的磨练，推剪、剃刀上已很少能见到血迹。

一天，曾扩情心血来潮，又开了理发的一个先河。曾扩情找到沈醉，让他用剃胡子刀给他剃个光头。沈醉一听，面有难色，连连推说自己剃不好。曾扩情倒不介意，还一个劲地鼓励他：“一回生，二回熟。”

沈醉索性也就豁出去了，他先用温水、肥皂给曾扩情洗头。曾扩情很内行地说：“最好让肥皂泡留在头上，这样可以使头发柔软些。”沈醉按照他的意思，将他头上抹满了肥皂泡沫。准备工作就绪，沈醉袖子一卷，便操起了刀剃了起来。谁知第一刀刚落下，只轻轻一拉，便听到曾扩情大叫一声：“痛！”沈醉赶紧收手，并喊了一声：“糟了！”只见白色的肥皂泡沫上，冒出一汪鲜血，看来是割破了头皮。

正在此时，“师傅”牟中珩跑来了，赶紧用手指把出血的地方用力按住，并立刻送曾扩情去医务所，给他上了止血药。牟中珩告诉沈醉，用剃刀给人剃头时，特别是老年人，一定要一手把头皮拉紧按住，不让他动，才可下刀，否则头皮会挤到一起，这样就会把头皮割破。应了那一句话，“一回生，二回熟”，经过多次实践，沈醉也慢慢成了一名真正的“理发师”。

◆秦城农场无一人逃跑

1958年10月初,战犯管理所的领导宣布:让战犯们去公安部绿化基地——秦城农场,进行一次农业方面的锻炼和农村生活的体验。条件有两条:一是身体好;二是自愿。年老体弱和自己不愿意去的,继续留在功德林,还和过去一样,边学习边搞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有病而暂时不能去的,病好之后,还可以请求去,也可以不去。总之,以自愿为主,不勉强,希望每个人都考虑一下。

这一消息在功德林引起了很大反响,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又紧张又兴奋,大家议论纷纷,一时难以平静。

共产党和政府的改造政策规定得很明确:“思想改造与劳动锻炼相结合。”现在既宣布了要去一趟农村进行改造,谁也不能说不去,但又考虑到农业劳动是在野外进行,自己又没有使用过农具,能否顶得住?会不会把身体累垮?不去,那会被看成什么呢?有思想包袱……总之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有。当然,多数人是希望有这种机会去锻炼一下的,认为到农村去劳动,总比围在高墙深院要好一些,不但可以呼吸新鲜空气,而也可以再一看外面的世界。

报名的结果出乎大家的意料,大部分人都报了名。有一些身体状况不佳的人,完全可以不去,却坚决要求一起去。例如,身体虚弱的杜聿明,年近古稀、又有深度近视的原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居然也争着要去。用杜聿明自己的话说:“我不能锄地可以除草,不能挑抬可以干别的。退一步还可以把缝纫机带去,给人缝补衣服。”态度是相当积极的,而且说得也很有一些道理。

还有许多人经医生检查后,决定不让去的,还经过一番说服工作才同意暂时留下来,等以后再回去。最后留下的都是实在不宜从事农业劳动的,如大腹便便的兵团司令刘嘉树,血压很高,连去晒一条棉被回来都要坐下来休息好久才能说话;山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真是骨瘦如柴。连稍大一点的风都可以把他吹倒;陆军副总司令

汤尧，满身都贴了膏药，多走点路都得要人搀扶；军统两广监察使邢森洲，三尺以外就看不清桌子和椅子；第三军副军长杨光钰两条腿没有了下肢……像这几位实在无法去的，才被留了下来，勉强能去的，差不多都去了。

10月底，战犯们乘着三辆大客车，来到了秦城农场。这支由国民党高级官员组成的劳动大军，由公安部十三局的李振江科长和刘幅印、李忠诚两名管理员带领，并配有一名护士。

在农场要比在改造所里放松得多，但也有一定纪律。李振江科长在到达后便向战犯们宣布“约法三章”：一是规定了战犯的活动范围，由于住房四面是田野，所以规定白天不要走出住的地方100米左右；二是夜晚解小便在住房门外的便桶内，一个人可以起床去解，不必惊动别人；三是到房后厕所解大便，就得找同房的人陪去。虽然李振江解释说这样做是怕有人在上厕所时万一发生什么“急病”，以便有人“照顾”。但战犯们都明白，这是以防万一。

自从由功德林监狱搬到秦城农场之后，战犯的心情比过去舒畅多了。因为抬头看不到窗子上的铁栅栏，也看不到高高的围墙，仅仅这一点就能使人减去不少压力。况且伙食比过去好，特别是有一定范围内的自由，使犯人们可以忘情地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气。

劳动是在离住地不远的山坡附近，不能越过小山的分水岭到山那边去。基本上还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但农忙时则减少学习而在雨天时补学习。有病要及时报告，自己不说，同房的也有责任。

这次是分五个队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分组。每队十几人，指定队长、副队长各一人。起初，战犯们都有些担心，万一有人借机逃跑，即使能抓回来，肯定会导致整个气氛严肃起来，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有百米之内的自由区了。

说也奇怪，这几十人在这里劳动了一年多一点点时间，居然没有发生逃跑过一个人的事，甚至连企图逃跑而被发现或引起可疑的事都没有发生过。这真是想象不到的奇迹！

其原因在于：第一，由于张治中、邵力子、程潜、傅作义、唐生明

等原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去功德林看望战犯们时,明白告诉过,对这些人将采取不审不判,从宽处理。大家都吃了“定心丸”,知道不会太久,就能得到宽大处理,又何必去自找麻烦当逃犯。

第二,几位身体较好的将军们曾悄悄地议论说,当军人打了败仗当了俘虏已够丢人了,如果再逃走被人从背后打一枪,那就更不光彩,无面目见人。过去冲锋陷阵都没有当过逃兵,今天怎么会当逃犯!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过几年改造,战犯们都很清楚,即使能逃走,到什么地方安身?亲戚朋友即使能看过去的情面留一两天,总不能长期呆下去。今天没有正式户口很快就会被查出来,再抓回来就连这样的待遇都没有了。权衡利害得失,还是不逃为妙。更何况这些人都老于世故,懂得人情冷暖,逃到亲友家中,让人家去告密立功,作送上门的礼品,实在不合算。

担心有人逃走而影响到全体会被严格管理的问题,虽然得到解决,但夜间上厕所必须两人一道去的规定并没有取消,因为毕竟“知人知面不知心”,谁也不敢保证没有人想逃跑。这样,这条规定就一直执行下去。谁也没想到,陪去厕所反而发现了一起“盗窃案”。

一天上午,战犯们在离住地相当远的山坡上挖鱼鳞坑栽树。快到中午,管理员要沈醉和同队的一位代号叫236的去厨房把饭菜挑回来,以便大家一回去就可以吃饭。这位236同学是一个不吃猪肉的少数民族,不论是在功德林还是农场,照例在吃肉时,厨房都设有单灶给这些少数民族的犯人做牛羊肉。那天,他们二人一进厨房,炊事班长先将一碗红烧牛肉端给236,然后盛满两大桶红烧猪肉。如果按照平日分菜的标准来看,吃牛羊肉的一份总是多一点,那天更是堆得尖尖的。

沈醉把猪肉挑回后,便到附近水沟去洗澡。因为236是不吃猪肉的,所以不必担心他会偷吃。说来可笑,过去一掷千金毫不吝啬的将军们,当了战犯后,许多人总想占点儿小便宜,要是没人看见,先尝

几块猪肉是司空见惯的。那天吃饭时,沈醉发现236一改平时吃两碗米饭或三个二两馒头的习惯,只吃了半碗饭,当时还以为他是不舒服,曾关切地问了一句:“今天有什么不舒服吗?怎么只吃半碗饭?”“今天的红烧牛肉比平日多。”236号简单地回答了一句。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看看当天晚上发生的事吧。

半夜,沈醉突然被236推醒,并说了一声:“请陪我上一趟厕所。”

回来后,睡下去没多久,236又带着他那几乎恳求意味的声音对沈醉说:“请再陪我上一趟厕所!”又奉陪一次,接二连三这样一直到天亮时,236一共去了七次厕所,沈醉也陪了他七次。

第二天早上,沈醉将昨晚发生的事如实向小队长反映。小队长便请来护士给236作检查。护士长拿着一个小纸盒,叫236解点大便拿去化验。

化验结果出来之后,护士长把沈醉叫到他的房内,用略带几分责备的口吻问:“明明知道他是不吃猪肉的,你为什么给他吃过量猪肉而造成腹泻?”沈醉想了一下,确定236一定是背着他偷吃了猪肉。于是便将那天的情况讲给护士长听。护士长一听,忙说:“可不能去质问236,也不要向别人去说这件事,这样影响不好!让他休息一天,吃点药就会好的。”

◆劳动才知农民苦

在农场一年多的劳动锻炼中,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将军们闹过不少的笑话。有一次出工,经过一片胡萝卜地,廖耀湘自作聪明地大声赞扬:“这块地的香菜长得真好!”话音刚落,嘲笑声随即而起。有人大声责问:“回家考察一下,香菜到底长什么样。”带队的老农和管理员纠正道:这不是香菜,是胡萝卜。但廖耀湘坚决不承认自己错了,坚持说湖南的香菜就是这样。

管理员和那位老农民相视一笑,没有作声,转身拿起锄头挖秧苗。直到见到秧苗下的胡萝卜,廖耀湘才算心服口服。老农将挖出的

胡萝卜分给每人一个，然后他自己拿起一个胡萝卜在袖子上擦几下，将上面沾的泥土擦掉后，就放进嘴里吃了起来。而战犯们见状，只是互相看了看，谁也不敢仿效，都是回去后洗了又洗，才肯吃的。

经过一年多与老农朝夕相处，战犯们改掉了身上的一些恶习。但有些方面，仍无法与劳动人民真正划齐。特别是每次去地里撒肥料，对人畜粪便搀和的有机肥，战犯们都是找一块破瓦片之类的东西，舀着去撒。科长李振江纠正他们，说这样撒，既慢又不匀，应当用手抓着撒。说完，自己抓起一大把，边走边向两边均匀地撒。战犯们起初不肯动手，但后来见科长一次又一次用手抓，尽管心里不太愿意，也都跟着用手抓。不过，在回来后，大家还是拿起香皂拼命地洗手，好像要洗净污物。

有一次，犯人们被安排到农场起猪粪。由于刚下过一场大雨，粪便全都溢了出来，很远就能闻到一股臭气。

战犯们实在难忍，就打算用瓢将粪水舀到粪桶里。但，如若一瓢一瓢地舀，十天半个月也干不完。一队小队长洛阳警备司令官邱行湘，操起葫芦瓢、弯下身子，把粪水一瓢一瓢舀到桶里，实在太慢。

正当这时，又是李科长挺身而出。他说：“这样下去得舀到什么年头？要下去用桶舀！”说完，便带头脱下鞋袜，走进粪池，将桶侧起一舀，他示意大家下来一起干。但是，多数人都只是望“粪”兴叹，谁也没这个勇气走进粪池。只有邱行湘脱掉鞋袜，走下粪池。

由于起肥发生困难，农场决定把猪圈和粪池下面都彻底整修一下，主要是利用附近几座过去烧红砖留下的破窑的砖头，把猪圈全部砌成砖头的。

任务交给了前来农场参加劳动的战犯们。战犯被分为两组，一组负责铺砖，一组负责拾砖，两个人一个筐，拾完后一起抬回来。

工作开始前，李科长一再叮嘱：只能在破窑附近拾砖，不准进到破窑里面去，以防倒塌伤人。

徐远举和陈长捷两人抬一个筐。这两个人都是急脾气，又都急于表现。于是二人商量，一定要密切配合，还要眼疾手快。谁知偏偏

事与愿违，越着急越拾得慢，越想快越拣不到合用的。二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趁管理员和科长正背对着他们，站在猪圈墙上指导如何砌砖时，二人悄悄溜进破窑，一下子就抬了一筐出来。

这样他们不但少走路，而且拾的砖质量还好。二人喜上眉梢，又悄悄地溜进破窑内去抽压在下面的整砖。如法炮制，他们的工作完成得相当出色。

以前经常是麦子与韭菜分不清，指着萝卜叫白菜的战犯们，经过劳动实践，不仅能分清了这些，而且连玉米苗和杂草也分辨得一清二楚。

刚开始去地里拔草时，几乎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把间种套种的玉米苗当杂草拔出来，一看到它根下连着的玉米种子，就傻了眼，手足无措。当时老农还特别强调要小心别把玉米苗当草拔出来，并将二者放在一起，好好比较了一番，战犯们还不以为然，觉得太小题大作了。当真正拔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望着手里带着玉米种子的“杂草”，战犯们也禁不住面露惭色。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弄虚作假之人，拔错了玉米苗，由于怕挨批评又重新栽了回去。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刚开始时，大家都没在意，只是单认为玉米苗比杂草长得高，高一点的不拔就行了。可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结果许多人把玉米苗当杂草拔了出来，等发现它下面的玉米粒后，便趁人不注意赶快用土埋了回去。这从表面上看好像没有拔错，反而得到了管理员的表扬。而有些老实人把拔错的玉米苗握在手里，准备自我检讨。管理员只是说了一句，下次注意，要向那些没拔错的同学学习，就完了。

可是，第二天一走进昨天拔过草的地方，管理员便愣住了，有几十垄的玉米苗不少都蔫了。不用说，拔出又埋了的苗，当时看不出，过了一夜便好像被人用开水烫过一样，全蔫了。管理员解释说：玉米苗一般不能移栽，拔出了又栽回去，肯定活不了，万不得已要移栽，也得带一大块泥土才能成活。今后拔错就拔错了，丢在杂草一起，不要栽回去。

接着,管理员又说了一声:“这样看来,昨天自己承认拔错了而准备作检讨的几个人,态度是老实的!”

经过这次教训,战犯们“痛改前非”,对玉米苗和杂草仔细研究了一番。最后,一看就能认出,好像玉米苗长在杂草之中,有亭亭玉立鹤立鸡群之态!

通过一年多的农业劳动改造,战犯们不但学到了许多过去不懂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真正体会到,农民劳作的艰辛与农业技术的重要性。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谁也不会相信,那些昔日一掷千金、挥霍无度的战犯们竟然会为冰雹打掉葡萄而痛心难过。

话说1959年春天,杜聿明、王泽浚等几个人在农场一片葡萄地里给刚出土的葡萄搭架。有一天,杜聿明发现有一株葡萄长得特别茂盛,便提议给这株葡萄搭一个方形架,让它向四面发展,管理员也表示支持。

自此,他们对这株葡萄倾注了特别的爱心,浇水时多浇,施肥时也多施。这株葡萄也好像通人气似的,不但越长越茁壮而且一到入夏就果实累累,四面架子上都布满了大串大串的青葡萄,十分惹人喜爱。眼看快要成熟了,有人提议单独给它计算产量,看看一株究竟能最高产多少。那阵子,谈论这株葡萄,几乎成了他们的热门话题。每次出工和收工,他们宁愿多走点路,也要绕道去看它。

天有不测风云,快到收获的时候了,有天夜晚狂风暴雨从天而降,接着又是一阵豆子大小的冰雹打了下来。杜聿明等人躺在床上,十分焦急,但狱中规定又不准夜间外出,只有苦捱到天明。

好不容易盼到第二天早上出工,几个人争先恐后地跑到那棵葡萄地里,远远看到那繁茂的枝叶被打得东倒西歪,一串串葡萄都不见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几个人强打着精神扶起了被打倒的葡萄支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保护它,让它恢复原来的旺盛的生命。

管理员抓住了这个教育战犯的大好时机。当天晚上,就冰雹打

掉葡萄，众人心底难过一事组织了一场讨论会。

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在管理员的引导下，讨论话题由心痛葡萄上升为爱惜一切劳动成果。会上人们达成共识：凡是经过自己劳动创造出来的果实，一旦被别人夺走，便会不顾一切豁出性命来保护它，夺回它。由此，也引发了对中国农民掀起革命斗争原因的讨论。以前，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农民只不过是一群只知道“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愚昧无知的莽汉。但要求如此之低的农民竟不顾一切，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足见其受伤害之深。如今，战犯们只是损失点儿葡萄就痛心疾首，那农民失去自己赖以生活的粮食、土地，当然会尽全力进行反抗！进行革命！战争中，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会败给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大概原因也在于此吧。这是参加农业劳动的一个重要收获！

◆羊信·兔爷·鸡长官

20世纪50年代末，全国经济状况十分困难，粮食供应比较困难。当时改造所内的战犯们并不了解这一紧张状况，只是感到吃东西不能放开肚子，肉也越来越少，很有一些牢骚。为了补贴战犯们的伙食，改造所开始让战犯们用自食其力的办法养羊、兔、鸡一类小家畜家禽，这样既可进行劳动改造，又可以自食其肉。

首先响应这一号召的是原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这位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老炮兵，在国民党部队中由炮兵排、连、营、团长直升到旅长，曾当过一任江阴炮台的要塞司令，便再没有爬上去的机会了。因其体弱多病，被免除参加较重较繁的体力劳动。到秦城后，他的态度有所转变，为了表示要争取进步，便报名参加畜牧组。管理员把十多只羊让他喂养，他以前没有养过羊，根本不熟悉羊的习性。再加上原本晴暖天气骤然变冷，门外汉的他又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结果几天内便开始发现羊掉膘、生病，不到十天竟接连死了两头羔羊，据说是受冻拉稀所致。他刚刚养了十天羊便被撤换下

来,后来有人取笑他,给他起了个“十日羊信”的绰号。

提起“羊信”,便让人想起“兔爷”,曾任过铁路司令官的莫德宏负责养兔子。有一次,别人问他:“养过羊的当上了羊官,你养兔该封个什么官?”话刚出口,正在一旁逗小兔的、一向说话尖酸刻薄的原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接口说:“管兔崽子的自然应当是兔爷。”莫德宏一向老成持重,不爱开玩笑,听到汤尧说他是“兔儿爷”,虽然心里不高兴,也没有立即反驳他,只是把头一甩便走开了。汤尧正在兴头上,冲着莫德宏的背影说:“我还没有叫他兔崽子而尊称他为兔儿爷,已够抬举他的了,他还不乐意,真太不知足了。”莫德宏也没有搭理他。但莫德宏兔爷的名声便传开了。

在承担养殖工作的战犯中,只有一位被人称为“鸡长官”的杜建时当之无愧。杜建时素以博学多才见称,他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后到美国堪萨斯陆军大学进修。学成归国,得到蒋介石的重用,任原北宁铁路护路司令兼天津直辖市市长。他最初养鸡的时候,与孔庆桂的境遇差不多,500只鸡几天内就死掉了300多只,但他没有灰心,开始钻研养鸡技术,在阅读了大量养鸡的材料后,终于摸索出一套养鸡的方法。以后不但没有发生死鸡的现象,而且当年的小鸡便能产蛋,这对改善战犯的生活,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受到表扬。

而最使人感兴趣的在于,他能指挥几百只鸡运动。据说他是看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论”等心理学的参考书,每次给鸡喂食时,他便拿着一只铃铛,一边喂食一边摇铃,时间长了,这些鸡听到了摇铃声便知道是开饭。他就是利用这铃声来召唤在高墙院内觅食的鸡闻声而来,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后来竟发展到他在前面边走边摇铃,一大群鸡便紧紧跟在他后面摇头摆尾,一路紧跟。说来好笑,这位美国陆军大学毕业的将军,在改造所中虽没有部队可指挥,但能调动几百只鸡来前呼后拥也够威风的了。这种情况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

有一天,范汉杰没事跑去看到杜建时摇铃召唤鸡群进餐,他也跃跃欲试,拿起铃铛乱摇一通,但是因为他摇铃的节奏不对,手里又

没有撒鸡食，鸡根本不朝他身边走。他很生气，又无可奈何，看见杜建时喂鸡时十分专注的样子，他偏着头说：“鸡长官，你将来打算养鸡过活吗？”杜建时对京戏很有研究，看到范汉杰一本正经样子，也把头一摆，慢慢地说：“山人将来下山之后，便养鸡罢了。”范汉杰便笑着说：“后面四个字你可得说清楚，少一个字也不行，特别是不能截头去尾，否则太不文明了。”趁杜建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范汉杰便溜之大吉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周围的人见杜建时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便对他说，他是在骂你，因为“养鸡罢了”把头尾去掉，剩下中间两个字便是很难听的了。杜建时只有笑笑而已。

◆ 监狱里的劳动能手

在监狱中劳动，在战犯中也产生了一批劳动能手，如小木匠章微寒，补鞋王岳焯远，砌墙能手卢资泉和敲煤专家周俊强等。

在战犯管理所中，大家叫0044号章微寒为“小木匠”，他也欣然答应。他身材矮小，不过矮得很均匀，全身都短小，看上去就像个小孩。在改造所要求犯人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时，他拿起了锛子，当上了木匠。于是，“小木匠”这个不失亲昵的称呼就成了章微寒的代名词了。章微寒是北京战犯管理所中仅有的一位上校级军衔的军统浙江省站站长。

章微寒原本担任军统浙江站的副站长，毛人凤的胞弟毛万里担任站长，1948年毛万里兼任了浙赣铁路警务处处长，就把站长让给章微寒，直到杭州解放。

当时，杭州军管会公安部门号召国民党留下未逃的党、政、军、警、宪、特人员去自首报到，章微寒便想去试试。但他觉得自己毕竟是个军统特务，本身对共产党的政策又不十分了解，所以顾虑重重。经过一番考虑，他决定派一个部下先去自首，自己留在家里静观其变。去的那个人自首报到后既受表扬，又安排工作，而且当时就让回家。得到这一消息，章微寒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自首报道处。

章微寒自首,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极大重视。负责人在接见他时,一再劝慰他不要有压力,不要背思想包袱,只要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就一定要有出路。这样章微寒主动交待了一些问题,就成了一名自首投诚人员。公安部门还让章微寒做一些工作,章微寒还真带了一些原浙江站的人员和过去在军统中工作过的人,到公安部门自首登记。

但是,由于顾及旧日交情,章微寒掩护了几个不愿去自首而愿回台湾的人平安离开了杭州。他们中除少数人逃到台湾外,其余的都被沿途军警民兵查出抓了回来。审问后,这些人供出是得到章微寒的包庇而逃出去了。公安部门的负责人并没有揭穿他,只在和他谈话时,暗示他今后要忠于自己现在的工作,不能再循私情去做不利于人民的事。他当时并没有警惕,也不知道许多人已被抓回来了。

逃到台湾的人一经查问,口径基本上一致,都说是章微寒念旧情,才帮助逃出的,使得台湾方面对章微寒也重视起来了,认为他肯定是“身在杭州,心在台湾”,机不可失,应当多方面去利用这一关系,重建浙江的潜伏工作。因此一批又一批过去认识不认识章微寒的人,都纷纷奔向杭州而来。

这些人在偷渡时,有的一登岸便被民兵捉去,有的在混到大陆不久也被逮捕了。他们供出的情况,都是去杭州找章微寒,这使得公安部门不能不对他特别注意。

当然,也有两个有混水摸鱼,蒙混过关逃到杭州,找到章微寒后,他们表明了来意。章微寒向他们表明处境后,态度很坚决,劝这两人赶快回去,并当场表示既不能掩护他们,更无意再为军统去冒生命危险了。这两人是奉命而来,得不到章微寒的支持,便自己去活动,结果一个被发觉而遭到逮捕,另一个便去找章请求暂避一下,好找机会逃走。章微寒不忍心拒绝他,结果由于那个被捕的供出了他与他们的关系,公安部门便去章家搜查,把那个落网的抓住了。这样,章微寒有口难辩,随同那个落网者一起被逮捕,交待问题。

由于他没有具体反共活动,仅仅是重旧情包庇过特务,不去检

举,所以需要改造一下他的立场观点,使其不再“敌我不分”。战犯管理所一成立,他就被选到北京了。

当北京战犯管理所要求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相结合时,一起成立了一个木工组,修理床铺桌椅。

据说章微寒学木工主要是因为他羡慕鲁班。年轻时,他曾听说过鲁班的故事,觉得鲁班本领很大,什么都会做。他也想当一名木匠,自己喜欢什么就做什么。还有点个人想法,就是他想着以后要能出去,可以靠当木匠来维持生活。很快他就掌握了木工技术。

在农场进行农业劳动锻炼时,章微寒还兼作木工活。床铺桌椅坏了,都是由他修理。他曾说过:“这木匠活儿,已能独立操作了,以后出去,做什么床儿,桌儿,椅儿的都行!”

本来是准备靠木匠混饭吃的。但是,章微寒和许多人一样,万万没有想到,他被特赦后送回杭州,当上了浙江省政协委员,根本不需要做木匠来维持生活。

补鞋王岳烛远,河南人,黄埔六期学生,学步科。早年跟随共产党,后来改投国民党,成为专门逮捕共产党员的军统骨干。按资历算,岳烛远可以说是军统中的老资格。

岳烛远曾任河南省站站长,后来又带过武装特务部队,任过别动军队纵队指挥等要职。

解放前夕,因蒋介石规定,对过去凡是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除少数认为非去不可的外,其余一律不准去台湾,岳烛远这位忠心耿耿为军统干了十多年反共工作的骨干分子,也没有去成台湾。

岳烛远既去不了台湾,又无条件逃到香港或国外,只能硬着头皮留在大陆。

岳烛远想了半天,想出一条“妙计”,决定在上海近郊让自己老婆租一块地种菜,自己去当雇农,比贫农还要贫,这该万无一失了。

但这“雇主”和“长工”二人对种地之事一窍不通,别说种了,就连菜苗都分不清,只好再雇一名当地有经验的农民来帮忙。这两位“长工”在女主人面前,表面上是一样的。但时间一久,那位长工有所

察觉。于是，他便处处暗中窥视，终于发现“蒋阿哥”（岳烛远为了表示永远忠于自己的“校长”，在当了农民后改名换姓为蒋忠）和老板娘的关系并不寻常，完全不像是一般女人偷人养汉，而是和普通人家夫妇一样，一方面由于多心，另一方面出于嫉妒，这位长工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

很快就有人来调查了，一经分开盘查，两人就露出了马脚。夫妻二人平时已对好口径，可在审问时，审讯人员专拣些没有准备的问题问，这样就破绽百出了。为了查证他们的身份，有关部门还动员了几个在上海自首的军统人员前来辨认，岳烛远是被人认出后逮捕的。1956年，岳烛远被集中到北京。

战犯所成立劳动小组时，岳烛远权衡了半天，认为理发要站着干，挑菜饭更吃力，学缝纫要操心，因衣裤穿在身上，弄得不合适，会看出毛病，最后他下决心学习修鞋，提出成立修鞋组，他说：鞋是人人要穿的东西，不能破一点就不要，得有补鞋的人，别的事我干不了，补补破鞋，除了脏一点外，还是比较省心的，所以决定干这活儿。

岳烛远选中的这一工作，几年中一直受到管理所领导的表扬和同学们对他的好感。首先是这活儿最脏，谁都不会把又脏又臭的破鞋先洗干净再去补，总是一脱下来就交给他。每次补鞋前，都得先将同学们劳动后送来的连泥带土的臭鞋用粉笔划上什么地方破了该修补，然后检查能不能修补，除非实在破得不能补了，但凡有一点可能性，岳烛远都坚持把它们补好。改造所中，有些昔日的将军为了争取当勤俭节约的标兵，不领或少领新鞋，一直穿到破洞百出了，还坚持不换，而拿到岳烛远那儿去修补。

钉鞋是个细致活。缝补鞋面要穿针引线，穿不上线，得用嘴把麻线的头头咬得细细的才能穿过针眼。钉钉掌也有学问，有的鞋底子硬，换几次地方，也钉不上去，非得找到合适的地方，用大力才可以。但又不能劲太大，太大容易钉到手指，这个度必须掌握好。

岳烛远不光技术过关，态度也十分认真。钉鞋不比别的活，每天必须钉完所有送来的鞋，否则第二天别人就没鞋穿，无法劳动了，所

以他经常加班加点，别人饭后休息、娱乐，他还要坚持把所有送来的鞋修完，这种精神在战犯中是很难得的。因此，岳焯远是很有一些人缘的。

砌墙能手卢浚泉是国民党第六兵团中将司令。他出生在云南彝族中三大家族之一的纳吉家，在云南部队中，官运亨通，仅次于唐继尧的妹夫孙渡。

卢浚泉在锦州战役中被俘。当时是第六兵团司令兼锦州警备司令。

卢浚泉虽是在大家族中长大，身上却没有少爷架子，干起活来，有模有样。在农场干活时，他可是大显身手。

有一次要修猪圈，管理员问谁会砌墙，这些战犯们只知道住高楼大厦，对砌墙一点不会。卢浚泉说他会，大伙都不相信。因为砌墙并不是简单地砖头堆集，而要有一定技术，否则越砌越高，一不注意墙就倒了，严重的还可能伤到人。卢浚泉见大家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当即拿起瓦刀，很快就把一堵墙砌好了，而且砌得条是条，角是角，大家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

卢浚泉笑着对大家解释：过去他对吃穿不太讲究，而对住却总爱弄得舒适点，常自己设计造房子，自己监工，有时还拿起瓦刀来砌砖墙。他还教大家，一堵墙砌得整齐与否，主要是要吊一根线，随时检查歪与不歪，因为眼睛看起来不易准确，有一根线悬在墙边，就容易校正了。他砌的砖墙从没有倒塌过，因此，在狱中有砌墙能手之称。

敲煤专家周振强，浙江诸暨人。青年时期，任孙中山卫士，黄埔一期生。毕业后，他从给蒋介石担任警卫工作起，一直升到蒋介石的侍从副官、警卫大队长、教导总队旅长，最后当上浙师管区中将司令，兼金华城防司令。在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金华后，他决心去找解放军的指挥部投降。

当他穿上便衣，忐忑不安走出家门，准备去找投降的地方时，正好遇上他的司令部几个士兵与保甲长，他们二话不说，一把将他揪

住拖着就走。周振强不知所措，连问他们要干什么？回答却令他惊讶：抓你去立大功！周振强无奈，反复向他们解释，说他是准备去找解放军指挥官投降的。那些人当然不会相信，说他穿上便衣明明是想逃跑，还想欺骗人是去投降。周振强好话说尽，那些士兵还是不相信，最后把他绳捆索绑，送给了解放军。过去只听说：“秀才遇了兵，有理讲不清。”谁知道天下居然会有司令官遇到兵，同样会有有理讲不清的！

在战犯改造所中，周振强有个绰号，叫“周老黑”。因为他不但人长得黑咕溜秋的，而且力气特别大，态度也积极，什么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从不偷懒耍滑，挑轻避重，所以“同学”们就给他起了这个爱称“周老黑”，时间一长，谁也不喊他的名字，而他自己也欣然接受。

周老黑人黑，工作更“黑”，他承包了监狱里的敲煤任务，整日与“煤”为伍，原本就黑的脸这下更黑了。

那时北京功德林监狱内没有暖气，冬天生了几十个煤火炉取暖，这样，战犯们最重的一项劳动，就是把大块大块的硬煤敲碎，用于烧火炉，每天要敲两百斤左右。刚开始轮流干，但不久有人偷奸耍滑，装病不干，这样任务就完不成了。

有一天，周振强自告奋勇，向管理员提出，敲煤的任务由他一个承包下来。当管理员还在考虑他是否能担负得下来时，一些聪明人已将表扬他这种精神的墙报贴了出去。除了表扬周振强的风格高、劳动观点强之外，还表示要向他学习，学习他这种不怕脏、不怕累，吃苦耐劳的精神，并口口声声称赞周振强是大家的好榜样。这些人可谓是用心良苦，写份墙报，表扬一下，既显得自己的认识强，态度好，愿意向别人学习，又可以借势，使生米煮成熟饭，让周振强毫无退路，只能承包。

开始几天，周振强确实有点吃不消，累得精疲力竭，许多人提出仍应恢复轮流敲煤的方法，不能让他一个人来干。周振强觉得自己话已出口，坚决不肯收回，无论如何，也要咬牙挺过去。为了坚持要

包下来,他拒绝了管理员和同学们的好意,把早晚的休息时间也投进去了,没有多久,居然熟能生巧,摸索出一套敲煤的办法。过去都是把煤块放在石头上,用锤子去敲,后来有一次他敲了半天也没敲多少,一生气随手把一块大煤块向另一块摔过去,结果两块煤都碎了,于是他发明了以煤敲煤的方法,功效便提高了一倍。这样,他终于把这个战犯们认为异常艰巨的劳动,一个人承包了下来,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监狱中犯人的劳动趣闻举不胜举,通过劳动,战犯们锻炼了身体,增强了对劳动的感性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感情。

3. 改造靠“参观”，社会当学校



1964年参观延安

中国共产党的改造力量是伟大的，在10年左右的时间就把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将军以及中国末代皇帝和特务头子等来了个彻底转变。这些人大都追随蒋介石多年，却在不长的时间前后判若两人。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些人转变得如此彻底？其中的原因当然相当复杂，有自身原因，管理所原因，整个社会原因，还包括每个人的家庭因素等，但是如果认真总结一下，那就是中共改造战犯的一着高招是“参观”学习，社会当学校。

◆ 新旧对比,改造有成

对战犯的成功改造是综合作用的结果,而组织战犯“参观”,通过新旧对比,使之真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触及战犯灵魂。对此,沈醉有很深的体会。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仅仅从革命的人道主义出发,在生活上给予优待,这些人并不稀罕,因为他们过去的的生活比这要好得多,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只是小恩小惠微不足道。

如果从不打不骂不侮辱来看,这只能使他们对共产党善待犯人的政策有所感激,与思想转变的关系也不太大,在安静的生活中有时还容易使之满足于现状,停滞不前或满不在乎,依旧我行我素。

如果说劳动锻炼改造了这些人的话,那也只是改变了这些人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在改造所里,他们只能服从命令,从事一些简单的劳动。不少人还会有那种“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想法。

如果单纯地说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真理,改变战犯内心深处的思想境界,使其对过去全盘否定,也有点勉强。要这些头脑中传统、封建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的国民党大员们,放弃自己信奉多年的国民党思想,转而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是不大可能的。

而组织战犯参观,则大大不同,这是深深触及战犯灵魂的事。因为他们中的人过去都是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当初把国家搞成什么样子,自己不会没有印象的,而参观可以让他们看看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面貌,对比对比过去,旧貌换新颜,才能让他们心服口服地接受改造,争做新人。如果不参观,仅仅从报纸上看到有长江大桥,他们是不会相信的。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报纸总归是报纸,政府办的报,当然就会替政府说话,谁去戳穿它。这一套,他们玩惯了,把死人描写成活人;大灾之年描写成六畜兴旺,五谷丰登,都是不足为奇的。

可是一旦亲自去看看,就不能不令他们折服。国民党时期满目

萧条、奄奄一息的景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新面貌。过去不冒烟的工厂都在冒烟，许多旧工厂不知扩大了多少倍，无数没有见过的工厂如雨后春笋一样矗立了起来。这就使得他们思想深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的伟大，比国民党高明。在以后的改造中，也就更加积极了。

战犯们集中改造后，改造所陆续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工厂、学校、商店等。每出去一次，战犯们都有一次新的体会，对共产党的敬佩也加深一层。负责人在宣布带他们参观时，总要说这样一句话：社会是学校，现在让你们进一下这个学校，这对你们加速改造将有所帮助，希望你们好好去学习。

“社会是学校”，这句话战犯们是深有体会。因为在战犯改造所里，每天读文件，看报纸，都是靠他们自己去无师自通，改造所只有领导人和管理员，没有教员，也从来没有人给他们上马列主义课，如果靠他们互相来提高，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人大都作威作福惯了，且自视甚高，“老子天下第二”（蒋介石第一）的思想十分浓厚，谁也不服谁，单凭几本书，几张报纸，几次讲话，改造他们是很难的。

进一社会学校，去看看实实在在的东西，体会体会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比什么经典著作对这些战犯都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百闻不如一见”，这是战犯们参观后共有的心声。在参观中，他们通过新旧对比，不得不佩服共产党力量伟大，不仅创造了新社会，还能很好地建设新社会。广大人民也都精神饱满，投入了高度的热情。这使战犯们很自然地就理解了社会制度不同，一切就改变了这样一条规律。

◆参观容易，准备难

通过参观而加速战犯思想改造，这一方法成效显著。想出这一办法的人，实在是聪明，但要做出组织战犯参观的决定，必须有一定魄力。万一出了问题，不止是对战犯的改造前功尽弃，对政府的威信

损失尤其不可估量。如果把成百的国民党战犯带到百货公司去参观,既不能像展览会预展一样,只让少数人先看看提意见后再公开展览,又不能因接待战犯参观而停止营业,当然更不能让群众“肃静回避”。

既然要组织参观,就要一切正常,让战犯们大大方方地看。但是,话又说回来,万一战犯中有一两个趁参观之际,混在群众中企图逃跑;或有个别顽固之徒当众散播什么反动言论,那在群众中将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所以组织大规模参观是一件极为繁重的工作,没有相当的勇气和魄力,是不会轻易作出这样一个决策的。

对参观对象也是有选择的,被参观单位必须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可参观的价值,能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一些被指定参观的单位,一接到通知,都是特别高兴,因为中央看中了这个单位,是对该单位工作成绩的肯定,这是一项十分光荣的任务;但高兴之余又有些担心,怕事与愿违,弄出相反的结果,怕负不起责任。还有些人多少有点害怕与这些战犯们打交道,说话重不得,轻不得,太讲原则了,达不到要求,太灵活了,又怕挨批。同时,还得控制好群众的情绪,避免意外事故发生。战犯中,有数人过去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死在他们手上的人不计其数。虽隔数年,难免有群众会念及私仇,要求血债血偿,做出些出格举动。

所以一旦哪个单位被指定为参观对象,那就得认真准备,展览时,要让战犯们看到最好的成果,要能反映出新旧制度变化带来的影响,要安排好参观的程序,还要注意尽量避免给战犯们带来情绪上的波动,真是既麻烦又复杂。

战犯在老百姓的眼中,是很神秘的一群人,不少人简直是把他们当怪物看。昔日威风凛凛的官老爷,今日成了阶下囚,这其中的变化,引起群众很大兴趣。一听说战犯来了,有时一个车间的工人全部停止工作,有时连下了班的工人还会从家中赶来,附近的居民也会在两旁站得满满的。主要是出以好奇。有一次,一个小姑娘对另一个排开众人挤到前面的小姑娘说:“没有什么稀奇,和普通人一个样!”

可能在这个小姑娘心目中,这些人应该是红眉毛绿眼睛、杀气腾腾,或烟容满面的,结果却令她大失所望,原来战犯是和普通人一个样。

每次参观出发前,改造所都要多次组织战犯举行座谈,讨论参观时的注意事项,最后由每人写一份“参观保证书”,内容主要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准随便脱离集体单独活动,见到亲友等熟人,不能随便招呼,如想与亲友等见面,须报请批准等。还有一次最特别,也是每次参观前都反复强调的,即在参观时不要触景伤情。犯人最容易触景伤情,这是改造所在总结了多年经验后得出的结论。

例如,沈醉在云南时,就发生过这样一件因触景而伤了情的事。有天大雨过后,监狱的下水道不通了,满地是水,管理员便组织犯人到高墙外挖通一条水沟。正当大家埋头干活时,忽然一辆漂亮的小汽车飞驰而过,只听沈醉大叫了一声:“啊?”然后就呆了,原来那正是他从前天天乘坐的车。沈醉立即产生了一种平生没有过的激动,他一边擦脸上、身上的泥水,一面顺口念了一句:“无可奈何劳动去,似曾相识汽车来。”这种容易使人触景伤情的事在参观中很普遍。因此,要战犯们特别注意。

参观是加速改造战犯的一条捷径,改造所对此十分重视。从集中学习直到1975年全部特赦在押战犯为止,除十年浩劫外,几乎每年要举行一次参观,也就是去进进社会这个大学校,而规模最大,行程最远,时间最长的,要算是去东北和武汉那一次了。

那次大规模参观,集中了山东、四川、西安等几个战犯改造所中军长级以上和少数高级文官,以及北京战犯所的全部100多名犯人,要经过几个省市,所到之处,大都是国民党中这些文臣武将的伤心之地,触景伤情之事,将是在所难免。若不事先规定一下,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意外事件。所以负责人在出发前一再强调纪律,反复嘱咐大家,无论遇到什么场面,都要正确对待,不要因为情绪激动影响其他人参观。

◆“群虎图”风波

在长春参观汽车制造厂的时候，战犯们对这座汽车城产生了极大兴趣，这些人过去都坐惯了外国汽车，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人自己也能生产汽车。当工厂把一辆刚装配好的解放牌卡车驶到战犯面前时，许多人都流露出惊讶的目光，一向爱车如命的杜聿明急不可待地走过去，摘下近视眼镜仔细看起来。管理员知道杜聿明曾经带过机械化部队，对汽车感兴趣，便征求工厂领导人的意见，然后让杜聿明上车去试试。杜聿明一坐入驾驶室，许多人都想坐坐中国人自己造的汽车。一个胆大的带头后，众人便一涌而上，纷纷上了汽车。

杜聿明开车的技术决不逊色于指挥军队，只见他动作娴熟、平稳地将汽车启动，内行人一看都暗地里叫好。他开着汽车，载着“同窗”，在试车场内神气地兜了一圈。工厂里不少职工闻声而至围上前来。车稳稳地停住了，杜聿明神采飞扬地跳下车，一边走一边不住地称赞道：“好！真是好！”紧接着从车上跳下来的同学马上随声附和：“不错！是不错！”工厂的职工们不便和杜聿明直接交谈，但从人们面部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人没有表现出半点恶意，只是冲他善意地微笑着。

与其他犯人相比，杜聿明的感情控制得比较好，一般很难让人找出破绽。沈阳是他的伤心地。到沈阳车站时，几乎所有战犯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他这位在东北赫赫有名的保安司令长官身上。杜聿明却若无其事，表情泰然。当他们的汽车经过过去他的保安司令部长官部办公大楼时，许多人又禁不住向他瞟去，只见他面部毫无表情，一点激动的痕迹都找不到。

参观所到之处，住的地方几乎都是一般干部开会时的普通招待所，每间房有两三张或更多的床铺。有一次，在沈阳参观，那天是去铁西区回来后，大家都比较累，躺在床上等吃饭。在沈阳住的这座楼

房，两面临大街，可以凭窗眺望大街景色，正当大半人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的时候，王耀武闲得无聊，伸头向外看，这一看可非同小可，只听他大惊小怪地叫了一声：“快来看！”战犯们虽然年世已高，年长点的近七十岁，但有时还和小孩一样，非常喜欢凑热闹，所以王耀武一叫，便有不少人挤到窗前，顺他的手所指的方向看去。刹那间，窗口挤满了人头，原本说着笑着来到窗口的人群变得非常寂静，几十人的呼吸声都能听见，与其说谁也不愿意先打破这宁静的气氛，不如说谁也无心打破这宁静的气氛，是惊得目瞪口呆，根本说不出话来。

什么吸引住这些身经百战的战犯们的目光了呢？原来王耀武发现，在他们住的楼下一片水泥地上，不知是大人或小孩，也不知是有意或无意，用粉笔画了许多老虎关在笼子里，其中一只最大的，还张牙舞爪，围在其身边的中小老虎，也都个个凶相毕露。

此事立刻惊动了负责参观的领导，这在参观中可是一件大事，搞不好就会出乱子。这位负责人当即动员招待所的勤杂人员把这幅画擦掉。画是擦掉了，但是它在战犯们心中掀起的波澜却无法平息。战犯们在学习座谈时把它当成了座谈的中心内容，都把老虎与自己的过去联系起来谈。

杜聿明在座谈会上，首先承认那只大老虎是暗示他，因为自己过去是在东北主管军事大权的保安司令长官；范汉杰也说大老虎身边那只略小一点，只露面而不露全身的老虎指的是他，因为在他被俘后，报纸上刊出的是他那张美髯公一样头部照片。几乎所有的人都能联系上自己是哪只大虎或哪只小虎，邱行湘说：“我用不着联系，因我在担任洛阳警备司令时，杀人不少，所以洛阳的老百姓早就给我取了一个凶恶的外号，叫我‘邱老虎’。”

地上几只不知是谁画的老虎，让一百多名战犯自动或半自动地硬与自己联系上，仿佛不和老虎挂上钩，就有失身份似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经过多年的改造，战犯们大都能正视自己的过去，面对自己的未来，心甘情愿地接受共产党的改造。这也可以说是共产党改造政策成功的一个缩影。

◆在天津有人下跪

这次参观的最后一站是天津市，这儿从前是陈长捷、杜建时的地盘。一下火车，爱开玩笑的范汉杰，一手拉着前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一手搭在前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肩上，说：“今天到了你们的辖区和防区，该好好招待招待我了。”

这句话使得陈长捷和杜建时不好回答。陈长捷索性理也不理，杜建时倒很沉着，轻轻地回答了一句：“今天吃和住都安排好了。”这句话说得太巧妙了。一方面给了范汉杰以答复，另一方面又无任何漏洞，不容易被人扣帽子，当然所到之处，吃住一定早有人来准备的。可是范汉杰还是不知趣，觉得意犹未尽，就又来一句：“是到你公馆去享受盛宴，还是去起士林吃西餐？”一向稳健的杜建时也有点不耐烦，顺口顶了一句：“这比到锦州时，你一点招待都没有要好得多。”可能这句话使当年驻守锦州的最高军政长官感到有些“往事不堪回首”，笑话才没有再说下去。

在天津，有个地方是必然要去参观的，那就是著名的南开大学。因为战犯中有不少人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以周恩来为代表也有不少毕业于这个学校。黄埔军校与此相类似，既培养出了许多国民党将领，也培养出了许多共产党的将领，这一文一武，一南一北的两所学校情况竟如此相似。通过这次参观，战犯们感慨很深，从中也得到很大启发，同样一个学校出身，而走的路却完全不同。

在天津工厂参观时，杜建时、陈长捷以及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和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等这些曾在天津顽抗到底的军政负责人曾一度感到很难堪。原因是在参观一家工厂时，这个工厂的负责人解放前就在那儿厂工作，那时他是共产党派在这里领导工人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在情况最危险时，他几乎被捉去杀了头。所以他在介绍工厂情况时，带着很强烈的感情色彩，多次联系到过去一些情况。

当他讲到为了防守天津,国民党军队拆去和烧毁了许多民房,致使一大批老百姓无家可归,工厂被迫停工,工人没有饭吃时,在场的战犯惭愧地低下了头。虽然大部分战犯当时没在天津,但他们在别处也都有过类似罪行,烧杀抢掠,多少人丧命在他们手上!这次的参观,使战犯们又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涤!

刚刚介绍完毕,突然从战犯行列中窜出一人,面向那位领导,双膝向地下一跪,幸亏管理员眼疾手快,一下把他提了起来才没有跪下去,但他还是放声痛哭起来。不用问,当然是触景生情者。此人是淮海战役中被俘的一位杂牌军军长,打内战时并没有打到天津。那位工厂负责人一席话,使他回想起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良心受到严厉的谴责,一时对自己愧疚之情无法控制,便当众痛哭流涕。由于他这一哭,参观便草草结束,许多地方只是走马观花,不再细看了。

回去后,领导参观的负责人立即召集大家开会,他意味深长地说:

看到过去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估计一定会引起一些人内心的波动,这是不可避免的,为了防止当场有激动表现,所以出发前便要求大家保证不能触景伤情,承认过去的错误,当然是应该的,也是好的表现,可是如果跪下去痛哭一场,这种认错的举动,是绝对不许可的。回来爱怎样都可以,在外面却不能不考虑到在群众中造成的影响,如果一百多人到处去下跪痛哭,那还成什么体统。事过了头就是错误。

听到这番话之后,许多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大家都担心因为那位军长的过激行为,而影响今后的参观。众人屏住呼吸,聆听领导继续讲话。

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大的问题,今天这里说明一下,

我们不提倡这种表现，大家也不要去看怪他，我们是把整个社会当成教育改造你们的学校，十个指头都有长短，进学校学习后，收获也自然各有不同，今后还要经常让你们进这种学校，希望大家总结一下这次学习的心得体会。

一听今后还要经常去，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不少人又都喜形于色，活跃起来。

从集中改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战犯几乎年年要出去参观一次或几次。参观对战犯改造的确起到过不小的作用，就连许多外国人都认为这个办法非同寻常，有独到之处，能使这些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在思想上起如此大的变化，的确令人折服，叹为观止。

四、狱中的生活和情感



战犯们在吃饭

1956年1月10日,战犯管理所的领导在大集中后的第一次集会上强调:大集中的目的,是为了加速改造。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亲自拟定的促进改造的具体措施。于人民有罪的人的改造,有一个由强迫改造到自觉改造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是不可能真正改造好的。

现在强迫改造的阶段已经过去,自觉改造的阶段已经到来。今后的学习、劳动和生活管理由在犯人中间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学习委员会承担。

并宣布:从现在起,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亲友访问……彼此间称呼,一律称同学。这决定了战犯日常生活的主要基调。

1. 战犯的日常生括



第四批特赦大会现场,中为康泽

对战犯的生活管理,管理所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合情合理的原则。管理人员一开始就向战犯们公开宣布,保证人格,保证生活,保证健康,严禁打骂体罚和侮辱人格的行为。对于饮食、卫生、生活必需品,文娱活动以及体育锻炼等等,都保证搞好。对其身体进行定期检查,有病及时治疗。这样,从各方面给予人道主义的待遇,保证身体健康,使他们深受感动,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思想改造。

◆沈醉领做广播体操

战犯们一般年纪都比较大,而且身体也不太好,有些人大腹便便,走几步路都会喘;有些人弱不经风,整日没精打采;还有的身患多种疾病,长期经受病魔的折磨。这样锻炼身体就显得更为重要,甚至成了战犯管理所的一件大事。刚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时,众人都是各自搞一些运动项目,如杜聿明经常带领大家打桥牌,黄维总是一个人在散步,李仙洲偶尔打打太极拳,王陵基一直喜欢盘腿打坐……,总而言之,都是各做各的。后来管理员将大家组织到一起,做广播操,而领操的人,则是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

这还得感谢郑庭笈,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全国十分流行做广播体操,有一天,沈醉问郑庭笈:“为什么不搞广播操而各搞一套?”郑回答:“虽有不少人看到报上介绍广播操有种种好处,希望也每天做做,但找不到教操的人。”沈醉听了十分诧异,因为当时在改造所里,仅黄埔一期生就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仙洲、范汉杰、曾扩情、刘嘉树、马励武、周振强、郭一予等10多人,而统率过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大军的军长、兵团司令等,超过百余人之多,怎么会连教广播操的人都找不出来?这使沈醉感到纳闷。

沈醉告知郑庭笈,他以前在重庆战犯管理所时,每天做三次广播操,而且领操的人正是他这个既不是黄埔军校,也不是什么其他军校毕业的军统特务。见郑庭笈半信半疑,沈醉接着说,他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练就了一套喊口令的本领。郑庭笈说,这100多将军中,除绝大部分是黄埔毕业的外,还有毕业于东北讲武堂、云南讲武堂的,以及留学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军事院校的。这些将军们官越做越大,对过去连长、排长喊口令那一套早已忘了,再加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也不想找那个麻烦。所以尽管管理所一再征求大家的意见,没有一个人愿意担任这项工作。

沈醉听后,表示他可以考虑一下担任领操。郑庭笈事后就向所

领导反映了这件事，几位管理干部非常高兴，立即找到沈醉，让他领操，并再三叮嘱他，对这些人不要操之过急，更不可要求过严，只要他们比划比划就可以了，动作不准确，要慢慢纠正，不要批评，要把他们的兴趣提高起来，一定要耐心，等等。

第二天，管理所的领导亲自集合全体战犯到操场内，并郑重宣布：政府为了关心大家身体健康，能更好地学习，从今天起，由沈醉辅助大家先学会第一套广播体操。在出操时，除有病的可以不参加外，希望都要去，玩牌、下棋等文娱活动，可以在晚上进行。

宣布完毕，由沈醉先做示范动作。沈醉比划了几下，当即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沈醉还很有当老师的天赋，做完动作后，又编出一套鼓励他们的话，说他没有做广播操以前，饭也吃得少，觉也睡不好，特别还有一些诸如腰酸腿痛等毛病经常折磨着他，做操不到一个月，饭能每餐吃七八两，而且再也不失眠、不腰痛了。其实这只是沈醉胡诌而已，他的身体一直十分健壮，与做不做操没太大的关系，但他这个活标本，对战犯来说是有吸引力的。

从开始教广播操起，那些战犯们的笑话就层出不穷，说来真让人不能置信，这些战犯们做起操来，一个个反应迟钝，动作蠢笨。

有几次在集合之后，沈醉让他们取好间隔、距离，免得彼此妨碍，这一点他们都会做，虽然动作慢些，也都能找好位置。但在做踢腿运动时，竟多次发生可笑的事，本来做各种动作，都在原地不动，腿踢出去，收回之后，仍应站在原地上。有几位大腹便便的将军，不但只能踢到一两尺高，而且一踢出去，便像新兵学正步走一样，等到再踢另一只脚时，往往踢到前面的人屁股上或腿上，被踢的人一定会回过头去质问，这样就得停下来，先去劝架，让踢人的退回去。有时刚调解完，再继续做的时候，他还是向前迈一步，被踢过的怕再被踢，立刻回过头去吵起来。为踢腿而发生争吵，不下十多次。虽然沈醉总是在开始前先做示范，并一再提醒不能朝前迈去踢前面的人，但有几位不知故意还是笨，老是记不住，一犯再犯。

踢腿动作尚且如此，弯腰运动就更没个样子了。按说，弯腰动

作,起码得把腰向前弯一点点,有些人却只把背向前略微弯曲一下,两只手伸下去还不到膝盖,沈醉见实在不合要求便大声叫:“这是弯腰运动,要把腰部弯下去!”有几个还是无动于衷,沈醉加大了分贝,大喊:“把腰弯一点!再弯一点!”

这一喊不要紧,最后一个人一紧张,将动作幅度加大了点,结果一个趔趄,撞在前面的人身上,前面一个又撞在更前面的人身上,一行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这可把沈醉急坏了,他连忙叫旁边的人把倒下去的扶起来,幸好都是穿着厚厚的棉衣,倒下去有的只是两手着地把手掌擦伤,最严重的是把鼻尖碰出了血,有惊无险。若真有人伤筋动骨,那可就是严重事故了。

尽管这样,还是引起了管理员的重视。沈醉为此也挨了批评:“早就告诉你,不要对他们要求太严,随便动作一下就行了!你看,今天这么多人跌伤,要是头破血流,损筋断骨,不用说你,我们都担不起责任!”自从那次事故以后,随他们怎样做,沈醉都不再去纠正了。直到1958年春天,从德胜门外功德林到公安部秦城农场去体验农业劳动时,才停止了做广播操。

◆“财主”和“拾烟族”

国民党将领在战败后逃跑途中,大都随身携带不少钱财。监狱中有“不搜俘虏腰包”的规定,所以他们的钱是不用缴公的。这样,管理所犯人的“财产”状况就大相径庭。有的“腰缠万贯”,有的“一贫如洗”。但也不乏“财主”硬充“穷鬼”者,腰里鼓鼓的,还专去揩别人的油。这类人,被杜聿明称为“九百九”。所谓“九百九”是指那些有钱不舍得花,老是去揩别人的油的吝啬鬼。

说起“九百九”的来历,还有一段故事呢,不知是杜聿明杜撰的,还是真有其事,他曾在管理所里当众讲了这个故事:

说是从前有个土财主,专门重利盘剥别人,有一天他收账回家,天快黑了,过河时,河边只有一条船了。他正想上船,驾船的人却说,

今天过河不给1000文不给渡。他一听大怒,说平日只10文钱,今天怎么要这许多?驾船的说,少一文也不让上船。

此人一听便卷起裤子,把鞋袜脱下提在手中,准备涉水过去。因为背着几千文钱,走起来很吃力,走了几步,就软了下来,自愿加一倍。驾船的理也不理,他一边走一边加,船夫还是坚持非1000文不可。快到河心,水都淹到胸部了,钱也加到了900文,船夫还是一动不动。水已到颈部,他10文一加,加到980,船夫仍是不理,最后,一脚踩进了没顶的深水中,并用力向上一窜,叫了一声:“九百九!”快要死时,他还舍不得10文钱。后来一些人把吝啬鬼就叫做“九百九”。

故事不论真假,监狱中还真有“九百九”这种人。如有的人本来很有钱,却连邮票都舍不得买,专向别人“借”,而说“借”是文明,其根本就不还。

不过,话又说回来,成为改造所中的“财主”,也得有一定的心机,懂得怎样处理身上的钱。在这方面,原保密局总务处长成希超很有一套。

成希超被俘后,显然比别人都有经验,他把被褥、洗漱用品等都带在身边。进入牢房后,他很老练地告诉大家,一会儿肯定要进行大搜查,匆匆忙忙从袜子里、鞋内掏出几叠美钞,塞进墙壁的老鼠洞里。果不出他所料,就在战犯们准备入睡时,管理员带了一大批人走了进来,说是要进行检查。这次检查很彻底,不但将每个人从头到脚全身搜遍,就连被子、枕头等都细细地摸了一遍。第二天起床后,成希超就说:现在不会再检查了,除非再搬动,才会搜一次。话音刚落他就去掏藏的美钞,谁知摸了半天也没摸到,这可把他急坏了。

原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便半开玩笑地说:“我会念咒,求神保佑找到,不过找到后大家都得点好处才行。”

“只要找到,”成希超许诺道:“找到了,在场的人都见财有份。”

郭旭不紧不慢,还真念了起来:“希超美金两千一,老鼠拖到洞隔壁。请求菩萨来保佑,找到大家都得益。”

果然被他言中,在隔壁的几个洞内找到了美钞。看起来是郭旭

有神机妙算，其实是郭旭根据当时老鼠多的特点，以为老鼠拖走的可能性较大。因有言在先，成希超只有与别人分美金了。

战犯管理所不仅新事多，怪事也不少。有骗酒喝的，也有拾烟抽的。当你无事站在草坪四处观望时，便可发现有人弯腰在地上拣什么，但又不是大大方方地拣，拣了以后，迅速放进一个信封里，接着又赶紧把信封塞进口袋。到再拣时，再重复上述动作，他们是在拣拾昨天夜晚别人在散步时丢下来的烟头。这就是“拾烟族”。

按说这次各地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来的，都是被俘的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中职位最高的一部分。这些人被俘虏时，除有个别因害怕钱财带在身上，暴露身份外，大都带有不少黄金美钞。对于那些挥金如土、一掷千金连眼都不眨一下的人来说，绝不会吝啬到连根烟都不肯接济别人。况且，在改造所中，有烟帮助无烟的瘾君子互通有无者，大有其人，怎么也不会穷到拾烟头而无人周济的地步。那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拾烟头现象？这还得从“拾烟族”的组成说起。

“拾烟族”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以董益三为代表，一类是以汤尧为代表的。董益三属于穷困类型的，他原是军统电讯处副处长，在军统局很有名气。抗战胜利后，戴笠为了培植他接替电讯处处长魏大铭，把他送往美国去学习电讯管理工作。两年学成回国，戴笠早已死去，毛人凤不想用他。董益三在美国时，认识了一个与戴笠齐名的特务头子康泽。

康泽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在国外学习回国后，蒋介石不让他再搞特务工作，任命他为十五绥靖区司令，负责指挥襄樊地区的军事工作。他便邀请董益三去担任他的第二处处长，负责搞军事情报。后来，他与康泽均被俘获。董益三这个人，个性十分强，他工作的那个处，又是清水衙门，所以他也就没有什么积蓄。至于沦落到拾烟头，还有另一个原因，董益三被俘后，态度比较合作，表现比较积极，集中后被选为学习组长。此时他的脾气一点没改，一是一，二是二，从不与任何人套近乎、拉关系，生怕“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影响自己的改造和“工作”，以致于他宁愿自己捡烟头抽，也不愿接

受别人接济。

“拾烟族”的另一类人是以原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为代表的。汤尧在被俘时，除了一块表和一支派克笔没有丢掉外，其余都在逃跑时丢得精光，他一向是吸“伸手牌”烟的人。当然，有时由于面子问题，不好意思老向人伸手，瘾来了，也和董益三一样拾别人丢下的烟头。捡的烟头并不能点燃就抽，今非昔比，大家抽烟太吝啬了，全不像过去，吸到还剩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就向下一丢，现在都吸到快烧到手指了，还要狠狠地吸上一口才恋恋不舍地丢掉。

所以拣起来的烟头，从拆开又再卷成烟去抽时，一股焦味直刺喉咙，但要过瘾，也得吸。“捡烟族”们常常偷偷地拣了到室外去吸，有时利用打乒乓球的机会，在乒乓球台上把烟头抖散，用废纸一支支卷好，留着慢慢抽。还很风趣地为之起了个名字，叫“自造牌”。说来很是让人感慨，这些人过去的生活那么奢侈，谁会料到今天竟去拣香烟头抽。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改造这些战犯，不仅要改造他们的旧思想，而且要改造他们的旧习惯，教育他们抛弃过去奢侈的生活，重新过上积极健康的生活。勤俭节约就是让他们养成的一个好习惯。

改造之初，战犯们很不以为然，毕竟以前奢侈腐化已成习惯，一下子纠正过来不是那么容易，经常会出现扔馒头、倒饭菜的现象。经过长期的教育改造，多数战犯已能体会到广大人民的疾苦，认识到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

◆学习组长难当

1956年集中改造后，战犯的学习、劳动和生活便由在犯人中间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学习委员会负责管理。具体执行者，就是由犯人担任的学习组长。在改造所中，当好学习组长是相当不容易的。表现太积极吧，经常被人攻击为靠拢政府；工作不负责吧，又没法向管理所领导交待，夹在中间，很难做。

梁培璜，国民党第六兵团中将副司令，是最早来到功德林的战犯之一，除了王陵基（1886年生）、孙楚（1889年生）外，就要数他和王泽浚年纪大了，他是1892年生人。此公心直口快，无论对谁都一视同仁，成了阶下囚，身上军人气质丝毫未减。也正是因为他的耿直的性格，在战犯中有较高的威信，被选为学习组长。不当则已，既然当了组长，就得尽职尽责，事必躬亲，这是他的观点。为此，有人说他讨好政府，假装进步，想以这些换来好的处理结果。对此，他并不介意，只是说了一句：“扯淡，什么讨好假装，还能讨出去？”而且，他还很有气度，不把这些刺耳的话放在心上，事情该怎么做还怎么做，情绪丝毫不受影响。

黄维是梁培璜这组的。黄维是个顽固分子，被俘后，不认输、不服气，企图以搞永动机试验，寻找新的出路。针对这些，有人提出要开黄维的批斗会。监狱的领导也觉得应该让大家帮助下黄维，加速他的改造。于是，就把开批斗会的任务交给组长梁培璜。

梁培璜工作态度十分认真，尽管感到很为难，但上面一布置下来，他立刻着手做准备工作。他事先了解到对黄维意见大的一个人早有材料，就要他为主发言人。黄维知道后，认为是梁培璜要整他，不然为什么非找平常对他有意见的人为主要发言人呢？梁培璜听到风言风语，说了句“扯淡”，会议照样开。

黄维有一绝招，他能控制放屁的时间。开会过程中，针对别人的发言内容，他能乘发言的间隙，放几个响屁，放完后态度严肃，别人则想笑不敢笑，谁都知道黄维是在对发言者说：“放屁！”

会议主席梁培璜很为难，不制止吧，继续下去怕难以控制；制止吧，这是生理现象，管天管地管不了人家拉屎放屁。他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只漫不经心地说：“黄维，你注意听发言。”说着无意，听者有心，黄维以为他与他过不去，在偏向发言者，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后，使劲地又放了一屁，意思是你梁培璜也是：“放屁！”梁培璜无可奈何，又不愿与他计较，便对发言者说：“你快点讲！”发言者本来想借机再骂黄维几句的，也没有骂出口，继续念他的发言稿，一场批评

会就这样草草收场。会后，黄维就写了几句打油诗并加注：

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势也。

韩信受胯下之辱，张良有纳履之羞。忍也。

在改造过程中明势利尤有必要。

黄维把写有打油诗的小本子放在床上，本子照原样翻开着，显然是有意让人看，梁培璜看后立即报告了管理科长刘福印。第二天，刘福印按规定检查违禁物品时，果然发现了这个本子，而且本子还是没有合上就放在枕头边。他看了没有当回事，放回原处就走了。

那个对黄维有意见的人见刘福印就这么走了，便当着梁培璜的面质问黄维：“你到底在骂谁？你是龙，你是虎？谁是虾，谁是犬？”黄维平静地说：“谁愿意当虾就当虾，谁愿当犬就当犬！”

那个人气急败坏，随手就打了黄维一耳光。愤怒已极的黄维抓住他的衣领正要一拳打下去的时候，被同房间的林伟侑拦住了，梁培璜也上来拉架，几个人扭成一团。

发生武力冲突立即惊动了狱方。监狱负责人姚伦问清事发过程后，首先强调了打人不对，批评了那个人，同时又指出黄维对改造持抵触情绪，应认真学习、改造，梁培璜偏袒动手打人者，也应当引起注意。

事后，这几个人都作了检查。梁培璜态度诚恳地接受了批评。他的组长照样当下去，直到1965年第五批特赦才自动“卸职”。特赦后回到了原籍河南，任省政协文史专员，1971年病逝，终年80岁。

学习文件是战犯改造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造所经常组织战犯针对当时的某些文件进行学习。战犯们大半都有相当的文化程度，所以许多文件拿来一看，一般不但能看懂，也能抓住文件的精神发挥一通。有时为了消磨时间，总爱推几个人轮流来什么“初读”、“精读”，读的人大声朗诵，其余便闭目养神。

当然，战犯中也有文化程度不高者，例如周振强，他劳动突出，

成为典型,而在学习上,是麻绳拎豆腐——提不起来。他的文化程度较低,据说他当中下级军官时,很得力于他的夫人楼亚隼,她是杭州一所中学的教师。北伐后,周振强衣锦还乡,楼亚隼对这位年轻英俊、身材魁梧的革命军官,一见倾心,而周振强对这位温柔贤惠、善于理家的知识女性也一往情深。二人结为夫妇后,楼亚隼帮助周振强学文化,代他看信写回信,几乎可以算是周振强的半个秘书。

后来周振强的官越做越大,便自己配了个秘书,不再需要这位结发夫人代劳,另外娶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如夫人。谁知等到周振强被俘后,这位倍受周振强宠爱的如夫人竟然另找出路,他的几个子女,还是靠那位发妻抚养成人。每次提起发妻,周振强都深感愧疚,而一提起那个小老婆就恨得咬牙切齿。

有人嫌学习气氛沉闷,明明知道周振强的文化程度低,便故意推举他出来读。周振强有个犟脾气,越说他不行,他越要干。读文件时,有些缺德鬼为了要拿他来开心,便用激将法来激他,让他自己抢着读,看他闹笑话。不知道是他真的念错字,还是故意来逗这些想取笑他的人,他往往把贪官污吏读成贪官污“史”,如火如荼读成如火如荼“茶”,有人便问一声:“什么茶?”“龙井茶!”回答得也很利索。

2. 恶习难改

改造所成立之初,上级领导已预料到,必须一步步来。改造所的工作人员采取了自愿接受教育与强制改造相结合的手段,对战犯集中进行改造。经过多年的思想教育与劳动锻炼相结合的改造方式,大部分战犯已能改过自新,改恶从善,但也有个别恶习难改、顽固不化分子。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杨文琮仍爱粉面油头

按常规,进了监狱的犯人,由于失去了自由,没有与外人接触的机会,再加上在狱中,心情不佳,大都是不讲究仪表的,一般形容狱中人总愿意使用“蓬头垢面”这个词。而在无奇不有的战犯管理所内,就有这么一位爱收拾头面的中将师长——杨文琮。

杨文琮,四川人,黄埔二期生,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参谋,师和军的参谋长,以及师、军长等要职。他看去不像个军人,满身香气扑鼻,头发油光铮亮,有些“顾影自怜”的酸劲儿。

在北京战犯所,早、中、晚挑三次开水,早挑的开水是洗脸用,上午和下午挑的是饮用的,晚上则是挑洗脚水。早晚的洗脸、洗脚水是由挑水的人来分配的,每人每次两大杯,加点凉水,也可以痛痛快快洗一下了。但对于杨文琮来说,两大杯热水是不够用的,他经常向分水人多要点。

杨文琮要那么多热水干什么?据说他洗脸是很考究的,往往是先把肥皂盒拿出来,把毛巾放在旁边,先用手捧着水,把脸洗过一遍后,才用香皂把手洗干净,再往脸上搓香皂,那种细致劲儿决不逊色于爱打扮的女人。

杨文琮洗脸一向是可以慢腾腾地洗上20来分钟,洗完还得在脸

上涂点雪花膏之类的东西，最后是在头发上抹点油脂，大功告成了，他才有心思干别的事。在管理所不可以买发油，他就买变相的油。如冬天买点防皮肤皴裂的蛤蚧油、甘油、凡士林等，他统统留下来当成头油慢慢使用。

杨文球对头发的保养也十分讲究。每次劳动时，他怕弄脏头发，总是要戴上帽子。每次劳动回来后，大部分人累得往床上一躺，什么也不想干，而他直到和早上一样把脸洗得干干净净才肯休息。每次理发时，他也十分挑剔，理掉头发，好像用刀捅一下他的心似的。

究其思想根源，据他自己说是为了能讨得漂亮女人的欢喜。尽管现在已成为战犯，他还深迷于过去的罪恶之中。

当年，他也算得上是风流倜傥。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极力追求当地的交际花、校花、名媛闺秀等社会上有名的美人儿。追到后，就与其结婚，不合胃口了，便抛弃不要，再换新的。在这方面，他还总结了一套“杨氏理论”。他认为：一般人讨老婆是易讨难丢，大凡有点地位的男人要结婚，总会有女人愿意来当太太的。这种女人到手容易，但一旦结婚，就像狗皮膏药—样，贴上去容易取下来难，要丢掉很困难。而像那种“花”—类的女子，却与此相反，是难讨易丢。因为这种女人追求的人多，而且娇骄气很重，架子大，追到手的确不容易，但是一旦玩腻了想换换口味，只要几番争吵，—记耳光，马上就会同意离婚。因为外面还有人等着排队哩！

在改造所里，相当长的时期内，他的思想都没有转过来，依旧活在过去花天酒地，莺歌燕舞的回忆之中。直到1975年，他才达到“改恶从善”的标准，随着特赦全部在押战犯的春风，被释放出来。

◆战犯依然“惹不起”

改造所里，也有霸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四个“惹不起”，他们横行霸道，蛮不讲理，别人不愿惹，也不敢惹他们，所以给他们取了个绰号叫“惹不起”。

话说排行第三的原国民党五十一军军长“惹不起”，这是按资辈排的。因为强中更有强中手，还有两个比他更蛮横，连他也不能轻易去惹。

名为“惹不起”，当然有他的涵义。这主要表现在他在什么事上都不肯吃亏。拿分菜的事为例，他先去数一数自己菜碗内分到的肉有多少或看鱼有多大，再去和分菜的同学比较，如果他少分一片肉或鱼比较小，那他就要大闹一场，对分菜的同学大喊大叫，一顿批评，几乎什么帽子都给人扣上，直到那人认错给他添足或掉换之后，他还要喋喋不休一阵子，才肯罢休。其实，按当时的伙食标准，每餐有荤有素，菜量也富富有余。定量的饭菜许多人都吃不完，可他宁愿将饭菜剩了倒掉，也要争争多少。

第三号惹不起也有碰壁的时候。北京战犯所的寝室和学习室外，有一片很大的空地，四周有几条粗铅丝，供战犯们晾晒衣服、被褥用。有一条向着正南，冬天几乎大半天都有太阳照射，人人都喜欢在这条铅丝上晒被子，也就经常为此引起纷争。

有一天早饭后，这位第三号“惹不起”，抱着被子去晒，一看这条铅丝中间日照最长的那一段晒着两条被子。他是“惹不起”，当然容不下这，便径直走过去，把两条被子向左右一推，将自己的搭在中间。他很得意地拍了拍手，转身正要走时，见在附近散步的同学中有两人气势汹汹地朝他跑过来，还没等他明白怎么回事，那两个人便一边一个拉住他的胳膊，另一手指着他的鼻子又叫又骂。一顿狂骂之后，两个人才放开手。

第三号“惹不起”也不是省油的灯，冲着两人毫不示弱地回敬了几句。那两个人对他又是扑头盖脸的一顿骂，直到骂得他哑口无言为止。那两个毫不客气地把他的被子从铅丝上拖下来向地上一摔，把自己的被子拖回原处，正准备就此休战时，忽然发现被子上面有一道黑色的痕迹。一定是刚才被子被推动时，将铅丝上的灰尘擦在上面。两人顿时怒火冲天，交换了一下眼色，怒气冲冲地走过去。

三号“惹不起”已把摔在地上的被子拾起来，一边用手拍去沾在上面的泥土，一边小声嘀咕那两位太凶。那两位一走近，便揪住他让他看两条被子上擦的东西，不仅让他把黑印拍掉，还从他手上把他抱着的被子抢过来，再次摔到地上。这还不算，每人还在他被子上踩了一脚。按常理他一定会大发雷霆，好好发作一顿的，出人意料的是他并不作声，而是抱起被子，到旁边去拍打灰尘和脚印，原来今天算他倒霉，正遇上比他更加厉害的第一号和第二号“惹不起”，否则他是绝不会让步的。

三号“惹不起”还有一个特点，是以批评别人来显示出自己思想进步，态度积极。在批评会上，一般采取犯人彼此教育的方法，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使被批评者认识错误。三号“惹不起”最喜欢开别人的批评会，每到这时，他都认为是自己表现的大好机会，而他每每采取的方式就是大吵大叫，连喊带骂。

这位“惹不起”在批评别人时表现得那么积极，而他对自己的许多坏思想，却从来不检查。别人只要指出一星半点，他就可以吵个不停，甚至能无休无止地胡搅蛮缠几天十几天还不罢休。往往要等待管理所的干部出来制止，他才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掩护下，自己表示要“加勉加勉”！

当然，他也有胡搅蛮缠不灵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学习发言中，说他在解放前“对国民党的仇恨比对共产党胜过十倍！”

“此话当真？”这话立即引起别人的怀疑。

“一点没有错！”“再说一遍！”他又重复一次。

那人当即质问他，既是那时就有那种思想，为什么不投降起义？而要顽抗到底才化装逃走，被自己的部下打了一枪，被解放军活捉了，还不立即承认自己是五十一军的军长。

这些话，问得他哑口无言，实在找不着合适的辩解理由。他只好使自己的看家本领与人吵闹不休。但是，他毕竟没有道理，最后，还是以他“太不老实”而告终。

经过一昼夜的深思熟虑，他终于又编出一套恨国民党胜过恨共

产党的所谓理由，说来令人发笑。第二天，他突然一改往日暴戾的常态，变得像饱受委屈的小媳妇一样，居然也挤出几滴泪来，不知是真情所致，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他为自己辩解道：由于他带的部队是“杂牌子”，一向要受中央军嫡系的歧视，打仗挡头阵，驻防却是最差的地方，说着说着竟至泣不成声。他说他恨国民党，也骂过国民党，但事实却远非他所说的那样。

据知情人士介绍，当年他被调到上海时，是满心欢喜，原以为到了上海可以发横财。因为那时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曾在上海强制收兑了大量黄金白银，加上上海资本家不少手中还有大批美钞、黄金和贵重物品，可以大大捞上一把。他哪里料到，到上海后，上海防守司令石觉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却命令他率领残部去浦东川沙方面，接替三十七军罗泽闾部在白龙港与三九港间的防务。他心凉了半截，那里除了海水和沙滩，什么油水都没有，但军令如山，他又不肯违背。

谁知该军驻防白龙港等地才4天，解放军便从左右两侧和背后包围过来，两个师长都不约而同地先溜走了。部队没人指挥，他也匆匆换上早准备好的便衣，天黑下来，便向上海市区跑去。

由于他当时换了便衣，没有立即被发现，当他的部下全部投降后，他也被俘，并被自己部下指出来，他就是五十一军军长。值得庆幸的是，没有被处死，反而受到了优待，把他送到了上海。到上海后，他与几个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住在一起，有人告诉他，不但汤恩伯、石觉跑了，连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闾也弄了不少钱，逃到台湾去了。听到这些，他不由勃然大怒，的确骂过石觉、汤恩伯等人，骂他们派他去驻守，结果没有发财，反而当了俘虏。

这几句话，竟然被他当作救命稻草。谁都知道怎么回事，结果当场就有人指出：他是为了个人利害而恨透这几个人，不等于他恨国民党，这只是自欺欺人，态度不老实。就这样，他被一连批了三天。最后，还是管理员替他解了围，宣布结束他的批斗会，让他自己好好认识一下。他说：“开始我说我恨国民党胜过恨共产党，你们批斗我三

天,说我不老实。今天事实证明了我的话不但是对的,而且应当提高一步,因为批斗我的人,都是你们这些国民党人;而帮我解围的,却是共产党人。我今后应当说,我永远恨国民党,永远爱共产党!”

3. 狱中人的情感世界

狱中人的情感世界是纷繁复杂的,囚在狱中,许多以前无暇去想,不愿去想或不敢去想的事,如今都涌上心头。亲情、乡情、恋情、友情,如潮水般汹涌澎湃。跟着蒋介石征战南北多年,得到了名和利、钱和权。可到头竹篮打水一场空,失去了亲人,失去了朋友,在本应举家团圆,欢度除夕的夜晚,却孑然一身,孤影自怜,回想过去,羞愧难当。

◆念娇妻和想故乡

自称“六一居士”的郭一予,是黄埔军校一期生,是黄埔军校“高干班”(中央军官学校)第一期学员,是中央训练团第一期学员,还是庐山军官训练团和陆军大学将官班的第一期学员。这六个“第一”的学历,对他的仕途并未起多少作用,他本身没有后台,所以一直没有得到重用,经常以“六一居士”来自我解嘲。

直到解放前,他总算在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的保荐下,当了中将政治部主任。当时正值淮海战役最紧张的时候,国民党军面临灭亡。郭一予负责部队政治工作,除给部队去打打气外,便是组织难民让他们搞互助工作,难民因没有东西吃,想偷偷逃出去,投到解放军地区,又被阻止,经常为此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有一次,郭一予去视察难民时,看上了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学生,他是灾星未退,色心又起,想娶那个女学生当姨太太。他派部下去与那个女学生的父母商量,条件是负责供应她父母和两个弟弟的口粮。

在那兵慌马乱的年代里,粮食就是生命,所以女学生的父母满口答应。在炮火纷飞的包围圈内,年过半百的郭一予又做了一次新郎,洞房设在他的掩蔽防空壕内。用郭一予自己的话说,这是“苦中

作乐”，也是“人的一生中少有的机遇”，“用几斤粮食娶一房姨太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决不放过。”这真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只可惜，好景不长，新婚连蜜月还没有过完，淮海战役便结束了，还没有享受够新婚燕尔滋味的郭一予与其他国民党高级军官一起，成了解放军的俘虏，由于走得太匆忙，也没来得及安排他的那位小妻子，以至于新娘至今下落不明。但郭一予无论是在解放军官训练团，还是在功德林监狱，以及山东战犯管理所，一直对那位还不满20岁的小太太念念不忘，他在睡梦中经常喊着那位可怜的少女的名字“珊珊”。据他自己说，当年他们临别时，她说过一句：“我等你早日相见。”郭一予一直记着这句话。这真是：“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是淮海战役中漏网的大鱼，福建解放时才被活捉回来。像他这样漏网后又落网的，在战犯中并不多见。

陈士章这人很重感情，讲义气。据他自己说，每年最难过的时候，就是过旧历的除夕年。因为这个日子在中国传统上意味着要举家团聚，除旧岁，迎新春，无论离家多远，这一天，都要赶回家中。而今他只能一个人在改造所内，默默地为亲人和朋友祝福。每每这时，思乡之情尤浓，每年都得哭几场。在改造所里可以蒙住头睡觉，如果想哭，只要不吵醒别人，可以哭个痛快，万一被别人听到，只要不承认有什么思想问题而推说做了恶梦，别人也就不会追究了。

据陈士章自己回忆，有一次，他因为想家，痛哭了一场。第二天，小组长不停地追问：“夜里哭什么？”他吞吞吐吐不肯说，那位小组长穷追不舍，非逼他说，他顺口说道：“我说出来你可不要生气，我昨夜做梦梦见你死了，我舍不得你，所以哭了起来。”虽是句谎言，却也无法识破，谁又能证明他做的不是这样的恶梦呢？

陈士章是河北赵州人，他小时候常常光着屁股和许多小朋友在赵州桥上玩。他说过，过去我常在上面撒尿的地方，今天成了举世闻

名的古迹,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历史名胜。这是我家乡的东西,我也一同感到光荣。他不止一次表示,有朝一日得到自由,一定要回家去看看这座石桥,一定要在它上面走上几遍,还要拍几张照片保留下来。

◆秦城农场的春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人之常情。当了犯人情感就更复杂了,过去是身居高位,每到除夕之夜,家人团聚在一起欢欢喜喜地吃团圆饭,听外边的鞭炮声,那喜气洋洋,其乐融融的气氛,他们是记忆犹新的。而监狱中的除夕,与之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家人不在身边,只能形单影只,暗自低泣。最令战犯们怀念的是1958年在北京秦城农场劳动锻炼中度过的那个春节,与众不同,令人欣慰。

距离春节还有半个月,管理员就宣布可以在春节期间自行排练一些节目,文娱活动不限于下棋打桥牌以及清唱,可以演唱一些京戏、地方戏、相声等。另外多采购一些吃的东西,可以征求大家的意见,把喜欢吃的、想吃的报上来汇总,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所以每个人都喜气洋洋的,准备好过好一次年。

北京地区的冬天,天寒地冻,根本无法劳动,管理员决定利用冬天来补秋忙时的学习课目。农活最忙是秋天,既要收获果实,又要储藏好,于是就成天劳动,原来定下来的半天学习,几乎都停止了,正好趁冬天把它补上。春节前一个星期,学习内容也不那么紧了,一般只是读读报纸而已。该开会批评的事也不批评,这是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这一传统的节日。甚至有个别同学说,春节搞文娱活动是“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像这类话,这个时候也不批了,整个春节几乎是人人喜笑颜开。

在春节快要到的前几天,就吃什么的问题,战犯们分为两大派发生了一场南北大战。南方同学极力主张按他们的习惯,把春节分配到的猪肉做成回锅肉、红烧肉,而北方同学主张按照北方的传统,

美美地吃上几顿饺子和包子。争论的结果，是吃饺子的一方胜利了，因为是在北京过年，就得按北京人的方式——吃饺子。

农场食堂的几位炊事员照例都回去过春节了，北方同学们把袖子一卷，号召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少南方同学也“不计前嫌”，加入进来。经过近十年的改造，这些“大老爷”们干起活来还都像模像样。当饺子包出了一大半的时候，庞镜塘包了10个白糖馅的饺子，混在一起，并说谁要吃到了糖饺子，便可以交上好运。但两顿饺子吃过之后，他自己却没有吃到这种能带来好运的糖饺子，也没有听到有人嚷嚷，吃了糖饺子，大概大家和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囫圇吞下去，连味道都没有尝出来。

第二年，第一批特赦正好是10个人，庞镜塘便得意地说，准是那10个甜饺子被这10个人吃了，所以他们能得到第一批特赦。其实到底真假如何，谁也不去较真，落得个心理高兴，就行了。

农历年初一一大早，每一间寝室都能听到祝贺声，犯人们不是互祝“恭喜发财”，而是互祝“吉祥如意”或“万事如意”。犯人能如心意的惟一大事是出去，金钱在牢中没有自由可贵，在狱中关了近十年，每个人都心平气和、深思熟虑地思索了很久，什么可贵、什么值得珍惜、什么该去奋斗，他们一清二楚。为蒋介石国民党奋斗了几十年，为了名和利、钱和权放弃了尊严、亲情、友谊，有的甚至丧失了人性。现在回过头去想想，往事如烟，不堪回首。

年夜饭也是相当丰盛的，除了豆浆、油饼外，每人还有一块年糕，难得的是年糕上有几颗红枣，按他们的意思理解，红是代表吉利，枣的谐音是早，吉利越早到来越好，战犯所待遇比一般监狱虽然好多，但千好万好还是早点出去好。

在农场的春节文娱活动别具一格，那么多文武大员登台献艺，不能说在历史上绝无仅有，起码也是凤毛麟角。

大家将劳动农场的小礼堂装饰为临时剧场，农历正月初一下午，在那里召开了他们自编自演自导的春节联欢会。报幕员是天津直辖市市长兼北宁铁路护路司令杜建时，他一口标准北京话，惟一

的嘉宾是留在大厨房给战犯们过年做饭的一位炊事员。

下午两点整,报幕员的京腔响彻了整个小礼堂:“敬祝各位身体健康,学习进步,新春万事如意!”话音刚落,四下里响起掌声。“第一个节目:湖南花鼓。”这是由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和一一四师一个姓夏的师长合唱的。“无湘不成军”,当兵打仗,过去是湖南年轻人的出路,所以将军当中,湖南人也多,被俘战犯中,湖南人占了十分之一强,所以杨伯涛那纯正的湖南腔一开唱,立即赢得了满场喝彩声。

第二个节目是第三兵团副司令兼四十八军军长张鸿文演唱的桂剧《王佐断臂》。战犯中,两广同学人数仅次于湖南人,所以桂剧也是很受欢迎的。

紧接着,京戏、越剧、苏州评弹陆续出场,都很有一手。最后一个节目,是由军统局东北督导室主任文强与国防部二厅副厅长沈蕴存自编自演的,歌颂新中国农民在解放后所过的幸福生活的独幕剧——小康人家多幸福。

被俘的战犯清一色都是男人,所以有女人的角色,都由男人扮演。这次沈蕴存与文强合作演戏,他自愿男扮女装,充当女主角。他的扮相还十分讲究。一出场,便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只见他穿上了管理员借来一套花衣服,半白的头发用一块花布包了起来,耳朵上一边挂一只小红辣椒,并把白粉笔调成水抹在脸上,学着农村小脚女人的样子,一扭一扭地走上场。可能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扮相上,对剧本还不太熟,开头几句台词,他还能对答上来,后来便结结巴巴,无言以对了。

文强是湖南腔,沈蕴存是苏北腔,两人一问一答,南腔北调,听起来十分滑稽。下面的人越笑,文强越着急,沈蕴存就越想不起台词。这可急坏了躲在一旁提台词的兵工署稽查处少将处长廖宗泽,他一看沈蕴存对不上来,便索性大声把台词念了起来。话剧一下变成了双簧戏,男主角连演带说,而女主角只是比划,张口无声,对答的话是从台后发出来的。这一场表演,把所有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高兴极了。直到散场后,人们仍笑声不断。

这年春节战犯们一连痛痛快快地玩了三天，除演出外，还有各种棋赛以及打桥牌、猜灯谜等活动。

宋希濂的棋艺精湛，围棋、象棋都首屈一指，杜聿明打桥牌是常胜将军，沈醉打克郎棋也难逢对手。

三天过去后，又半玩半学习了十多天，才又重新投入了紧张的劳动与学习。多年以后，战犯们每每回想起在秦城农场过的春节，都还意犹未尽。

五、沾了女儿光的杜聿明



杜聿明

杜聿明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1924年6月,他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是蒋介石的爱将之一。

毕业后,参加过东征和抗日战争。从长城抗战、昆仑关战役到远征赴缅抗日,他都屡立奇功。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杜聿明也曾与人民为敌。

杜聿明曾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后在陈官庄被俘。在淮海战役以后,他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教育,走上了新生道路。

1. 成为阶下囚



杜聿明被俘

1949年1月10日，是杜聿明终生难忘的日子，是他结束军人生涯的最后一天。这一天，他在河南省永城县陈官庄被俘。当时，他认为“一切都完了”。然而，他却没有料到，这一天竟然是他新生活的开端。从这一天起，他踏上了光明广阔的再生之路，尽管一开始并不那么自觉自愿。

◆蒋介石集团的主要成员

杜聿明，字光亭，1904年11月28日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一个地主家庭，16岁入榆林中学读书。那时，他是一个活跃分子，体育课特别专心，尤其擅长篮球，且很快学会了步枪射击，对军事知识和技术兴趣更大了。1923年中学毕业后，他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抉择，此正值黄埔军校和吴佩孚的洛阳军官学校同时招生。在他的本家、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的影响下，以及自己对军事的酷爱，杜聿明毅然选择了南下的道路。于1924年6月考入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官学校，成为第一期黄埔生。入学不久，他就服膺三民主义，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24年12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广东革命政府为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以黄埔师生为主，成立了两个教导团。杜聿明被分到第一团第一营三连当见习官兼军需上士。由于他善于管理，全连伙食办得很好，不久就升为副排长。1925年2月，广州革命政府以教导团为主力，举行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杜聿明担任教导团宣传队队员，随团参加了淡水之役，后来因病离开了黄埔教导团。

杜聿明投奔蒋介石，其实是个偶然。1926年底杜聿明投身于张治中任团长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被张治中委任为学兵团一营三连连长。1927年夏的一天，在武汉分校学兵团任职的黄埔一期生洪君器同张治中谈及某些政治问题，有人揭发张治中与洪君器企图带学兵团到南京，洪君器即被逮捕，武汉分校在武昌阅马厂召开大会，将洪执行枪决。学兵团全体师生同仇敌忾，群情激愤，高呼“打倒蒋介石，枪毙洪君器”，唯独杜聿明既不举手，也不喊口号，垂首站在人群中一动不动，此举激起大家强烈愤慨。

当晚，连里召开大会，对连长杜聿明提出质问。会上，任凭多方质问，杜聿明始终一言不发，最后被处以禁闭，呈请上级彻底查办。当被反绑押送时，杜聿明拚命反抗。禁闭期间，杜聿明听说要被枪

毙,就在当晚和同室的犯人冒着倾盆大雨逃出监狱,乘船到南京,找到已在总司令部训练处任职的张治中,一同去见蒋介石,讲了他这段经历。蒋介石听后很高兴,给了他一些钱,叫 he 到司令部黄埔同学会登记处登记。张治中遂委任他为校园委员会中校委员。从此,杜聿明投入了蒋介石新军阀集团。

由于杜聿明长于训练,工作忠实肯干,为人处世比较灵活,颇受张治中青睐,先后在张治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南京中央军校和教导第二师任职。但此时的杜聿明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到1930年,他已被提升为教导第二师第六团上校团长。同年冬,教导第二师改番号为陆军第四师,由徐庭瑶任师长,杜聿明任第二十四团团。杜聿明很会把握机会,他认为团长这个职务很重要,是今后一生事业浮沉的关键。因此他格外努力,拿出全副精力,认真治军,不稍懈怠,再加上他本身有一定的军人素质和领导才能,二十四团经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后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不久升任副师长,由此杜聿明总算在派系林立的蒋家王朝内立住了脚。

长城抗战后,杜聿明进入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一期学习,在此加入复兴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为数不多的复兴社成员之一。1937年,南京军委会、军政部决定,将交辎学校战车营、交通兵第二团所属装甲汽车队合编,并补充一批战车,建成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受到蒋介石、徐庭瑶瞩目的杜聿明,被任命为第一任团长。

1938年,国民党政府从欧美购买了一批机械化装备,将装甲兵团扩编为第二〇〇师,由杜聿明任师长。该师编制比一般陆军师大,总兵力约两万人。12月,第二〇〇师又扩编为第十一军,徐庭瑶任军长、杜聿明任副军长,部队移驻广西。不久,番号又改为第五军,徐开始任集团军总司令,杜任五军军长。

第五军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初期成立的惟一的机械化新军。杜聿明幸得老上级徐庭瑶的扶植,也得益于他个人良好的军人素质和才能,稳固地保住了许多人都眼热的五军军长宝座。杜聿明并非机械科班出身,深知这个位置来之不易,因而自任装甲兵团团长开始,

就严格要求自己,不耻下问,刻苦学习驾驶和修理技术,掌握了战车、装甲车和汽车的性能,由外行变成了内行。

在杜聿明的领导下,第五军注意训练,士气旺盛,装备、训练优良,号称新军,蜚声全国。重庆军委会派员前往校阅。军事训练列为全国第一。徐庭瑶对此曾激动地说:“现在我可以告白天下了,国家创建这支机械化部队没有白花钱,我荐举了第五军军长,没有看错人。”

1942年,杜聿明入缅作战回国后,被蒋介石提升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杜聿明以抗战功臣的身份,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先后担任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东北“剿总”副司令兼冀辽热边司令官、徐州“剿总”副司令等要职。

1948年,国共双方已进入最后决战阶段,刚刚出院的杜聿明被任命为徐州“剿总”副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长官。杜聿明登上了蒋介石这辆战车,只有尽其愚忠、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了。

◆ 被俘,拒绝见陈毅

淮海战役中,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在刘集战败后,带着警卫、随从、司机等10余人,化装成人民解放军逃到刘集南侧的张老庄。山穷水尽之际,杜聿明换上了士兵服装,刮去脸上富有特征的小胡子,混迹于士兵之中,藏匿于张老村一个隐蔽物的后面。当解放军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拿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门,他要以死效忠于他的党国。正要扣动扳机,被副官阻止。

几天后,当解放军再次盘问他时,他又从身边抓起一块石头,猛击头部,顿时血流如注,晕厥了过去,解放军救活了他。异常的表现,终于暴露了他的身份,引起解放军的怀疑:“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你们知道我就是杜聿明还问什么?”被俘后他三缄其口,不透露任何问题。陈毅要见见他,竟遭到拒绝。为避免他再度自杀,解放军给

他戴上沉重的脚镣，送进了北京功德林监狱，杜聿明成了被改造的囚犯。

杜聿明是淮海战役中被俘的最高长官，国民党徐蚌会战的主将，也是被俘被捕国民党战犯中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人物。被俘后由华东解放军官训练团管训，从名称上可以看出，中间再多一个“军”字就是解放军军官了，可见当时对这些俘虏是相当宽松的，在名称上也不刺激他们。这个训练团所管训的俘虏，主要是淮海战役中被俘的，连同后来在华东、中南等地区陆续俘获和逮捕的国民党敌特人员就成了山东战犯管理所关押的主要对象。这个所(团)是全国关押场所中待遇最好的，无论是在管理上，还是生活上，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

2. 在狱中



1957年杜聿明(后为王耀武)在北京战犯改造所参加北郊劳动改造

杜聿明被俘后,由对共产党的满怀敌意和猜疑,逐渐转变为信服和感激,以至衷心拥护共产党,走上社会主义的光辉大道,绝非偶然,这是他经过长期、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特别是通过对许多具体事情的观察和体验的结果。真理面前,顽石点头。

◆不想活，死不了

杜聿明在被俘前的短暂时间里，思想斗争相当激烈。当时，杜聿明曾几次想突围，但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不敢妄为，后来蒋介石命令杜部解黄维之围，因黄维兵团是国民党的主力，黄维又深得蒋介石的宠爱，杜聿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再加上邱清泉一直监视他，使他不能随心所欲，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硬着头皮“贸然为之”。如果当时按杜聿明的突围想法，不顾蒋介石的命令，可以全师而归。

但当时的杜聿明，上有蒋介石、陈诚，下有邱清泉，他夹在中间，左右动弹不得，虽想突围，身不由己。先拿邱清泉来说，他是蒋介石派来监视杜聿明的，这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法。邱清泉这个人骄横跋扈，目中无人，虽为杜聿明的下属，但毫不示弱。在战役进行期间，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两次写信给杜聿明，劝他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第一封信落在邱清泉手里，他自作主张把信烧了。第二封信，杜聿明看后曾想：如果投降，还可以保留住两个兵团。他想试探一下邱清泉的态度，于是将信给邱看，邱当即反对，又烧了，杜聿明只好把这个想法咽到肚里。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当时想遵照陈毅命令办，“因限于处境不能表达”。

再说陈诚，黄维是陈诚的亲信，他必救他无疑，黄维的兵团，又是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蒋介石也不会置之不顾。由于上有蒋介石的命令，怕得罪陈诚；下有邱清泉制约，迫不得已，他与邱清泉、李弥集体决定：令各军自寻出路。结果邱清泉被击毙，李弥、孙元良化装逃走，杜聿明就有了上面那一幕。如果不是有这些顾虑，说不定最后的近二十万人也会被他撤出。

杜聿明被俘后，还没有立即自杀。在经过几次讯问后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时间短促，他的思想斗争比被俘前还要激烈。

一方面，他对共产党有顾虑。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中，他指挥大军与解放军对抗，延长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是历史的罪人。在

辽沈战役中，死伤无数共产党官兵，淮海战役还施放毒气，撤退时挟持四五万群众，致死一万多人等等。这都是杜聿明担心的。作为败军之将有抹不掉的罪责，他一接触到这个敏感而又现实的问题时，就觉得共产党决不会饶恕他。尤其是听到一位解放军干部谈话时说：除了战犯杜聿明其余一律宽大对待，联想到西北权威人士谈战犯时把他列为43名首要战犯之中，他觉得落到共产党手里是必死无疑，他随时作好死的准备。

另一方面，杜聿明对蒋介石更有顾虑。这么大的战役，关系到国民党生死存亡的战役，败在他手上，他无脸见“校长”，无脸见上司，无脸见同僚。他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过去在与共产党作战中，在抗日战争中，自我感觉是过关斩将、奖章勋章挂满胸的英雄。每到一处总是威风凛凛，他经常是在掌声中行进，人们投给他的是羡慕和敬仰的眼光。如今当了俘虏，失去了自由，没有履行对蒋介石的“不成功便成仁”的信条，成了阶下囚，无论从对蒋介石的忠心考虑，报效蒋校长的知遇之恩，还是从维护自己尊严考虑，保全封建名节，都觉得不应再活下去。

还有一层，他的老母亲和妻子儿女全家八口均转到台湾，这是蒋介石专门为高级将领安排的，名曰是妥善安排家庭，消除后顾之忧，实为变相做人质，以便使他们能自始至终为他卖命。谈到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去台湾的家眷都是经过选择，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能去的不用说都是蒋介石的高级嫡系将领和最亲近的中下级人员的家属，是高级将领而非嫡系者不行，是嫡系而非高级将领则可，前者包括原为共产党叛徒或沾到共产党边的那些后来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人和他们的家属不准去台湾，相反，像1975年特赦回台滞港的十人之一中的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的家属就可以去台湾，还有类似张铁石情况的一批人。

话说回来，家属去台湾对杜聿明本人而言，是好事，也不是好事。现时，他的全家八口都在台湾，杜聿明只要有一言半语对蒋介石不利，他的全家就会遭到灭顶之灾，这是有很多事实证明过的，深知

蒋介石为人的杜聿明心里非常明白。而他被俘后未杀身成仁,将来免不了谣言是非传到台湾,影响全家八口的安全,为了堵死这条路,不如一死了之。为避免祸端,他“遂起自戮之心,期以一人之死解救全家的危难,即以巨石将头击破,不省人事”。

杜聿明是个孝子,长期的军旅生活顾不上孝敬母亲,忠孝不能两全。在他看来,自杀可以成仁,自杀也可以孝母,公私兼顾。可是,阎王爷不收这位人债、国债还没有偿还的败将,他被抢救过来了。

他自杀未遂,却给自己带来麻烦。为了防止他继续自杀(后来又有一次藏安眠药想自杀未逞),管理单位根据上级批准,给他以“惩罚”,戴上了镣铐,直到1950年11月8日由山东转到北京功德林监狱时方摘下。战犯无小事,首要战犯更是如此,他戴刑具,摘去刑具,都是报到公安部,由周恩来批准后才执行的。摘下后也没有让他住集体间,而是住单间,专人专哨监视,单独管理。到1956年1月10日,被俘七年整才又与其他人过集体生活,同样对待。这使他异常兴奋,并把这一天作为他再生之日,作为斩断同反动集团罪恶关系的一天。

◆ 满纸新词,爱摆架子兜圈子

杜聿明在最初入狱时,拒绝学习,直到1949年4月在受到柳亚子、马寅初等一批民主人士接见后,才开始愿意学习。国庆节后愿意阅读报纸、书籍,不过像《人民公敌蒋介石》、《蒋党真相》、《四大家族》等他还是不愿看。读书看报也要经过请示批准。后来,他要求发给笔墨纸张,开始写历史,写心得体会。

杜聿明有一个特点,说话说半句,写东西也是写半个意思。1949年11月初,起义将领陈明仁到济南看杜聿明,在杜聿明求死不能,求生不甘的时候,他的老部下劝慰他,并说毛泽东讲过不轻易杀一人。他也估计共产党可能不杀他,但又不十分相信。这时,他听陈说要把他调到北京,还以为是让他在抗美援朝中给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到北京后原来是被关进功德林监狱。

在这种情况下，他心想，共产党既不杀他，又不让他立功赎罪，那就活一天算一天吧，看他们会把我怎么样。他在写这个材料时，本来是要看你共产党把我怎样，但笔锋一转写成“看看共产党是怎样地领导人民创造新世界的”，前后意思完全联不上，这只能看作半句话。

在军事上叫“引而不发”，说半句，起个头，看你接不接下句，听听对方怎么说。在这半句话策略里，对方无意从何说起，也就只听不说，没戏，他只得自动封嘴，免得引起祸端，特别是有关领袖的话非常敏感，人人都知道它的厉害，他更清楚，于是说些今天天气如何如何，下顿饭可能吃什么，把话题很自然岔开，像没事一样，一切如初。

杜聿明给人的印象是严肃，矜持，话不多。写东西除摘抄书报上的内容外，还是比较精练的，无用的话不多，军人风格十足。他说半句话，或引而不发而又自然化解的做法应用得非常自如。

“昨日座上宾，今日阶下囚”，杜聿明可谓饱尝这种感受。长期身居高官，要在短时间内放下架子是困难的，由于架子放不下，他吃过苦头，他的被俘就是因为在白天吃五香牛肉干、五香豆腐干、罐头，抽高级香烟，老百姓发现后不能不怀疑他的来历。在改造所里，经过五六年集体学习、劳动、生活，过去那种上下级、大官小官的观念有些淡漠，可是杜聿明去掉刑具，参加集体学习以后，起初还不是那么自在，仍放不下架子。他不像很多人那样能很快适应环境，随遇而安。

开会时他条件反射地要向周围扫一眼后再坐下，如果说他表情严肃，还不如说他显得谨慎。在讨论时，他总爱先说几句，说完后又毫无表情地看看周围。他参加学习时，起初发言很短。后来，他的发言长了，往往是长篇大论，书上的、报纸上的，大段大段的、半篇半篇地引用，“同学”们只好硬着头皮听，经常是大部分时间让他占去，也没有人说个不字，只是在会后议论，有的说他当官当惯了，有的说他“好为人师”，有的干脆就说“还是保安司令”那一套。

娱乐时也有类似情况。他打桥牌的水平相当高，他不但经常教

训他的搭档,还公开说他要“开班收徒”。有的人附和,有的就不买帐。因为打桥牌、下棋,从来就没有人能服气对手,这样,私下又有议论,说这人“很讨厌”。

打牌他比别人擅长,他很机智,而打桥牌要善于计算、推理、判断,不聪明是不行的,他确实是胜人一筹。劳动虽是他的弱项,他同样好为人师,而从不承认错误。有一次挖砖翻地,要把地里的砖块石头挖出来,扔掉,然后再平整。别人都按要求在组长统一组织下干,可他不是,东挖一锄西挖一锄,把砖头到处扔,扔到杨伯涛脚下,砸着了杨。杨伯涛没有说什么,别人也没有批评他,只是组长让他注意点,他不高兴了,反而说他是为了多挖砖,谁叫他不走开点。实在是有点不讲理,大家也不跟他计较。

还有一次,轮流值日轮到他刷厕所,他把洋灰墙凿了很多洞,大家感到莫名其妙,在当周的检讨会上组长提出这个问题。他不以为这有什么错,墙上不干净嘛,不凿掉留着干什么。而且反过来责问组长邱行湘为什么不当面提出,而拿到小组会上来讲。

◆一笔好字,无极电机

杜聿明是一个很有才华人,他不仅擅长武的——领兵打仗;而且擅长文的——写一手好字。很多人愿意看杜聿明写的各种材料,哪怕是他抄书抄报的东西也愿意看。理由很简单,看起来舒服,可以说是一种享受。很多文字,无论是用毛笔写的,还是用钢笔写的,也不管是质地好的纸还是不好的纸,整件整件的、整篇整篇的都写得非常工整,从头到尾每个字都差不多一样大,看上去简直像印的。他写的正楷多,有时也有草书,草书也是大小划一,整整齐齐。他的毛笔字人称蝇头小楷,但也有比蝇头小楷更小的,该是“蚁头小楷”了。

蝇头小楷也好,“蚁头小楷”也罢,那么大量地写下去,对一个体弱多病,高度近视的人来说实在不可想像,况且监狱光线不是很明亮,也没有高的桌子矮的椅子,只能“伏床”而写,可见难度之大。仅

此一事,没有一种内在修养是没法办到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磨毛笔专家”,其实他只是“借此消磨时间”。

坐牢的人一无所有,最富有的就是时间。时间多,对每个坐牢的人来说都是难熬的,有的人就适应不了,感到烦闷,不安,神经质,甚至想自杀。有的人就能适应,他们能找出适应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树立一种信念,制造一个希望,寄托一项目标,然后采取一种实现这些东西的方式,杜聿明的方式就是写字,他写的字,按印刷数字计算,一页16开的纸,蝇头小楷每行28个字,每张38行,每张就有千余字;“蚁头小楷”每行48个字,每张50行,就有二千多字。

按他的身体情况和客观条件,写一张蝇头小楷恐怕至少得用一个小时。“蚁头小楷”就得花更多时间。对过去习惯于分秒如金的将领来说,这不是消磨时间又是什么呢?杜聿明自称“磨毛笔的专家”。同学们没有表扬他,没有公开地羡慕他,反而批评他这是“自命不凡”,是“借此消磨时间”。

除了可借此消磨时间外,杜聿明“磨毛笔”还有一个妙用。他患有腰腿痛的病,后来检查是脊椎炎,他每写一张文字都是把腰伸直,累了就停下来,这也是个锻炼身体的好办法。说来也巧,他原来“老寒腿”一直缠绕着他,走路不太稳,经过几个月后,走路也利索了。胃溃疡也是他的老毛病,后来一顿能吃五个包子,好了。为这两种病,想当年他向蒋介石请假要去美国治疗,被奚落了一顿,也没让他去。

杜聿明每次写完字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满一张纸以后,他总是很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佳作,长时间地扫视着它们。有时是情不自禁地摇摇头,笑了,有时很严肃,有时摘下眼镜凑近文字揣摩,有时又双手摊开纸审视,总之有一种满足感。不知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有可能觉得这些字整整齐齐排列像“兵马俑”,有可能觉得像他昔日统率的军队,这只有他自己清楚。

再有一点是,杜聿明这人很善于分析,当他见了陈明仁、柳亚子,特别是张治中后,他非常清楚,共产党不会要了他的命,那么早晚有一天能获得自由,又觉得眼下不会马上放他的,而且要获得释

放必须交代罪行,认识罪行,有好的实际表现。这样,他又不甘心,面子上抹不开,于是又想了一着:发明“无极发电机”,也叫“无极电机”、“电力发电机”。想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得到国家的奖励,以便体面地走出监狱。

他利用建立机械化军队的经验,参考有关的技术资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大量论证,推导出它的原理公式。他认为这种机器能节约大量能源,提高电动机车的效率,成功后会广泛应用于铁路和其他企业部门。据说国外早已有这种机器,只是由于工艺等各方面的限制,在中国还没有研究和开发利用,那其实就是现在广为应用的所谓无极变速等技术。

与此同时,黄维出于同样的动机要发明“黄维永动机”,即不需要任何动力原料的机器。经公安部领导批准让他试验,中国科学院鉴定,属于空想,予以否定,这与杜聿明的“无极电机”不同。可是黄维仍坚持试验,遭到很长时间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杜聿明对自己的发明计划也就自动收回。

说到这里,可以看出,杜聿明比黄维灵活,他们俩都准备第一批特赦,可是黄维坚持试验,并做出很多对自己不利的事,越搞越糟,直到1975年才最后特赦,比杜聿明晚了十六年!应当说,杜聿明比黄维还是聪明些,他见势不妙就当机立断“撤退”。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中不也是这样吗?杜聿明不愧为“撤退专家”。而黄维则不,他先是冒进钻进了解放军布下的“口袋”,而且自恃是国民党的主力,一直采取进攻态势,发现被围后,还顽固到底,施放毒气,直到被俘。所以国民党将领中不少人说黄维是军事上的“书呆子”,就灵活这一点来看,远远逊色于杜聿明。

◆四肢不灵,五脏不全

“我过去在反动的旧社会有钱有地位,病都没有治好。现在我是一个罪犯,人民政府还想尽一切办法,治好了我多年来没有治好的

各种疾病,这种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使我永世难忘。”这是杜聿明1957年发出的心声,在这之前,他的胃溃疡、脊椎结核、肺结核、肾脏结核都已痊愈。

说四肢不灵,就是他的腿总是伸不直,走路跟别人不一样,也不是瘸,给人的感觉是拖泥带水,不利落。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病,1947年在上海养病期间也没有检查出来,时间久了也就不注意了。

说起治好腿病,那还得感谢管教科科长李振江。事情发生在1953年,有一次战犯洗澡,李振江突然大叫道“二〇一,你站好!”(“二〇一”是杜聿明的代号)这一叫不打紧,所有洗澡的人都站了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那时用水很节约,尤其是他们,已养成了节约用水的习惯,听到科长命令就把水龙头关好,赤条条地都站在那儿。

说实在的,杜聿明与其他人一起洗澡本来就不自在,除在黄埔军校一起集体洗过澡外,他都是一个人洗,别说他住高级洋房时那种洗澡条件,就是行军打仗时洗澡,他也不要别人在场。当时功德林监狱洗澡条件不太好,只能集体洗。科长一喊,他还没听清,待流水声停止后,李振江指着杜聿明:“叫你呢!”

李振江凑近他,蹲下去仔细看,弄得他很不好意思,别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凑近去看,他更是莫名其妙,有点忍不住,“这不是侮辱人格吗?”正待发作,李振江说他屁股上长了一个大疱,两腿站着不一样,需要马上检查,叫他擦干身上的水,穿好衣服,带他去医务室。杜聿明走后,水龙头又打开了,剩下的人说什么的都有。不过赞叹李振江心细的声音压倒了流水声。

杜聿明的腿、股后来被诊断为脊椎结核,久病麻痹所致。幸亏李振江发现,及时诊断,及时治疗,打针吃药消除了肿,但当时没有根治。后来卧床治疗,每天保证足够的营养,牛奶鸡蛋,流汁饭食,医生每天检查病情,护士精心护理,一年后基本痊愈。治好腿病,对他来说触动最大,他非常感激政府的关心,他知道这肯定惊动了最高当局,估计毛泽东、周恩来都知道。他的估计是对的,所有进口药品都

要报经周恩来批准,战犯工作无小事嘛。

说他五脏不全,主要是他的肾病。杜聿明小便越来越困难,经住院检查诊断为肾结核,还很严重,需要手术。他有些悲观,认为治好也是个残废。经过做工作,安定了他的情绪,最后与治疗脊椎结核一起治疗,做手术摘除了一个肾,恢复了健康。胃溃疡是自然好的,肺结核也治好了。这样,他判若两人,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在党的教育关怀之下,治好了我的心病——思想病,又医好了我的身疾——结核病,真是再生之恩德!想到这里,我觉得蒋介石不仅是人民的公敌,也是害我的敌人,对他恨入骨髓;毛主席共产党是救我的恩人,真是感恩不尽,感激涕零!由此,深刻地体认到党改造人类改造世界和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伟大意义。觉得毛主席说不杀一个人,我也可能包括在内的,不然就不会对我这样的关心。

这是他的真心话,在小组会上发言时他流下了感激的眼泪。将军有泪不轻弹,一向严肃矜持的杜聿明,病痛折磨消除后也会感情用事,这种感情的触动是他整个思想转变的开始,但还不能说他转变了。

◆参加劳动

身体健康状况不断好转,也就没有思想包袱,精神状态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跟同学相处不再那么一本正经,而是随和了,与大家有时还开开玩笑,对问题有不同看法也不那么固执己见,能以平等态度听取别人的意见。

中共改造战犯的政策是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由于北京管理所基本上是国民党的首要战犯,一般年龄大一些,身体差一些,劳动技能更谈不上,不少人不知劳动是怎么回事,什么都不会干,有

的人连简单劳动都是第一次参加。所以说是劳动改造,实际上只是象征性地做一下。

杜聿明本来是属于免除劳动的对象,但他积极性很高,提出搞个缝纫组。这个组在杜聿明等人几批特赦后一直到“文革”中还存在,别的组都自动取消,这个组一直存在,这不能不说与杜聿明打的基础有关。第一任组长是杜聿明,文强、徐远举、沈醉、黄维、宋希濂、刘嘉树、严翊、王泽浚等都曾经是这个组的成员。

杜聿明指挥过几十万大军,指挥国民党的这些党政军特的头头们搞缝纫自然不在话下。他擅长机械,缝纫机是最简单的机器,况且他在任机械化军长时还接触过缝纫机和缝纫“业务”。

但是管理好缝纫组的事,却没有这么轻松。这并不是说杜聿明没有能力,而是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在处理特殊的人与人的关系中,稍微处理不当,就会出事。缝纫组有两员大将,组长是杜聿明,质量“验收员”是黄维,杜聿明是“和事佬”,总是尽量避免出事,出了事也尽量自己兜着。而黄维是个严格把关的质量“验收员”,对于不合要求的衣服,一律返工重做,而且一视同仁,因为返工问题,经常双方僵持不下,闹到杜聿明那里。

杜聿明一般是能放过的放过,实在不行的有时说服黄维,有时自己代替重做,很少让被提意见的人返工,如果人家主动愿意返工就让他返工。于是黄维就认为杜聿明不讲原则,常常以此来攻击他,并将这些在周会上提出,这样,问题就变得有些复杂,杜、黄之间不可避免要发生矛盾,甚至吵起来。结果当然是“黄胜杜败”。

这种情况要数十七兵团中将司令刘嘉树处理得最好。刘嘉树是第一号大胖子,长期患高血压心脏病,属于免于劳动的对象,他在缝纫组干最轻的话,诸如铺棉花。由于他个高体重,铺棉花粗手粗脚老是铺不均匀。如果遇上黄维的眼光盯在棉衣上,他就采取主动,“先发制人”,半开玩笑地跟黄维说:“拉兄弟一把吧”,逗得黄维“扑哧”一笑,事情就解决在“襁褓”中了。杜聿明也认为刘嘉树有办法,很欣赏这种“战术”。

杜聿明当缝纫组长最担心的是把机器搞坏。怕事总有事，断针的事就少不了。要是在过去，断一根针有什么了不起，换一根就是了，别说一根针，就是一部缝纫机，一个工厂，坏了毁了又有什么了不起。杜聿明在指挥东北和淮海两大战场撤退时不就毁掉了成千上万部机器、重武器和工厂、矿山吗？可现在就不一样了，断一根针，弄断一尺线都是“破坏公物”，就有人上纲上线批你。

杜聿明就挨过批，说他“领导”不力，不爱护国家的一针一线，是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少爷”作风，要深挖思想根源，搞得他哭笑不得。所以他最怕听到“叭”的响声，一听到这种声音就如同损失一个师一个军的心情一样紧张，立即亲赴“战地”加以解决。

杜聿明在担任缝纫组组长的时候，原以为只要技术上能胜任，一切问题就好办，实际上与他想象的大相径庭。这时他想起他的妻子当缝纫厂厂长是多么不容易。

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跟很多官太太不一样，用现代语言叫女强人。她不是专门在家管内务，而是“工作型”的官太太。她善于理财，玩股票，投资做生意当厂长，也能交际。曹秀清有自己的“体己钱”，这些钱可用作她私人的投资或置买房产，而杜聿明是不知道的。为此，杜聿明在被俘后谈到自己的财产时费大量时间和笔墨也谈不清楚他在上海、南京等地到底有多少财产，他自己为此也很苦恼。

后来使他感到庆幸的是，由于妻子的能干，六个子女都能成材，曹秀清也在1963年从美国转道莫斯科回国与杜聿明团聚。

杜聿明属于心灵手巧的一类人，悟性很高。在劳动上，还是个多面手。身体不好，要求劳动的积极性很高，被认为是态度好，有正确的劳动观。

秦城农场种了不少果树，有桃树、梨树、葡萄，还有一片长势不错的苹果树。种果树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劳动，其中关键的一环是剪枝。果农为了教他们剪枝技术，专门挑出一棵做试验，杜聿明专心听讲，很快学会了。理论易学，实践难做，当他拿起剪刀，一剪一剪剪

下去的时候,剪得对的少,错的多,当果农提出剪掉了不少结果枝,留下了不少废枝时,他很不好意思,在小组会上自觉检查说不虚心。当再正式在其他树上剪枝时,结果对的多,错的少,技高人胆大,熟能生巧,后来他剪枝既快又好,同学们称他得了两个冠军:剪枝冠军和桥牌冠军,所以在特赦时专门给他照了一张剪枝的特写照片。

◆有个好女婿杨振宁

人逢喜事精神爽。杜聿明恢复健康,在劳动中多次受到表扬后,心情比以前舒畅多了。后来又与在台湾、美国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尤其是得知他的女婿杨振宁博士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后,他更兴奋不已。

杜聿明这人做事谨慎,从他与家人通信过程就可以看出来。从1955年起,他流露出想与家人联系的意思,但大都比较含蓄,只是些例如“不知老母是否健在”等话,他是在试探政府,等着政府与他联系。果然,管理所要他提供情况,他便很快把全家八口去台的经过说出了。这八口是妻子曹秀清,三儿三女加上老母亲。按1956年算,老母77岁。六个子女中,杜致礼为长女,嫁给杨振宁,她在昆明读大学时是杨振宁的学生。老三杜致仁 and 老四杜致严是双胞胎,除老大杜致礼1947年就赴美国留学外,其余子女当时都在台湾读小学、中学,老母健在。

当政府帮助他与杜致礼通信并知道家庭情况后,他很感激,原来那种试探性的希望实现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试探,可直接向政府提出,这是他的权利。杜聿明想得太多,以为家属在台湾,如果提出可能会引起误会,这样试探遭到误会时最多算“暴露思想”而不是向往台湾,成功了更好,不成功也不是他杜某人提的,面子上也过得去。

与亲人取得联系后,接着就是希望老母、妻子、儿女和女婿早日返回祖国大陆。这是真的。杜聿明与其他人不一样,他早就向政府表

明：死活不愿离开自己的祖国。所以就是特赦后，改革开放后，在许多人都去了香港、美国，杜致礼和曹秀清也要求他去美国定居的情况下，他拒绝了。

杜聿明在处理女婿杨振宁问题上，也是含含糊糊，若隐若现。当他知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去瑞典领奖后去台湾，路过香港而不回大陆看看时，他的想法是复杂的。当时，他对杨振宁的政治态度不太清楚，只知道台湾当局对杨振宁大肆宣传和拉拢，而大陆只登载了一条简单的消息。他的内心是希望杨振宁回来，至少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作点贡献，对他自己问题的解决也有好处，但他不主动向政府提出让他做女婿的工作。

而政府呢，当然不便要他出面，因为他还是战犯，对他愿不愿意出面还没有把握，就是他愿意而捅出去被外界抓住辫子是不好听的，所以形成了麻杆打狼——互不相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搞了个“迂回战术”：他给女儿女婿去信说他生活得很好，他断定女儿会回信会说他们（杨振宁夫妇）希望杜的问题能早日得到解决，果然女儿这么回信了。为使他们了解党的宽大政策，进一步争取他们早日返回祖国，他准备再做些工作，以取信于政府。

这个战术只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就是政府应早日解决他的问题，只有解决了他的问题，才能争取杨振宁夫妇返回祖国，因为不解决他的问题，他们就无法了解党的宽大政策。可是这句话，他要政府说出来，让他出面做工作。

杜聿明判断，杨振宁是世界有名的科学家，如果宽大处理了他的岳父，那共产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尊重科学的形象就会影响到全世界。对杨振宁，他也不直说让杨给中国共产党施加影响。相反，他在给杨振宁夫妇的信中只单独给杨写了个小条，小条上只写了两句话：祝贺你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祝你顺利。这可能是碍于长辈的尊严吧，只字不提他的事。而这个条，政府是知道的，他也在向政府表明，他没有借女婿的名望来促成自己问题的解决，真是一语双关。

杜聿明长期从事战略战术的研究，多多少少也犯有一种职业

病,什么事都拐弯抹角,不直说,不够坦率。其实,他在处理杨振宁夫妇是否回国与自己前途的关系问题时,完全没有必要如此迂回,两头试探,两头要面子。

但是有些事杜聿明考虑的也不是不无道理,例如他说希望在台湾的亲属能去美国定居,原因是,他们回大陆不可能,台湾控制很严,如果提出也不安全,因为原来台湾当局已把杜聿明列入“成仁”名单,进了“宗烈祠”。后来知道他还活着,还传出他有对蒋介石不利的言论,又与在美国的女儿女婿取得了联系,对杜则会另眼看待,杜聿明深知这一套。如果在台湾不走,对他和亲属也都不利,是一块心病。

与大女儿联系上后,杜聿明心情舒畅多了,人也开朗多了。有时还跟同学开开玩笑,闲着没事干还给人家取绰号,秦城的同学中有不少绰号都是他取的。什么“九百九”啊,指人吝啬。什么“一万多”呀,是指七十九军中将军长方靖,他一脸麻子,南方人视麻子为“一万多”,即麻点无数的意思。这就是杜聿明的另一面,诙谐、活泼。

◆ 第一批获特赦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中国共产党宽大政策的感召下,杜聿明这块顽石,终于被打动了。用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名句“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是再恰当不过了。

杜聿明由对蒋介石的愚忠顽固思想转化为热爱新中国,热爱人民的思想,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也是微妙的。杜聿明思想转变的主要障碍是愚忠思想在作怪,所以,研究他的思想转变,得从愚忠思想入手。据杜聿明自己所说,在1949年4月间,民主人士柳亚子和马寅初等十余人接见他后,他这个顽石脑筋开始打开了一条缝。

后来张治中、邵力子等人也来到北京。杜聿明心想:为什么国民党的前辈、学者都到共产党这里来,都来拥护共产党,足见国民党真

是一团糟，势在必亡。《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中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背叛人民大革命是真的，屠杀千千万万的人也是事实，蒋介石真是人民的公敌。《蒋党真相》中所说的种种黑幕和《四大家族》中揭露出蒋宋孔陈以化公为私、假公济私的方法占有全国人民的财产达两百亿美元之多，并且依靠出卖中国的主权以取得外援来屠杀中国人民也是真的。而自己为蒋介石尽忠也就做了蒋介石的走狗，因而他对于蒋介石发生了怀疑，觉得应该把人民的文件研究研究，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后他就逐渐开始学习。

他的自白最简单地说明了他的思想转变的关键是国民党的前辈、学者张治中、邵力子、柳亚子、马寅初等一大批人都到共产党这边来了，资历比他们浅、学识比他们浅的杜聿明还有什么理由死守“不成功便成仁”的信条不放，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忠于蒋介石？没有了。从气节上讲，张治中等没有任何不守节的问题，因为守节是一种信念的体现，既然以国民党政权为载体的整个“国家机器”都不复存在了，那么整个信念就应该改变。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已腐败透顶，守节的人没有必要硬去维系它。

再说，守节不守节，往往是以外力强制改变的，而张治中等完全没有外力强制，完全是他们看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到共产党这边来完全是自愿的选择，是爱中国的大节所致！在杜聿明看来，他要变化，也不会有人骂他变节，要骂先骂国民党的前辈，所以他后来思想转弯是顺理成章的事。说到底，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作用。张治中等到共产党这边来，杜聿明等与旧我决裂，都是对气节的重新认识和对待，共产党没有要他们“背叛”蒋介石，转弯以后，也没有要他们发表什么声明，只是表示欢迎。可以说，一切都是自愿的。

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毛泽东主席提议特赦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战犯。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首批特赦。许多战犯都在思量着“改恶从善”的标准，有的自觉已经达到，应该特赦；有的人心悬在半空，即使有的认为特赦无望，也抱有一丝幻想，而杜聿明绝不敢奢望

自己能获赦,他还对同学说:“我是四十三名战犯之一,没有希望。你们出去以后我继续好好改造,争取以后特赦。”

12月4日,特赦大会召开,他平静地坐在会场的一角,仿佛发生的事与他毫无关系似的。“杜聿明!”第一个叫的就是他。

“有!”他机械地应了一声,站起来走向主席台前,面向法官肃立。当法官把特赦通知书送到他手中时,他低头深深地鞠躬,双手接过通知书,转身回到坐位。此刻,他喜悦、幸福、羞愧之情交加,热泪滚滚而下。由此,他走向了新生,终于回到了人民的行列。

杜聿明特赦后,与王耀武、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周振强一起留在北京,先在北京近郊红星公社劳动,一年后被安排在全国政协当文史专员,正式成为统战对象。1975年特赦的就不经过劳动,连同前六批特赦和刑满释放的国民党“战犯”一律列入统战系统,所以说他们思想转弯的关键是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是有前因后果的。

3. 全国政协常委



1972年7月,杜聿明(右)获特赦后,夫人曹秀清自
美返北京团聚。女婿杨振宁(中)亦至京探视

1964年11月,杜聿明被特邀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78年又相继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昔日对人民有罪的战犯,今天竟参与商讨国家大事,为人民作有益的事,他的心情无比激动。1964年11月,他激动地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表达他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无尽感激之情和誓为实现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竭尽全力的决心。

◆周恩来的座上宾

杜聿明特赦了，自由了，作为一个公民，他最想去的地方是天安门广场，他想看看天安门，看看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毛泽东在这里宣布的，凝望着毛泽东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题词及周恩来总理书写的碑文，看着一幅幅人民英雄的浮雕，他心潮起伏，惭愧地低下了头。望着广场上悠闲游览的人们，他蓦地思念起妻子。他给妻子的信中说，他已获特赦了，并于1961年春，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关工作，他生活不错，家有一卧室、一客厅、一办公室。

收到丈夫的信，曹秀清决定舍弃在美国舒适的生活，从大洋彼岸回到祖国。1963年6月3日，在中国驻外使馆的周密安排下，曹秀清飞回祖国。机场上，政协领导人、老朋友都来迎接。她一眼看见了戴着近视眼镜东张西望的丈夫，急步向他走去，当妻子欣喜若狂地说：“不认识我了？这不是回来了！”他笑了，连连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机场上充满着愉快的笑声和温馨的气氛。

曹秀清做梦也不曾想到，周恩来知道她回国后立即接见她。当周恩来那双大手紧握着她，说“欢迎你回来”时，她心里涌起阵阵暖流。周恩来还请他们吃饭，嘱咐道：“你们要互相关心，和和气气生活，把家庭搞温暖。杜夫人，你放心，国家会负责你们的一切费用的。”

这位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与她的丈夫有着师生之谊。周恩来曾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杜聿明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杜聿明获释后见到这位昔日的师长、今日新中国的领导人时，愧悔交集，无地自容，连连地说：“周老师，我是一个不好的学生，没有学好，当年没听你的话，走错了路，实在愧对老师！”他万万也没有想到，这位心胸如大海，磊落如日月的共产党领导人，红着眼圈，声音低沉地说：“不怪你——怪我这做老师的没尽到责任，没把学生教好。”何等博大的胸怀！何

等宽广的气度！何等真挚的感情！杜聿明这位赳赳武夫被深深地感动，被征服了，眼中泪珠滚动，曹秀清连连地说：“不是老师没尽到责任，是学生背叛了你，没听你的话。”

◆邓小平参加追悼会

杜聿明一生有个未了的心愿，就是没能看到祖国的统一，没有看到台湾回归大陆。他的晚年，为祖国的统一事业贡献了巨大力量。从1960年起，杜聿明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以自己切身经历和感受推心置腹地劝告台湾师友，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奋斗。他先后写了《回顾淮海战役，寄语台湾旧友》、《纪念“二二八”起义，寄语台友》等文章，以他特殊的身份，以其真挚的爱国热情，为促成海峡两岸人民早日团聚不懈努力。当有人问他：

“如果为祖国统一，派你去台湾，你怎么想？”

“那就去！”他毅然回答。

“你不怕？”

“怕什么？七十多岁了，为祖国统一，我死而无憾。”

弥留之际，他更殷切盼台湾回归祖国，早日完成统一大业。他不忘共产党的恩情，立下遗言：

我的心情极其愉快，是由于经过党的教育，改变了我的的人生观。

余妻曹秀清素知余志，余已嘱其率子女为祖国现代化继续作出贡献。病危深思，最关怀者一言而已，盼在台之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共同把我文明古国建成现代化强国，为子孙万代造福。

殷殷之情，溢于言表，感人肺腑。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去世，终年77岁。

全国政协为杜聿明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送了花圈，邓小平、邓颖超参加了追悼会。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肖克致悼词，对杜聿明做出了全面的评价：

他虽然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他有着光荣的后半生，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人民将怀念他！

六、在狱中也会做人的王耀武



王耀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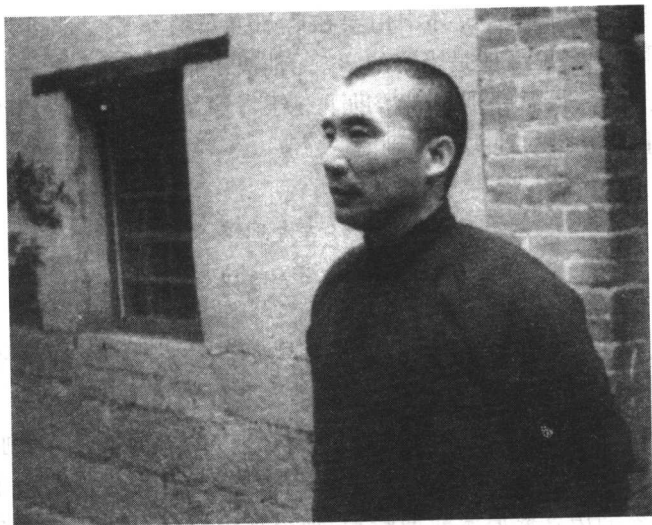
王耀武是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他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在战场上是一员猛将。

王耀武这人十分灵活，八面玲珑。他被俘后，能迅速改变立场，当上监狱的学习委员，被认为是一向表现好的典型，获得第一批特赦。

但是特赦后他才知，过去托付副官带千两黄金去香港以照料夫人，结果副官和夫人成婚，使其人财两空。

1968年，又碰上了“文革”风暴，看到造反派批斗康泽的情形时，被活活吓死了。当时他才64岁，过早地结束了一生。

1. 王耀武会做好人



王耀武被俘

王耀武会做好人，这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在国民党集团内，还是在解放军的俘虏营，他都是出了名的好人。他左右逢源，在错综复杂的国民党派系中游刃有余，又不斤斤计较，在战犯改造所中也很有人缘。

◆一步一步不容易

王耀武出生于山东省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没有什么背景，后来能发迹，全靠他自己的本事。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他就四处打工，小小年纪跑遍了天津、上海。学徒的日子非常辛苦，他希望自己能从给人当学徒、打工，到攒钱当老板，但这是遥遥无期的。后来运气来了，王耀武终于听人说孙中山要在广州办黄埔军校。他以为是“军官”学校，顾名思义就是当官的学校。他决定报考。可是第一批、第二批没有赶上，最后在别人的帮助下终于考取了黄埔三期。当他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迎头是一副对联：

升官发财请走别路
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他看了两遍，伫立片刻，心想“原来如此”。但又想，上这个学校比给人当学徒强千倍，好万倍，便踏踏实实地入校了。

王耀武毕业后，从少尉排长、上尉连长、少校营长、中校副团长、上校团长到1933年29岁的时候当上少将旅长，走完了他军旅生涯中比较难熬的历程。后来峰回路转，他参加由蒋介石亲率50万军队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并立下“战功”，被蒋介石召见。王耀武很善于把握机会，他知道这次可能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于是他做了精心的准备，在召见中，他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蒋介石所器重，并直接提拔他为补充第一旅少将旅长。他以这次提升为转折，运用技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一步一步地向前奔。

王耀武是靠打共产党起家的，他是踏着革命烈士的鲜血往上爬，朝前奔的。他在国民党发动的对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大“围剿”中，不遗余力，向中央苏区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当时，在交战中，打死了红十军团副军团长兼十九师师长寻淮洲，俘虏了军团长、著

名将方志敏和军团二十师师长胡天陶，并将他们杀害。这是王耀武对共产党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一笔无法偿还的血债。而王耀武主要以此“战功”赢得了蒋介石的赏识，蒋介石视他为嫡系，并在1936年提升他为中将师长，时年才32岁。

他当上中将师长后，在抗日的正面战场，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上高会战、长沙会战等，屡建战功，军职也变成中将军长、集团军中将总司令、方面军中将司令、绥区中将司令。

王耀武后来成了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在蒋介石“重点进攻”解放区的布局中，一是西北以胡宗南为首进攻陕北解放区，一是以王耀武为首进攻华东解放区。这就是西有胡宗南，东有王耀武，可见王耀武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他的官越做越大，钱也越来越多，据说他的钱是同僚中最多者之一。他在上海、武汉、山东等地有很多的房产，拥有各种股票，金银成堆。钱多好办事，他的官运之所以通达，除了能打仗外，就是会花钱。

他很会“送礼”，视人而异。如果是上司，舍得花“血本”，而且态度诚恳，方式自然，使“受礼者”心安理得，无法回绝，而以“会办事”相回报。如果是同级，送上厚礼像是喝杯茶那么大方，无所谓，使对方舒舒服服，而以“重感情”相回报。

对于职务比他低的他也送，凡是用得着的都送，比如派克金笔啊，金表啊等等。这些低职人员决非伙夫、勤杂之类，而是长官身边的人，诸如副官、秘书之类人员。给这些人送礼，可能比给上司送的作用还大，往往会收到奇效。比如同样的事别人办不了的，他可以办，这些人可以在长官面前美言几句，可能某个报告就会很快批下，这叫吃小亏占大便宜。

王耀武送礼与一般人不同，能当着许多人，甚至蒋介石、何应钦的面，送人家东西而不被人发觉。抗战时期，许多人生活困难时，王耀武往往利用他驻守的防地，大搞走私等活动，赚了不少钱，他对直接领导他的上司身边所有的人，都去进行收买。其方法之妙，是一般

人所想象不到的。当时一支派克自来水笔或一块瑞士的金表，都是人人求之而不可得的贵重物品，他每次去参加什么高级会议或去晋见什么大官时，身边总是带上几支派克金笔和金表，他要送东西给人时，往往当着众人的面，向某人借自来水笔或手表，说是自己忘记带了，等到散会或临走时，便把自己带去的还给别人。为了怕对方发觉不是自己的而拒收时，他会把上面贴的一张很小的“王耀武敬赠”的字条让对方看一下，就能彼此心照不宣地收下了。

无论是对上司、同僚或下级，凡送了礼都会有回报，今天没有明天有，甚至一年、几年后总会有收获。所以，王耀武的人缘相当好。那么，经常这么干，要花多少钱啦？

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有人提他一级，或帮他做一笔生意，或及时送呈一个文件，或多批一点军饷，等等，等等，能买多少宝石、戒指、项链、手表、金笔？这个账，王耀武算得清楚着呢。

◆好人做到俘虏营

王耀武被俘以后，先是送到华东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管训，后转押于山东战犯管理所、北京功德林监狱。无论是在山东，还是在北京，也无论是被俘初期，还是特赦前，王耀武一直表现很好。说他表现好，不仅是他对过去的罪恶有深刻的、诚恳的忏悔，而且在学习、劳动上都很积极。他不存在任何不服气的心理，也没有任何幻想，而是放下架子，面对现实，老老实实做人，不标新立异。

王耀武是学习委员会的委员。所谓学习委员会，是由所方干部和被改造者中既表现好又有能力有威信的人组成。学习小组和生活小组有若干个，学习委员会只有一个，领导着全部小组。学习委员平日在小组内与大家一道学习，每天学习完毕，召集各学习小组长开一次碰头会，各组长向他汇报学习情况，由他汇集以后去向管理所的领导汇报。

王耀武学习委员当得很有威信，表现好的赞成，表现不好的也

赞成,都认为他很公道。他向政府、向管理员反映或汇报他们的情况都是实事求是的,讲事实,讲道理,是非分明,一视同仁,最重要的是他以身作则,处处带头,物质上还牺牲自己,让给别人。

那还是在山东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次,他与同室的一位少将把衣服互相穿错了,这是经常的事,因为他们的衣服都是一样的,不叫囚服,叫制服。王耀武的那一件口袋里装有一只怀表,当这位少将穿上后发现有了表时,没有吭声。王耀武一摸口袋,表没了,一眼看见在少将那里,便态度和藹地向他要。那位少将开腔了:就只有你有怀表,我就没有?王耀武说了表的样式、特征,他还是不给。在场的同学都抱不平,少将还是不还。没办法,拖了一段时间,少将不提这事,王耀武也只好作罢。

又有一次,他和这位少将的衣服换了个。少将把一叠脏衣服放在枕头边,王耀武也把一叠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放在枕头边,因为他们两人是“邻居”,后来少将把那叠干净的穿上了,等王耀武换衣服的时候,发现衣服怎么这么脏。他想了又想,自己放的衣服是干净的,怎么变成了脏衣服呢?正在疑惑不解时,同室的另一位少将看着那位少将,笑眯眯地说:你刚换下脏衣服怎么这么干净?(因为每人只有一套外衣)他无话可说。那就脱下来给王耀武吧,他不给,反而对王耀武说:这套就是我的,那套才是你的!王耀武又只好作罢,把那套脏衣服洗了,晒干后他把它放到了枕头的另一头。

由此可见,王耀武为什么与大家的关系搞得很好,为什么他有威信?他是付出了代价的,这种代价毫无虚伪之嫌。他是在磨练自己,在还他的本来面目,难怪不少同学说他为人厚道!

人就是这样,去掉了恶,善就来临。去掉了刻薄,厚道就复原了。善与恶,厚道与刻薄,都是很微妙的,它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用进口手纸露出破绽

可能有人要问,王耀武这么圆滑,这么会随机应变,怎么会被俘虏呢,这说来很好笑。当年在济南被解放军层层包围时,他带着4名卫士混在难民群里悄悄出城而去。起初他化装成病人,脸上贴张膏药,头戴一顶破毡帽,盖着两床大棉被,躺在马车上哼哼唧唧。就这样顺着胶济路东行,企图混过解放区逃到青岛。

前四天他顺利过关,没遇到什么麻烦。但9月28日早上,当王耀武一行到达离济南相当远的寿光县的张剑昌桥头时,因为要解大便,他的副官便从身上掏出经常带在身边、他用惯了的外国进口的手纸。当地老百姓解大便时,一般是用一根小树枝,甚至用一块瓦片或土块擦一下,很少用手纸,也从没有看到过有人会用那样雪白柔软的纸去擦屁股,都暗地感到惊异。

当然,这种事很快就引起了当地解放军的注意,便把他和副官分开,加以盘查,当解放军战士问他叫什么名字,家居何处时,王耀武装作病重吃力的样子说名叫:“乔堃,系临清人,在济南开菜馆。”当问何字号时,王耀武却答不上来。问及他的4个随从人员时,王耀武更加紧张,张冠李戴,笑话百出。王耀武的西洋镜很快被揭穿了。在解放军工作人员的教育批评下,王耀武无可奈何地说了实话,于是他就被作为高级战俘而送入了监狱。后来第三野战军在苏州成立解放军官训练团时,他被送到那里去集中管训。

2. 监狱生活



济南战役中人民解放军的炮兵阵地

王耀武被俘后,先是被集中在北滩头进行思想教育,后被调到苏州解放军官训练团,华东军官解放军区训练团进行改造。他思想转变快,在狱中表现积极,被选为学习委员。

◆立有一功

人民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优待俘虏的政策，基于来源状况分为五类，不同对待：一是起义的，二是投诚的，三是报到的，四是被俘的，五是查获的。王耀武是在济南战役后在寿光被查获的，依例不算是俘虏了，但人民解放军仍以战俘对待，加以优待，将其集中在北滩头进行思想及政策教育。他深知自己在山东近三年罪恶极大，死有余辜。于是他响应号召，决心对国民党反戈一击，多次在电台上对国民党官兵广播讲话。

在淮海战役前后，尤其在战役中，人民电台多次放送王耀武的广播，其中最重要的是宣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对瓦解国民党军队军心，起过重大作用。他的广播像发射流霰弹一样，散布面广，杀伤力也大。

据说蒋介石听到王耀武广播时，大叫无耻，一脚踢坏了收音机，这说明了王耀武立下了新功。因王耀武乃嫡系将领，对中央嫡系部队有很大的心理影响作用，而非别的被俘军官所能及的，许多国民党官兵就是在他的宣传下投诚起义的。他被俘后受到优待，与他立大功不无关系。

◆在解放军官训练团

1950年全国大陆解放，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胜利结束，华东地区被俘军官数千人均处理将毕，国内全面土地改革工作也将在新解放地区进行。中国共产党为贯彻优待俘虏政策，第三野战军在江苏苏州成立解放军官训练团，将华东地区被俘军官（包括起义投诚犯了错误的军官与东南亚外籍军官）四五百人不遣回原籍，而集中于苏州相门外，进行较长期的训练工作。该团编成四个队，第一队成员是将官级，第二、三两队是中校、上校，第四队则以政工人员、中统、

军统、特工人员及部分县长、行政专员、厅局、省政府、省党部委员为成员。

王耀武及军级以上人员如庞镜塘、陈金城、牟中珩、刘镇湘、黄淑、韦德、周开成、李荃宣、司元恺、胡临聪、汪匡锦、孙良诚、李汉萍、王秉钺、李九思、郭吉谦、邓军林、杨荫、崔广森、陈冰、王泽浚、陈士章等均编入第一队。1950年工作重点是各自交代历史(包括功罪),写述对台同学、同事广播信,介绍台湾海外官员的人物小传,活动开展得很热烈。王耀武在苏州这一段,清算自己时,声泪俱下,感人颇深。在国内镇反时期,这批战犯却得到宽大政策的保障。

后来,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简称解训团)驻在山东禹城达5年之久,王耀武在这里长期接受改造教育。1952年春,第二次清算蒋美罪行大会开始,王耀武交代了历史。据他自己说,他确信坦白从宽的方针,如实交代了在国民党内追随蒋介石20多年的功罪。特别是山东人民要求山东省人民政府将王耀武提回济南公审时,人民解放军答复说,王某已低头认罪,交代了历史,拒绝提回,并向山东人民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王耀武对不杀不辱的政策,无数次感激涕零。

1952年夏,布置有计划有阶段地学习马列主义。在1953年之后,解训团有计划地编纂了《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二年的史料》,于是学习与工作双管齐下。

关于马列主义的学习,主要是学习辩证唯物论及历史唯物论。首先学习社会发展史,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由团领导布置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结合自己的思想学习。每一单元做一次总结,逐步提高认识水平,连续达三年之久。

王耀武思想转变,并不主要是他圆滑,在狱中的学习,使他脱胎换骨,他熟读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史、近代史,在谈到从东征、北伐、抗日、“围剿”到三年反人民解放的战争,谈到自己的反动行为,深感愧对人民。在这段时间,他读了《联共(布)党史》、《中国共产党三十

年》及大大小小达数十本的革命书籍。他有了唯物论基本知识后,过去忠君爱国的封建思想,亦进一步崩溃,感到新生有了希望。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大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再生感觉。

从1953年至1955年,编纂史料研究组工作了三年,收集素材达千万字以上。集中三四百人提供的亲身见闻资料这一巨大工作,是华东军区布置给解训团全体成员的任务。先成立由团领导直辖的一个历史调查研究组,具体分工是第一队调研组负责国民党党政军的上层政策法规、阴谋决策,第二队调研组负责国民党战役资料,第三队调研组负责国民党政治资料,第四队调研组负责特工及历史事件。王耀武负责政治小组工作,十分繁忙,既要写述,又要编纂,他任劳任怨,努力工作。这时期他所写的死守宜黄的反共战役,围攻方志敏的谭家战役,山东济南战役,均很详细具体,为史家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些自然要归功于人民解放军总部的英明领导,但也与王耀武的努力分不开。

在解训团期间,这些战犯在生活上受到优待,从来没有见过粗暴的打骂,团内领导层及辅导人员十分耐心。全团驻在禹城一个旧天主堂内,除不准外出外,在团内可以自由活动,学习起居有定时。在山东解训团期间,战犯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团内有自建的剧团,有体育活动(如乒乓、排球),有电影等配合教育。这种优待俘虏的政策,使战犯们感激不已,也加速了其自身的改造。王耀武在解训团期间,思想开始发生转变,逐步摒弃了过去的旧思想,接受了新思想,在各方面表现均佳。

◆有人想搞垮王耀武取而代之

1956年,王耀武被从山东挑选到北京战犯管理所“加速改造”,并当了学习委员。由于王耀武表现优秀,得到干部们的信任和许多同学的尊敬,不少人对他这个学习委员眼红而想搞垮他取而代之。但由于他事事谨慎,从不乱反映问题或欺上压下,别人很难抓到把

柄。最后，还是有人不断向领导和管理人员反映，说他白天装得老老实实，夜晚睡着做梦时，经常咬牙切齿地痛骂什么“俺操他……”、“奶奶熊……”等，一定是白天抑在胸间的愤懑，在夜间控制不住而发泄出来，说他是外表老实，内心仇恨共产党，不是表里如一。

尽管多人多次反映王耀武的所谓问题，但领导上还是信任他，没有半点撤换他的意思。有人等不及了，竟当面去质问管理所的领导，得到的答复也很使他们失望，一是从来没有发现王耀武弄虚作假欺骗领导；二是始终如一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没有理由撤换他；三是夜间说梦话，并不能说明他骂人是骂共产党，也可能是种生理上的习惯，加上管理所的干部没有听到他在梦中骂过人，因此一直没有调换他，许多人为此不服气。

3. 被吓死



王耀武与全国政协的同事杨伯韬、溥仪一起工作

1959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精神第一条的规定，对在押的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王耀武进行了审查，认为王耀武关押已满10年，在关押期间，经过改造，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符合特赦条件，予以释放。在颁布特赦名单大会上，当念到王耀武的名字时，他热泪盈眶地接受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书。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文史专员

1959年特赦不久，王耀武就与在香港的女儿王鲁云取得了联系，也很快与6个儿子联系上了。本来他该从此过上幸福的晚年，但是他的妻子的问题使他大受打击。在他被俘后，他的妻子就与他的副官带着他的巨资逃到海外去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全部家当被他们卷走了，出狱后，他一贫如洗。

王耀武1959年12月4日特赦后回到北京。除已安排回原籍者外，留在北京的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周振强、杨伯涛、郑庭笈等6人都归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领导，安置在红星人民公社木队工作，向工人农民学习（每月工资60元）。在这一年中，他学会了培植葡萄、草莓、苹果、梨子的方法。1960年10月19日，受到周恩来接见，并就宴于颐和园。除6位特赦人员外，陪周恩来接见的还有陈赓、邵力子、张治中、李奇中、侯镜如、黄雍、郑洞国等人。

1961年王耀武被安排调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的（每月工资100元），除红星公社的6人外，还有溥仪。王耀武从1960年进入全国政协搞文史工作，迄“文化大革命”开始，六七年来都是在文史军事组，一面写文史资料，一面审核评选各省寄来的政协稿件。他写的史料，计北伐、抗日、“围剿”的战役资料达20万字左右，已出版的亦有好几万字，为史学工作作出了一定贡献。至于审核的稿件，在百万字以上。由一个军事指挥官，一变而为文史资料工作者，王耀武这一转变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改造旧社会旧军官的伟大措施。

1963年10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一、二、三、四批特赦人员，鼓励大家托共产党、毛主席之福，好好欢度晚年。1961年国庆第二天，张治中曾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没有成家的迅速成家，以便有人照料生活；妻子在海外者，争取回国；在国内妻子已离婚尚未改嫁者，争取复婚。不是一、两项者，即重新组织。”基于这个指示与关怀，在政协的文史专员，如溥仪、董益三已结婚，郑庭笈亦复了婚。

◆重组家庭

王耀武在特赦后，渴望过一份温馨的生活，他曾多次去函争取妻子回心转意，却毫无作用。心灰意冷，又因受刺激过深，王耀武患了帕金森氏症，双手不时痉挛，行动也很迟钝。此时幸得后期同学高德昌介绍与吴伯伦相识。吴伯伦系天津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当年任教于北京八十二女中。她不嫌王耀武的多病之身，仰慕他是抗日英雄，两人情投意合，愿结为夫妇，互相照顾，以娱晚年。

1960年冬，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王耀武与吴伯伦结婚了。吴伯伦是个中学教师，贤慧能干，与王耀武生活得很幸福，虽然这种幸福很短暂，对王耀武来说也是一种感情补偿。

王耀武再婚之后不到一年，新婚夫人为了照管家庭、服侍他这个病人，提前退休了。过了几年，厄运同时降临到王耀武和吴伯伦身上。

十年内乱开始了，新生的战犯也在劫难逃。陈长捷自杀了，曾扩情下落不明，遭批斗的就更多了，王耀武是陪康泽挨斗以后被吓死的。

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横扫一切的铁扫帚扫到了康泽的头上。本来年老多病的康泽，很快就头昏脑胀，倒下了。倒下了拉起来，再倒下再拉起来，喊杀声震耳欲聋。那场面是康泽、王耀武从未见到过的，康泽过去罪大恶极，这次必死无疑。康泽这么想，王耀武也这么想。王耀武还想到自己过去的罪恶比康泽还大，方志敏就死在他手上，斗康泽这么厉害，明天斗我还不知要厉害多少倍！

他越想越害怕。本来同前妻的事就得了半身不遂，回家后恶心、高烧，心脏病发作，再也没有醒过来。

可是，他不知道，康泽并没有死。康泽对共产党的了解比王耀武多，所以那时他没有死。这叫做挨斩的幸免，吓死了陪斩的。

吴伯伦作为“反革命”家属也受批斗和管制，加上亲生女的虐待，她死得更惨。

王耀武娶了吴伯伦之后，曾写信嘱咐在香港的女儿王鲁云一定要孝敬后妈，王鲁云遵父命非常尊敬吴伯伦。在王耀武去世以后，女儿按月寄钱给她，而吴伯伦把这些钱积攒起来，给了她的亲生女。

吴伯伦有一个亲生女，王耀武是不知道的。这是吴伯伦的私生女，她在与王耀武结婚时隐瞒了这事。这个私生女寄养在吴伯伦的一个朋友家，私生女视这位朋友为亲妈，而视吴伯伦为姨妈。在吴伯伦因王耀武受牵连之后，精神的压力，生活的清苦，使她患了精神病。

她没有别的亲人。开始住在医院里，无钱付住院费，只好回家。家里独自一人，起初还有好心的邻居照应，后来就没人管了。亲生女不承认她是她的亲妈，那位“亲妈”又要与她划清界限，不给“亲生女”讲真情。这样，她给了亲生女大笔大笔的钱，而到最后也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回报，她竟被活活地饿死了！

一个吓死了，一个饿死了，王耀武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不幸，吴伯伦做梦也没有想到是这个结局！1980年7月29日，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为王耀武、溥仪和廖耀湘三人补开了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七、“黄埔大哥”曾扩情

曾扩情是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绵阳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是作为被俘的国民党官员中党务方面职务最高的官员而被集中到功德林。

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党的方面，凡属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以上；政的方面，省主席以上；军的方面，中将军级以上；特的方面，中统、军统负责一省范围站长以上，均集中北京归中央公安部负责管教。

在战犯中，曾扩情的年龄比较大，许多人都亲切地叫他“况大哥”，从黄埔开始曾扩情的“扩”就念“况”，这是对他的尊称。

1. 总是不得意

曾扩情从黄埔一期毕业后一直搞特务、政治、党务工作。他跟其他的一些人不同,既不是一个职业特务,也不是一个政客,又不是一个职业军人,更不是一个党棍,当了20多年的中将,最后说他是四川人,便派他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 年龄比周恩来大

在周恩来的脑子里,有很多黄埔学生都能记住,最不能忘的有三个人:曾扩情、范汉杰和李仙洲。他几次在接见包括这三人在内的特赦人员时解释道:这三个人都比他年龄大,所以忘不了。

曾扩情和范汉杰都是1895年生人,比1898年生的周恩来大三岁。李仙洲1894年生,更大一岁,他是婚后有了孩子才进黄埔的。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时间正好是1924年9月至1926年底,前四期的学生都听过他的讲课,这种师生情是很难忘记的。

所以当周恩来以总理和老师的双重身份接见他们时,他们在周恩来面前再三地忏悔,说是当学生的有负于老师,而周恩来则风趣地说是当老师的没有教好,也有责任。这是个双关语,当老师的还有蒋介石,他是校长,如果要负责任的话,他负的责任应该最大,这一点被接见者都能听得出来。

曾扩情在国民党官员中是老资格了。早在1928年,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10月,蒋派曾扩情为特派员去四川,与四川军阀进行联系。曾扩情除带去蒋介石给四川军阀的亲笔信外,还带有孙中山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印成的小册子,分赠给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人。其用意十分明显,蒋表示自己是孙中山的信徒,我给你们写信犹如孙中山给我写信。在四川,他受到了盛情款

待，刘湘等不但把他看成贵宾，而且所到之处，还发动当地军民郊迎十里，天天都是莺歌燕舞。

不但有人送钱送东西，连当时逃到四川的吴佩孚，也亲写一副对联送他。吴佩孚用了杜甫送给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严武的七律中一联：“川合东西瞻使节，地分南北任流萍。”因曾扩情一直钦佩这位北洋军阀，今天得到墨宝，曾扩情认为这比当年保皇派头子康有为送吴佩孚五十大寿的对联显得更加尊敬自己。

曾扩情第一次去四川，收获之大，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除了几万元白花花的银元外，四川特产更是不计其数，仅川绣被面就是100多条，有一小报戏称他为“绣花被面特派员”，他还感到很得意，真是没有廉耻。

◆十三太保之首

曾扩情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但他的官运却没有同期毕业的杜聿明等亨通，这其中的原委主要是曾多次惹怒蒋介石，这位太岁爷对他很不满意。

曾扩情在北伐前当过连长，后来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多次被派往四川。1933年8月，他又一次去四川，受命加委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特派他的师长范绍增负责接待他们。范是有名的吃喝玩乐的能手，特叫四川名妓陈八、马九来陪伴曾扩情，使他饱尝四川美味。曾扩情便产生了与当年“乐不思蜀”的刘阿斗相反的思想：“乐不思宁(南京)。”

刘湘看出此意，想利用曾扩情向蒋介石要些武器装备，便电呈蒋介石，保荐他为川军教导师师长，蒋介石一看来电，大为震怒，认为自己的学生要别人向他保荐，不仅仅是给蒋某人丢脸，也是学生背叛自己的行为，立即电召曾扩情回南京，大骂一通之后，曾扩情的官运便每况愈下，等到西安事变之后，就更加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了。

西安事变后，曾扩情更受蒋介石的压制。原因是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后，曾希望派重兵包围西安救他出去，南京的何应钦积极准备。张学良怕把事情扩大，也为了蒋介石的安全，就请曾扩情出面向南京广播，做南京方面的工作，曾扩情同意张学良的看法，就照张学良的意思办了。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认为他是站在张学良一边，下令扣押了他，并撤职查办，投入军统监狱。

虽然得不到蒋介石的器重，但他在国民党里相当有地位，跟上层、同僚和下级的关系都不错，受人尊敬。他与他的同僚有着广泛的联系和较好的关系，尤其是与同期的胡宗南关系格外密切，用他的话说是有着兄弟般的情谊。

患难见真情。曾扩情被扣以后，胡宗南凭着与蒋介石的关系，大胆地照顾他，并多次为他说情，后来蒋介石释放了他。在他被蒋介石扣押期间，还有一个人给了他极大的关怀，令他刻骨铭心，那人就是戴笠。他当时被关押在军统的监狱里，戴笠对他也很照顾，很尊敬他这位前辈。

还值得一提的是，曾扩情是“复兴社”的创始人之一，他与鄧悌、邓文仪、贺衷寒等被称为十三太保。但对此，他却一直否认，说自己还不够当太保的资格，因为别人排挤他。

◆ 为人十分天真

曾扩情这个人给人的印象还有些“天真”，许多事情他想得十分简单，也十分可笑，就拿他被捕这件事来说吧。解放军进入成都后派人去逮捕他时，他既没有躲，也没有逃，而是坐等解放军的到来，还满不在乎地对去的人说，我已拜某大和尚作了皈依弟子，早遁入空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你们还抓我作甚？

这几句话引得抓他去的人都大笑，并告诉他，不用说像他这样反共反了二三十年的十三太保，自称皈依佛门的人要抓，就是削发多年，正在庙里闭关面壁的“军统”分子宋灰鹤（曾任军统局行动科

长和特训班教官,抗战胜利后,便拜广东南华寺虚云大和尚为师,是真心诚意去出家为僧的)一样要清查出来。

到这时,曾扩情才如梦方醒,悔恨没有早点逃走。这件事,当时被人们引为笑谈。这么重大的生命攸关的事,他用这种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的简单办法去处理,来对付共产党,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见其人想法之幼稚。

还有一件事也十分可笑,在重庆白公馆监狱时,他不愿在楼上与高级犯人一起住,而非要住到楼下,与一些小特务混在一起。因为以前一些低级犯人曾发过牢骚,说“官越大罪越大待遇越好”,很不服气。后来管理人员解释:那些战犯年龄都较大,而且囚禁的时间肯定比下面一般犯人要长。所以曾扩情以为住在楼下,就可以早一点释放,便坚决不肯到楼上享受较好的待遇。直到西南公安部撤销,一般犯人去农场改造,他才与高级犯人合并到一起。当时,他十分气愤,白白在下面受了那么长时间的苦,到头来还不是一样。

2. 在狱中有点温情主义

曾扩情这个人是属于那种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人,而且从不与人为难,有点温情主义,在改造所里,与大家的关系都比较融洽,被选为负责清洁的委员。

◆ 以为死期将至裤裆全湿

曾扩情这人不但天真得像个小孩,而且胆子特别小。有一天,几个人正在牢房内闲聊,一会儿管理员匆匆跑进来,一个劲地喊:“恭喜各位!恭喜各位!明天或后天,就要送各位回去了!”一听这话,大家都不禁惊叫一声,脸色顿变。曾扩情一屁股坐在大通铺上,两眼发直口中喃喃。不用说,过去在国民党的监狱,向犯人道喜,就是报道处死的一种说法,何况还加上送他们回去这句话。回什么地方?大家心知肚明,是回到阴间去。

当时,牢房内一片寂静,待冷静下来时,都特别恨那位管理员,明知对犯人是致命打击,死前还让他们难过一两天。突然,屋内一名小特务问:“我的罪比他们小得不知多少,总该没有我吧!?”管理员忙说:“没有你!没有你!”这时他便斜着眼看那些将军们,嘴里还得意地吹起口哨。沈醉忍不住冲着那位管理员大嚷:“你也太缺德了!你既然知道要明天或后天才处决我们,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好这两天,一定要我们难受你就舒服吗?”

谁知管理员听了竟哈哈大笑道:“谁说要处决你们啦!我向你们道喜是你们马上要大大改变待遇,集中学习。你们原来住过的地方已经粉刷一新,每人有一张小床,还有蚊帐、凉席等,伙食也提高多了,我刚才去看过,才来向你们道喜的。”他的话音刚落,所长也走进了房间,一面与大家打招呼,一面问管理员:“你已告诉他们了吗?”

“告诉过了！”所长便补充一句：“明天我送各位去，希望各位好好去学习，将来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小特务急了：“请所长也让我一同去吧！”所长答道：“你差得太远了！这次是集中武官少将以上、文官厅长以上，你不够这个条件。”这时，大家脸上才露出笑容，大有重生之感，只有那个小特务一个人把脑袋耷拉了下来。在这一瞬间里，人生的喜怒哀乐都一齐出现了。

所长等人走后，曾扩情才慢慢地从床铺上坐起来。铺上湿漉漉的，他的裤裆全湿了，原来把他的尿都吓了出来。

◆粗中有细带点温情主义

曾扩情是个典型的温情主义者，他做事经常粗心大意，拣芝麻，丢西瓜的事时有发生。解放前，他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省党部的职工连薪饷都发不出，他去向省主席王陵基借钱，王不借，说党部开支有党费收入，不能拨行政经费。他再三解释，法币贬值，物价涨了不知多少倍，党费却没有增收，全川党员的党费集中起来，还买不到一担米。

王陵基仍旧不给，他只好把省党部一辆旧汽车卖掉，才维持了一两个月。党部开不出伙食，他就东吃一顿，西就一餐，没有定所。当时，有人介绍他认识了成都某照相馆的女老板，她答应供给他食宿，曾扩情喜出望外，马上就搬到照相馆楼上，和她同居起来，才食宿有着。

其实那位女老板是不甘寂寞的女人，在成都开的照相馆生意相当不错，加上她虽是半老徐娘，风骚依旧，因此，一些不肖之徒都对她颇感兴趣，时常骚扰她，也给她招来了不少麻烦。她决定把曾扩情接到自己家中，愿供食宿，并不是“浪女”回头，而是借钟馗打鬼，她公开向曾扩情表示，如他什么时候需要她，她一定奉陪，其余时间，则由她自由支配，两不干涉。

如果说曾扩情什么事、什么时候都是粗心大意，那未免有点冤

在了他，他毕竟是几十年的军统特务，从他和沈醉之间的这两件事就是可以看出曾扩情的细心。

那是在磁器口重庆战犯管理所，他们住的地方是原来军统局的缫丝厂办事处和军统重庆训练班本部，往西不远，就是当年戴笠住过的杨家山公馆，下面有一个用双喜和寿字组成的花园。沈醉当年经手修建这花园，它是专供戴笠和他的情妇散步时用的，花了上万银元到处去收罗奇花异草，搞得十分漂亮。所以沈醉一有空就到那个小花园去走走。有一次，他邀曾扩情跟他一起去，曾扩情一脸紧张，奉劝说：这个地方你少去吧！别人看见会说你还在留恋过去的。这当然比沈醉心细多了。

还有一次，在离他们住处不远的一片菜地里，有个女人在网蝴蝶，边网边唱边跳，沈醉上前与她攀谈起来，曾扩情也缓缓走过来，那个女的迎上去，很客气地叫了一声：“首长，您好！”曾扩情一时莫名其妙，她又补上一句：“这位首长有点眼熟，记不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曾扩情定睛一看，并拍了一下沈醉道：“等你开会，还不快回去！”拉着沈醉就走了。

离开了菜地后，沈醉忙问：“开什么会？”他又用一贯的口吻说：“开批评会！”接着又小声说：你知道她是谁？她就是当年国大代表中最年轻漂亮的“国大之花”！我吃过她的“豆腐”，因此她对我有点印象，你和这样的人聊天，不是要受批评吗？

曾扩情接着说：在改造过程中，做了一百件好事是应该的，做了一件错事就成了错上加错。你可得当心！可能正是由于他这种粗中有细的性格，处处做得得体，所以能争取第一批特赦。

◆坐定又还起，无风门自开

曾扩情喜欢写写诗，遇事爱搞个“有诗为证”。他与原配结婚那天，男女双方特选八月十五月圆之日作为佳期，希望永远团圆而不分离。但婚后曾扩情投考黄埔军校，并当了官，对家乡的“黄脸婆”

虽未忘记，但家花总不及野花儿香，所以他并不接发妻出来共享幸福，而让她去“苦守寒窗空寂寞”。但他还是为了怀念她而写过这样一首诗：“当年此日是佳期，每到佳期怨别离。两地相思同见月，但凭明月寄相思。”

曾扩情爱写一些诗，这本不是什么坏事，可是在监狱写诗填词，就有点麻烦了。1959年10月1日，国庆十周年，战犯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临时看台上，观看国庆大游行后，纷纷写出五言和七言诗贴在墙报《新生园地》上。

曾扩情也写了一首贴上，不料其中一句：“喜得今朝大礼巡”，给他惹出了麻烦来。诗刚一贴上去，几位专门爱从鸡蛋里挑骨头、以表示自己改造得好的同学，马上贴出质问他的墙报，指责他：忘记了战犯身份，居然敢大言不惭去“巡阅”或“巡视”国庆工农兵的大游行。

曾扩情一看就慌了，连忙解释：这个“巡”，是和“巡逻”、“巡更”一样，不是“巡阅”、“巡礼”。这一解释，那些人更抓住了他的小辫子，指出他在强辩，诗中明明写着“大礼巡”，怎么不是在“巡礼”？一时他那小组几个“同学”对他一阵猛轰，墙报上也是一片杀声，他急得满头大汗。

正在无可奈何之时，幸好庞镜塘出来给他解围，庞镜塘贴出一张墙报：根据《辞源》、《辞海》对“巡礼”的解释，一是指朝拜圣地；二是指朝拜或礼拜。并举出唐诗人张籍《送令狐尚书赴东都留守》诗：“行香暂出天桥上，巡礼常过禁殿中。”亦可引申为“巡游”、“观光”。结论是“大礼巡”或“巡礼”，都不不尊敬工农兵游行群众之处，相反还可当作朝拜工农兵群众。庞镜塘的墙报一出，几个好战分子，只好偃旗息鼓，鸣金收兵。

曾扩情生性爽直，没几天就忘了此事，又唱起《活捉王魁》中的戏文：“你看他，绿穿灯火映楼台，那还记，当年饿倒在长街。”他正唱得起劲，同组的一位四川同学便走过来质问他：你又在唱什么鬼戏来宣传迷信？他马上答道，你没有听到我是唱“向前走、要过关……”吗？

对方批评他：这曲戏也不健康，是黄色的。曾扩情知道他没有听清自己唱的什么，便说道：如果连“抢伞”都是黄色戏，那广播电台放送的《秋江》，唱的是小尼姑私奔，又怎么解释？对方一时无法应对，便说了一句：群众可以听可以唱的东西，战犯就不能唱！曾扩情只好答应：“下回不唱就是了！”等那人一走开，曾扩情又唱了起来：“坐定又还起，无风门自开……”。

◆特赦后定居沈阳

经过十年的改造，曾扩情也有点肯动脑筋了，不过那种拣芝麻丢西瓜的性格并没有怎么改变。1959年他得到第一批特赦后，本来按规定是可以留在北京的，但他在沈阳的儿子来信欢迎他去沈阳，说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留在北京则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他便决定要去儿子那里。

曾扩情没有想到，留在北京的人，在政治待遇上比到地方的好多了。等到他看到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等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又一次傻眼了，后悔莫及。不过他和李仙洲后来也都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据说后来他回四川荣县去看过结发妻子。曾扩情于1988年去世，终年93岁。

八、陈赓常去探望的宋希濂



宋希濂

宋希濂是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黄埔一期毕业生，且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是国民党高级指挥官中最后一个被俘的。

早期加入共产党，后来误入国民党，是少有的一个与国共两党都交好的人。被俘之后，前后态度差别明显，先是抵触情绪极强，坚决不与共产党合作，后来，态度逐渐转变，在狱中表现积极，获得第一批特赦，特赦后，定居美国。晚年安详。

1. 国共两党都有好朋友



国民党第七十一军中将军长宋希濂

宋希濂与国民党的顾祝同、张治中、卫立煌等都有着良好的关系，与同学辈的胡宗南、贺衷寒、黄杰、胡璉、肖赞育、袁守谦等关系也不错，与共产党的同期同学蒋先云、陈赓等关系也很深，他是一位少有的与国共两党都交好的人。

◆黄埔高材生

宋希濂是国民党的名将，是黄埔一期生，也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当年黄埔一期的同学中流传这样的说法：第一名胡宗南，第二名李默庵，第三名宋希濂。这一排名主要是根据学习成绩来排的，可见宋希濂乃黄埔的高材生。黄埔毕业后，宋希濂去日本留过学，当时留日的还有一期的潘佑强、贺衷寒、杜心如、肖赞育，二期的李士珍，三期的周复，四期的任觉五等。留德的有一期的桂永清，二期的邱清泉等。留俄的有三期的康泽，二期的郑介民等，他们的成绩都很优秀。

宋希濂为人处事遇事不惊，左右逢源，人缘非常好。其实，国民党内部是派系林立，矛盾重重，例如，杜聿明属于何应钦系，黄维属于陈诚系，这两系之间矛盾就很深，而宋希濂跟哪个派系的首脑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所以他总是说自己是蒋介石的嫡系，是黄埔系。当然，在他官运的行程中，直接提携他的还是张治中、程潜。

宋希濂是黄埔一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进校17岁，毕业18岁。进校半年就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年轻党员。后经陈赓介绍又加入共产党，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又脱离共产党，这时他是国民党第二十师的一个中校营长。1926年底，参加北伐，1928年四一二政变后，便跟随蒋介石。

宋希濂的升迁是很快的。在去日本留学之前，军校毕业后从副排长升到上尉连长只用了半年时间，1935年从日本学成回国后没有马上升迁，这是蒋介石用人的原则，把他放到“第一线”锻炼，让他参加蒋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当时他还只是中校营长。由于表现不凡，立即升任上校团长，一年后即为少将旅长，时年才24岁！后来他参加淞沪抗战。

1933年9月任中将师长时26岁，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35年6月奉蒋介石之命杀害了瞿秋白，这是他作为战犯关押

的一条主要罪行，他沉痛地说：“将我碎尸万段，也不足以蔽其辜。”1937年后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配合中国远征军对日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累建功勋。他是在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时，于1949年12月19日在四川峨边县沙坪镇被俘的。

◆有共产党朋友

宋希濂是少有的几位与共产党员保持真挚友谊的国民党员，陈赓是他在共产党里最有地位最好的朋友。陈赓比他大4岁，同去报考黄埔军校的时候，是陈赓这位老大哥一路照顾他，后来各奔东西，抗战时又两次相逢，他被俘后又是陈赓去看望他开导他，他特赦释放后陈赓又两次宴请他，两人的友谊从未断绝过。

他们都是湖南湘乡人，宋希濂是溪口人，陈赓是柳树铺人。1923年底，任孙中山元帅府军政部长的程潜派人到长沙招收湘籍青年到他在广州办的讲武堂学习，陈赓和宋希濂都报名赴考，结果双双被录取。当时录取的人数有一百多名，由于交通不便，需绕道武汉、上海、香港去广州，这样就分成一批一批的去，每批二十、三十人不等，宋和陈又分在了同一批。

宋希濂个子比陈赓矮小，年龄也比他小，性格内向，矜持腼腆，带几分稚气。而陈赓性格外向，活跃大方，具有组织能力，被选为领队，一路上像照顾小弟弟一样照顾宋希濂，几经辗转，到第二年的2月才到了广州。4月，他们参加了黄埔军校考试，又被录取，成为黄埔一期620余名学员的一员，从此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由国共两党合办的黄埔军校，从招生开始就带有不同的政治色彩。招生本身是秘密的，两党选送学生一般是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像一期的徐向前（徐象谦）、杜聿明、黄维等人进校前都是小学教师，有一定的革命思想，都需经人介绍或具保。共产党方面的一般都是经过组织派送，当然都要经过考试，考试很严格，黄埔一期2000多人报考只录取了620余名。

由于政治色彩很浓，学生中自然就分成了阵线分明的两派，一派是“青年军人联合会”，主要以共产党员为主的左派学生，包括校外军队中的一些青年军人组成。一派是“孙文主义学会”，以国民党党员为主的右派学生组成。陈赓在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学生三队的党支部书记。宋希濂进校半年就加入了国民党，但他倾向于共产党，后来在陈赓的影响下，由陈赓介绍加入了共产党，成了双籍党员。

在两次东征、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和北伐中，他们曾共同战斗过，自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就各奔东西，没有见过面，在内战战场上也没有直接对峙过。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宋希濂率三十六师进驻西安并任西安警备司令，第二年春陈赓也由延安到西安时，两人才重逢，由宋作东，设宴款待陈赓。

这是他们别后的第一次重逢。这次重逢，应宋希濂的要求，陈赓讲述了在第二次东征中蒋介石遇险，他背着蒋过河，救了蒋的性命的经过。陈赓还讲了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被捕后押往南京，蒋介石要他脱离共产党并以高官相许而被拒绝的实情。宋希濂也讲述了他受伤、向蒋介石写信、留日回国后的一些情况，两人都试图以自己的政治信仰和观点说服对方，但都是“各抒己见”，没有交锋。虽说两人之间是有点阴影，但谈到个人感情时还是依然如故。

宋希濂在黄埔结识的共产党朋友还有一个人也必须提及，那就是蒋先云。他与宋希濂、陈赓是同期同学。蒋先云和陈赓一样，也是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黄埔也很活跃，他是第一个公开反对蒋介石的黄埔学生。

中山舰事件以后，蒋介石又抛出了打击共产党、篡夺国民党领导权的整理党务案，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被迫全部离职，蒋介石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紧接着在黄埔军校给共产党员发“党籍声明表”，要他们退出共产党。

蒋介石对“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起人蒋先云百般拉拢，以高官许愿，可是蒋先云第一个把“党籍声明表”撕得粉碎，并声明“永

做共产党员”。宋希濂与他的私交也是非常好的,从宋希濂对陈赓和蒋光云的尊敬来看,宋希濂是很重情义的,蒋先云后来在北伐中牺牲,年仅25岁。顺便说一下,当时第一个站出来声明退出共产党的是李默庵,也是宋希濂的好朋友,而且都是成绩优秀“集团”的成员。

2. 送终将军



1984年1月,李先念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宋希濂

宋希濂是1949年底被俘的,他率领的两个兵团共六个军、四个师14余万人被消灭,宋希濂本人是国民党军队高级指挥官中最后一个被俘的。

◆谁是国民党的“送终”将军

在宋希濂之前关押在重庆的有军统西南区少将区长徐远举、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军统川康区少将区长廖宗泽、云南绥靖公署中将副长官孙渡、西康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王靖宇、军统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等，这些人后来都集中到北京关押。正是由于宋希濂最后被俘，与他有矛盾的徐远举经常讽刺他是国民党政权的送终人，且一有机会就用这句话刺激他。

宋希濂爱下象棋，而且总爱跟他原来的部下十四兵团中将司令钟彬下。钟彬也是黄埔一期的，他的兵团司令是由宋希濂保举的。宋希濂下棋的水平在战犯中数得着，而且下棋时非常认真，一是一，二是二。有一次为了一个棋子钟彬要悔，宋希濂就是不让，并说下棋哪有悔棋的，要是打仗打错了能悔回去吗？两人一个要悔，一个不让悔，争得面红耳赤。眼看下不下去了，蹲在一边观战的王陵基开口了，他对宋希濂说，算了算了，让他一次吧，你连十四兵团司令都让给他了，一颗棋子就不能让！宋希濂说这是两码子事。

听到争论的徐远举大步流星地走过来说：什么两码子事，一码事，都是你们“宋钟”的事！“宋钟”与“送终”谐音！宋希濂听后，火不打一处来，他把棋盘掀了，怒斥徐远举：“你这是什么意思？说清楚！”“开个玩笑嘛！”“你不是开玩笑，别来这一套！”

宋希濂硬要徐远举说清楚，徐远举就是笑嘻嘻地看着他，重复着那句答话。眼看一场“战斗”即将爆发，王陵基连忙打圆场，把两个扯开，钟彬不吭声，徐远举哼着京腔“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走开了。宋希濂也收起棋盘了事，一盘好棋被搅黄了。

要说宋希濂是国民党的送终将军，是很冤枉的。事情还是他自己在一次生活会上澄清的。他说：

我是1948年8月在湖北沙市组成十四兵团的。归我统率

的有六个军和一些地方部队，总数是14万多人。我原来是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蒋介石知道我和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闹矛盾，并希望我能利用川湘鄂边区有利地形，保住西南四省，所以成立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调任我当主任，我也希望能“得地利，挽天时，讲人和”以挽救失败残局。

我担任绥靖主任后，又把两个军组成一个第二十兵团，由第二军军长承克非为兵团司令，同时保举曾任二十六军军长及广州第四编练司令的钟彬为十四兵团司令，实际上我是指挥两个兵团。说这两个兵团是给国民党在大陆的送终兵团，真有点冤枉！

到现在我还记得，1949年11月间，蒋老先生派蒋经国拿着他的亲笔信，到川湘边境的彭水西边武隆县江口镇和我会晤时，我向他分析了在川东战场上失败的四个重要原因，主要是共军实力雄厚，斗志旺盛；我指挥的六个军，大多残破或新编，战力脆弱，指挥官缺乏信心；鄂西山地粮食少，官兵常吃不上饱；加上天气寒冷，大多数士兵无棉衣，吃不饱再加穿不暖，又遇到这种地形，怎么打仗？

当时蒋经国先生除同意我的意见外，还说这次与共军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是20年来国民党没有搞好政治，也没有领导好军队，只有彻底改造，才能产生伟大的新生力量。当然，这不是短时期能办得到的，我是希望知道当前打算怎么办？他说：“正在把胡宗南的第一军调来，希望撑持一个时期。”

我表示：“我只有一句话，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那次，他自己来和带老先生的亲笔信来，不但没有使我们产生新的希望，是使我们感到失望。但最后我们还是拼死抵抗，正如钟彬所说：“现在还有什么办法？我们决不会投降，只有打光算了！”就是这样，我们边打边逃，明知是死路一

条,也还是朝死路走去。

公平地说,真正给国民党送终的应该是胡宗南。蒋介石在1949年12月29日给28日到西昌的胡宗南发了一个急电,下了一道死命令:令他固守西昌三个月,以等待国际形势变化。狡猾的胡宗南把收到的电令的前一天和月份大多出的两天都算上,在1950年3月26日晚乘飞机逃往海南岛以转道去台湾,潜逃前耍了很多花样,还要部属把回电蒋介石的时间写成3月27日,正好三个月,完成了蒋介石交给他的任务。当时情况非常紧急,胡宗南如果在第二天早晨走就走不了,也就会成为俘虏,因为解放军是27日早晨5时解放西昌的!

所以说,宋希濂给国民党送终是很冤枉,他只是对蒋介石忠一不二,明知是死路一条,还往死路上走,结果钟彬和他先后被俘。他的这些作为完全可以证明他确实没有给国民党送终的思想,相反,想为国民党蒋介石挽回败局,起死回生。

◆兵败川西

宋希濂前半生,追随着蒋介石南征北战,曾屡建功勋,被人称为青年得志的将军。他认为君子不事二主,直到被俘的最后一刻,他对蒋介石都是忠心耿耿的。但是,每当回想起那一段历史,他都感慨万千。他说:

1949年这一年,是我最不幸的一年,也是国民党对大陆统治完蛋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父亲死了,妻子也死了。自己屡屡打败仗,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虽然,我那年才42岁,不但两鬓开始花白,头发也脱掉不少,几乎一切事皆不如意,弄得心力交瘁,意趣索然,所以我在当年石达开被活捉的大渡河边被活捉时,是决心一死的。感到将来当俘虏,是多么可耻!

当解放军正四面把我包围着、自知已走投无路时，便抽出手枪，朝着脑袋，正要开枪时，我的警卫团一个亲信排长袁定侯，一下把我的枪支夺去，抱着我哭了起来。一会功夫，解放军就过来了。开始，他们在清查谁是宋希濂的时候，我的部下没有一个人做声，最后是一个叫王尚述的苏北人，他是在1948年9月间受解放军派遣打入我在衡阳办的军政干部学校的，后被人发觉，许多人都主张枪毙他，我看他很年轻有为，认为只要肯认错悔改就行了，并把他留在干校工作。正当解放军认不出我的时候，他忽然走过来向我敬礼，并说解放军优待俘虏，对高级将领会更加优待，要我不用耽心，我当然只好承认我是宋希濂了。

1949年，对宋希濂来说是痛苦的一年，真是屋漏更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苦心经营的军队被彻底消灭，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作为家庭中六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的他没能给父亲送终。爱妻冷兰琴也去世，同样不能告别。人说忠孝不能两全，他一头也没有顾上，恩爱夫妻应相伴终生，他没做到。正是：国事家事事不顺心，今天明天天天有坎坷。

3. 狱里狱外



1989年8月,宋希濂与夫人易吟先在尼加那大瀑布合影

与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一样,在被俘之初,宋希濂抵触情绪相当强,抱着君子不事二主的思想,坚决不服从共产党的安排。被集中到战犯管理所后,态度逐渐转变,由一个顽固分子变为先进分子,终获第一批特赦,出狱后赴美定居。

◆湖南骡子脾气

宋希濂于1907年出生在湖南省湘乡一个书香之家，也是一个地主家庭。他是典型的湖南人，身上的湖南骡子脾气十足。宋希濂和王陵基两人，是当时被俘的西南战场上高级军官中最重要的两个。所以被俘后，解放军报和四川地方报纸都大肆宣传，不少摄影记者去找他拍照片，他当时很抵触，火气大极了，对拍照经常采取拒绝的态度。

他开始总认为作为一个统率十几万大军的高级将领，竟成了战场的俘虏，实在不是味儿，所以许多新闻记者找他谈话和拍照他都不愿意。有一次，一个电影摄影师想给他拍几个镜头去放映，他一直不把面部对准镜头，一连拍了好几次都没有拍成，那个摄影师生气了，说了他几句，他更是火冒三丈，叫那个摄影师马上拿枪把他干掉，他决不愿听从安排，坚持的结果，还是他胜利了。

所以他在重庆的几年中，谁都不敢惹他。后来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时，他完全改变了，脾气柔顺多了，各方面表现都很积极。所以，他能争取到在第一批特赦战犯中得到特赦。可是在下棋方面，他还是斤斤计较，不肯让人。当时在北京战犯管理所中，谁也下不过他，公认他是“下棋能手”。

宋希濂是蒋介石的高材生，陈赓被蒋介石称为“奇才”，但两人走的路截然不同。宋希濂是国民党的主力干将，陈赓是共产党内赫赫有名的大将。二人虽然立场不同，但私人的友谊是颇深的，但是当他们在1950年春再次重逢时，双方的境遇完全不同。宋希濂作为俘虏被关押到西南军区管辖的重庆“白公馆”，而陈赓则是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

当陈赓知道宋希濂在“白公馆”时，他约当时任西南公安部部长的周兴一起去探视宋，陈、宋两人几乎谈了一整天！谈什么？谈他们1926年分手以后20多年的风风雨雨，人生历程。两人的谈话完全是

平等的,用宋希濂的话说,陈赓丝毫没有以胜利者自居的口气跟他谈话,他感到亲切。而宋希濂,在这位老大哥面前,显得拘束,不只一次地感到愧疚。

这种愧疚还不能说他是为蒋介石打内战而自责,这时的宋希濂还没有那么高的境界,他是在为打了败仗而惭愧,也是在为第一次重逢时完全拒绝陈赓的劝告而自责,这种自责是出自他和陈赓的私交情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位曾经是矜持腼腆的宋希濂又还了他的本来面目,他毕竟对面前的这位兄长是尊敬的。

这一次陈赓请宋希濂吃饭,虽是粗茶淡饭,但充满了一个胸襟开阔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成为国民党败将老朋友的深切情谊。陈赓语重心长地告诉宋希濂:你不要有任何思想包袱,不要有精神负担,多看点书,多思考一些问题。

言下之意,作为老友宋希濂是会听出弦外之音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中央还没有做出对国民党战犯如何处理的方针政策,了解和掌握中国共产党一贯政策的陈赓不可能直接告诉宋希濂:共产党不会杀你。但话也够明白了:不要背思想包袱,不要有精神负担,说白了就是不会杀。宋希濂心领神会,所以他自此后至少不是整天想到死,而是感到有希望。原来不愿照被关押的案犯登记相,后来也对工作人员说你们尽管照,想照多少照多少。

十年以后,宋希濂被特赦,同时特赦的杜聿明、王耀武、郑庭笈、杨伯涛、周振强等6人留在北京,曾扩情、邱行湘、卢浚泉分别回辽宁、江苏、云南省政协安排。留北京的6人在红星公社劳动的时候,又是陈赓去看望他们,并请他们吃饭。

只要有会,或宋希濂处于思想苦闷,彷徨无主的时候,陈赓总是很关怀他的。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以张治中的名义在颐和园宴请黄埔出身的宋希濂、杜聿明、周振强、王耀武、郑庭笈等人,陈赓及夫人傅涯,邵力子、郑洞国、侯镜如、唐生明、覃异之等黄埔同学作陪,畅谈黄埔师生之情,周恩来和大家合影后,陈赓又单独和宋希濂合影,并沿昆明湖散步。像陈赓这样关怀宋希濂,在黄埔同学中,或

由于历史的渊源而结下的各种关系中,是极为罕见的。

1961年陈赓去世,宋希濂极为悲恸,满含热泪参加了吊唁。他说:陈赓的逝世,对我个人来说丧失了我一生中难得的良友,他的伟大,他的忠诚,他的无私无畏,令我折服,使我永远不能忘怀!1985年,陈赓夫人傅涯赴美探亲时,在美定居的宋希濂和李默庵等黄埔同学盛情款待,对陈赓高风亮节赞叹不已,可见陈赓在宋希濂等人的心中树起的这座丰碑永世留存!

◆出狱之后

1980年宋希濂定居美国,与二女儿宋苏元、小儿子宋锦蓉等子女团聚。宋希濂共有六个子女,三男三女,长子平其,于1949年9月随弟妹去香港。次子抚元、三子锦蓉、长女晋元、次女苏元、三女宛蓉,均为前妻冷兰琴所生。子女均于1949年去香港,有的后去美国。冷氏在1949年6月因患脑溢血在香港去世。1961年,宋与友易吟先结婚,后一起去美国。

特赦后的宋希濂,一直忙于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宋希濂在去美之前就出版了《宋希濂自述》一书。1981年,他与黄埔同期同学潘佑强取得联系后,第二年在纽约发起成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任该会总顾问。1984年初,在美国的黄埔同学蔡文、李默庵一起提出组织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得到宋希濂和当时在美探亲的黄埔同学侯镜如的大力支持,他们共同签字、起草发表了一个《宣言》。

《宣言》说:“国家第一、民族第一、统一至上、建设至上,切盼我全体军校同学及其家属奋发参加促进中国统一运动。”在这两个组织中,宋希濂都是主要的倡导者。中间台湾当局也组织了相应的团体与“促进会”和“联谊会”抗衡,把矛头集中对准宋希濂。台湾《中央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文章指责宋希濂等“甘为中共鹰犬”,对此,宋希濂表示蔑视,并把原书名《宋希濂自述》改名为《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这就是“鹰犬将军”的来历。

1984年6月16日,正值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之际,在北京成立了黄埔同学会。其后,台湾的黄埔同学年年不断地有人参加该会,有人资助该会,海内外黄埔同学广泛联络,都在为统一中国奔走。宋希濂虽离开了人世,但新黄埔同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李默庵(几届连任会长)等也都甘为“鹰犬”。台湾的《中央日报》不吭声了。

1959年宋希濂第一批特赦后在北京郊区红星公社劳动一年,1961年安排在全国政协当文史专员。1964年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后任第五届、第六届政协常委。1980年赴美定居,与子女团聚。1993年2月13日因患肾衰竭在纽约逝世,终年86岁。逝世前任全国政协常委、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总顾问。2月21日,宋希濂的追悼会在纽约举行。

当时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张伟超,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陈健,侨界知名人士、宋希濂的亲属和生前好友等约200人参加了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

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黄埔军校同学会等部门发了唁电。全国政协、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和当地侨团等送了花圈。

全国政协的唁电说,宋先生早年参加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为解放中华民族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后来,宋先生广泛联系海内外各界人士,为促进祖国统一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宋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赤子之心,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宋希濂的一生是坎坷曲折、丰富多彩的一生,青年风华正茂,中年有荣有损,晚年还算幸福。



九、不原谅傅作义的陈长捷



陈长捷

陈长捷是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的高材生。一听他的名字,给人感觉就是战场上的一员武将。

其实陈长捷这个人文质彬彬,温文而雅,瘦弱得像个书生,别看外表文弱,打起仗来,却敢拼敢杀,而且在紧急关头,也真能身先士卒,这或许是他的兵团战斗力强的一个主要原因。

被俘后,他思想转变较快,能接受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是一位文武双全的真儒将。

1. 成为阶下囚

陈长捷一生中的最后一仗——在防守天津市的时候，却未能“长捷”。当他在地堡指挥所中，指挥部下作垂死挣扎时，解放军的指战员用手枪和冲锋枪对准了他的背部。结果连自杀的时间都没有。

◆“他成了起义将领，我成了战犯”

陈长捷是天津的防守司令，这个职位是傅作义在蒋介石面前保荐而得到批准的。按说，陈长捷应该感谢傅作义，但恰恰相反，他对傅作义耿耿于怀，甚至达到了仇恨的程度。因为在平津战役中，傅作义出卖了他。在战斗最关键的时刻，傅作义仍命令他“坚守就有办法”，陈长捷一贯“以服从为天职”，死守天津，从未考虑过投降的问题，结果，陈长捷大败，并成了俘虏，而傅作义却在北平搞和平谈判，大有成也肖何败也肖何之喻。

傅作义在蒋介石面前保荐陈长捷，是诚心诚意的，但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两人原来都是晋军将领，在一起共过事。傅作义深知陈长捷为人耿直忠厚，又是一名骁将，让他守天津完全可以放心，也有把握。

当时陈长捷任国民党联勤部第八补给区中将司令，这是个肥职，不打仗，没有生命危险，又可发财，谁都有求于他。况且该区又在甘肃，离“前线”还有一段距离，可以安稳地过几天好日子。但是，陈长捷有些“血性”，又被人们称为“常胜将军”，更碍于老同事的保荐，蒋介石的器重，他只好临危受命，走马上任。

“坚守就有办法”，这是在天津防御中，傅作义给陈长捷的惟一指示。正是这句话，使陈长捷当了俘虏，也正是这句话，使陈长捷对傅作义恨之入骨。天津形势每况愈下，几次情况异常危急，陈长捷几次请

示傅作义应如何应对时,得到的总是那句“坚守就有办法”的话。

在解放军对天津发动总攻的前三天,1949年1月11日拂晓,天津警备司令部接到林彪签名的信件(实际是最后通牒)。信是写给天津市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副司令兼六十二军中将军长林伟涛和八十六军中将军长刘云瀚的。信的内容大致是:辽沈战役胜利后,百万大军已进关,劝你们放下武器,不得破坏工商企业。

看罢信后,陈长捷、林伟涛、刘云瀚、杜建时、秋宗鼎五人开会,都沉默不语,谁也不敢讲真心话。因为有特务监视,五人也情况不同,互不信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在等待北平傅作义对整个华北问题的解决办法,顾虑如果先放下武器,怕影响傅作义对华北问题的处理;又怕解放军处死他们几个为首分子;幻想长江以南还在蒋介石手里,将来时局还不知如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林伟涛首先开口打破沉默,问陈长捷对这封信究竟写不写复信。这时,解放军的通讯员还在军部等候着。

陈长捷无可奈何地答复:“复他一封吧。”便叫秋宗鼎执笔,由他口述,一句一句地写:“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耻辱。如果共谋和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信写好后陈、林、刘三人签名,由林伟涛派一科长随解放军通讯员出城。但因事先没有联络好,这位科长又带着复信返回。

因林彪信件限1月13日前答复,如过13日,解放军将攻城。到14日拂晓总攻开始,国民党军损失惨重,坚固的碉堡群、海河、壕沟等防御工事都无济于事。这时陈长捷亲自与傅作义通话,得到的指示还是那句话:“坚守就有办法。”直到最后,15日凌晨解放军打到陈长捷的司令部,陈长捷、林伟涛、刘云瀚都成了俘虏。

而傅作义自己却起义投诚,成了起义将领。所以,当陈长捷再见到傅作义时,态度十分冷淡。

后来,当有人问陈长捷,为什么那样对待傅作义时,他才气愤地说:没什么可谈的,他在北平和平谈判,命令我坚守不投降,他成了起义将领,我成了战犯!我上了大当!就这么简单!

◆怒斥傅作义的代表

天津战役打到最后，解放军各路纵队会师于金汤桥，天津的国民党军已被拦腰斩断，天津被切成数块。为尽快结束战斗，解放军各纵队根据师团的进攻情况，进一步明确了战斗任务，一纵一师负责攻击核心区，活捉陈长捷。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指挥室内，陈长捷见大势已去，焚烧完各种文件以后进入地下室。这时隆隆的炮火打在警备司令部的周围，指挥间墙上蒋介石的画像被震落在地，摔得粉碎。墙上还挂着一张“1949年天津国民党军战况一览表”，表内开列了194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整整一年的时间，但是，他们的战况，仅仅记载了14天就结束了。

陈长捷早年与傅作义同在保定军校学习，同到阎锡山门下。参加过1930年的中原大战，“围剿”过红军，抗战中参加忻口战役，制造了进攻八路军的晋西事变，解放战争中被调任天津警备司令，他忠实地为国民党卖命也挽救不了日趋没落的蒋家王朝。

解放军其他各路纵队很快清扫了市内的敌人，国民党守军纷纷投降。到15日15时，天津战役胜利结束，前后只用了29个小时。16日拂晓，陈长捷在解放军士兵的押解下来到后方的谈判室，不多时代表傅作义与中共谈判的周北峰、邓宝珊也来到了谈判室。

陈长捷看清来人后，猛地起来，指着邓、周吼道：“你们这些家伙，躲在这里，以和谈为名，吃饱了饭磨牙玩，就是不签字！让我和13万天津弟兄当牺牲品，作为你们讨价还价的资本。呸！我们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看你们还靠谁来拖！”这真是戏剧性的一幕，上级在这里谈判，下级却成了俘虏。面对陈长捷的怒斥，邓宝珊、周北峰当即面红耳赤，脑乱语塞，一句话也说不出。

2. 秦城春秋



陈长捷于1959年12月获特赦后留影

陈长捷性情耿直，过去忠于蒋介石，一心无二，但当他被俘后，静下心来思考，回顾过去的一点一滴，发现有许多不仁之举，再加上共产党的宽大的改造政策，以及采取的各种具体的改造措施，使这位秉直的将军发生了变化。

◆学习劳动

陈长捷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还自费买了《资本论》，这在战犯中是少有的。陈长捷买《资本论》并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细细地研读，慢慢地品味，在许多地方都记下了他读后的批语和心得。他在这方面的理解能力是很强的，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不仅看得细，看得认真，而且爱看。每次休息的时候，别人在打桥牌、下象棋，而他总是手不释卷地专心致志地看书。

在学习上，陈长捷是一流的，但到农场劳动，他是属于二三流的劳动力。他编在第三队，一、二两队是强壮些的，一般较重的活都由这两组担任，三、四两队担任较轻的活儿，往往是在一起工作。

有一次他和杜聿明两人抬一筐粪肥向地里走时，引得旁边看的一些同学暗暗发笑。因为杜聿明不但是深度近视眼，而且走起路来，一拐一拐，两个人都是那样瘦，又都是文质彬彬的，都曾经是能征善战的名将，今天凑在一起抬粪筐，不认识他们的，谁会相信这一对书生一样的人，是当年指挥过那么多精锐部队的将军呢？

陈长捷见大家笑他和杜聿明，很不服气，便揭杜聿明的老底说他比杜聿明要胜一筹，力气也比杜聿明大，而且不会连踩死了老鼠都不知道，这一下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因为杜聿明的确闹过这样的一次笑话。

在一次学习时，杜聿明一走进学习室去，大家都感到有点奇怪，原来发现他不是一拐一拐，而是与别人一样端端正正地走。杜聿明发现别人注意他，也似乎感到今天走路与平时不同，便坐了下来，用手提起左脚的鞋去摸，并说了一声：“一条绳子！”可把这条“绳子”往外一拉，竟是一只死老鼠被他提着尾巴从鞋内拉了出来，这一下弄得全组的人捧腹大笑。

◆傅作义为他说情

1956年3月，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了如何处理国内外战犯问题。会后，民主人士的一些头面人物纷纷到监狱探望被关押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

这次探监是根据三月会议的精神，通过探监的方式，向在押国民党人员传递一个信息：对他们将实行“一个不杀”的政策，也是给他们吃“定心丸”。同时，在押的这些人也想借这个机会向曾是他们上司的探监者提出要求，把他们放出去。所以，大批的头面人物探视，他们无不喜出望外。

当民主人士各自找到自己要见的对象并互致问候的时候，傅作义来到了陈长捷的面前，正要打招呼，突然遭到了陈长捷先瞪眼、后低头不语的冷遇，这使傅作义非常尴尬。幸好，傅作义熟悉的人很多，去探视的人也发现陈长捷的不快，大家就忙着跟他交谈，把这一场面掩盖过去了。

不过，他们后来还是进行了交谈。会见后回到房间时，陈长捷顿时换了个面孔，满脸灿烂的笑容。无疑，傅作义跟他谈了这次探视的目的，更多的谈了他的内疚和不安。傅作义在起义前后，为他的下属做了两件事：

一件是在起义前夕，他召集华北“剿总”和各军军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决定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改编。并同时宣布：愿意起义的欢迎，不愿意起义的听其自便，可以离开，保证安全。当时第四兵团司令李文、九兵团司令石觉及其第十三军各师长、第九十四军军长郑庭锋、十六军军长袁朴及该军师长等，乘飞机逃离北平。

一件是在起义之后，他多次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毛泽东、中共中央报告，要求赦免在押的陈长捷等人。他在上述三月会议上两次发言，力陈理由，要求赦免。这些，陈长捷是无从知道的，这次会见后他才了解一二。

刚解放时，傅作义就赦免在押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与毛泽东单独面谈过好几次，也给中央写过信，当面提出要求。

在这次政协扩大会上，傅作义的发言最直截了当。他说我为这些人乞求，要求宽大他们。为什么？他认为他与他们是同病相怜，与他们的历史差不多，也可能走那条路。他说他也是战犯，西北权威人士就把他列入43名战犯名单。所不同的是他最后看清了前途，主要是敢于冒险，这样就与他们不同了。他甚至说，论反共，他很坚决，跟共产党打过很激烈的仗，给人民带来很大的损害和伤亡。可是，最后起义了，现在成了座上宾，而他们成了阶下囚。所以他要为他们反映，因为他们成了替罪羊。

傅作义还提出，要团结他们，应该把他们度过来，就是普度众生。关于度的问题，他作了长篇阐述，指出从社会的过渡到人的过渡是一个道理，既然社会主义可以过渡，为什么人就不能过渡，就不能度人？他的两次发言都充满内疚，充满着要求宽大处理战犯的渴求。这些，陈长捷们是无法知道的，也就谈不上谅解傅作义。

◆“文革”中自杀

陈长捷的监狱生活和表现与改恶从善的标准是吻合的，他首批特赦，与他一贯表现好很有关系。特赦后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安排了工作，回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回到上海后，起初在上海市长征人民公社参加轻体力劳动，服从领导，遵守纪律，劳动积极，学习认真，每天晚上还坚持看书看报，田头休息也不放松学习，受到群众好评，后来到市政协当文史专员。

团聚的日子是短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色风暴”不可避免地刮到了陈长捷头上。在那浩劫的时代，“无产阶级”的铁扫帚到处横扫“四旧”和“牛鬼蛇神”，首当其冲扫的是陈长捷这些人。1968年“文革”达到高潮，陈长捷整天挨批斗，瘦弱的他难以坚持下去，他不堪忍受，终于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十、三天不说两句话的康泽



范汉杰、沈醉、康泽、廖耀湘(从左至右)1964年参观西安

康泽的一生，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兴衰而大起大落。他曾经是蒋介石的忠臣，以亲蒋反共而著称。由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蒋介石的私心，他又一次失宠于蒋介石。

解放战争中，作为国民党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的他，在镇守襄樊时被俘。后在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思想认识逐步改变，于1964年第四批获得特赦，平安地度过了晚年。

1. 由特务到中将



康泽

康泽于1904年7月出生在四川省一个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考上黄埔军校,他虽是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但后来超过了许多一期毕业生。他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是“十三太保”的主要成员。由于得到蒋介石的器重,转而获得中将军衔。

◆本质是特务

黄埔军校毕业后，康泽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按惯例到军队从排级军官干起，而是由于成绩优秀，经蒋介石批准，直接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康泽只在苏联学习了一年半，1927年10月回国后就得到了重用。尤其是在蒋介石身边任侍从参谋以后，深得蒋介石赞赏。

1931年底，蒋介石在下野之前，为了巩固国民党的统治，镇压一切进步力量，召集贺衷寒、康泽、潘佑强、邓文仪、郑介民、桂永清、曾扩情、杜心如、肖赞育、鄞悌、胡宗南、刘健群等人筹备成立一个法西斯特务组织，以所谓“复兴中国革命”，“发扬黄埔精神”为宗旨，先成立了一个“力行社”，后正式成立为“复兴社”。这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初期组织，上述这些人就成为“复兴社”的“十三太保”，后来也就有了“军统”、“保密局”等庞大的特务组织。康泽就是这些特务组织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曾担任“复兴社”的书记长。

这个书记长与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是两回事，因为“复兴社”标榜的是既不在朝，也不在野。权力极大，无所顾忌，只服从蒋介石，而党部书记长没多大权力。

康泽这个人聪明、好学、肯干，所以干起工作来，非常有魄力，但同时这个人又非常残忍，心狠手辣，这可能也是他飞黄腾达的原因吧。康泽在“复兴社”内，主要是搞了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他是总队长。其组成人员基本上都是他培训的，组织形式模仿德国党卫军，遍布全国。他对队员的要求是效忠党国，绝对服从，“生的进来，死的出去”。而对共产党人、进步人士、进步力量，则是无情打击，残酷迫害。比如，他在江西进攻红军时，红军俘获了他几个别动队员，后来他也抓到几个红军战士，把心挖出来祭奠那几个队员，他对内对外完全是法西斯一套。

康泽没有带过兵，他有意向军事方面发展，想抓军权。由于国民

党元老们的阻挠和反对，未能如愿。

康泽一生对蒋介石的贡献太大了，蒋介石格外器重他，保荐他当了中央执行委员，并授予他陆军中将军衔，为他进入军界提供了条件。

1948年1月，蒋介石任命他为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镇守襄樊。可是，好景不长，7月16日就成了俘虏，正好半年。

◆ 台词未唱完解放军已攻进

康泽任十五绥靖区司令官以后，司令部驻在襄阳，那年他才44岁，正是大有可为之年，他很想打败解放军，显示一下自己的指挥才能。1948年7月1日，襄阳的行政专员、县长和几个旅长等官员为康泽庆祝生日，大摆寿宴。一位当地有名的女演员正在卖力地高唱“万寿”献词，还只唱到一半，主管情报的董益三便匆匆忙忙走到他身边，用嘴贴在他耳朵上，轻声地说：“报告司令官，刚才接到老河口的电话，解放军的大部队已向我进攻，战事极为猛烈，请司令官速派队伍增援。”

刚听到这个消息，康泽还有点盲目乐观，认为这是送上门的生意。于是叫堂会草草收场，赶忙去部署迎战计划。不料解放军的主力从天而降，一下子就冲破了他历数月筑置起来，“固若金汤”的强大工事和重重封锁。就在第三天，驻防老河口的一六三旅就败下阵来，沿汉水南岸向襄阳撤退。紧接着的是解放军大部队随即向襄樊包围过来，驻守樊城的一六四旅还没有听到枪声，就放弃了防地而全旅乘船渡过汉水向襄阳驶来。他听到了这一情况，非常恼火，立即命令该旅一定要返回樊城，同时向华中“剿总”白崇禧求援。

这中间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当一六四旅官兵蹑手蹑脚回到樊城后，见解放军并没有来，他们又高高兴兴地开进去，但马上又都怒气冲天，原来樊城的老百姓以为国军退走了，解放军立刻会来，便箪食壶浆，杀猪宰羊来迎接。一看又是这些“中央军”回来了，便把准备好

的东西都收藏起来。康泽听到这一情况，十分气愤。认为老百姓非惩罚一下不可，便借口为了固守樊城，扫清射界，命令化学炮连向北门一带民房发射黄磷弹，这种炮弹既可使建筑物着火焚烧，又能产生五氧化二磷有毒气体，可以毒害进攻的解放军。这些措施，并没有能阻止解放军的进攻，两三天后，樊城再次失守，一六四旅的残部又再次撤到了襄阳。

经过康泽一再呼救，白崇禧本来答应派整编第七师去救援，可是，一直到了7月16日下午，解放军已攻入襄阳城内，也没见整编七师的到来。万般无奈，康泽他们只好坚守，突然一个手榴弹从碉堡枪眼塞进这个临时的指挥所爆炸，康泽的头上幸好戴了顶钢盔，只右膀受伤。董益三因躲在一具尸体下，才安然无恙。

◆王近山要活的

在淮海战役中俘虏过黄维等人的解放军第六纵队，这次攻下襄樊，司令员王近山下死了命令：一定要活捉康泽，不要死的！

在所有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中，还没有一个像康泽这样使解放军如此兴师动众进行搜索寻找的，以至从上到下层层布置，命令一个接着一个，寻找结果随时催报。

当报告找不到康泽时，又命令找不着活的也要死的，见不着人要找到尸体。在那尸体遍野，血肉模糊的死人堆里，解放军干部、战士拿着康泽的照片，一个一个地翻找。

在一个坑道里，有一个战士正在翻找，一双血淋淋的手从尸堆缝里伸了出来，差一点，刺刀就挑上了。

出来的简直是一个“血人”。身穿衬衣短裤，颤巍巍地站在了战士的面前。

康泽是束手就擒的，没有按照他向蒋介石表的决心那样，“与城共存亡”，也没有做到“不成功，便成仁”，而是乖乖地当了共产党的俘虏。

康泽的这一举动，一定令蒋介石十分气愤。因为还在解放军寻找康泽的时候，蒋介石非常自信地说：他了解康泽，康泽决不会当俘虏，很可能像张灵甫那样壮烈成仁了。不几天，当时任国防部政工局局长的邓文仪宣布：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在襄樊作战中已经殉难。

这种毫无根据地宣布某位将士身亡，在当时国民党内是很普遍的事，蒋介石一方面爱面子，不愿相信他的爱将竟然做了共产党的俘虏，另一方面也是刺激那些正在镇守驻地的官兵，要坚守信条，“与城共存亡”，所以他在台湾建的“宗烈祠”里供了许多他认为该“成仁”的将军的灵位，如杜聿明、黄维等。

康泽终究没有“成仁”，也没有“与城共存亡”，而是由解放军的担架，抬到了战俘营。

在国民党内，“不成功，便成仁”的信条几乎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在战争开始前，每位将领都雄心勃勃，立志“与城共存亡”，但真到选择死时，却没有这个勇气，康泽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他是胆怯的。

康泽没有选择“成仁”的道路，做了共产党的俘虏，他心里明白，以他犯下的罪行，杀十次也不够抵罪，所以，他有死的准备。但他从与共产党的接触中，深知共产党的政策，“坦白从宽”，如果有这条路或许会有一线生机。况且他也明白，他这种国民党的重要将领，掌握国民党的重要机密，这些是共产党所要了解的，所以，即便要杀他，也不会马上就杀，所以他就静待时机。

2. 在解放区战俘营中



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

康泽作为战犯中的要犯被严加管押，既要防止他逃跑，又不能让他自杀。在襄阳，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提审过他；在宝丰，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又提审了他。面对审讯席上坐着的23年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邓小平，康泽无比沮丧，一言不发。

◆学达摩面壁

在保卫干部和一个排解放军战士的押送下，康泽被护送着经洛阳北渡黄河，又过山西晋城、长治，来到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加入专门收容、看管和教育国民党被俘军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军官训练班。

在监室内，康泽也是“拿达摩面壁自解自慰”，一言不发。他在思考。这次的失败，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原想在军界大展鸿图，谁知才刚刚半年，战旗就被解放军打掉。败军之将——这从来没有想过会与他结缘的称呼落到了他的身上。

不久前，他还在嘲笑陈诚的旧部、蒋经国的青年军干部邱行湘在洛阳战役中违背“与城共存亡”的誓言，成了解放军的俘虏。现在，自己也成了心口不一、为“党国”带来“奇耻大辱”之人。康泽对他的失败很不服气：如果离开南京时国防部调拨给他的是一如蒋介石允诺的精兵强将而不是一张张“空白支票”，如果他到达襄阳开始部署后吴绍周的二十三旅不被带走，如果白崇禧的援兵整编第七师动作快一点，真像他们所说的“日夜兼程”、“驰援襄阳”，如果川军一六四旅在西南山、在西关不是那么禁不起打，各级长官也都像他自己那样坚守岗位，恪尽职守，甚至解放军的攻击战术能够“正统”一点，先攻山、后攻城，而不是直捣西门……他相信他能坚守到援军到达，里应外合，守住襄阳。

康泽一直处于矛盾状态中，他不知自己的被俘，是否意味着对蒋介石的“不忠”。凭心而论，他对蒋介石是死心塌地、崇敬之至的。在重庆浮图关时期，蒋住李家花园，两地相距不远。每逢康泽的车与蒋介石的小车相遇，他总是远在几十米之外就唤司机停车，自己下车规规矩矩站在路旁，立正、举手敬礼、目迎目送，直至蒋的专车驶远。

这次，没能“与城共存亡”，没能“成仁”，对他来说，或许是个耻

辱。但是，他不承认就意味着是对“校长”的背叛。他没有背叛蒋介石，他是尽了全力的，天命该绝，他也无能为力。他惟一感到不安的就是没有遵照诺言，城亡了，人还存。他了解蒋介石的个性，更了解他的为人，他能够想象得到蒋介石听到他的战讯后那一副勃然大怒的样子，他也清楚，蒋介石不会再收留一个当过俘虏的人，蒋介石一定非常痛恨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败军之将，而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是降军之将。康泽很担心，很郁闷，他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因为这已置之度外，况且他了解共产党不会赶尽杀绝的，他最担心的是他的妻儿老小，他了解蒋介石的手段，不知他会怎样处置他们？

◆妻子大闹

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宣布康泽在襄樊作战殉难后，中共新华社针对谣言，发表了“康泽就擒记”，向全国人民公布了事情的真相，这引得南京国民党军政各界为此议论纷纷。康泽的妻子朱素怀不明真相，不知丈夫究竟是生是死，像疯了一样到处找人，哭诉他的丈夫如何为“党国牺牲”，作了总统的孝子忠臣。

在襄樊危急时，她曾一再乞求蒋介石把康泽调回来，但遭拒绝。此时她将这股怨气到处发泄，在国民党上层掀起轩然大波，弄得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蒋介石只得派侍从室主任俞济时马上给她送去金元券十万元，又答应为康泽召开追悼会进行安抚。朱素怀一时被稳定下来。

康泽被俘后，一方面担心不知蒋介石会如何处置他的妻小，还有一点使他放心不下的就是共产党如何处置他。自古“胜者王侯败者寇”，如今当了俘虏，没什么话好说，就像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在他看来，共产党没什么理由不杀他，他是自黄埔毕业20年来冲在反共前沿的蒋介石“天子门生”。

康泽对共产党犯的罪恶太大，他非常清楚他的属下在集中营里是怎样虐待以至处决共产党人、新四军战士和进步青年的，他也怕

共产党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不相信共产党在中国能得天下，万一处于劣势或危急时刻把他这样的要犯“清理”掉是很有可能的事，就像当年上饶集中营他所做的那样。

由于心里没有底，康泽无心吃饭，也难以成眠，天天在观察着对手的每个眼神、每种神态，分析他们的每句话、每种表情，试图从中捕捉到足以说明或预示自己命运的影子。但是，他所看到的一切，都远非他所能想象的。在监狱里，他看到他的伙食比看管人员还好，那些看管人员不拿薪水，还穿着带补丁的衣服，有专门的医护人员为他疗伤，审讯时也非他所想象的那种严刑逼供，而是态度十分和蔼，和和气气，令他不知所措。他还听说为了救犯了大烟瘾的国民党杂牌军司令孙殿英的命，共产党专门派人去国统区黑市用黄金买回鸦片救急，使这个年已六旬，当过土匪、做过汉奸，以挖掘了慈禧太后的墓穴而闻名全国的人缓了过来，此后经过节制，又帮助他戒掉了几十年的大烟瘾。

更令人惊异的是，解放军以毛泽东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训示，又打仗，又种庄稼，当兵的劳动，当官的也劳动，据说连他们的总司令朱德也不例外。要不是身在解放区看见、听见，否则真难以置信。这一切，都是康泽无法理解的。以前，他自以为对解放军十分了解，认为他们是“顽民”，是拼命地与国民党作对的“洪水猛兽”，可是一经接触，他发现他们是那么善良、朴实，不像国民党内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他似乎有一点儿明白了为什么国民党的美式装备的百万大军会败在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解放军手下。

◆在解放军官训练班读书

辽沈战役开始之际，康泽随着一支由国民党军战俘组成的专门队伍从中原经邯郸、邢台北上，来到距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不远的河北省平山县境内井陉河畔的解放军官训练班。迁徙途中的所见所闻，对康泽的触动相当大。他亲眼看到解放军官兵纪律严明，与民

众亲密无间，鱼水情深，与国民党军所到之处拆房毁屋、掠夺一空截然不同。

他感到：共产党的成功已不仅仅取决于或超出了一、两个人的魅力，而在于一个集团、一个群体的魅力。以往对共产党的了解已经不够用了，是对自己的对手再次研究、更新认识的时候了。“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研究学习一下，请能给我《资本论》、《列宁全集》、《斯大林选集》、《毛泽东选集》等书。”康泽向管方提出了读书的要求。

在这里，康泽的思想有了一点转变，他开始学习《资本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任何社会形态为转移的人们存在的条件，是永久的自然的必然性。”

“一个商品所有者必须得到另一个的同意，从而，依双方共同的意志行为，才在让渡自己的商品时，占有别人的商品。”

这些还是不难弄懂的，但《资本论》中“——人的经济化装，一般只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不仅积累的资本，可以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原垫支资本的一部分，也可以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就不那么浅显易懂了。康泽还重点学习了毛泽东的一些文章，他对毛泽东的关于土地改革的思想和对日战争及文化教育的理论与政策很感兴趣。康泽在重庆谈判时见过毛泽东，听到过他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讲话，也领略过他稳健、庄重又充满自信的风度。正是这位在延安时常穿着补丁衣服、吃着自己种的小米的人，在全面内战后不到三年，就使国共两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除毛泽东的文章外，最吸引他的是新华社播放的新闻和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那里有国共交战的最新战况和南京方面的间接消息。还是在康泽刚刚被押解离开襄阳去解放区的途中，一次无意中在电台广播中听到国民党要为“以身殉国”的康泽开追悼会的消息，急得他团团转，他担心家中80多岁的老母禁不起这致命的打击。

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让老母安心，他请求解放军允许他写封

“现在解放区”的平安家信，帮他转到长沙友人处，再转回四川老家去。新华社的广播成了他了解南京方面动态的重要途径。而他听到的是国民党军战场每况愈下，国统区要民主争自由的民众运动风起云涌，解放军继辽沈、淮海战役之后，又发起平津大战，使蒋军损失150余万，蒋介石被迫下野……代总统李宗仁只能疲于应付，然终难以应付。

随着对解放区面貌的了解日益增多，康泽对新民主主义有了新的认识，“新民主主义很好，切合今日中国的需要，国民党里面的进步人士是会赞成的。”同时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罪恶有所揭露，对自己之罪恶不再自以为是，开始有所反省。

1948年9月下旬，在同中共中央社会部的人谈话时，康泽说了下面这些话：

国民党是一个黑暗的封建的统治集团，丧失了三民主义的精神与原则，丧失了革命的理想，奖励贪污，对于公正的人则是惩罚，没有真与是。

说国民党不好怪下面，不怪蒋介石，这种论调现在已成过去。

蒋介石是地域主义、家族主义，信任浙江人，重用家庭，一切都是由蒋决定的，自然主要是他的责任。陈仪讲得好：“我们党的政策在哪里？政策在主席的脸上”。是的，大家一切都要看蒋的脸色行事。

蒋好用权术，制造矛盾，掌握矛盾，使部下各树一帜，互相牵制。今天的分崩离析一半也是他自己造成的。

我不愿意市侩式地在被俘后痛骂蒋。我说话是有分寸的，我不随便讲，但凡我讲了的，我完全负责。

蒋扶植蒋经国，郑颜棻、余继忠这些品质很坏的人是蒋经国的左右手，邓文仪现在也一个劲捧蒋经国。蒋经国掌握了三青团，还给他管十个师的青年军，许多将领感到

不平,认为多年汗马功劳弄个师长都不易,他毫无资历倒负这大责任。

蒋还叫蒋经国去当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二陈自然不满。该校学生在校内遍贴标语:“欢迎宋美龄来校任教育长,欢迎蒋经国任总务科长,欢迎蒋纬国任军事科长,欢迎蒋经国夫人任看护长,彻底实行学校家庭化。”弄得蒋经国不敢去接,陈立夫要辞组织部长,蒋介石自己要辞兼校长,后来索性改成国立,叫顾毓琇当了校长。蒋纬国也当了装甲兵副司令,这也使人不能心服。其实国家弄好了,大家自然会尊重他的子弟,否则又有何益?

从莫斯科回国算起,我为国民党工作二十年,我为三青团工作七年,现在想来一切都是白费。现在我做了俘虏到解放区来,很惭愧,但将更加加强我重新检讨重新认识的决心。

◆写了自省录

1948年底,康泽开始写“自省录”,1949年1月到3月,他先后写了复兴社回忆录、特训班与别动队及特务处(军统局)的情况。在“再省录”里,康泽回忆了他早年在安岳家中每逢冬春青黄不接时,全家老小以无油无盐的青菜干萝卜叶为饭,最小的弟弟吃了这样的饭后,一摊一摊地口吐清水的艰苦日子,母亲带着几个孩子苦苦支撑,白天干活,夜晚纺纱,父亲为凑钱供他读书,四处奔走借得5元钱,此后贫病交加一病不起。年关更难熬,兄弟姐妹几个围在母亲和纺车周围望着别人家过年,还要面对要账的债主的欺辱。

康泽谴责自己:“应当站在穷人的立场为穷人服务,使穷人翻身,而不应当跳到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阵营里,为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服务,使穷者愈穷!”他剖析自己,为什么要去做四大家族反动统

治的工具？“一是狭隘的错误的民族主义，以为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不能相容。”“我在苏联留学时，由于无知和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民族偏见，没有学得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回国以后一直在国民党反动集团里工作，还以为是应当的，听了蒋介石高调的讲国家民族，以为在蒋下面努力，就是为国家民族努力。”“以为不从农工的解放，也是在谋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

“见到封建剥削、官僚资本肆行无忌时，以为只是蒋的左右之罪恶，而不是蒋之罪恶”。“二是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理，希望在统治集团里追求‘扬名声，显父母’的事业”，“及到自己被俘，离开一切职务时，虽曾有重新考虑之动机，而无毅然脱离的决心与勇气。这些都是我极大的错误！这错误的发展进程，开始是不自觉的、被动的。及到在反动集团里地位较高，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发展，便变成自觉的自愿的了。于是就成为反动统治的工具！穷人队伍中的叛徒！”

在列数了复兴社宣传信仰“领袖”，发展特务，侦查排斥异己，通过别动队、特训班、保安及宪警保护地主，反共反人民，控制地方武装，维护反动统治等等罪状外，在“再省录”里，康泽对他服务了七年的三青团和效忠了二十多年的国民党给予了否定的评价。他写道：“……三青团的宗旨是：‘团结并训练全国青年，力行三民主义，捍卫国家，复兴民族’。在事实上三青团既没有有系统的领导青年学习，也没有领导青年生产，更没有领导青年抗战。只是把一些青年吸收入团后，要他们‘拥护领袖，服从命令’；要他们帮助学校当局镇压学潮；要他们在学校中监视其他党派的活动，特别是共产党的活动……根据以上所述事实，复兴社与三青团，无论他们的政纲与宗旨如何，其本质都是巩固反动统治，排斥异己和反共反人民的。”

“1927年以来，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所搞的事摘要列举如下：（一）制造血腥之罪恶——清党。这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这是叛卖中国的革命。（二）连年军阀混战。从桂唐战争、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战争，由1927年到1930年，迄无宁息，人民遭受无限灾难。（三）长期反共反人民。由1931年到1936年，在湖北、湖南、河

南、安徽、江西、贵州、四川、西康、陕西等省，倾全国之力，企图消灭红军，招致日本侵略。（四）消极抗战。对抗战采取消极政策，不发动广大人民，而寄希望和依赖于同盟国。（五）四大家族不断地扩大统治权力，而且无所底止的发国难财和劫收财，致使民族工商业萧条崩溃。（六）‘戡乱’。这是制造饥饿，制造迫害，制造内战，终至自焚。”

可以说，康泽在“再省录”中对国民党和它的政权的否定是客观的。虽然有的词语他用得很牵强，思想上也未必真的搞通了，但这毕竟是他人生第一次认真的反省。正如他自己所说，“追忆往事，不禁泣下沾襟！我过去的错误，从阶级觉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

3. 安家功德林

平津战役后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入北平。1949年5月初，康泽所在的解放军官训练班的全体被俘国民党军官离开河北省平山县，搭乘汽车直驱北平城德胜门外的关押地——功德林。

◆ 由平山县到功德林

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惩办战争罪犯的命令，宣布凡国民党军官及国民党党部、政府各级官吏等，命令其部属实行屠杀人民、施放毒气、破坏建筑、毁坏物资等罪恶行径者，皆以战犯论罪。从那时起，康泽就明白，他不仅是俘虏了，也就再没有被遣散或经双方交换战俘从而返回南京的可能。既然战犯的身份已经确定，那么，根据1949年初中共发言人在和谈中发表的和平谈判必须包括惩办国民党战争罪犯的声明，他必将受到法庭的审判。

康泽以这样压抑的心情来到北平、进入功德林。这是他生平第三次来北平，与前两次相比有天壤之别。头两次他是蒋介石特派视察员的身份赴热河时途经北平，威风凛凛，这一次是以阶下囚的身份来这里长住的。时过境迁，两种场景、两种境遇，形成强烈反差，刺激着他绷得紧紧的神经。

康泽来到功德林后，这儿有他已十分熟悉的同事董益三，有他的老师、黄埔三期的区队长黄维，还有他以前不甚了解，了解放区始为同窗的陈诚系的邱行湘。大家在这儿相见，十分尴尬。

到功德林后，康泽面对管理人员的体贴入微的照顾，心平气和的说服，思想的变化更大了。有一次黄维犯了痔疮，流血过多，手纸不够用，就拆开自费买来又已读完了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苏

联名著,用作手纸以当急需。这在当时,是极其恶劣的行为。同组人立即批评他“侮辱革命,侮辱布尔什维克”。黄维不服,与小组长争吵起来,说他这是废物利用,既已看完了,就可以发挥第二次作用。小组长请管理员来解决“争端”。管理员不仅没有批评黄维,反而说出了一串极富人性味的活:黄维犯痔疮,应该要求多发手纸,他没有提出来,是他的不对,但是我没有发现,是我的失职。大家不要因为黄维处理得不恰当而同样也作出不恰当的结论。一场争端这样平息,黄维当然感到庆幸。

还有一次康泽同前来功德林调查有关材料的人员发生口角,事后心中很是不安,担心会来一次疾风暴雨式的批评。然而令他不甚理解却又十分感动的是管理处领导在组长碰头会上宣布:今后接触调查材料的人,态度尽量好一些,对有些动辄拍桌子、打板凳者,可以不予理睬。又要人家讲,又要骂人家,真是岂有此理!今天康泽与外调人员吵架,责任不在他身上,他不用检讨。

朝鲜战争后,康泽对共产党的力量更是欣赏不已。共产党在朝鲜战场中打败了“天下无敌”的美国,这在功德林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同时也加速了康泽的改造。这几年中,他写了大量回忆资料。由于他曾长年侍卫在蒋介石左右,对国民党中枢活动的内幕和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倾轧知之甚多,他本人又参与了诸多的政务,所以他的资料很有价值。

1952年12月,他的长达十多万字的反思性交待材料“我的再清算”完稿,对他为国民党政权效忠的反共生涯进行了系统回顾,详细记述了从早年进黄埔军校,赴苏入莫斯科大学并成为国民党正统派,回国后投靠蒋介石做蒋的侍从参谋,筹组复兴社、主持别动队、为青年训练班主任、掌三青团实权,又被蒋经国排挤出国、游历欧美,回国后当选中常委、竞选立法委,直至兵败襄阳,开始战犯生涯等升降沉浮的前半生。

被俘后四年有余的战犯生活使他对过去的自己进行了细致的解剖,追忆过去,有了忏悔的表示,因此在这部“再清算”中通过剖析

自己追随蒋介石的经历和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既披露了自己走上顽固坚持反动立场道路的思想演变过程,对自己有所批判,又无所遮掩地倾诉了对蒋介石搞封建世袭、蒋经国逐渐得势的不满。

但康泽也有些私心,他担心政府清算他的罪行,所以有关他的一些重大罪恶,他避重就轻、一带而过。比如对皖南事变后他充任战时青年训导团主任,在重庆五云山、江西上饶、湖南衡阳等地均建立关押共产党员、新四军被俘人员、进步人士及无辜群众的集中营,尤其是江西上饶集中营残酷迫害和大批枪杀被关押者的罪恶行径轻描淡写,描述为:

是张超在事实上负责……敌人扫荡浙赣路时,东南分团曾自上饶迁到闽北……在迁往闽北前后那些时间,该分团受训人员,曾有相当人数(不是一二人)发生潜逃,似曾予以严厉的处置。

张超和我有颇长的历史关系,虽该分团所在地与重庆距离遥远,而又明白规定就近受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的指挥监督,但仍与本团保持了相当多的联系。

1948年8月,我被解放,转到中原时,有一个解放军同志和我谈话,他告诉我他在上饶东南分团,曾受到残酷的虐待,使我当时半信半疑。因为我过去没有听到这样说过。1949年到了北京以后,大概是在11月左右,看到《人民日报》副刊上,连续的若干幅关于上饶集中营的图画,描写当时残酷和虐待的情形,使我感到毛骨悚然!因为,我一方面想到,张超那个家伙反动十足,在顾祝同允许或指示之下,那些残酷事情他可能做得出来。我另一方面又想到,这一项罪恶行为,我当时虽然不知道,我仍负有连带责任。

1954年,康泽又写出了“长沙大火与斩鄂悌”、“说陈诚”、“CC与朱家骅的暗斗”、“眼中的戴笠”、“刺杨永泰的不会是刘芦隐”、“老

摩登’吴铁城”、“段锡朋秘密参加‘闽变’”、“张道藩缘何打滚”、“哭陵事件”等国民党秘闻。他的交待和回忆材料披露了一些国民党重大事件的实情和蒋介石身边的要人间的争斗及鲜为人知的情况,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和他特有的方式再现蒋介石政权由盛及衰的过程,因而在功德林具有“材料库”的美称。

◆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

1956年是对康泽一生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题为《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部分里,毛泽东重申共产党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他指出:“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同时又说明:“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这一段话也决定了康泽和他的狱中“同窗”们后半生的命运。

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来到功德林。他们带来了新的信息,党和政府希望这批人学习好,身体好,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今后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一律妥善安排工作,愿意去台湾、海外的,政府也予以方便,保证来去自由。

共产党的宽大使这些人感激涕零。1955年6月,瞿秋白的遗骨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宋希濂主动交待他就是执行杀害瞿秋白的人。不少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但管理处并没有对宋希濂采取任何惩治行动,而是一如既往。这在功德林内产生极大震动,

再一次验证了党的宽大政策,促使不少原国民党的将军向前迈出了交待罪行的关键一步。

但对康泽这样城府很深的人来说,虽然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有所认识,但他还不能完全叛离自己的过去。他已向狱方上交了不少史料,文章较之过去内容翔实、有血有肉,但他总忘不了对“校长”的承诺,他始终信守着“不市侩式地骂蒋介石”的信条。

◆ 以身试“针”

康泽身患风湿病、结核和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其中左臂的风湿疼痛令他大为苦恼。由于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中说用蜜蜂针螫风湿痛处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疗效,康泽决心以自己的身体做试验。如果真有其效,那就可以大力推广,使所有的风湿病患者免除痛苦,这也是一大贡献。

他常利用放风的机会,站立在放风场内的花丛旁边一动不动,待看到有蜜蜂飞来,便俯身向前,轻手轻脚地把它捉住,然后忍住疼痛,伸出手臂让蜂儿螫刺。一次又一次,直至凑足一个疗程,也就是让蜜蜂螫满100针。康泽的手臂上留下了一粒粒由蜂毒刺激引发的小小皮肤隆起,有些很久都没有消尽,但疼痛仍没有完全解除。最后,风湿痛症还是用蜡疗治愈的,但康泽没有对自己的努力及吃过的这小小的苦头后悔,毕竟他的努力不是无益的,他以自己的身体又一次为医学证明了蜂刺治疗风湿痛症的局限性。

改造活动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组织战犯参观学习,“耳闻不如一见”,让这些过去统治国家的大官们亲眼看看以前被他们称为“顽民”的共产党是怎样治理国家的。在康泽的日程记录中是这样写的:

- 2月6日 参观国棉二厂、黄河规划展览
- 2月8日 参观北京农具厂、义利食品公司
- 2月11日 参观八大学院和天安门广场
- 2月17日 参观百货公司

- 2月18日 参观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
2月19日 参观北京体育馆
2月20日 参观南郊国营农场、红星集体农庄
2月22日 参观民族学院、清华大学
2月24日 参观官厅水库

伴随着这日程，战犯们亲眼看到，在短短6年多的时间里昔日衰败破旧的古都变成了一座具有勃勃生机的大都市，做到了历代统治者所不能设想或只能说做到而不能做到的事情。

1957年，经过多方周密的计划和准备之后，又组织战犯去外地参观。到达武汉时，康泽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

武汉是康泽执掌三青团的地方。他对这里是有感情的，同时，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也都是十分熟悉的。当看到气势磅礴的武汉长江大桥横跨长江两岸，再走上宽阔平坦的桥面，观望脚下一碧无边的江水时，康泽的心情，比那奔腾滚滚的江水还要汹涌翻腾，他是兴奋的，他是欣赏的，同时内心深处还有点涩涩的酸楚。

这次参观对康泽的震撼太大了。昔日国民党统治时期，城市、农村到处都奄奄一息，人民见了国民党官员，就像见到猛虎饿狼一样。今天的国家，到处井然有序，生机勃勃，工人、农民，情绪高涨，齐心建设。康泽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回到功德林，康泽又恢复了平静，没有打破“三天不说两句话”的“惯例”，但他以悄悄话的形式向他的川南同乡、复兴社同僚及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曾扩情说：谁愿意吹捧共产党，为共产党说话呀，在真理面前谁又能否定？

这就是参观的效用，这位从来不向人低头的顽固分子，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暗挑大拇指。这位一向谨慎，从不向人袒露心迹，担心被人抓住把柄的人，也不由说出了心声。

正是事实的威力、政策的感召和人格的力量摧毁了康泽精神上的一道防线，他不再惧怕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怨恨在逐渐减少。他相信共产党言而有信、说到做到，承认共产党的成功和国民党的失

败均毋庸置疑、不容颠倒，他已经能够心平气和、心甘情愿地接受和走上共产党为他和他的同事们铺设的弃旧图新之路，把新中国作为自己后半生的依靠。

1958年3月，康泽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切盼早日解放台湾。第一，是为了祖国早日获得统一；第二，是为了早日清除美帝制造远东紧张局势的祸根；第三，是为了我住在台湾的妻儿，能早日团聚。为了解放台湾，如政府有所驱策，我决尽其绵力。”

1958年，管理所组织战犯们去农场劳动，采取自愿报名的原则，结果几乎每个人都不甘落后。但是还有规定，必须身体条件允许。康泽就属于那种由于身体条件不合格，即高血压而被留在了功德林的。

大队伍奔赴秦城农场以后，“大本营”功德林内只剩下黄维、康泽、“无脚将军”杨光钰和汤尧等几个疾病缠身的人。功德林变得格外寂静，往日的喧闹声，戏笑声，争吵声一下子都消失了，几个病魔缠身的人各自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心事。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万籁俱寂的改造所，四四方方一片天，映着几点星星，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望着星星，最容易进入往日的记忆中。

康泽早就知道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已被蒋介石带到台湾，他还没有把握蒋介石会怎样处置他的妻儿。现在自己的事几乎已成定局，共产党不会杀他，也不会马上放他，他已做好了长期受监管的准备。多年不见的妻子和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是他最最挂念的。哪怕不是生活在一起，只是见一次面也行。而看目前的形势，共产党一时难以收复台湾孤岛，蒋介石现在也不甘将台湾回归大陆。他与妻儿的见面恐怕是遥遥无期了。

康泽过去是不恋家的，在重庆浮图关三青团中央团部时，除每天必去办公，星期天也不大休息，到附近学校视察、找人谈话，还时常在外边过夜。现在想来，家庭、亲人实在是自由之外最重要的东西。真是“妻离儿散我成囚，人世悲酸到尽头，最是伤心乃今夜，背人无语泪偷流”。

4. 特赦获释



康泽被特赦时

1959年9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在建国十周年之际,特赦一批战犯的消息。这一新闻的公布,简直像在功德林里投了一颗炸弹,到处都沸腾了。就连康泽这样谨小慎微,三天不说两句话的人,也一反常态,跟着欢呼。康泽兴奋了,他口中念念有词,逢人就握手,也不管对方是谁。终于导致他多年的高血压病又复发了,立即被送入复兴医院急救。

◆欣闻特赦令

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的特赦令。10月1日,战犯们被安排在东长安街紧挨着天安门广场的公安部灰色围墙内临时搭设的观礼台上,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这次活动,使他们感受到一种威严、一种震撼,回到功德林后还难以压住内心的激动。在学习委员会的自发组织下,他们向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我们深深的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地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

中,贡献出自己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敬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1959.10.2

接着,就是漫长的等待。这些战犯们,已等待了十年,但这十年的时间,仿佛没有这几个月的时间长,每个人都度过了一个个难眠的夜晚。康泽当然也不例外。他知道自己不算先进分子,但还是抱有一丝幻想,谁不渴望自由呢?

◆终获特赦

1959年12月4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首席法官郑重宣布杜聿明等十名人员,改造十年期满,确已改恶从善,符合特赦令第一条规定,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这次特赦会,使大多数人都大失所望。原以为终于“苦尽甘来”,谁知只特赦了十个,战犯们普遍有许多不满情绪。

康泽不像其他人那样牢骚满腹。因为在这改造的行列里,不论是思想改造和劳动锻炼哪个方面,他都算不上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因此对于名落孙山,他也并不是十分意外,只不过是也有一丝丝失望。

1960年3月,全部在押战犯搬进秦城监狱。同年,康泽因病被允许监外就医。这一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务院第105次会议公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第二批特赦战犯名单,还是没有他。1961年11月25日,68名战犯被特赦,康泽又被筛选下来。康泽一次又一次地被筛选下来,他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着精神的震撼和情绪的激荡。

1963年4月9日,第四批特赦。康泽当时已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希

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突然，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当时，内心一阵激动，他走上台去，当他接过那张16开的“特赦通知书”的时候，难以在他脸上见到的泪水充满了他的眼眶，他极力控制住才使它不致滚落出来。

康泽在大陆没有自己的家。他被安置住在崇内旅馆，与第二批获释而处境大致相同的沈醉又一次作了邻居。

康泽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他以丰富的材料和近乎精确的回忆致力于这份工作，先后撰写了《复兴社的缘起》、《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经历》等一系列以他亲身经历的事件为依据的片断回忆。

出狱后的康泽给人的印象是平静的，他大口吮吸着自由的新鲜空气，慢慢咀嚼和品尝着摆脱了罪恶感的轻松又略带满足的普通人生活的滋味。他深深地感到：共产党是宽宏的，也是伟大的，她能以她博大的胸怀包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难以容忍的昔日的政敌，又能以她独有的魅力令人难以置信地把他们改造成为全新的人。

此时，年老体弱的康泽更渴望家庭的温暖，但他与妻子自1948年南京一别，天各一方，再也没有机会相见。他的儿子曾来大陆看过他，让他欣慰了好久。

1966年，一股红色热浪席卷中华大地，无情地冲击着一切。鉴于康泽的特殊经历，他势必会成为这场运动的攻击目标。周恩来亲自授意，以监护的形式，使康泽得到特殊保护。1967年，康泽旧病复发，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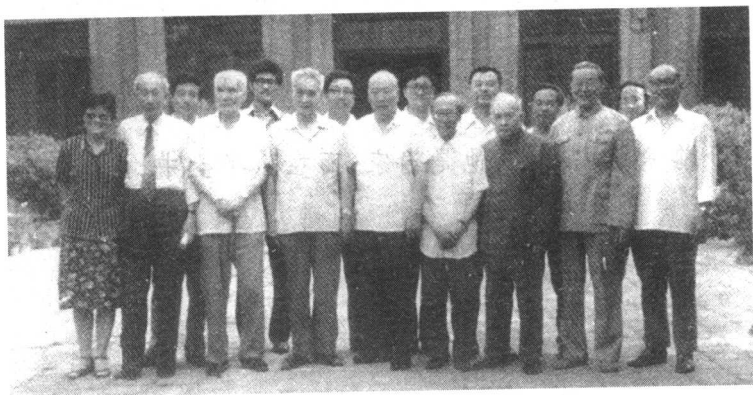
35

36

37

38

十一、死不认账的黄维



1985年摄于全国政协大院，前排左起：沈美娟、文强、杜建时、黄维、宋希濂、溥杰、赵子立、沈醉、吕光光。后排为全国政协工作人员

黄维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他在旧社会度过了44年,在新社会度过了41年,而后半生中有26年过的是战犯生活,15年是自由生活。

如果以黄维被俘为界,把他的人生分成两半,前半生与蒋家王朝一样,在中国进行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他是输家;而在后半生中,在善与恶、真理与谬误的决战中,得到了新生,他是赢者。

1. 淮海败将



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官黄维

黄维是黄埔一期生，蒋介石的嫡系，一生唯蒋介石之命是从，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目标就是黄维，他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顽固念头，但没有成功，双堆集他成了淮海战场上被俘的第一个兵团司令。

◆性情刚烈

十二兵团司令黄维也是黄埔一期生，同时他也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黄维算得上是国民党军队中的铁腕人物，带兵打仗，他是一流的骁将，而且文武兼备，有勇有谋。黄维最大的特点是性情刚烈，忠贞不二。他是被俘的国民党军官中最顽固者之一，提起黄维，一句话，不服输。黄维对蒋介石可谓是忠心耿耿，死心塌地。

1904年2月13日，黄维生于江西省贵溪县一个店员的家庭，家道小康，温饱如年。可是，在他6岁那年，父亲去世了，他和弟弟、妹妹只得靠母亲抚育。他从小高小毕业到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当小学教员，是他母亲含辛茹苦的结果。黄维是个孝子，为了母亲，为了出人头地，在当时全国人民奋起反抗北洋军阀的浪潮中，他瞒着母亲弟妹，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一考即中，赴广州入校受训，从此，开始了军人生涯。

黄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从基层的少尉排长干起，他的升迁是一级一级的，直到升为联勤总部中将副总司令和十二兵团司令。在黄维的军履生涯中，罗卓英和陈诚对他的影响特别大。黄维这个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为人急躁，赋性刚愎，容易与人为忤”，“我的个性对社交活动缺乏兴趣，因此我的社会关系不是多方面的，而是单纯”的，但他与这二人的关系相当好。

早年的黄维，一直追随罗卓英，受他的提拔。到1933年他升到中将师长的地位以后，便逐渐得到了蒋介石的宠信，后来接任陈诚精心培植的第十八军中将军长，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命，官也越做越大。

正是黄维的忠孝思想使他对蒋介石忠贞不二。既然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就不在共产党面前低头。所以，他被俘后，顽固地对抗，死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训条，认为蒋介石是中国的“正统”，也是“为国为民”的。而且自命为蒋介石的信徒，为能作为蒋介石的信徒而感到自豪。

◆双堆集之夜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任务是歼灭黄维兵团。为保证歼灭敌人，淮海战役总前委将兵力部署如下：中原野战军全部兵力和华东野战军的第七纵队以及特纵炮兵部队，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任务。歼灭黄维兵团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围困黄维兵团，二是阻击打援，三是最后彻底消灭。

黄维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一支王牌军，兵团所属部队曾进行过“日式”和“德式”训练，后又接受“美式”训练，改换美械装备，装备精良。士兵受法西斯教育很深，管理上实行连坐法，因而有一定战斗力。

到1948年12月底，黄维兵团被中原野战军层层包围，要想突围，简直是梦想。包围圈内的敌人饥寒交迫，伤兵遍野，士气低落。中原野战军双管齐下，一面加强政治攻势，催促国民党军队投降，一面加强火力炮击，一举砸烂了黄维的“近卫军”——“威武团”、“英雄团”、“老虎团”，歼灭了这支守卫兵团司令部的顽敌。

15日黄维与兵团副司令胡璉等指挥人员被追击到平古堆，决心实施胡璉提出的“四面开弓，全线出击，觅缝钻隙，冲出重围”的策略，决定黄昏6时行动。不想蒋介石闻报大惊，特派飞机带王叔铭到平古堆上空命令必须改变突围计划，等时机成熟配合空军投毒突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黄维在他的军人生涯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决定违背蒋介石的命令。命令一下，兵团12万人，顿作鸟兽散。

黄维、胡璉临突围时曾向医务人员要了大包安眠药，万一不能脱身即服药自杀，并相约谁突围出去后，谁就照料家属，担任一切善后事宜。下午4点，黄维、胡璉双双走出掩体，互相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各自登上了自己的坦克，向西南冲去。

他们在一个岔路上分手，相约在蚌埠以南的滁县会合，谁知此

一别离，两人再无相逢之日。胡珺磕磕绊绊，背上还中了流弹，居然逃了回去。而黄维的坦克没开多远，发动机坏了，他万分沮丧地走出坦克，预料中的事发生了：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他急忙伸手去摸口袋内的安眠药瓶子，等摸出来，为时已晚，一个解放军战士一步跨上来，抓住了他的双臂，他做了俘虏。

2. 俘虏生涯



黄维(前左一)被俘

黄维成了俘虏时，愤恨、懊悔、不服气，一屁股坐在坡地上，两眼直盯盯地望着燃烧着的焦土。他感到憋气，进入战役还不到一个月，偌大一个兵团，军事人才、美式装备都是一流的，还没怎么打就被消灭得干干净净（除一个师起义）。对于如此下场实在不甘心，于是他被俘后一直到作为战犯关押很长一段时间不只一次地扬言，如果把部队重新拉开再打，说不定谁胜谁负哩！一句话，不服输！

◆不服输

从对他的审讯中就可以看出他不服输的态度。那是1949年2月7日的晚上，黄维由管理人员领到临时的审讯室。他身材不高，中等个儿，腰部硬朗，走起路来挺胸大步，两眼直视前方，使人看上去脖子几乎都是直的。走进审讯室后，他条件反射地作了个“立正”姿势，马上不请自坐，两手搭膝，双眼直射着审讯员。

审讯员事先听说过他的许多故事，了解他的性格，见此状并不感到意外，为了缓和气氛，首先跟他说：“今天随便谈谈”，随后问他到这边来以后有何感觉。他像学生向老师回答问题一样，生硬地说：“多年来我担任军事教育训练，以后在联勤总部，筹备学校，后到兵团。兵团是临时指挥，对作战地区不了解，对部队情形也不了解。曾向参谋总长、总统提出辞职，不行，我是职业军人，是军人不能不接受任务。这回指挥得很惭愧。”审讯员随便问了一句：“惭愧什么？”

“个人指挥部队失败，又当了俘虏，作为军人当然是惭愧的。”他漫不经心，脱口而出。

“淮海战役规模之大很可观，打得也很残酷，人民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像北平问题就解决得很好，人民很少受灾害，士兵少伤亡。”

“对这边广播我们没收到，禁止收听，无线电人员偷着收听，也不敢讲。这边给我们的通告未收到，后听说刘、陈司令有给我的信，未收到。当时在战场上思想不冷静，我个人除战斗外，不可能采取其他途径，现在想来是遗憾的。”其实，他的兵团被围时，根本就不听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对他的最后警告，至死不投降。

“问题最后解决了，人民与人民解放军力量的强大，使你全军覆没。”

“人民解放军说我们是五大主力之一，实际上只有十八军是骨

干,八十五军战意消沉,十四军开始一攻击一个师就垮了,事实上这个兵团不是很强的。”

谈起军事问题,哪怕是打了败仗,黄维可以跟你侃几天几夜都不觉乏味。审讯员明白,这样谈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便把话题一转:“研究这个问题是有许多内容,但你是那个战场的指挥官,我们有通告,应了解到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人民的损失,能采取更好的步骤是很好的,但没有。因此,这个责任应由你来负。”

“我是这个单位的最高指挥官,责任不能推辞,人民要给我什么处罚我接受。”黄维的口才很好,不假思索,非常干脆。

“既然到这边来了,希望对我们的政策多学习,以反省自己过去的罪恶,应作正面反省、检讨,然后人民对你是否可以宽恕,根据你过去的罪恶事实,与现在对罪恶事实的坦白反省如何来决定。”

这是这次审讯的主题,黄维是个头脑清醒、思维敏捷的人,他听到审讯员的这番话,实际上是要他对自己的问题有个正确的态度,趁此机会,他作了如下表白:“我21岁参加大革命、抗战,个人革命精神至今还有,走的路,在中国制度下走上反动方面,这是制度问题,领导问题,我个人是职业军人。我想有时间对革命政策多学习,或许对当前革命有所效力。我个人没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这回指挥作战是另一个问题,战场问题。”

“新民主主义过去看到一些,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是正确的步骤,毛先生的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主义的轮廓相差不多。三民主义国民党没做,革命的共产党做了,这步骤除少数人外都可以接受。在10年前国民党改组起,反帝反封建、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与节制资本等基本政纲,国民党与中央政府把这些遗弃了,没执行。今天不要说全国人民,国民党的分子也可以接受这一政纲,国民党的分子不都是没革命性,只是领导的错误,CC系作为争夺政权的工具,党脱离了人民。不要说你们有这样强大的力量,没有这样强大的力量他也要垮台。”黄维并不像他所说的只是职业军人,也不乏政治头脑。

◆不认账

黄维的战犯生活几乎占了他一生的三分之一。从1948年到1975年,他一直都是监狱中度过。26年中,黄维的思想变化大体可分成四段:1948年至1955年,立场、观点如旧,对共产党有反感;1956年至1959年有转变,交了自己的罪行,并有悔改表现;1959年至1966年又有反复,思想改造走弯路;1967年至1975年由悲观失望到加速改造,尤其是1972年重申党的战犯政策不变以后,对过去的思想进行了自我清算,决心改恶从善。

刚被俘的黄维,思想处于游离不定、身不由己的状态,表现出愿意学习、寻求真理的愿望。在淮海战役结束的当天,也就是他被俘的20天后,1949年1月10日,在履行登记手续写自传时写道:

我是一个纯粹的职业军人,昧于政治了解,尤其对于中共方面之材料无缘接触,所以对中共所领导的革命真相是极其隔膜的。我希望能早日到达固定的地方,学习有关共产主义革命的学说、理论以及解放区政治经济具体实施的材料,使对于各项问题能详加研究。人总是愿意接受真理的,认识真理必然站在真理方面去奋斗,至少也可以在将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内做一太平良民,就是抱瓮灌园为老农以没世也是欣幸的!

然而,到1950年就不一样了,确切地说将他转押于公安部管理的功德林监狱和秦城监狱以后,其抵触情绪非常大,因为这时正式向他和在押的其他人明确宣布是战犯,他们应向政府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并接受改造。于是,他一反常态,抗拒学习,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罪行:“如果有,一切罪恶,唯一的罪恶就是打了败仗”,其余的一概不承认。也就是一句话:不认帐。

比如在淮海战役中使用毒气的问题。这是件众所周知的事,他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而被补充列入首要战犯的名单中,也向国内外公布过了。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按照战争法规和惯例,这是犯有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的要害问题,对此,黄维十分清楚。然而,他采取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来减轻自己应负的罪责。

他这样辩解:十二兵团的所属部队确实有使用“催泪性瓦斯投掷弹”的事实,而且是极为严重的战争罪行,作为兵团司令官我必须负这一罪恶责任,为此构成战犯也就死有余辜。黄维的逻辑思维能力非常强,用词严谨,合情合理。但是,他又说:“至于我,没有命令使用毒气也是事实,蒋介石有由空军投毒的计划,以拯救我突围,但并未付诸实施,这一罪恶责任拉不到我身上。”

这种具体的否定不能说不是合情合理的,这就出现了逻辑和事实的矛盾,黄维深知这一点,于是他怕别人听不懂,又进一层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得更加清楚。他理直气壮地说:“我认为反动集团的所有罪恶都包括我在内,都有我的份。但对于具体的罪恶,则应该由具体的事实和具体的责任来决定,不应乱拉乱扯,包揽一切,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正视和承担自己份内实际应负的罪责。我不能把蒋介石的责任拉到我身上来,也不能以为所属部队使用‘催泪性瓦斯投掷弹’的都是我下令干的,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包揽,虽说是认罪,那也不过是把认罪视为儿戏的不负责任的认罪而已。”

这样,上有蒋介石为拯救他突围的投毒计划,下有所属部队确已实施,然而他没有下命令,上推下卸得一干二净。事实上,他确实已布置投毒,当时整个部队都知道要投毒,毒弹器具都发到了部队。在当时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用不着像黄维所说的那种形式上的“放!”、“投!”之类的命令。

再看杀害俘虏的问题。这又是构成黄维战犯的要害问题之一,因为根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规定,杀害俘虏是犯“战争罪”。黄维是熟知国际法的,他采取了同样的办法进行辩解。他先说前提,“在淮海战役中,我规定对于俘虏每人发伪金圆券5万元,一律

当时释放。因为不放没有房子,没有给养,各部队都是照上述规定办的。”

这是战争常规,黄维运用得练达自如。对他的部队杀害解放军俘虏解释为:“在我被俘虏以后,解放军负责人告诉我十军丘仁汉团有杀害俘虏的事实,应负责。我并不因为丘仁汉团违反我的命令并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杀害俘虏而减轻我的罪恶。”在他的部队犯下烧杀抢掠、强奸等罪恶中,他都是采用这种逻辑方法辩解的,要么是战争需要,他本人没有具体罪责,要么是部下违反纪律,与他无关。

◆要发明“黄维永动机”

黄维很清楚,共产党是不会要他的命的,但他更清楚,以他的罪行,短时间内不会放他。他一贯采取不服输、不认帐的态度,自由更是遥遥无期。他于是产生了这个念头:发明永动机!并命名“黄维永动机”或“东方红发动机”。这种机器不用燃料,可以永远做动力,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幻想。黄维提出发明永动机的真实动机是搞发明,找出路。黄维是个很好强的人,当他在淮海战役失败后,自觉大势已去,一切都完了。然而,他并不甘心现状,在1949年底至1951年初多次提出要搞永动机。

这样做,一则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当不成将军可以做发明家,二则可以堂堂正正地恢复自由。他对军事工程学很有研究,从他对永动机绘出的图纸和精于高等数学的计算公式看,他有相当功底。

再说,他对科学史也颇有见地,当1956年和1963年永动机两次被科学院否定后,他对妻子蔡若曙说:“科学院的裁定是错误的。古今中外,好多伟大发明并不是什么科学家干的,像瓦特发明蒸汽机,他是一个修钟表的,德国一个医生发明了离心机。永动机自14世纪就有人在研究,但都失败了,而我自1951年至今,13年的考虑,我有足够的信心。敏南(黄维的长女,当时是清华大学教师)给我的那本小册子就是介绍关于永动机在研究上的经过和失败的教训。我研究

了他们的教训,我如果搞不出名堂来,刷了我都可以的。”

中国科学院否定黄维的设计之后,为使他能专心致志地进行学习和改造,管理所曾组织多次批判帮助会,他妻子蔡若曙也于1963年10月、12月和1964年2月,三次会见黄维进行帮助。无论是管理所,还是他的“同学”,他的妻子、子女,统统无济于事,不仅如此,还生出各种各样的事来。

蔡若曙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对永动机问题应有正确的认识,不要狂妄自大,不要想在将来还成名成家。黄维非常气愤,骂她“荒谬透顶”,不愿跟她谈这个问题,轰她走,并叫她以后不要再来!

他的妻子蔡若曙是知识广、修养高的女人,也是一位称职的贤妻良母。当淮海战役进入后期,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的时候,她和5个孩子被列入蒋介石审定的高级军官家属撤退名单中,并从上海直接航运台湾,比起取道香港、福建逃台的又优惠了一层。按照黄维与胡珪的口头协议:谁能跑出去就负责照顾对方的家属。蔡若曙到台湾后立即找到胡珪,哪知胡珪翻脸不认人,根本就不负责他们的生活。

虽说黄维的社会关系比较硬,但蔡若曙考虑败将家属去找蒋介石、陈诚也不是长远之计,经过深思熟虑,以她晓于共产党政策的胆识,毅然决然带着子女于1950年取道香港返回大陆。不出她所料,回到上海后,有关部门按照党的政策很快安排了她的工作。她靠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的微薄工资,加上原有不多的积蓄,维持家计,培育三子二女读书上进。在这方面,黄维也非常感激她。

每当蔡若曙会见黄维时,都不厌其烦地劝说他放弃发明永动机,安心改造。黄维却一句也听不进去,还经常恶语相加。当蔡若曙泪如雨下的时候,他仍噘着嘴,气呼呼、直挺挺地坐着一言不发。黄维有个习惯,无论是坐着还是站着,腰板总是板直板直,据说这样可以长寿,不过也是黄维性格的一种外在表征吧。

最后蔡若曙感到丈夫要搞永动机是谁也说服不了的,既然如此,就顺其自然,答应替他想办法,找朋友帮助试验。但有一条,在管

理所一定要安心改造。黄维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不得已,只好说“不谈这个好吗,这里的接见时间是半个钟头,你该走了”,下了逐客令。

蔡若曙实在忍不住,生气地说:“你思想问题未解决,还是谈谈好。这不单纯是个发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你反复无常,蒋匪叫嚣反攻大陆,你感到形势不妙,处理无望,对蒋还抱幻想,还想为蒋介石效忠到底吗?”黄维被气得脸红脖子粗,竟然骂道:“你简直是放屁!”

蔡若曙感到继续谈下去也无济于事,便说:“你不要着急,看问题要从政治上着眼,这里的领导为了挽救你,对你的教育改造是仁至义尽的,可你还是那样顽固,不满意这里的局长、处长。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把你放出去能起多大的作用似的,这是幻想。改造不好是出不去的,不是因为永动机问题不放你,改造是个政治问题,像你这样,今年肯定不会有你,明年也不会有你。”

黄维也软下来,只好说:“难道搞发明为社会主义有所贡献成了政治问题,我看任何人处在这种情况下也会不满意的,已经改造14年啦,一个罪犯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不放我,我老死在监狱呗!”蔡若曙听出了黄维还是想出监狱,只不过想堂堂正正地出去,便抓紧时间给他出主意:“你没有办法,我替你设法。”并试探性地说:你就不能找找你的老师,叶帅、周恩来总理都是你的老师嘛,不要死抱住永动机不放。说到这里,蔡若曙只能是这么办,在她看来这是最后的一着,不说吧,会见机会和时间都少,说吧,黄维肯定不会同意,但她还是鼓起勇气说了。果然不出她所料。黄维说:“你这是做梦!”其实,黄维一直鄙视这种做法,他见时间已到,坐在面前的妻子还在流泪,没有用更加刺激的言词反驳她。

由于黄维要发明永动机的决心坚定不移,几乎时时、事事都离不开这个话题,对此,管理所和公安部不只一次地研究处理办法。后来,经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批准,让他搞,并聘请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进行审核、鉴定。被科学院否定后到了抚顺他还做实际试验,仍无结果。1975年3月黄维被特赦。4月份,抚顺战犯管理所先后收到他的

两次信和一次电报，索要他在改造期间试制的永动机图纸和试制件，继续进行试制。经公安部领导和统战部领导童小鹏批准，将全部图纸和样品转交给了他，他表示感谢。但是由于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年龄也越来越大，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研制下去，最后不了了之。

◆ 报仇和报恩

黄维对两种人不放过：一是靠拢政府表现积极的人，一是揭他短的人。有两件事非常典型。

由于他牢骚满腹，怪话不断，不免就有人向管理人员反映，他知道后既向众人“揭露”，也向当事人“反击”，更多的是在众人面前对当事人从不放过，指责当事人说：“反映情况的人都无耻，监狱本来就是糟蹋人的地方，硬要反映情况是糟蹋人的事。”不仅如此，他把靠拢政府、表示愿意改造的人说成是“没有气节，是投机无耻”。

有一次，借讨论电影《马兰花》，他用旧诗骂这些人：“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王姬，贱日岂殊人，贵来方悟稀。”他生怕别人听不懂，还专门对给他提意见的同学说：“共产党没有成功的时候你就无情地讥笑打击，成功以后又拼命的捧，是狗眼睛！”

受黄维讥讽打击次数最多的要数他的学习小组长。他认为这位组长同时符合上面说的两种情况，即靠拢政府，又愿意揭他的短。在黄维看来，这位组长之所以能当组长是为了踩低别人，抬高自己，早点出去，这是不能容忍的。这位组长以前是黄维的下级，进了改造所后，成了黄维的直接“上司”，而且他对黄维的错误，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的。所以，黄维认为他是投机取巧，“踩着别人的血和肉爬上去的”，黄维与他之间“战争”不断。黄维与这位组长的恩怨直接影响到他的改造和前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被他们的这种关系缠绕着。其实，黄维心里也明白，批评和批判他的人并不只是组长一人，他采

取的是“杀鸡儆猴”的办法，也叫“以守为攻”吧。

虽然黄维说过“我为人急躁，赋性刚愎，容易与人为忤”，而且他与大多数人关系都不好，但是，他却恩怨分明，对他有恩的人他是刻骨铭心的。黄维曾多次直言不讳“有恩不报非君子”。他曾说“人非草木，孰能无动于衷”。当政府治好了他的病后，他从内心感到共产党关押他们是真心挽救他们，是消除他们的反动思想，而不是要消灭他们的肉体。

黄维在旧社会身患5种结核病，一直未能治愈，被俘后病情加重，一度垂危。1952年7月8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报告周恩来总理：“黄维于6月20日发病，可能有生命之虞。后经医生确认：黄维原患重度肺结核、结核性腹膜炎、肋膜炎、颈部淋巴结核、副睾丸结核、浮肿、腹水。经大量注射链霉素、葡萄糖、PAS和手术，痊愈。”

黄维在治病问题上也是由拒绝、悲观、发牢骚到感激，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也因这件事触动了他。可以说，这件事是他开始转变的重大事件，1958年是他与前半生决裂的关键一年。

刚开始时，他拒绝治疗，想一死了之，而且他不相信政府会治好他的病，甚至说过“进步的医院制度对于我来说反而成为更残酷的制度”。当政府聘请高级医生，使用进口药，加上精心的护理终于治好了他的病的时候，他受到了触动，从心底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身体恢复后他又主动向政府作检讨，说以前是“以怨报德”，政府抢救治好了“垂死的多年重病的恩德，何止是再生父母”。

在长期的养病过程中，他对被俘后的种种言行和表现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对过去从不愿读的马列主义书籍和毛泽东的著作也感兴趣了。养病期间，也给妻子写了自我检查和道歉的信。病好后又到社会上去参观，受到事实上的教育。对这一转变过程，他有一段文字总结，现将原文照录如下：

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由于以前特别是解放初期几年，我以为改造政策不能决定我的

前途,不能解决我的问题,而只有立功赎罪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大处理,而妄图以发明创造为捷径,以幻想的黄维永动机为立功赎罪的法宝,从此走上歧途,加以被囚监狱年久,而且自1952年至1955年长期重病,难安心于改造,现在,为了惩前毖后,对症下药,治病自救,第一,痛下决心摒弃一切幻想以绝祸根,今后保证绝对不再有黄维永动机发生。第二,从思想上坚决消除和改正发牢骚、说怪话的思想根源和丑恶性格。第三,从此低头认罪,诚心服法。第四,坚决以思想改造为唯一的出路和要求,全力以赴,今后老实学习。总而言之,我现在低头认罪,诚心服法,老实学习,埋头改造,努力耕耘,不问收获,以从头改造,争取新生,希望在此以前的错误和罪行还能得到政府宽大,允许我有走向新生的机会。

这一年之后,黄维开始交代自己的历史罪行。从1932年赣州之役一直到1948年的淮海战役,把所有问题兜了个精光。与其他人一样在1958年比较彻底地交代了全部问题。所以他说:1948年是国民党垮台的一年,1958年是从思想上彻底缴械的一年。黄维由崇拜蒋介石到大骂蒋介石,最后表示感激共产党的政策挽救了他,使他由一个“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战犯得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直到1966年,他的思想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有反复,由于当时“左”的思想路线的冲击,使他产生悲观情绪,怀疑党的政策变了,特赦无望。尤其是秦城监狱被军队管制之后,原来执行的政策几乎全变样了,使他们不知所措,原有的干部一个不剩地都离开了秦城监狱。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有利于他的改造,管理人员有意识地把 he 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这是1968年4月的事。到了抚顺,碰到的也是军管,违反政策的事甚于秦城。然而,抚顺毕竟是全国公安机关的先进单位,中央很关心,工作基础也很好,所以违反政策的事一经反映

到中央，周恩来等领导人便立即作指示，立即纠正。1975年，黄维第七批获得特赦。

黄维对抚顺的感情比对秦城深得多。秦城是他交代罪行的地方，抚顺战犯管理所是他认罪、再生的地方，所以在特赦后的10年，即1985年11月他已是82岁高龄，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不住宾馆硬要住在当年的寓所，最后在2号监室住了一宿。在和管理所工作人员座谈时他满怀激情地说：“抚顺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过去我在改造中表现是不好的，经过政府多年耐心教育，使我这个顽固分子变成新人。没料到我能活到现在。这主要是党的照顾和关怀，是共产党的政策好！”并挥笔题词：

重来抚顺管理所纪念

抚顺是我新生之所，是我第二个家乡

黄维敬书

1985年11月

时年八十有二

3. 突然病逝



黄维(左)与沈醉

黄维出狱后,曾任第五、六届政协常委,出狱一年后,其妻蔡若曙即投河自杀,1989年准备赴台时,因心情激动,黄维突发心脏病去世。

◆ 愧对爱妻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黄维这位硬汉子也有落泪的时候,他的泪是为他的爱妻而落的,他觉得一生中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他的妻子。

有人说,军人的感情经常处于抑制状态。黄维对蔡若曙表面上是冷的,可内心是热的,由于黄维的不善表达,曾无数次对蔡若曙造成伤害。1976年蔡若曙犯病身亡,使他受到沉重的打击。蔡若曙曾长期患神经衰弱症,3月29日因神经分裂服安眠药自杀,由于黄维发现得早,进药量小,未造成严重后果。5月8日上午9点,她又因旧病复发,投永定河自杀。黄维发觉后立即下水抢救。由于水深,时值春寒,黄维也年老体弱,不但没有能救起人,反而自己也被淹。幸好,过路青年和学生把他们救上岸,送医院抢救。蔡若曙经抢救无效死亡。

黄维脱离了危险,但因前列腺肥大,加上紧张、惊惶和着凉,发生排尿困难,尿道发炎,经多方医治才恢复正常。这件事使黄维终身遗憾,他自责对妻子关心得少,照顾得少,有负于她,而且是在他特赦刚过一年多就离别了,无论想起过去,还是考虑眼前,黄维都自责不已,不由得有生以来第二次落泪。

黄维感到内疚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在永动机事件上他给蔡若曙带来的痛苦。虽说他没有直接讲她的神经分裂症与他发明永动机有关,但为永动机的事他多次使她难堪,使她的神经受到刺激,他是一清二楚的。每次会见,为充分利用半小时不知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准备,说什么,怎么说,才对他有点用。而他,可以一句话把她的苦心全部勾销掉。久而久之,这对一个温顺、责任心强的妻子来说不知要受到多大的打击。事情往往是这样,人活着的时候磕磕碰碰无所谓,当她死去的时候一切都被回忆起来。黄维在回忆他们夫妻一生的经历时就是这样的。他越回忆越痛恨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改变了生活秩序才渐渐平静下来。

◆未能成台湾之行

重访抚顺4年后,即1989年黄维和文强准备一起去台湾访问。19日晚,他们整束行装,当时黄维特别兴奋,他问文强:“到台湾后应先访问谁?”文强想听听他的想法。他说先拜陈诚墓,后见……文强说不对,应先拜蒋老先生墓。他连说“对对对”,边整理行装,边检查礼物,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激动得不能控制自己,高兴过度,心脏病突发,昏倒在地,再也没有醒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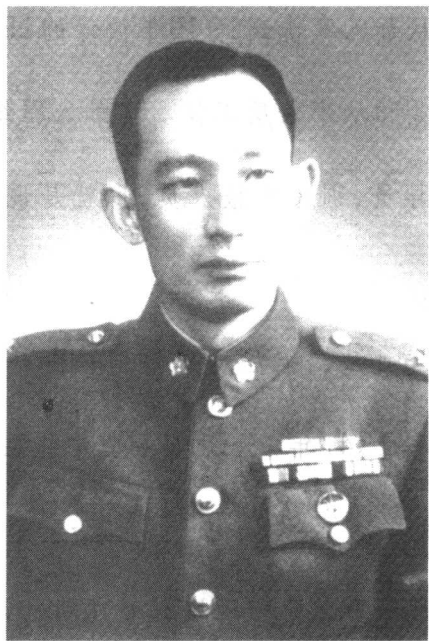
1989年3月20日黄维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李先念、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乔石等人献了花圈。胡启立、宋平、阎明复、习仲勋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参加告别的还有首都300余人。从特赦到逝世的14年间,他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祖国和平统一的工作,《人民日报》1989年4月8日发表的电讯评价中一段文字可以说高度概括了黄维晚年的功绩:

黄维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参加人民政协活动,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黄维同志为人耿直、个性刚强、生活简朴。他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深深怀念在台湾的亲朋故旧,期望海峡两岸骨肉早日团聚,共同为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而奋斗。他为此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就在逝世前夕,仍积极整束行装,准备接受有关台湾方面的邀请,到岛内会见久别的旧友。

黄维的转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进行长期的、耐心的教育结果”。凡是接触过黄维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黄维是最难改造的一个,也是改造得最好者之一。他的改造,的确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曲折的过程。



十二、军统中将文强



军统中将文强

文强的一生较富传奇色彩，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是川东特委书记，1934年加入军统。

文强从加入军统到1949年被俘的15年间主要是训练特务和从事策反工作。当加入军统时，他在学校当指导员，训练情报人员，也就是说训练军统特务。

1938年1月，担任忠义救国军少将政治部主任。1946—1947年任东北督导室中将主任兼东北行辕督察处长。

文强是作为重犯押到战犯管理所的，后被平等对待，学习积极，改造认真，晚年幸福。

1. 特务生涯



1946年留影于南京

文强的一生富于戏剧性变化，本来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结果被环境所迫，阴差阳错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军统特务，由站在人民的立场转变为反人民的战争罪犯。这就是历史，很能捉弄人。

◆先入共产党

说起文强,很容易就想到他的家庭。文强出生在湖南长沙市一个书香之家,他的父辈是文天祥二十三代子孙。优裕的生活,父辈的教诲,环境的熏陶,使这位少爷很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文强是在贵族学校念的中学,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再加上他的父亲与孙中山、黄兴、蔡锷、徐特立等人是好朋友,这使得文强受到革命的熏陶。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周恩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他讲课时,要文强做记录,因为文强会速记法,能较全面、准确地记下讲课内容,自此周恩来也就认识了文强。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在军校清党时,文强没有退出共产党,而退出了国民党。后来参加了东征、北伐,雄心勃勃,正如他诗中所叙的“浩荡天风长告捷,飞奋雄心看月明”。

1926年8月,他随北伐军到了武汉后,又入川。这时,遇上四川军阀刘湘清党,波及到他的头上,只好再返回武汉,任炮兵营教导员,可是又遇上汪精卫发表反共宣言,由于形势所逼,又奉命到九江。到九江后参加了贺龙的部队,当上了政治部助理秘书,受政治部主任周逸群的领导,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来周逸群当了师长,让他当特务连的少校连长。

起义失败后,他随周恩来率领的部队到福建、潮州,在潮州打了一仗,特务连伤亡过半,撤到韩江,与从汕头脱险的周恩来见了面。

不久,周恩来、贺龙到香港,随后文强也去了。文强从香港回到上海找周恩来时,没有找到,这对文强来说是个人生的转折。因为自此以后,他逐渐脱离共产党,走了另一条路。

没有找到周恩来后,组织上想让他去莫斯科学习。他回到湖南老家等待,写了四五封信也未见回信。于是在1928年2月,他离家去

四川万县。在重庆、成都都没有找到党的组织，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公园里碰到了廖宗泽，廖宗泽是改变他命运的人。廖宗泽当时是中共四川特委委员，使他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到川军第七混合旅第二团任党支部书记。半年后任旅委书记，一年后任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到1929年，李立三路线发生了，军队打了败仗，他就逃到陕西境内。无奈，在一支土匪部队里混了一段时间，后来经过巧妙周旋，脱离了这支部队，回到重庆，找到组织，并被派任四川22县特委书记，即川东特委书记。

他的人生悲剧就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发生了。

◆ 踏入泥潭

文强曾在中共由一个团的支部书记、江(北)巴(县)兵委书记、城(口)万(源)宣(汉)达(县)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常委)到川东特委书记，领导四川22个县的军队和农民武装的党政军工作，地位是相当高的。当时的动荡社会，世事难料，谁也未想到这样一位共产党员会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正如他自己诗中所写：“世事伤多变，吾人故作痴”。

就在这年的秋天，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被捕了。被关了一个多月后，他越狱逃跑。逃出后又遇上了王明路线，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对知识分子要进行审查，认为这些人靠不住。本来对他逃出就有怀疑，加上又是知识分子，他想申辩，结果无效。文强认为，如果不逃的话，一定很难活命，于是他与妻子周敦琬一起连夜逃走。周敦琬是文强的原配夫人，燕京大学毕业的，当时任省委妇女部长，后来搞新闻工作，带着孩子回到湖南，又迁到湖北、四川，与文强两地分居，因患子宫癌住院，于1940年被日军轰炸而死于手术台上。文强夫妇跑到上海后再次找周恩来没有找到，就又到了长沙，化名当了记者。

在记者生涯中，文强干得有声有色，本来以为可以这样平静地过下去。可偏偏天有不测风云，四年后，文强在《建设日记》上写了一

篇文章,指责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对日本兵舰来长沙示威、侮辱市民不加抗议,反而派人员携带厚礼慰问献媚,是有损国格和省格,这种无耻行径使三千万湖南人蒙羞。

何键大发雷霆,派特务查封报纸,要抓文浮生到案法办(文浮生是他在长沙的化名)。又一次到了生死关头,这一次,彻底转变了文强。当时他的处境很难,想脱离险境,远走高飞,是不太容易的,万般无奈,1934年,经廖宗泽(也脱离了共产党,加入了军统)介绍,又有程潜、张治中的帮助,他再次加入国民党,并在军统任职。

后来作为战犯关押时,文强说他之所以加入军统,一来脱离共产党已经五六年了,二来廖宗泽实际上是戴笠让他来找文强的,再说还有程潜等人的帮助,文强觉得自己对共产党没有什么负疚,将来在国民党里也没有多大危险。

在任军统特务期间,文强主要是训练特务和从事策反工作。他曾在策反日伪军工作中成绩卓著。然而,在他管辖的北方区也搜集共产党的情报,有一个处就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他有意与共产党保持一点距离,避开直接对抗,便让副手去分管,但这脱离不了国共两党的敌对关系,陷入泥潭要洗掉身上的污秽是不可能的。后来在淮海战役中,文强率领部队找出路时走投无路被俘虏。

◆文强与林彪

文强与林彪是黄埔军校的同学。刚进黄埔时,两人同在一个入伍生连队里,后来经过甄别考试,林彪到步兵科,文强到了政治科。同学之间有友谊,也会有矛盾。而文强与林彪之间矛盾却远远多于友谊。这要归因于他们同在入伍生连队时发生的一件不愉快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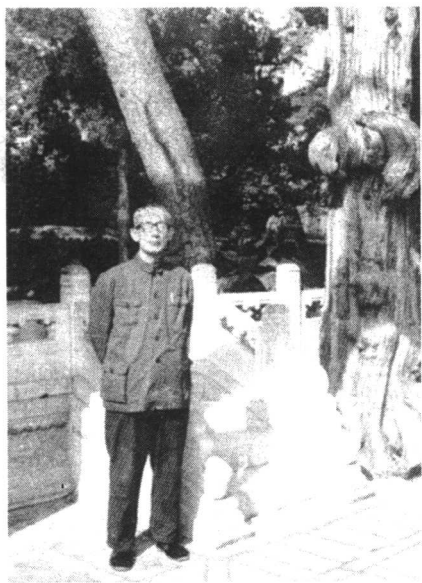
有一天,在课余时间,林彪搬弄手枪,谁知一不小心枪走了火,把二层床上的枕头打了一个洞。幸好上床睡的那位同学当时不在,否则,就被打死或打伤了。这在军校中是属于违纪的,上面发现要追查。别人都不吭声,只有文强劝林彪,应主动承认错误,在无法隐瞒

的情况下林彪承认了，第二天被关了禁闭。

自此以后，他们结下了冤仇，林彪总想找茬报复一下文强。有一次两人终于打起来了。按说这两人在少年时都是能打架的，林彪在村子里还是孩儿头，会打架，善于指挥别人。只因文强艺高一筹，林彪不是他的对手，最后还是失败了。这一架打完后，文强对林彪说：以后别想在这方面报复我。此后，两人再也没有争斗，也很少见面了。

后来，林彪当了元帅、国防部长、党的副主席，文强在监狱里成了战犯。文强初到北京，想过林彪可能会报复，后来想反正总是死，报复是死，不报复也会死。再后来，党的政策是不杀，林彪想报复也不一定能杀头，他也就不想它了。

2. 秦城岁月



文强特赦后在故宫留影

文强被俘后，是按重要罪犯对待，戴着脚镣和手铐由山东解往北京关押的。不久，在当时监狱负责人姚伦命令下，与杜聿明同时摘下刑具。狱中的文强表现积极，当上了学习组长，而且还是一个威信很高的好组长。

◆ 随遇而安

文强生性乐观，他有一个处世哲学，即在最困难最危险的境地，总能自己开脱自己，听天由命而不怨天尤人。这可能与他的经历有关。所以，在被俘后，文强的表现很平静。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信条不放，企图自杀，也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自暴自弃，毫不合作。而是采取了他自己的处世哲学，既来之，则安之，随遇而安。

文强明白，这次被俘，问题严重，他是军统高级特务，恐难活命，所以他曾拒绝写悔过书。但是，他毕竟曾经是共产党员，很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所以可能还有希望。于是，文强就采取了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顺其发展。

初到功德林时，他按他的处世哲学自我稳定烦乱的心情。他很少讲话，用眼睛看周围的一切。他观察管理员的动静，分析当官者的训话，对每一个细节，哪怕是怎样安排他们的铺位，如何发放生活用品，监规的内容等等，他都仔细分析，沉于思考。他不像有的人天不怕地不怕，“乱说乱动”；也不像有的人胆战心惊，整天愁眉不展。他通过分析后得出结论，共产党不会杀他们，也不会马上放他们，到底如何处置，还得观察。

可是，有一点文强是清楚的，像他这样的高级军统特务决不会在短期内就释放。于是，他作好了长期被监禁的思想准备。

文强遵守监规，认真交代问题。对于交代问题，他不隐瞒，觉得应该交代，不交代也会搞清楚，不如主动交代，迟交代不如早交代。但有一点，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自己的不推给别人，是别人不揽在自己身上。是错误就承认就改正，是罪行就清算。

在实际交罪过程中，文强总认为自己虽说很早就脱离了共产党，但总是在警惕自己不要做对共产党不利的事，自己的人生路毕竟是共产党引导走的第一步，人要感恩。所以在交代问题时，在抗日

战争中那些过关斩将的事说得详细，理直气壮，面对革命事业有害的事就简单交待，认为事情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所以就出现了自己的行为与政府的要求存在很大距离的现象。文强对自己问题的认识达不到要求，很自然就会被认为思想反动，立场顽固。但是，他自己也清楚，作为高级特务，没有实际改变从善的表现，是很难特赦的，所以他尽量争取，让管理所领导满意。

◆是个好组长

文强由于思想认识清楚，所以一直表现较好。这种表现是全面的，包括交罪认罪、劳动学习、遵守监规等，最重要的是能向不良倾向作斗争。由于他表现好，所以当上了组长。

文强的组长当得十分成功，他不像其他组长那样，遇到什么事就喜欢打小报告，而是采取说服劝解的方法，消除矛盾。

与文强同组的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保安司令部上将军司令王陵基，是个佛教徒。他总喜欢朝西拜神。有一次，他双眼紧闭，跪下拜起来了。正好对面是莫德宏，莫德宏感到莫名其妙，怒斥王陵基：“你这是干什么？我还没有死，你拜我干什么？是不是希望我早死？”

王陵基听到斥责声立即停了下来，睁开眼睛向上瞅瞅，站起来，慢条斯理地说：“你吼个啥子啊！我在做功课关你啥事。你别忘了，我是上将，你是中将，我给你拜啥子。”

莫德宏原为国民党四十八军中将军副军长、湘桂黔护路中将司令。他是广西桂系，不是蒋介石的嫡系，1949年被俘。由于长期患病，心绪不宁，谁要是惹着他是很难脱身的。莫德宏见王陵基毫无修正之意，便大吵大闹。

同房间的组长文强觉得僵持下去对内对外都不好，便想了个办法。他对莫德宏说：“他（王陵基）朝拜的时候，你就把背对着他，不就没事了。”莫德宏说那还是一个样，不过好一点。

文强见问题还没有解决，又想了个办法。他先征求王陵基的意

见：让他与莫德宏换个位置，靠墙睡，拜起来就是面对墙，爱怎么拜就怎么拜，王陵基认为是个好办法。莫德宏早就想跟王陵基换铺位，因为靠墙在门口有风，衣服也容易脏，当然喜出望外。

但是，换铺位的事，组长是无权决定的。他便向管理员刘福印报告，报告的理由自然不是朝拜的事，而是说他们两人习惯不同，想互相换一下，刘福印一口就答应了。文强很高兴地跟他们说上面已批准了。两人甚为满意，一个是可自行“面壁思过”，一个是“心安理得”，各得其所，皆大欢喜，一场因朝拜引起的不和就此结束。

◆分西红柿风波

文强这个组长既是学习组长，又是劳动组长。杜聿明特赦以后，缝纫组的组长就由他接替，文强除搞缝纫外也从事些农田劳动，主要是种菜种果树。这些以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将军们，现在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到了收获的时候，对自己劳动所得的果实人人都有一种喜悦的心情。这一年，战犯亲手栽种的西红柿获得丰收。为满足他们生吃的习惯，监狱当局也把部分西红柿交由他们自己处理。文强分配是公平的，因为他一视同仁，对个数和大小搭配都很注意。

正当各人拿各人的时候，坐在旁边的杨光钰轻轻地拉了一下文强的衣角，小声道：“那个高个子在你分的时候，用手指往他怀里多拨了一个，正好是我那一份里面的。”文强拍拍他的肩，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句：“知道了，我有办法。”

“大家请等一等，看看今天分的有什么问题没有？”文强一边说一边扫视着众人。“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几个人同时应声。

他还是坚持叫大家不要走开，然后一个一个地点名，每人把分得的都摆出来。一目了然。他对高个子说：“你怎么多一个？”高个子立即反驳：“是你分的嘛”！

“对，对，杨光钰那一份少了一个，他的脚残了不会自己下来藏

一个，西红柿也没有脚不会自己滚过来，就算西红柿是圆的能滚吧，多滚了一个到你这一堆，你就拿一个出来给杨光钰吧！”高个子听文强这么一说，无可奈何地给了杨光钰一个，边给边唠叨“你分的嘛！”这样一场矛盾解决在萌芽中。

◆ 监狱里也有“探长”

有一次，缝纫组在收工清点衣服时，发现少了几件棉背心。这是很奇怪的事，因为在监狱里偷去也没法穿。组长文强非常着急，丢了东西没法向上面交待。

这时，有人向他提出了怀疑。而且举报者说得有声有色，有把握，说是放在什么什么地方，但不能毫无根据的怀疑，尤其是这类涉及人格的事，一定要慎重。

文强又想了个办法，他让黄康永去“侦察”。黄康永是军统少将站长出身，“侦察”这点事儿是小菜一碟。他趁值日做清洁时，把每个人的铺位都“摸”了一遍，发现有个人的枕头特别，鼓鼓囊囊的，又高又实又软，定是他没错。

文强认为事关重大，无权搜查。如果要说是他拿了，他会跟大家拼命的。于是他报告了监管人员刘福印。刘福印按监规检查了那个人的枕头和被子，发现确实有问题，便叫他拆开，拿出了棉背心。刘福印的这种例行检查是为防止带进危禁物品到监房，那个人无话可说。

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评。但为了他的面子，没有像对其他的事那样采取开会的形式。也没有让组里批评他，而是进行个别帮助。

文强善于做这些工作。他跟他谈心时，从两个方面帮助他。一方面，说大家过去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不要做这些“出格”的事；另一方面，大家现在都在坐牢，吃的用的每人一样多，你多占一点别人就少一点，比如到你值日做卫生时洗碗用的碱就没了，大家也知道是你用纸包好放在枕头下面，这样别人就没有用的，应该“同甘苦”

嘛。

谈心是成功的，自此后没有发生类似事情了，组里同学也相安无事。文强毕竟是黄埔军校政治科的毕业生，做“政治工作”蛮有一套。

文强组长当得这么好，却没有被提前特赦，他认为前几批都没有他，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但这并没有影响他，该怎么做还怎么做，直到最后一批特赦，他一直当好这个组长。

3. 晚年生活



“我有一个让我很高兴的称号‘世纪老人’”

文强的晚年，十分幸福。妻贤子孝，身体硬朗。写诗寄情，著书表志。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四处奔走。

◆以诗寄情

文强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而且非常喜欢作诗，无论高兴，还是悲伤，他都喜欢作首诗来纪念一下。早在1925年，文强去广东投军时就写了一首浩气荡然的七律诗。其后四句为：

关山烽火数亡日，
铁马金戈扫荡年。
此去豪情搏牛斗，
但期无负祖生鞭。

1940年，当他的妻子周敦琬死于手术台上时，他曾作了十首绝句悼念她。其中第一首为：

才女为情革命花，
几多恩怨寄生涯。
人生朝露如萍逝，
蜀水湘波岁月遐。

在改造所时，有时心情郁闷，就写首小诗发泄一下；有时心情舒畅，也写首小诗抒发一下。有一年，他们亲手种的西红柿长势喜人，他就写了一首五律诗：

细雨一园幽，
青光映晓楼。
黄花连碧草，
绿叶系红球。
疑是红南桔？

恰如岭上秋。
佐餐人尽喜，
此物出番都。

文强特赦后，主要是为台湾回归和祖国和平统一做贡献。1978年中秋节，文强寄给台湾友人一首诗，以表达他盼望祖国和平统一的殷切之情。

谁道蓬莱岛有吟，海天原是一家亲。
乡心萦绕关山梦，故国常怀草木春。
隔海鹏程明月共，满江渔火友情真。
中山陵祭鲜花灿，茗奠先贤少故人。

文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1983年以前，他主要以通信、会谈、写作的方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83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无论是参政议政，还是出国访问，都大胆直言，献计献策，广交朋友，积极工作。1984年黄埔同学会成立后，他当选为学会理事，为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耄耋之年，还积极奔走，毫不懈怠。精神可贵，令人敬仰。

文强在1978年与张瑞馥女士结婚，张女士出生在天津的一个行伍之家，他的父亲是清朝的一个将军。两老相依为伴。文强在张女士55岁生日时，与之一起畅游颐和园的时候曾赠诗与她，诗曰：

颐和饶有四时春，柳暗花明可醉人。
爱侣人间多韵事，双星天上纪良辰。
呢喃紫燕翩跹舞，婉转黄鹂分外亲。
九曲长廊天地寿，昆明湖水绿如茵。

张瑞馥原是一名银行职员，经文强原来的部下介绍，两人结为伉俪。他们的子女都不在身边，生活起居，各方应酬，就只能靠自己了。两老身体健康，生活简朴有序，而且，张女士出身名门，谈吐自若，也是文强的好帮手。

文强对周恩来的感情很深，最使他念念不忘的是，在他脱离共产党后，周恩来也一直关心他和他的夫人。周恩来曾多次寄信给文强，让他回到共产党内，文强当时出于自己的考虑，拒绝了。每当文强想起周恩来的教诲，邓颖超的关心，心情就不能平静。他曾多次以诗抒怀，寄托哀思。

1977年，他以《悼念我师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为题写诗二首，其中之一：

风雨苍黄几度秋，无端萌蘖杞天忧。
十年诋诬今朝雪，举国讴歌互唱酬！
解冻好随春意转，更新喜有百花幽。
半生趋步追师训，永促环瀛向自由。

1992年，他以《悼邓颖超师母》为题也作了两首，其中之一：

六十年前识荆颜，羊城怒潮撼江山。
渝关再谒抗倭日，官邸亲聆记箴言。
一生教诲恩如海，两泪交盈愧又惭！
誓将晚节遵遗教，一统和平报国安。

◆拒收补偿金

1985年，蒋经国的学生蒋志云（国大代表）和丈夫刘建章（黄埔六期）邀文强去美国作客。后文强正好因公访美，他们就以蒋经国的

名义向文强提出：鉴于文强长期被关押改造，台湾可给他一笔补偿金和一幢房子，可住美国，也可去台湾。补偿金的数额从他被俘之日算起，以中将薪金为标准。那时中将月薪和特别费 1200 元，补贴 1400 元（银元）。这样算下来近百万美元。文强拒绝了。但对方还留下话，以后如果要也可以，只要有一人证明你被俘即可。

据文强自己说，他当时拒收这笔钱出于两点考虑。一是这钱不是好拿的，虽说蒋经国不会要他反共，但至少要有不利于共产党的言行，他不是这种人，他对共产党什么时候都是感恩的。二是，他在监狱花很长时间学过辩证法，如果拿到这些钱，他连一天的好觉都睡不安稳。他在大陆的亲戚、子女 30 多人，今天这个向他索，明天那个向他索，一直要完为止，肯定没好日子过。再说，钱给多了对子女没有好处。

文强有自己做人原则，他有四大主张：一是国共两党的是非要一笔勾销；二是永远消除内战；三是台湾经济目前比大陆好不要骄傲，大陆要赶上，要共同努力把祖国建设好；四是黄埔同学右肩要促统一，左肩要促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凡是有利于这四条的，他就做；不利的，他就不做。

◆ 著书立说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文强脑子里形成了有关邓小平理论的一套系统想法，他把它叫做“邓小平主义”，在耄耋之年有对此著书立说的打算。他谈了“邓小平主义”的几个基点，

即：大团结思想。不搞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转为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大统一思想。主要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理论与实践。大民主思想。不是“文革”那种大民主，而是创造一种实事求是，提倡讲真话，反对讲假话的政治局面。大转折思想。纠正有文化知识的人受压的偏向，提倡有知识有文化，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的思想。大法制思想。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彻底消除那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现象。最后,文强得出结论说,是邓小平使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处于不败之地,蒸蒸日上。

文强1985年访问美国时,在发表的讲演中谈了这五个基点,受到国外舆论好评。后来在中国政法大学讲演几个小时,受到该校师生的高度评价。文强雄心勃勃,但毕竟是九十多岁的人了,为了表达他的“邓小平理论”的想法,仍用诗的形式先告天下:

一

小平终古圣贤才,履纪长征博大怀。
一剑能当天下敌,两淮主战霸王摧。
从容扫荡西南域,粉碎企图半壁龟。
如此英雄操左券,一人千古大丰碑。

二

搏节旌扬卢布国,凯旋歌赞紫金都。
光荣访美轻盈事,载誉归来笑语稠。
两制棋将丘相国,一鞭舌战铁人休。
如斯大敌全无敌,遗泽芳声护国猷。

三

大任斯人出坎坷,法苏求学苦如何?!
三颠九折胸犹毅,百炼千锤志不磨。
正气浩然驱瘴疠,为公天下善人和。
全球共誉非常事,不世荣光化瑞珂。

四

大智大能大德明,十年浩劫好公评。
教条凡是都推倒,改革当然起共鸣。
是也非也一言定,白猫黑猫九鼎成。
酒余佳话千条少,囊口皆碑乐太平!

五

代代英贤不绝传，五千年史总延绵。
邓公伟大谁能匹，继代元龙更向前。
滚滚长江归大海，泱泱古国本同船。
兴悲荣莫齐挥泪，饮泣春风壮舜天！

这五首七绝曾发表于《黄埔》杂志，发表前在友人中传诵，都受到极高评价。

文强已有九十几岁高龄，体格几十年如一日，精瘦有力，谈吐轻松，思维敏捷，精力充沛。

文强的晚年过得很幸福。妻子贤慧，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孩子们对他也很孝顺。顺便介绍一下，他有五个儿子。老大文致中仍在湖南，次子文执中已病亡，三子文一中在安徽农村，五子文岩中在新疆，只有四子文贯中靠他自己的本事到美国一所大学当了教授。

如果把文强的一生分为两大段，前半生从3岁能背唐诗开始，到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是42年的如梦生涯；后半生50年“太平盛世”，其中26年当阶下之囚，24年是太平生活。

文强在谈到他的一生的时候，把它看成“坎坷曲折，历尽劫波，千死一生”。是的，像他这样曾经是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后来成了国民党的高级特务，经历两党的风风雨雨，在任何时候也不忘中国共产党恩情的人，目前如此高龄健在者依作者所知恐怕只此一人！

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

十三、被轻视的文官

1956年，毛泽东主席下令，集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进行加速改造。主管部门接到命令后，立即到全国各监狱、劳改单位中挑选。而被俘的战犯中，够这一条件的最多的是军长一级的将军。

行政官员和特务也容易挑选。唯有党官太少，只找到一位专门负责党务工作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境塘，后来只好降低标准，找出了两个省党部的代理书记长李帆群和李佩青。

文官由于没有打过仗，特别是国民党党务人员只会卖嘴皮子，因此很为当时军人所轻视。在秦城监狱也是受尽了冷潮热讽。

1. 职级最高的文官庞镜塘

庞镜塘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山东省党部的主任委员，负责山东党务工作，他是被俘虏的国民党党官中级别最高，资格最老的一个，被从山东济南解放军军官训练团挑选到北京战犯管理所。

◆ 职业政客

庞镜塘没有军衔，是一位职业政客。他不像其他国民党官员，是黄埔军校毕业后当官的，而是读了两个大学，一个是北京大学，一个是山西大学。毕业后进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搞编审工作，后来又到处色各样的政治部门当秘书、委员、专员、县长、处长，还当过教授，最后升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

庞境塘是在1948年的济南战役中被俘的。据说，他当初是听了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和副司令李仙洲的话，才没逃到台湾的，这两位将军曾拍着自己的胸膛向他保证过：“俺们有十几万装备精良的部队，还怕打不过只有步枪迫击炮的共产党军队？想当年日本军队装备比俺们好得多，还有飞机，俺们也熬过来没有当俘虏。你放心好了！”

结果这位书呆子和这些将军们一同成了高级战俘。说来好笑，他当时被查获，是因为长得太胖。10月9日那天，在济南临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他被解放军发现，解放军看他肥肥胖胖的，就知道是个大官，只盘问了几句，庞境塘就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庞镜塘1901年出生在一个旧官僚家庭，父亲当过满清的大官，家产丰厚，除上海、南京、济南有大公馆外，北京绒线胡同还有一所大院子。所以一直过着少爷生活。受家庭环境影响，他从小吃喝玩乐，诗书字画无一不精，而且从小就学着如何往上爬，如何统治别

人。当了党棍之后,更加剧了这种思想。他在济南解放被活捉后既没有像许多高级将领一样准备自杀,也没有敢隐瞒身份,而是处处小心翼翼,一般人对他的评语是“循规蹈矩”。

他长期从事国民党的党务工作。所谓党务就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先后在上海、武汉、北平、南昌、浙江、山东等地任职,每到一处就要捕杀一些工人、农民、学生和进步分子,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被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思想顽固,表示“不向共产党投降,不背叛国民党”。

庞镜塘是搞党务的,很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他判断像他这种地位的人,共产党要杀掉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被查获后态度自若,不想自杀,也没有怕死的表现。他也深知,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所以让交待问题时,他很迅速,明摆着的,他都交待了。

◆很少发脾气

庞镜塘平日和人接触总是先笑一笑之后才用不流利的北京话和人攀谈,很少看到他发脾气。他在改造所里,只有两次特别生气。一次是不知道是谁在他桌上写了几个字,他看了气得跳了起来,并且向管理所领导反映要查对笔迹,看是谁写的,非要处分这个人不可。原来在他桌上写的是这样几个字:“前有石敬瑭,现有庞镜塘,现镜塘想学前敬瑭,可惜学不像!”他一面大发雷霆,请求追查,一面伏在桌上流泪。

还有一次,不知道是谁,把他种的两盆山胡子和五色朝天辣椒淋上一大杯开水,等他发现这些东西蔫了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为此,他大发脾气,说干这种事的人太缺德,太可恨了。连监狱中这一点生命都不放过。

庞镜塘平日里交待问题的态度好,遵守规章制度好,身体不错,劳动也好,且从不在背地里发牢骚,于是便当了生活委员。

生活委员这个角色什么都管。从打扫卫生的扫帚、水桶到劳动

工具,都得负责清点、保存、使用、修理。最难办的是领发生活用品,牙膏、牙刷、毛巾、手纸、肥皂等等,有时碰上个把贪小便宜的多拿一份,如果查不出来就得把自己的一份垫上。所以每次领发时他宁可一人干也不要别人帮忙,这样错了时心里有数便于查找,免得出些不必要的麻烦。

生活值日也是件难办的事。他得负责检查楼道、厕所等公共场所的卫生。如果是负责的人值日还好办,要是碰上不负责的人可就麻烦了,有的经指出后马上改正,该补做的补做,该返工的返工;有的就不是,指出后不予理睬。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碰上这种情况,庞镜塘多半是自己动手,该出手时就出手,得饶人时且饶人,他从不为这些事向上汇报。

庞镜塘的生活委员干得很成功,既能负责,又以身作则,还不打小报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好评。

◆剃胡子事件

庞镜塘很有文采,是有名的笔杆子,而且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这点在改造所里大有用场。凡是要写个什么集体表决心、挑战书、应战书、总结、计划之类的事,他执笔起草的时候多,多数是一稿定音,很少修改。要是向中央表态的东西,那是非他起草不可,也多半是“一读”通过。

他有调解才能,脑子里的典故最多,可随手拈来。《资治通鉴》、《辞源》、《辞海》都能随口引用,记忆力也好。如果碰上文字方面的事,去找他没错,他可根据具体情况引经据典,让别人心服口服。

庞镜塘遇事灵活,这对他的改造也有很大帮助,拿剃胡子的事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是刚来功德林不久,功德林有五个胡子,这五个人是庞镜塘、张淦、刘嘉树、莫德宏和黄维。这五个人留胡子各有各的想法,庞镜塘说是为在台湾的妻子杨宝琳留的,当时她是台湾“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为怀念妻子留胡子谁也说不出什

么，暗地里却说是为蒋介石留的。

张淦、刘嘉树、莫德宏主要是个人爱好，而黄维则公开说他留的是“落难胡子”。这样一来，监狱管理部门当然不肯放过，一个是为了蒋介石，一个是对“落难”不满，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说是“忠于国民党”的表现，就要他们剃掉。庞镜塘、黄维没有不剃的理由，于是庞镜塘一看这势头，知道迟早也得剃掉，不如服从决定，还落个起了“带头”作用。马上答应首先剃他的，并说“早就想剃掉”。庞镜塘一表态，张淦、刘嘉树、莫德宏也就无可奈何，思想不通，也勉强剃了。只有黄维坚持不剃，一直留到他思想通了，自己提出剃掉，才最后一个剃了。

庞镜塘有三个儿子都在大陆，后妻带着两个女儿去了台湾。1960年第二批特赦时，适逢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安置地点原则上有关亲属的随亲属，没亲属的属于首要战犯者安排在全国政协，庞镜塘先拟安排在全国政协，后他要求与儿子同住。最后随三儿子去了沈阳，在省政协当文史专员。1965年病逝于沈阳，终年64岁。

2. 李帆群爱耍笔杆



战犯在图书馆读书看报(左二为李帆群)

在北京战犯改造所中,一提起李帆群,许多人都感到头痛。因为他的笔杆子也相当厉害,但这与庞镜塘不同,庞镜塘是专门化解矛盾,而他是专门制造矛盾。他要是抓住谁的小辫子,一准写出一张质问该同学的小字报贴在墙报上。

◆比庞镜塘更厉害的笔杆子

由于战犯中80%以上是要枪杆子出身的,你如和他们大吵大闹,甚至动拳挥脚,他们都会毫不示弱,但要起笔杆子来,除少数如宋希濂、徐远举、文强等“文武双全”的人之外,大都是一拿笔就不知所云。所以谁要在墙报上质问他一下,这比骂他几声“反革命”和“蒋介石的孝子贤孙”还不好受。吵一下,谁是谁非很难弄清,多一句少一句也吃不了大亏,但一旦上了墙报,看到的人便多了,甚至是全所都知道,不仅如此,墙报还得收回去,送到管理员那里去存档。这事关个人前途,谁都害怕。李帆群却专爱干这种事,所以,在改造所里,人缘就不太好。

李帆群下笔特别快,下笔仅一顿饭功夫,一篇质问某某某的墙报便能写好。这当然和他的出身与过去的职业有关系。他是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毕业的高材生,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大家知道,过去新疆由盛世才统治,杀人如麻,即使是中央派去的人,也都提心吊胆,一不小心便会人头落地。

盛世才被赶走后,国民党掌握新疆的军政大权,许多单位都没有人,得有人去填补,李帆群便自愿去了边陲,并被任命为《新疆日报》的主编。新疆解放前,国民党省党部几个头头,都走了。大头走得了,中小头头走不了的,便想过几天官瘾,自己封起官来,只要发一个电报,国民党中央便可照准。李帆群毕业中央政治学校,又是省报的负责人,便被封为代理新疆省党部书记长。可是好景不长,新疆很快和平解放,他也就成了阶下囚,被送进了劳动改造队。

◆时来运转,选调北京

1956年,毛泽东下令,集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进行加速改造,主管部门在执行这一项命令时,便从全国许多监狱

挑选。据说被俘的战犯中，够这一条件的最多的是军长一级的将军。行政官员和特务，也能凑出一批，唯独党官太少，只找出一位是专门负责党务工作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庞镜塘。于是只好降格要求，总算找出了两个省的代理书记长，一个是河南的李佩清，一个就是这位李帆群。

李帆群挥汗流泪劳改了几年，居然又时来运转。1956年，他从新疆劳改队选调到了北京战犯管理所，这一下比他代理省党部书记长更加走运，引起了上下的劳改人员的羡慕。因为集中到北京来加速改造，这等于提了好多级别。

谁都知道，集中到北京来的，武官是军长一级，文官是省主席一级，特务是将官级，他一个省党部代理书记长也被挑选上了，不但引起许多人的羡慕，更引起不少人的嫉妒，甚至有人发牢骚，说共产党人太不了解情况了，把国民党党部的书记长也误为像共产党书记一样，是掌握大权的主要负责人，才把李帆群当作重要人物而挑选到北京了。

◆ 柿子要找软的“吃”

李帆群也不是什么样的人批，是专挑那些能武不能文的来批一下，这是他从几次教训后得出的经验。有一次，因为惹了宋希濂而搞得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宋希濂以前是新疆警备司令，是李帆群这些小人物想巴结都巴结不上的。现在既成了“同学”，就都一样了，可以过过瘾，斗斗大人物。

有一次，不知为一件什么事，他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时，便写了一张质问宋希濂的小字墙报，宋希濂是湖南骡子脾气，谁要惹了他，他一定要进行还击，决不妥协。李帆群的一张小字报，引来了宋的三张反质问，最后他只好认错，并向宋表示没弄清楚的情况下乱提意见，作了检讨才收场。有了这回教训，他懂得了一句老话：“黑夜摸柿子，要拣软的吃（欺）！”

3. 李佩青爱充进步

李佩青比李帆群还走运，他在国民党政府中，最高的职务是当过一届小县县长，河南快解放时，当了几天省党部代理书记长。也不知为什么把他从劳改农场集中到北京，和过去他只能从报纸上看到的这些国民党大官在一起，他立刻觉得自己是大人物了，总想在人们面前显示一番，充充进步。

◆李佩青充进步过了头

李佩青学识浅薄，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却有一手绝招，敢于暴露思想。吃到肉想吃鱼，吃到鱼又想吃鸡，领到新棉衣还希望能发一件新大衣等等所谓见不得人的丑恶思想，每次不论学什么，谈什么，他都能大讲一番，半天学习时间都能让他一个人占去。

李佩青不仅在座谈会上显示自己，在劳动上，他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集中的这些战犯们，多数年老体衰，身患各种疾病，这些人在旧社会长期过着被人服侍的生活，根本不会干活，有些甚至连一桶水都提不动。而李佩青天生大力气，这样，他就有表现自己的机会了，除了争取劳动外，还自动请求负责背杨光钰的工作。

杨光钰是黄埔一期生，但多年征战中，最高也还只当了第三军中将副军长。1948年，在清风店战役中，他和军长罗历戎同被活捉，他认为作为军人应该“不成功便成仁”，被俘不久后，便寻机自杀，自己放火烧自己，结果把自己的两条腿烧成重伤，被看守发觉而将火扑灭。

双腿经包扎后他又暗中把药弄掉，用冷水去淋伤口，想感染成破伤风死去。由于两腿溃烂，医生为了抢救而将他两条小腿切去。在医护人员的照料下，他终于决定活下去。这位无脚将军在集中后，除

学习可以躺在床上外,其他活动都得由人背着。他怕给人添麻烦,不去看电影,李佩青就坚决要背他去,这样一来,李佩青便有争取进步的机会了。

由于表现得好,李佩青去秦城农场被选为劳动副队长,便立刻摆出一副“首长”架势,每天分工时,都是一副长官姿态,经常使许多人感到非常好笑。有一次实在使人受不了,有人跟他顶了起来,他便去向管理员哭诉。管理员一听,立刻指出他这种态度不对,不能这样对待犯人。他一听更伤心了,他便强辞夺理,说过去这些人对他都能拍桌大骂,今天严格一点他们都接受不了,这不是过份了吗?管理员们经过研究,决定把他这个副队长免掉,让他当队员。

李佩青眼睛近视非常厉害,管理所几次想给他配眼镜,他却一再拒绝,目的是想在这方面表现“进步思想”,宁可视力差点,也不乱花政府一分钱。

◆ 卖力不讨好

李佩青自被免掉了副队长后,便极力想争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在劳动中特别卖力,尤其是管理员在场时,他几乎一刻也不休息。别人休息他不休息,别人挑五六十斤,他非挑百斤以上不可。由于他平时人缘就不佳,许多人欺侮他近视,经常捉弄他。

有一次在挖树坑时,他正在一人深的坑内用力把土向上甩出来,两个寻他开心的战犯讲:“怎么?今天局长和处长都来看我们劳动了!”他一听这话,以为有人来参观,表现的机会来了,便两手挥动铁铲不停地甩土,他刚想停一下时,这两人又说一声:“怎么专朝我们这边走来?”李佩青听到此,连汗都不擦一下,干得更起劲了。结果干得面孔发白倒在坑内,人们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他抬了上来,他一听到管理员说快送他回去休息,又马上又跳回坑内,并说:“我要向解放军学习,轻伤不下火线。”

管理员讲:“要你们来参加体力劳动,不是把你们当成一个劳动

力来使用,一定要完成多少劳动定额,主要是希望通过体力劳动来改造你们过去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他还想表现,管理员只好说:“要你回去休息就得回去休息,不听从就是严重的错误行为!”李佩青马上爬上来,垂头丧气地回去了。因没能在领导面前好好表现自己,他又恼了好久。后来,当他得知局长根本就没来时,鼻子差点没气歪了。



十四、“杀身”未成的将领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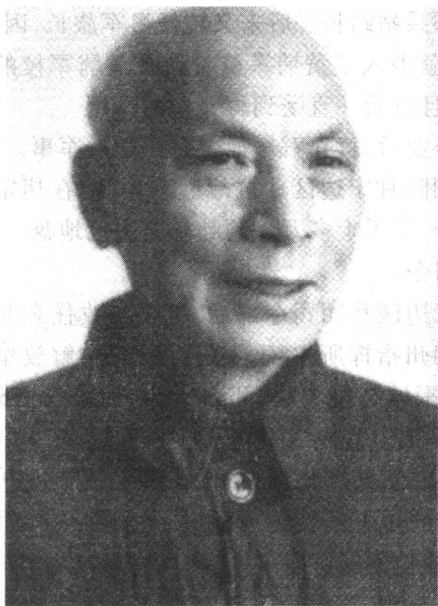
1963年，范汉杰(右)、廖耀湘(左)在政协礼堂餐厅就餐

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战场上被俘时，有一大半的人都闪过一个念头，“杀身成仁”。这些将领都曾向蒋介石发过誓，表示要“与城共存亡”，“不成功便成仁”。

然而，当真正打了败仗，失了城池，成了俘虏后，只有几个人信守诺言，有“杀身成仁”的举动，大多数没有这个勇气。

历史证明只要心向真理，不必“杀身成仁”。

1. 爱开玩笑的范汉杰



范汉杰

提起范汉杰，在国民党军队中和黄埔前几期的学生中，没有不知道他是一位足智多谋而且十分有趣的人。无论过去在国民党军队中，还是后来在解放军的俘虏营，他都没有改变自己幽默、诙谐、爱开玩笑的本性。

◆ 逆来顺受

范汉杰在国民党中央属于老资格了。在1918年至1920年间,就和蒋介石在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部同过事。当时蒋介石任高级参谋,参谋长邓铿留守汕头时,蒋介石曾代理过参谋长,范汉杰就在总司令部任军事委员和兵站站长。后来又转任粤军旅长,因部队被打垮,又赶上黄埔招生,就考入了黄埔军校。他在黄埔军校的一期学生中是十分出色的,而且以后一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

黄埔军校毕业后,蒋介石送他去德国学过军事。抗战期间,他与胡宗南一道包围陕甘宁边区。抗战胜利后,他在胡宗南部下的第一兵团任兵团司令,带了十多万人赶赴东北去抢地盘。以后,又改任冀热辽边区兵团司令。

撤消冀热辽边区兵团司令部后,范汉杰改任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辽沈战役中,解放军集中主要兵力攻打锦州,采取围城打援战法,死守塔山,使范汉杰外无援兵,最后十几万大军全军覆没。

锦州失守后,范汉杰化装向松山、塔山逃跑,中途被解放军查获。由于当时穿的是士兵衣服,解放军也没能识破范汉杰的身份,当作俘虏,一起解往佳木斯。范汉杰当时的心情也很复杂。一方面,十分庆幸自己没被发现,没准还可以有机会逃跑;另一方面,十几万大军损失在自己手上,即便溜出去又怎么向蒋介石交待,没准还是死路一条。他就在矛盾中过了一天又一天,走了一天又一天。由于他很长时间没有走这么远的路了,实在吃不消了,他就豁出去了,向解放军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以求能早日枪决,免除痛苦。

出他意外的是,报了真实身份后,马上就被送到解放军纵队司令部,受到了优待。1956年从佳木斯解送到北京战犯管理所“加速改造”。

范汉杰在战犯中是属于改造态度好的,当他知道自己不会被

杀,而且如果改造得好还有可能恢复自由后,他就又恢复常态,经常与人开玩笑。

集中北京后,他认为有重生可能,可能不致死于非命,把留的长胡子剪了,并保持写日记、看书的习惯,除床头几本新书如辩证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等,还托人买了高等代数、微积分来消磨时光。

范汉杰确信:“国家兴亡有数,人的成败有命”,所以在改造中听天由命,不先进,也不落后。范汉杰平日爱讲笑话,曾多次说过,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这些被俘将领,败军之将,释回国民党去,抬不起头,生不如死。在共产党专政下,如不被杀也有重生希望,届时可以告老归田,这也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还有一次,学习小组长要每个战犯填家庭情况表,他说自己眼睛有毛病,改日再填,组长说当天要交,不能拖延,范汉生说,那就请你代填一下吧!组长先问他的妻子姓名和儿女数目及名字,他却答道:“我的老婆么,刚好半打,儿女还不足新编制的一个班。”他的这话刚一出口,弄得全组哈哈大笑,组长大怒,便批评他,这种事也开玩笑,他却说:“这是习惯了的,你不填我自己来填就是了!”

◆假装写遗嘱

范汉杰不但喜欢开玩笑,还很喜欢捉弄人。有一次,他伏在桌上写东西,因他写字一向很小,写东西很吃力,他一面闭目养神,一面用手揉眼睛。这时小组长从外面进来,看到他两眼发红,忙问他有什么心事,为何如此伤感?范汉杰看房内没有其他人,便把抄好的东西翻过来放在桌子上,两手扞住头伏在写好的东西上,作痛哭状。

组长吓了一跳,一个劲地盘问他,想弄清原因,范汉杰头也不抬说:“这样下去,活不成了,所以先把遗嘱写好。”组长一听,忙跑到管理员那里去报告,管理员又急忙向管理所的领导报告,一会儿便有几个干部跑了过来。只见范汉杰还伏在桌上,管理所领导问他,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希望他说出来好帮他解决。范汉杰向来的几位干

部看了一下，便说了一声：“我眼睛有点发胀，休息一会就会好的，没有什么要请领导帮忙的事。”

那位组长一听，马上质问他：“你不是说活不成了，要立遗嘱吗？”范汉杰反而反问：“我好好的立什么遗嘱？”组长便把他覆在桌上的东西拿起来送给干部们看，弄得几位干部哭笑不得，原来他抄的正是当天《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由于当时房内没有他人，他和组长的谈话，也无人听到，所以谁也说不清楚，干部只好让他们不要吵了，说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并叮嘱不要在小组会上批评范汉杰，以免纠缠不清，而影响学习。

范汉杰改造态度好，不发牢骚，学习起来也很认真，所以特赦第一批的名单中便列有他的名字，后来由于原在国民党十九路军中一些高级将领，如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的反对，第一批便没有他。据说，当时将符合特赦标准的列出名单，由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逐个讨论，在讨论到范汉杰时，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们一致指出，范汉杰任十九路军的参谋处处长时，在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前，便和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郑介民有了勾结，早把十九路军的一切内部情况详细告诉了戴、郑等人，使部队无密可守。

特别更可恨的是，中央军对十九路军包围进攻的时候，范汉杰把参谋处所有的密电本全部派人送给了戴笠，以致部队联络通讯都成了严重问题。结果，福建人民政府存在了不到100天。因此对范汉杰恨到了极点。

范汉杰却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他一开始便反对，古人云：“凡事应谋定而后动”，而这些人却是“先动而后谋”，那有不失败之理？再加上十九路军的基本队伍只有六十、六十一、七十八三个师，一二八淞沪停战后扩充了两个师，实力不足5万人，事变发生后，把5个师的番号改成五个军，人数还是一样。他们买来6架飞机，事变发生前，连飞机上的机关枪都没有装上去，只能当运输机用，中央军和地方军却有十多人，几乎多两倍，怎么把打败仗的责任怪到他的头上呢！实在是冤枉。

第二批特赦前,说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先向几位反对特赦他的人做了一番说服工作,讲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的失败原因很多,不要太过分责怪范汉杰。这样,在第二次提出名单进行讨论时,才勉强通过了。

◆ 骨灰存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1962年2月,第二批特赦的范汉杰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工资每月100元。他任专员后,分配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工作,负责审阅东征、北伐、抗日等方面稿件。1962-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范汉杰审核稿件数十万字,自撰亲历资料则有数万字。范的写作很慎重,当时虽已年老,尚能尽到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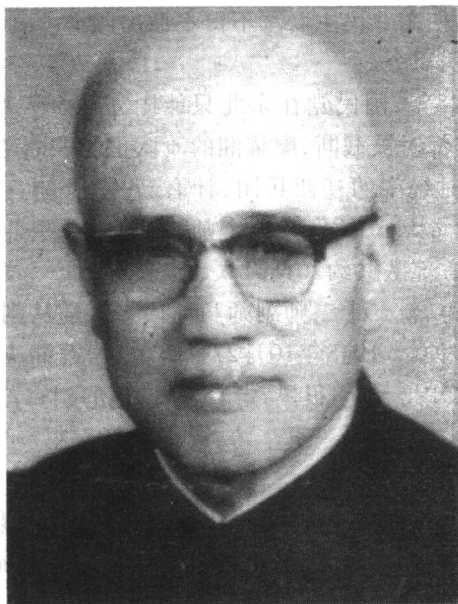
“文化大革命”期间,范汉杰只受冲击并未遭殴打,亦属幸运了。1966年8月27日,政协宣布文史专员停止办公,一律回家待命。8月30日黄昏,北京第四中学红卫兵光临各家,在和平街宿舍中只打了康泽一人,其余各家没有殴打。在范家中抄查一番,搞得满屋狼藉,痛骂一顿后,便勒令各人写一份悔过书,限3日内送达西城四中红卫兵总部,如有逾期即严惩等语。范汉杰遵红卫兵之命办妥后,抄家这一关就过去了。范汉杰当时已被委为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冬,范汉杰了解“文革”斗争目标,主要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自己乃国民党残渣余孽,不过是陪衬而已,于是放下心来。

1969年“文革”高峰已过,红卫兵纷纷下乡向农民学习,机关干部大都到各省干校去劳动改造。政协的干校设在湖北沙洋,机关派有军代表接管。文史专员大都年纪老迈,在机关留守,从1969年至1972年每周在机关学习文件、时事三次,其余时间参加机关劳动,主要任务是打扫政协机关大院的卫生,管理机关树木、果木,搬运干校物品,接待外调人员的访问,写证明材料等。范汉杰年纪最大,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每天只让他扫扫地。

1976年1月17日,范汉杰病逝于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当时“文

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但全国政协已次第恢复了工作。政协为他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主持,参加追悼会的干部达百余人。特赦战犯的骨灰能进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实属难得。遗憾的是范汉杰的子孙众多,多学有所成,但俱在海外及台湾,临终后,无一人回国送终。在追悼大会时只有一个同父异母的胞妹送终,在会上有人感叹地说:“满门多学士,全家无孝子”。

2. 自命不凡的廖耀湘



廖耀湘

廖耀湘,1903年生于湖南邵阳,是中央军校第七期毕业生,后升任第九兵团司令,升到这一步确属不易。但此人非常不谦虚,甚至很骄傲,自命不凡。他认为,自古湖南宝庆出了两个杰出人物,一个是蔡锷,一个就是他廖耀湘。

◆失败后，准备自杀

廖耀湘早年任新六军军长时，曾在东北风光一时。1945年冬，他率领新式装备的新六军攻打盘山、台安、辽中，在1946年3月，就打通了沈阳、鞍山与沈阳到营口的交通线，特别是在四平街一战，他的部队攻下八棵樹，使东北民主联军不得不撤出四平。由于这些战功，他晋升为第九兵团司令。

但到了1948年，国民党在东北只能固守几个大城市，被分割包围，铁路交通等都时被截断，廖耀湘的军队也是四面楚歌。

廖耀湘当时统率的辽西兵团，计有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四十九军等5个军，共12个师，再加上一些杂牌部队和直属重炮单位及地方部队共约20余万人，但几天便全军覆没。身边只有新六军军长李涛、新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与一随从副官带一个特务连跟着他东逃西窜。1948年10月27日晚上，廖耀湘决定向南方解放军较少的地方突围。夜间很黑，走着走着，他的副官首先跑了。卫队人数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李涛、周璞和新六军一个高参，还一直跟着他。

一路上饥寒交迫，提心吊胆，可谓吃尽了苦头。廖耀湘当时抱着一个希望，就是赶到沈阳追上杜聿明的部队，就会有希望，这样他夜行晓藏，艰难地前进。

后来花重金买下了老百姓的旧衣服，化装前进，白天也敢走了，等到走到辽河边正在等渡船时，听说沈阳已解放了，这使他彻底绝望了。他想到自己统率的庞大的精锐部队，只几天功夫，便全军覆没，自己堂堂一个兵团司令，仓皇出逃，担心被解放军撞上，现在也不敢去见蒋介石了，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知道去了也没有好结果，死在自己人手里更惨，便决心自杀了事，但手中连用来自杀的手枪都没有。他坐在路边一棵大树下，不由抱头痛哭起来，准备等到天黑就在那棵树上自缢算了。

周璞看出廖耀湘的心事，一再苦劝，要他绕道奔葫芦岛，可以赶上撤退的部队，能逃出解放区总是比较安全，他只好慢慢往前走。由于身上没有通行证和路条等东西，不敢走大路，结果在一条小路上还是遇到一小队巡逻的解放军，一盘查，他便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但求速死，并说周璞是勤务兵。巡逻的解放军当时就把周璞放走，因为找到了这样大的官，巡逻的解放军干部太高兴了，对周璞已没有兴趣再去盘查了。

廖耀湘立刻被送到一个高级指挥部，并受到了很好的待遇，连日来东躲西藏，寒冷饥饿的生活暂时结束了，他想不管将来怎么处理，现在总可以舒服一下。后来他被送到了佳木斯一处高级战俘收容所，那里不是监狱而是一处民房，同在一起的有范汉杰、李仙洲，和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等十多个人。

◆ 狱中逸事

收容所里管理很严，连夜晚起来大小便都先喊“报告”，再说明要解大便，还是解小便，得到哨兵之后才能起床。廖耀湘有前列腺炎，小便不易解出来，有时站在便桶边很久都解不出。他还有一个怪习惯，有人时便解不出大小便。他认为这是最大的苦事，特别是在佳木斯长的冬天，室外常常摄氏零下30度左右，不能出去上厕所。白天还好一点，夜间起来，哨兵便死死盯住，久久解不出小便还得挨批评，说他故意找麻烦，没有小便说有小便，真是苦不堪言。直到转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时，上厕所没有人站在窗口盯着，他对此非常高兴。

范汉杰想与哨兵开玩笑，他常常在要小便或大便时，把四个字连在一起喊：“报告小便”或“报告大便”，有的战士不注意，就算了。有的一琢磨，觉得是故意在捣乱，便问他：“你是向谁报告？”“当然是向你报告！”“我是小便、大便吗？”这样便会吵起来，范汉杰并不肯认错，所以后来管理所规定只准先喊“报告”两个字，等答应后再说什么事。

廖耀湘很爱看书读报，在佳木斯，能看的東西只限于管理人员发给的文件和报纸。收容所里还规定，白天没有病的，只能坐在大炕上看书，有病的要经过医生允许后，方能在白天睡觉。而廖耀湘一口气把报纸看完，然后常常把报纸往脸上一盖，就睡着了。因为这事，看守曾多次批评过他。后来又规定，经过管理干部同意，白天才能躺在炕上看书。在北京战犯管理所时，条件有很大改观，书和报纸比较多，还可以请求购买自己喜欢阅读的东西，他买了一些法文书，有时一看便是一两小时，许多人都取笑他是“一本正经”。

廖耀湘在管理所里，表现算是一般，不是太积极，也不是太落后，1961年第三批获特赦。1964年当了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在北京病故。

3. 鼻歪心正的张严佛

见过张严佛的人,就不容易忘记他,因为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鼻子歪。张严佛,又名张毅夫,年轻时曾得过一种怪病,病好后,鼻子就歪在一边,虽经多方治疗,鼻子却再也没有正过来。接触过他的人都说,他鼻歪心不歪,对人非常诚恳,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

◆军统特务,白忙一场

张严佛在被俘的军统特务中,地位最高、资格最老。其实在军统系统中,他的地位仅次于毛人凤,但资格比毛人凤老得多。张严佛是黄埔一期生,原属邓文仪特务系统的重要骨干,邓文仪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时,他任副科长,戴笠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后来,蒋介石免掉邓文仪科长职务,由戴笠接任。戴笠为了收买人心,对邓文仪的旧部委以重任,把张严佛调升到南京特务处担任书记长一职。

结果戴笠表面上一视同仁,暗地里别有用心。张严佛干工作十分困难,阻力重重,便请求调换工作,后来担任了川康区区长和西北区区长等外勤单位中的重要职务。1943年,又被调到军统局任副主任秘书,毛人凤任主任。其实,毛人凤只不过是戴笠的一个棋子。由于毛人凤不懂军统事务,才调张严佛这个军统前辈来辅助他。

张严佛在与戴笠共事中,戴笠发现此人忠实、可靠、能干、肯干,便渐渐地把他当作亲信。而张严佛在军统局担任副主任秘书期间,对毛人凤也做到尽力帮助,当时毛对外勤单位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张任过两次区长,所以许多事毛都先找他商量,才向戴笠建议或对外勤以戴的名义发出指示。

可是等到戴笠一死,毛当上了副局长,便大权一手抓,局长郑介民的兼职多,也不愿多过问军统局的事。而当抗战胜利,一些军统大

员都纷纷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搞五子登科(即接收房子、车子、金子、票子(美钞)及女子)时,毛人凤却任命他为军统重庆结束办事处处长,主持军统局的结束工作。

张严佛不但没有怨言,而且认真负责工作,为安置几千名裁汰的中小特务,费尽心思,虽然这样,后来还是和毛人凤发生了磨擦。

在1947年冬,毛人凤当上了保密局局长后,却给张严佛安排一个有名无实的设计委员会主任的闲职,张严佛非常失望,便脱离军统去湖南投奔程潜,在湖南省政府当了一个办公厅副主任。程潜与张严佛是同乡,对他很赏识。湖南起义,张严佛跟着起义了。但不久,毛人凤派特务将随同程潜起义的长沙省会警察局局长、军统特务刘人爵刺杀后,有人怀疑是张严佛干的,再加上有几个从香港去长沙搞秘密活动的军统分子去找张的时候,他没有揭发检举,最后便被抓了起来。

◆重提旧事,转押北京

张严佛被捕以后,开始在地方改造所里接受改造,可是后来忽然把他转到北京来,因为20年前他曾参与过谋杀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宣侠父。1937年,张严佛在西安任军统西北区区长时,军统曾秘密杀害了当时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宣侠父,并将其尸体丢在西安城内东南角城边下马陵一口深井里。不见了处长,八路军方面四处寻找。后来,办事处的人回想起宣侠父失踪那天,是接了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电话后走的,这样延安方面向重庆要人,后经蒋介石出面,才平息下去。

事隔20多年后,宣侠父的夫人要详细弄清她丈夫被杀害的经过,便亲自来到北京,叫人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查问几个军统大特务。有人讲当时张严佛是军统西北区区长,只有他清楚。很快,张便被移送到北京,成了战犯管理所的“同学”。

宣夫人在管理所里亲自询问张严佛,张严佛如实地将事情全部

经过说了出来。宣夫人临走时叮嘱张严佛把事情的经过照实写出来。事后，张严佛一直心神不宁，但他也顾不得什么，回去后迅速写了一份交待材料，送了上去。

此时，张严佛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他觉得这次肯定没命了，估计不久就会被枪决。在等待死亡的那段日子里，张严佛开始安排后事，让沈醉帮他照顾在湖南的家属。而在他万念俱灰，以为非死不可时，一切却很平静，管理所的领导没有再找过他，宣侠父的夫人也没有再找过他，这件事似乎已经过去。张严佛担心了一阵子，见没什么动静，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这一次，他相信党的宽大政策是真的。

4. 名聪实不聪的胡临聪



胡临聪

胡临聪是国民党四十一军军长，淮海战役中被俘。许多人一听他的名字，马上想到“人如其名”，他一定相当聪明，可他自己却说：“我名聪实不聪，我要聪明，就不会落到今天这样了！”胡临聪自认为这一生做了不少蠢事，而他最后悔的是没能听老乡薛子正的话。

◆我名聪实不聪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胡临聪任川军孙震率领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参谋长，不久又兼任五绥靖区司令部参谋长。全面内战爆发前夕，由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和在伏牛山、桐柏山等地区活动的共产党的武装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包围。军事调处执行部为调停国共两军的冲突，派来了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共产党的代表薛子正，是四川人，与胡临聪是同乡。

薛子正一到老河口，就去找胡临聪，与他谈乡谊。胡临聪并不愿认这位同乡，并处处设置障碍。薛子正多次向胡临聪谈到，国共合作，合作建国。胡临聪最后悔的就是他当时对这些话完全听不进去，并一个劲地讽刺薛子正，说：“你们拿出西北高原的黄土，只能种出小米，种不出机器钢铁。”

薛子正也不介意，只笑了一声，便很耐心地向他解释两党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听不进去。还有一次，薛子正说，共产党方面人才很多，胡临聪反问：“靠你们小学毕业，都可以招收过去的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生，能制造出火车、轮船、汽车等吗？”薛子正并不介意，总是耐心说服他，他却一点儿也听不进去。

被俘后，胡临聪常常感叹：我名聪实不聪，我要聪明点，能交上这样的老乡作朋友，我怎会走上最后这种绝路？特别是当他看到报纸上薛子正已当上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消息时，更是追悔莫及。

◆设想逃跑，当了俘虏

胡临聪是个非常耿直的人。淮海战役中，十六兵团撤退时，连兵团司令孙元良都化装逃跑了，他却一直坚守到最后。当黄维的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围困时，十六兵团奉命去策应突围，以徐州西南15

公里之孤山集作为第一攻击目标,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总算把孤山集和白虎山攻占下来了,胡临聪指挥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乘势占领孤山集东南之纱帽山。

为了占领纱帽山,他下令一二二师要不惜一切代价,务求攻占。除令军部直属野炮营,及临时拨归指挥之七十七军野炮营以强大炮火协同步兵作战外,他还亲临前线指挥,发射的炮弹近两千发,小小纱帽山已差不多夷成平地。占领了纱帽山后,他便命令一二四、一二二两师继续向南进攻,想攻下曹村车站。

解放军展开反攻,这两个师不但没有攻下曹村车站,而且连原来攻占的几个据点也被解放军夺了回去。

1948年11月29日下午,兵团司令孙元良到前线集合四十一、四十七两军的军师长开紧急会议,宣布:徐州“剿总”已奉命放弃徐州退守淮河南岸之线,所有各兵团即日经萧县、永城地区向淮河南岸撤退。十六兵团担任掩护大军主力撤退。在撤退途中,十六兵团损失了不少兵力。

1949年1月10日,第十六兵团和第十三兵团在萧县西南大小陈庄、赵家楼、偃山一带被解放军围歼,十六兵团全部被歼灭,当时两个兵团司令孙元良、李弥都化装潜逃。胡临聪和四十七军军长汪匣锋及副军长、参谋长等均被活捉。

后来每次谈到这一天被俘的时候,胡临聪总是默默无语,后悔自己没有能像何基沣、张克侠等战场起义,又怪自己不聪明,没有像孙元良、李弥一样临阵逃跑,结果当了俘虏。

◆学习组长当得好

胡临聪被俘后,一直表现很好,愿意合作,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这也许是由于他后悔当初没能听共产党员薛子正的劝告,现在弥补过来,胡临聪不久就当了学习组长。

胡临聪当学习组长与别人不一样,有的学习组长在学习中,总

是喜欢挖掘别人的坏思想,然后对他批评教育,来过过官瘾,有时还向管理所汇报,以邀功请奖。胡临聪不同,他从没存心整过谁。他在主持学习时,不要小组的人轮流担任记录,而是自己不怕辛苦,既主持会场,又作记录。别的小组大多是小组长当“主席”,记录是“同学”轮流或专人担任。这样万一反映问题发生纠纷,由记录负责,组长也可以清闲一点,好集中精力专门抓别人的小辫子。

其实,管理所的领导对谁老实,谁不老实,谁以揭别人的短来讨领导的欢心,是一清二楚的。在改造过程中,管理所主要就是改掉这些人的坏作风,所以像胡临聪这种老老实实的人就能获得第二批特赦。

5. 邱行湘以力服人

邱行湘是黄埔六期生，军衔少将，担任青年军整编二〇六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但在战犯管理所里，他当了学习组长，手下管一批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许多人讥笑邱行湘说，解放后他算是连升三级，官运亨通，比他在解放前神气得多了！

◆“邱老虎”守洛阳

提起“邱老虎”，恐怕不知道的人很少。“邱老虎”就是陈诚系的邱行湘，一听称谓，就知道他是一位能征善战的骁将。邱行湘很得蒋介石的赏识，1948年春天，蒋介石亲自决定把他从九十四军第五师师长调任青年军二〇六师师长，在南京接见他，并任命他为洛阳警备司令，当面向他训示：洛阳是兵家必争之地，且有易守难攻的好地形，务必尽全力以保住洛阳，才能稳定中原战场局势。邱行湘当场承诺：“除非天塌地陷，洛阳万无一失！”

正如蒋介石所说，洛阳乃兵家必争之地，解放军方面派了刘邓大军进攻洛阳，没多久，就把平汉铁路南段斩断，洛阳告急。驻在洛阳附近新安、陕州一带的裴昌会兵团向西撤走，洛阳成了一座孤城，仅仅靠一个整编的青年军二〇六师来防守，邱行湘没有把握守得住，只抱定“不成功、便成仁”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守一天算一天。

1948年3月初，解放军二野集结于洛阳以南襄禹地区，此时不但裴昌会兵团已撤走，孙元良兵团也龟缩到郑州不敢出来。万般无奈，邱行湘只得直接向蒋介石请援，恳求将第五师由北平空运洛阳。回电却是：“目前空运有困难。”他只好一狠心：“死而后已”！

3月9日，解放军二野主力部队越过临汝、登封直趋洛阳，开始攻

打洛阳。当天正午，二野一部便强渡伊河逼向龙门，据守龙门的保安团向宜阳西逃。另一路解放军又由宜阳至洛阳间渡过洛河北进，开展对洛阳东西两方的攻击。此时，邱行湘命令炮兵集中火力，以便斩断龙门至洛阳间解放军的进出通道，连当地的关云长人头墓都被毁掉了。

3月10日拂晓，解放军已猛攻至东车站，据守车站的一个工兵营全被歼灭。中午，西车站又被攻破，邱行湘把残部撤入城内。

11日全线展开激战，半夜，解放军有一部突入东门，占领瓮城，邱行湘除一再命令第一旅一定要把进入瓮城的解放军打出去，将这一突破口夺回来外，还亲自指挥步炮兵南北夹击，反复挣扎，结果均未能奏效。12日清晨，这一突破口越撕越大，战役进入巷战阶段。

13日中午，洛阳城内已混乱不堪，第一旅旅长赵云飞被活捉，第二旅旅长盛钟岳丢下部队，化了装，藏到老百姓家中。至此，守军已被全歼，邱行湘被困在西北城墙角一个指挥所内。他这时还利用身边的电台向蒋介石发出最后一个电报：“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坚守到底，以报党国。”

“邱老虎”果真信守自己的诺言，“与城共存亡”，一直坚持到被俘的那一时刻。

◆当学习组长，毁誉参半

邱行湘学习组长当得很神气，他那组的组员，既有战犯中惟一的上将，国民党被俘军政人员中地位最高的陆军上将、四川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王陵基；还有曾统率过近百万大军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名将、曾任过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以及在国民党中搞特务工作与军统头子戴笠齐名的康泽和中将军长陈林达、杨文瑒等。

要说他这个组长当得好呢，却有许多人对他有意见。要说他的组长当得不好呢，还有不少人对他很满意，评价很高。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应该是“毁誉参半”吧。还是采取先抑后扬的办法，先“毁”后

“誉”吧。

说起对邱行湘最不满意的，要数十二兵团司令黄维了。邱行湘做过黄维部下，知道黄维经常说要学文天祥，讲气节。他指着黄维大声质问：“你要学文天祥，你连自己的名字都可以不要嘛！你连自己的老祖宗都可以不要嘛！还谈得上坚持什么气节不气节！”

生怕别人听不懂，邱行湘解释说：“你记不记得？你在1938年春天，由六十七师师长晋升为十八军军长时，去南京见‘老头子’，他送你一张照片，写上‘培我将军存念，蒋中正’几个字之后，你大喜若狂，明明‘老头子’是把你父亲给你取的别号‘悟我’写成了‘培我’，你便认为这是‘老头子’很明白地告诉你，他要培养你，你便引以为荣，并且从那以后把你父亲给你取的名字不用而改用培我。你为了要想升官发财，连父亲取的名字都可以不要，而去用别人改的名字。你的气节在哪里？”这一番话，说得太刺激，气得黄维七窍生烟。

康泽也是一看到邱行湘就生气，因为他认为邱行湘有的事做得太过分，令他当众很难堪。据说有一次邱行湘把那个组的饭菜拿回去之后，因为太累，不想按照平日的作法将菜每人一份分好，而是要组员们自己去舀菜，康泽这人，当了战犯后，很小气，遇事斤斤计较，老想占点小便宜。

当听到邱行湘叫各人自己去舀菜时，便第一个拿着菜碗走到菜盆前，挑好的菜舀了一满碗。邱行湘一看就大发脾气，从康泽手中将那碗菜抢过去向菜盆一倒，接着叫大家把菜碗拿出来，由他一碗一碗地分。

康泽一下愣住了，不知所措，也想发一顿脾气。但是他看到邱行湘分菜时自己留得很少，最后又把自己很少的一点又分一些给他，把他弄得狼狈万分，觉得受到了污辱，以后从没有说过邱行湘好话。

杜聿明认为邱行湘为人正直，不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手法。在当时，这种作风是不太多的。许多老于世故的国民党大员们，大多是阴一面阳一面，遇事唯唯诺诺。而邱行湘却是斩钉截铁，一是一，二是二，杜聿明认为这是他可取的地方，至于他对人态度生

硬,是次要的问题,所以,杜聿明对邱行湘的评价很高。

◆无愧大力士

邱行湘不仅是学习组长,劳动也非常突出,还是挑菜饭组的组长。挑饭菜是个很麻烦的事,一担有百斤以上。邱行湘力大如牛,经常是前面挂两桶,后面挂一桶,有时甚至前后都是两桶。

到秦城农场进行农业劳动锻炼期间,更是邱行湘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他专门拣重活干,拣重担挑。在栽种葡萄时,要到附近水沟去挑水浇灌,他一个上午挑50多担不休息,而且看上去还很轻松。

有一次,收工回来,大家每人肩上扛着一把锄头,拖着疲乏的身子走向宿舍,在经过一座小桥时,发现中间桥墩歪了,有人跳一下就过去了,邱行湘却停住了,向跟在身后的喊:“下去把桥修好!”大家只好把裤脚卷起,走到桥下水沟中,他指挥十多人分站在中间那块大石板两边。

“用力抬起来!”他的话音刚落,十几双手便去把那一千多斤重的石板吃力地抬高了一点点,他毫不犹豫一个人钻在石板下面,用肩头顶着那歪了的桥墩,想一下把桥墩扶正,但他的气力全部使出来,桥墩还是一动都不动,而抬石板的人,却再也抬不动而慢慢一点一点往下沉。

正好有一辆吉普车经过,车上的司机和一位干部,马上把车停住,并奔到桥下,三个人一齐用力才把桥墩扶正。抬石板的十几双手早就坚持不住了,就在桥墩刚刚扶正时,“啪”的一声落了下来,那位干部惊叫了一声:“好险!”

回来后,大家都埋怨他“爱管闲事”。还有人说他这是“好大喜功”、“爱出风头”。管理员只说了一句:“以后遇到这种事,不能自作主张,这太冒险了!”

邱行湘在劳动中的确是大显身手,不断得到了科长、管理员和护士长的表扬,他也越干越有劲。1959年,邱行湘获第一批特赦。



十五、“军统三剑客”的狱中生活



军统少将总务处长沈醉

小说《红岩》是人们比较熟悉的,《红岩》是根据现实撰写的,里面的几个让人恨得咬牙切齿的大特务后来在战犯改造所里获得了新生。

书中徐鹏飞的原型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务区长徐远举,心狠手辣的沈养斋的原型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务局副局长周养浩,还有一个被称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严醉的原型,是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他们三人被称为军统三剑客。

1. 死于狱中的徐远举

说徐远举怙恶不悛，不过份；说他十恶不赦，不过分；说他死有余辜，也不过分。他在军统工作的18年，欠人民的血债罄竹难书。

◆军统特务

在战犯改造所里，关押着许多国民党的高级特务。这些人在过去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以各种残酷的手段，迫害了大量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论罪死有余辜。但是共产党以博大的胸怀，宽恕了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以惊人的毅力、极大的耐心，教育他们改恶从善。这些特务没有辜负共产党的期望，大都认清了方向，这些特务中主要是军统。

康泽、曾扩情、文强、沈蕴存、李犹龙、岳焯远、邢森洲、章微寒、徐远举、周养浩、沈醉、郭旭等都是军统特务。军统里有一个情况，就是军衔普遍偏低，军统的总头子戴笠、毛人凤都是中将，所以军统处长、主任、站长都是少将，不能超过戴笠，还有一位浙江站站长章微寒是上校，是首要战犯中惟一的一位上校。康泽、文强是中将，那不是特务军衔，而是军队军衔。

康泽是“十三太保”的成员，军统前身“复兴社”的创始人之一，老牌特务，但作为战犯关押时用的是他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的职务。文强的中将用的是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职务，还有一个兼职是军统北方区区长。而曾扩情用的则是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没有军衔，也未用军统职务。曾扩情也是“十三太保”的成员。

顺便介绍一下，“十三太保”。所谓“太保”，与“泰斗”的意思相近，指的是某一行当或某一系统、团体中资历最深，地位最高，或者是其中的骨干人物。“十三太保”指的是军统前身“复兴社”中的骨干

分子,有说十三人的,也有说十四、十五人的,习惯上说“十三”,就这样,把最初组织“复兴社”的人统叫“十三太保”。这些人有:贺衷寒、滕杰、郑介民、潘佑强、邓文仪、桂永清、刘健群、梁干乔、肖赞育、康泽、胡宗南、鄯悌、曾扩情、杜心如等人,康泽还当过“复兴社”的书记长。戴笠还排不上,他是后来者。

军统里说法很多,像军统“四杀星”、“三剑客”,不同时期指的人也不同,没有一定之规。由于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三人是同时期的人,徐远举是西南区区长,周养浩是副区长,沈醉是总务处长、行动处长、云南站站长,作为首要战犯关押的主要依据又是他们共同犯罪,还是同时被捕的,一起押在重庆,后来又一起转来北京,习惯上把他们叫做军统“三剑客”。

◆血手染红岩

徐远举1914年出生在湖北大冶一个商人家庭,1928年考取了中央军校武汉分校(黄埔七期),当时还不到15岁,并在同年加入国民党,完全可以叫做“少年党员”。两年半毕业以后,开始做些像助理员之类的基层政治、军务工作,1932年就参加了复兴社,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特务生涯,一干就是十八年,直到他1949年12月9日在云南昆明被捕,当过军统副站长、站长、行动处长、副区长、情报处长、区长,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徐远举这人骄横跋扈、不可一世,也不能说与此无关。

从事军统工作,每升迁一次,是要有实际功绩的,这功绩不是别的,而是用别人的鲜血凝聚的,主要是看你杀了多少革命志士和共产党人,杀的是谁。杀的人越多、越重要,升迁得越快,这些人的官位就是建立在屠杀、残害革命志士和共产党人的基础上的,用他们的尸体做台阶,用他们的鲜血铺路,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徐远举更不例外,他能这样平步青云地升上去,当然也是踩着更多的尸体,踏着更多的血迹爬上来的。用徐远举自己的话说:“我

血染红岩的罪行,是震惊中外,令人发指的。”被俘后,他的主要罪行归结为十大罪状。

第一大罪状,1946年初,他任第一战区调查室主任兼北方区副区长(区长是文强)时,与军统特务李肖白一起迫害共产党人和摧残破坏西安的民主运动。当时,《双十协定》才签订,蒋介石一面承认要释放政治犯,一面密令军统杀害共产党人。这是直接破坏双十协定,挑起内战的行为。徐远举和李肖白就是直接执行者。他们对西安劳动营关押的十八集团军干部进行了清理。结果,重要干部没有在其中,查出的400多人属下级人员,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放弃杀机。紧接着,同年8月,李公朴和闻一多在云南昆明被害,成都各界人士要在成都一影院开追悼大会,徐远举和重庆站长徐钟奇密谋破坏。

第二大罪状,查封《新华日报》,拘押中共代表团成员。其目的是想把中共代表团从重庆挤走,放手准备内战。查封了《新华日报》后,又拘捕了《新华日报》的编辑人员和工作人员。当时徐远举还监视周恩来,监视吴玉章,监视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的活动。这也是罪不可赦的。

第三大罪状,主持所谓“六一整肃”。第一大罪状主要是打击中共上层领导人,“六一整肃”是打击面上的革命进步力量,目的都只有一个:稳定局势,巩固后方。当时徐远举任西南长官公署情报处少将处长。所谓“六一整肃”,是1947年5月国民党中央颁布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命令各地准备名单,对爱国学生、进步人士进行搜捕。

在这场运动中,徐远举亲自召集重庆市党、政、军、警、宪、特联席会议,从这些单位汇总提出的500多名黑名单中,于6月1日在重庆各机关、学校、工厂、团体中逮捕了民主爱国分子300多人,将其中的40多人转押于渣滓洞看守所,后来在集体屠杀中被杀害了。这又是徐远举欠的40条人命,如果说一命抵一命,他得死40次。

第四大罪状,也是徐远举赖以飞黄腾达登峰造极的“事业”。即

以破坏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为开端，全面破坏四川各地中共地下组织和镇压革命武装。他不遗余力、挖空心思地穷追猛打，几乎把中共在四川的整个地下组织破坏了。他先后逮捕了中共地下党员陈伯达、任达哉，利用任达哉叛变，又逮捕了任的上级许建业。

随后，他先后向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刘国定、冉益智下手，这两人也未能经受住考验，结果江竹筠等也被捕。这次行动，前前后后共逮捕80多人。除此之外，还破坏、镇压了四川各地的游击武装力量，逮捕了三四百位领导人和游击队员，其中重要干部徐也速、张八妹等30人被关押在渣滓洞。上述这些人，除少数叛变外，大部分在1949年底被集体屠杀。

不但如此，徐远举对被逮捕的革命志士如许建业、江竹筠等人，刑讯逼供，手段极其残忍。集中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刑具看着就让人毛骨悚然。不但有手铐脚镣、电鞭、麻醉药品，还有老虎凳、水葫芦、踩杠子、吊杠子、竹签、烙铁等等，连测谎器之类的器材也具备。

就是这些“丰功伟绩”，使得徐远举又升官又发财，一举成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任侦防处处长，很是风光了一时。

第五大罪状，监视杨杰起义，逮捕杨杰和民革负责人。杨杰是云南警备司令，是龙云和卢汉起义的力举人，蒋介石非常仇恨他，千方百计要除掉，于是就令毛人凤处理。毛人凤特派徐远举为驻云南代表，徐远举带着一批特务和器材到达昆明，专门负责此事，准备逮捕杨杰将军和云南民革负责人陈复光教授。

徐远举先找到与杨杰住对门的沈醉，让沈醉负责监视杨杰，并立即派人执行，连抓到后坐徐远举来时的飞机押回重庆都作了安排。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当一帮特务闯进杨杰家里时，已人去屋空。原来杨杰已有警惕，就在徐远举到的当天乘飞机逃到香港。

徐远举气得暴跳如雷，大骂沈醉办事不力。但是，他毕竟是个“久经沙场”的老特务，在军统跌爬滚打了十几年，理清思路后，迅速弄清情况，采取措施，报告毛人凤，毛人凤当即作出决定，派人到香

港将杨杰暗杀了。逮捕陈复光就更轻而易举了。徐远举不断在他的“丰功”牌上积累革命者的骨骸。

第六大罪状，主持昆明“九九整肃”，大肆逮捕民主人士。这次活动更加嚣张，明目张胆地在昆明大肆逮捕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9月9日昆明全城戒严，通宵达旦，大肆逮捕，前后逮捕四百多人。直到和平起义后，才将逮捕者全部释放。

第七大罪状，谋杀杨虎城将军。这是由蒋介石决定，毛人凤策划，徐远举主持，周养浩执行的惨无人道的罪恶勾当。徐远举亲自行动组长熊祥，行动员王少山、杨进兴等七八人到合作所布置，决定用斧头、匕首杀害，杀死后焚尸灭迹。1949年9月6日晚，杨虎城及秘书宋绮云夫妇及杨的儿子、宋的儿子共6人被害于合作所松林坡。

第八大罪状，在四川解放前夕布置潜伏特务组织和策划、主持重庆大破坏，造成了社会的极端危害和空前的灾乱。

第九大罪状，主持重庆大屠杀。这更是震惊中外、骇人听闻的罪孽。重庆大屠杀有两次，一次是1949年10月底，徐远举奉毛人凤之命清理“积案”，按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授权处理的决定，将中共重庆市委一位姓刘的副书记，共产党员蒲华辅，《挺进报》编辑陈然，华蓥山革命武装负责人徐也速，以及江竹筠等42人在合作所杀害。第二次大屠杀制造了惨无人道的“一一·二七”大血案。11月27日徐远举派人将张八妹等160多人活活勒死，执行中因众人反抗四处奔跑，用机枪集体屠杀，连不到周岁的婴儿也不放过，一时血肉横飞，遍野尸体，最后用汽油焚尸灭迹。

第十大罪状，在国民党政权垂死挣扎时，张群授权于他，让他处理合作所的那些犯人，他毫不犹豫地一个不留全部杀掉。

徐远举身上可谓血债累累，这十大罪状，其中任何一条，都够判他死罪，而且死有余辜。在他的18年军统生涯中，为了高官厚禄，不择一切手段，简直可以说是丧心病狂，灭绝人性。他的身上，从头到脚，都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他自己不会不知，相信他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心灵的忏悔

徐远举自己十分清楚，他欠下的血债是无法偿还的，他欠人民欠得太多了，简直是浑身上下血迹斑斑。所以，在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时，他仍全力顽抗，他认为，即使不这样干下去，如果落到共产党手里，以前欠的血债也足以枪毙了。

所以在他被捕以后，一心想死。用他自己的话说，别人可以不死，特务不能不死；特务可以不死，他不能不死。在最初的审讯中，他处处抵触，事事怀疑，对自己的问题上推下卸。后来他变了，主动承担责任，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而且从思想上认清了方向。

徐远举作为战犯关押期间，对自己犯下的罪恶作过全面交代，他在《我的罪行实录》中写道：“我血手染红岩的罪行，是震惊中外，令人发指的。”“为蒋介石做了十八年的特务，竭尽忠智，为非作歹，以种种阴谋危害革命组织，摧残革命志士，用心之狠毒，罄竹难书。”“我沉痛地悔恨自己过去的罪恶，即使人民处以千刀万剐，也难慰革命烈士的英灵于万一。”

顽石点头，脱胎换骨，对徐远举而言，恰如其分。经过长期地、痛苦地、反复地自我斗争磨练，他逐渐地否定了自己，否定了过去。他写道：“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宽大政策，将我这个危害人民、作恶多端、怙恶不悛的大刽子手，从深渊中拯救出来，给以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政府的耐心教育之下，使我恢复了人性”，“分清的是非善恶，认识到谁恩谁仇。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感谢毛主席把我由鬼变成了人”。

徐远举知道政府对战犯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后，冷静地思考了自己的问题，想出了怎么办的计划。他认为在金钱、地位充斥头脑，以致丧心病狂时，犯下了十恶难赦的罪恶，要洗清自己的罪恶，走“改恶从善”的道路，就得付出努力，要有实际表现。可是，自己的罪恶太大，特务本来就难赦，自己比一般特务更难赦，别人做

一分努力可能达到“改恶从善”的标准，而自己需要做出百倍于他人的努力，才能得到政府的宽大。怎么办？

他很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很熟悉监狱的管理机能。他分析，共产党的监狱与国民党的监狱有本质的区别，共产党讲思想改造，一切为了转变人的思想，在做法上不搞刑讯逼供，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以改变立场改变世界观为根本；而国民党不讲这些，只求目的，不讲方法，只要达到政治目的，不惜任何手段。

经过一番分析后，他想出了改造思想的两个最好形式：一是开小组会，二是出墙报。开小组会可以揭露思想，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澄清思想，加强认识，加速改造。出墙报的功效与之差不多，而且墙报一目了然，增加透明度。所以他准备在这两方面大显身手，放下残害人民的“刀把子”，拿起改造思想的“笔杆子”，争做积极分子。

比如说出墙报吧。开始出墙报时，没有多少人写稿，为了完成任务，写出来的东西也是空洞无物，抄报纸，唱高调。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墙上出现了交锋，先是对别人提出批评、批判，被批评者提出反驳，这个交锋是不是由徐远举挑头的，不敢说，因为当时还有几个积极分子，像沈醉、邱行湘、董益三、梁培璜、宋瑞珂、李佩青、李帆群、王秉钺等人。但徐远举的笔头相当快，几分钟就可对某人某事写出一篇评论，边叙边议。这种评论往往是新八股：问题，分析，上纲上线，希望几部分。由于提出的问题有大有小，有政治上的，有生活上的，但一分析上纲，就是思想问题，也就是改造之“的”。

再说说学习会。徐远举可能是由于长期审讯人而得了“职业病”，他经常对别人的发言进行分析、评论，甚至冷笑。当别人按事先准备好的思路发言时，他有时突然打断别人的发言，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使别人没法讲下去。所以同学们对他很反感，说他总是抹杀别人的意见，总想以自己的意见压倒一切。

在学习会上，生活会上，在劳动中，甚至在闲谈时，徐远举经常与同学发生口角，发生争吵，跟大家的关系都很紧张。加上他本来就性格暴躁，容易冲动，大家都不愿理他。

在小组会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许多人对徐远举提出了同一条意见,就是指出他背有进步的包袱。这个说法很客气,也很有策略,首先肯定他是想进步,但提醒他不要背包袱,这是很容易接受的。为这事,他的上司文强(军统北方区区长,徐远举任副区长),私下曾劝过他多次。也许是与文强的劝告有关,也许是徐远举明白什么才是真的积极,或许是党的政策的感召和影响,徐远举改变了态度,他不再那样骄横,对人对事也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那种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言词少了,跟大家的关系日益改善,自己血压高的毛病也有缓解。

◆方言误会闹笑话

徐远举在重庆战犯管理所时闹了一次大笑话。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女干部去找他核实一些材料。他们谈话的时候,那位女干部曾表示和他谈完后,还要找另一人谈。徐远举便在她谈完之后,站在窗口高声喊了一句:“xx快点来,我已搞完了,你快点来搞吧!”那位女干部立即羞得满脸通红,桌子一拍:“徐远举!你乱喊什么?”

徐远举还不知道为了什么会使她那样生气,又补上一句,“我们搞完了,喊他来搞。”她更气得不得了,叫来管理所的负责人。负责人一询问,才向对方解释这是误会,因为他们习惯了把做什么、谈什么等称为“搞”,而有些地方的方言却把这个“搞”,指为男女之间的事,说明这是方言的误会。

那位女干部还是气呼呼的,管理所的负责人连忙举出了另一种因方言发生误会的事来证实徐远举不是故意来占她的便宜:有一次一位四川女干部在钉钉子,找不到什么东西好敲钉子,有个战犯使用讨好口吻对她说:“我去把锤子拿给你用。”那位女干部也气得大发雷霆,说他有意侮辱她。后来才弄明白,原来四川人把男性那家伙叫“锤子”,而把锤东西用的锤子叫“钉锤”。

一批又一批的特赦,徐远举都名落孙山,他自知罪孽深重,也不

大抱怨,但他那易怒的脾气却没有彻底改变,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他的思想情绪又开始波动,血压高的毛病经常犯,与同学的交往又焦躁不安起来。

徐远举最后一次犯病是致命的一次。那是1973年1月19日夜,病情突然发作,顷刻间不醒人事,手脚冰凉。当时监狱的医生立即抢救,用药降低血压,不见效。到21日的上午送北京复兴医院抢救,诊断是脑溢血,经抢救无效,22日死亡。连花甲都没过得去,只活了59岁。

当徐远举的死亡报告送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时,总理很不满意,立即批示公安部查清死亡原因。

战犯工作无小事。凡涉及战犯的事,周恩来总理总是事必躬亲,尤其是对那些首要战犯的情况更加关注。作为首要战犯的徐远举,不到60岁就死了,引起周恩来的极大警觉和关注。在“文革”中,由于精神上的折磨和物质生活的下降,患病的战犯日增,周恩来曾作过多次长篇批示,那都是对事不对人,而作亲笔批示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徐远举,一个是刘嘉树。

当周恩来的批示下达后,当时公安部的主要负责人迅速处理了这件事,责成有关部门通宵达旦地进行调查,调查的关键是19日夜发病后即不省人事,为什么到21日的上午才送北京复兴医院抢救,中间隔一天多的时间?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调查的结果工作上不存在什么问题。

开始,监狱按脑溢血进行抢救,监狱负责人怕路上车子颠簸出问题,想使徐远举病情稳定后再送复兴医院住院治疗,这种考虑不能说是过失。报告也是及时的,而且提出要立即住院治疗。但在当时办事多头批,报告层层送,这样多多少少延误了一些时间。加上与医院联系,路上的警卫等问题,一天多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根本原因是他自己。当天,因为缝衣质量问题他与缝纫组的同学发生争执,争吵完后他仍放不下,非常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接着,他洗了个冷水澡,用冷水浇头,结果发高烧,血压猛升。当时是北

京的一月，寒冷难当，窝着一肚子气的他去洗冷水澡，本来就患高血压心脏病，根本吃不消。

事隔18年，1991年3月，徐远举居住在台湾的女儿徐继红来大陆，要求开具一个证明，证实徐远举是在监狱关押期间病亡的，以便向台湾当局注销并申请抚恤金。她没有直接找到秦城监狱，而是找了文强。文强给公安部顾问姚伦写信，并转附徐继红的报告，要求尽快答应徐继红的要求。据说徐继红持证明顺利办妥注销和抚恤金事宜，感到很满意。

2. 赴美定居的周养浩

周养浩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在徐远举的领导下工作，也是一个心狠手辣、作恶多端、身上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大特务。在被关押后，一直表现不好，直到1975年特赦全部在押战犯时，他才借着春风跟着一起出来。

◆拼命为自己辩护

周养浩不同于其他国民党官员，他不是军校出身，而是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法律系。1932年毕业后，在公安局、警察局、军法会当法官；1939年加入军统也是当法官，长期从事审讯审判工作。后来跟着戴笠、毛人凤就变成了一个职业特务。

清理周养浩的罪行，也可以装一箩筐，如“大世界”惨案、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党案、“一一·二七”惨案、云南“九九整肃”、杀害杨虎城将军等震惊中外的事件，都有他的份。这些事件又与徐远举、沈醉搅在一起，他应当承当多少，这些帐应当怎么算，他的看法和算法总和政府的看法有距离，也与徐远举和沈醉不一样。

周养浩工于心计，加上他又是学法律出身的，就拼命为自己辩护，将自己由血债累累的罪人辩护为受冤枉的无辜受害者。而事实并非如此，他的罪恶是相当大的，政府不允许他狡辩。这样，周养浩背着沉重的包袱总也跳不出自己划定的圈圈，整天生活在苦闷、彷徨和孤寂之中，长期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往。

周养浩十分清楚，他犯下的滔天大罪是天地难容的。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他处心积虑，上推下卸。但他最担心的就是杀害杨虎城将军的事，因为这件事影响大，全过程他都参加了，自感脱逃不了罪责，他背包袱主要背在这件事上。刚开始交待这件事时，他总是敷衍

了事,不敢触及事件的本质和重要情节,后来,眼看共产党掌握的资料越来越多,纸里包不住火时,他干脆就说当特务是“社会环境所迫”,“我不杀杨虎城将军,别人也要杀他”,这就是他从旧法律观点得出的只有“公罪”,没有“私罪”的结论。

事情越来越明朗化,他心中的包袱也就越来越重,疙瘩也就越系越紧。徐远举已有过系统交代,万般无奈,他也不得不甩掉包袱,特别是对他说明这件事的决策人是蒋介石,策划人是毛人凤和徐远举,组织执行者是他的时候,他认为这样提较为公平,才准备和盘托出。

据周养浩自己交待,毛人凤之所以没有让徐远举去执行,而选择了他,无非是事情太重大,太机密,必须有一个十分可靠的人去承担,除了他没有别人。因为他与毛人凤不但是上下级关系,而且还是亲戚,利害攸关,完全一致。还有一层,就是周养浩与杨虎城的个人关系很好,只有他才能欺骗杨虎城,使谋杀保证百分之百地成功。而毛人凤知道,周养浩是不会出卖他的,会唯命是从。

1949年是国民党政权寿终正寝的一年,政治上已只剩下一个空壳,军事上一败涂地,主力基本被消灭。下半年,全国城乡已大部丧尽,只靠胡宗南、宋希濂的30多万人马收缩于西南,蒋介石已作好了退到台湾的一切准备。8月,蒋介石从台湾飞到重庆,重庆一片混乱。在处理国民党在大陆的“后事”时,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向他请示:是否把杨虎城解往台湾?蒋介石脸色铁青,恶狠狠地说:“留着 he 做什么,早就该杀了!”

毛人凤领了这道“圣旨”后,觉得非常棘手。要是在往日,杀个人他连眼都不眨一下。如今大势已去,杨虎城又关在贵州,事情又要做得人不知鬼不觉,使他大伤脑筋。

8月底的一天上午,他召集徐远举和周养浩商量。为了保密起见,决定将杨虎城押回重庆执行。至于执行者,毛人凤心中早已暗定了周养浩。

西安事变以后,杨虎城与夫人谢葆贞和儿子被迫去了欧洲。七

七事变后回国，一到上海就被军统监视，沈醉就是监视组的组长。后来以蒋介石要“召见”他为名，欺骗杨虎城上飞机，结果飞机没有往南京去，而在南昌着陆，杨虎城才知道是上当了。后来又转到湖南和贵州息烽郊外的玄天洞内，将其全家软禁，一蹲就是12年。

1949年3月，蒋介石“引退”，李宗仁登台，曾在报纸上披露要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但蒋介石不同意释放，命毛人凤秘密将杨转到贵阳黔灵山麒麟洞的前戴笠住宅。当时杨虎城气愤已极，声言“要死就死在这里，我不是小孩子，今天移这里明天移那里”，他知道蒋介石背信弃义，怀疑对其有不利举动，坚决拒绝转移。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杨虎城不得不同意转移，但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将宋绮云夫妇由白公馆迁来一同居住（宋是杨的秘书），二是要周养浩在贵阳陪住一个星期（意在作试探）。这两个条件都满足后，才秘密转移成功。

在贵阳，杨虎城向周养浩诉苦：杨夫人在生活极端困苦的条件下生下女儿杨振美，因营养不足，积郁成疾，精神失常。后又生一男孩不到百日夭亡，夫人刺激加剧，体弱多病，于1947年春含愤去世。前任两个队长李家杰和龚国彦百般刁难，尖酸刻薄，苦不堪言。

周养浩将杨的诉苦和了解到的有关情况，包括在非常困苦的情况下李家杰和龚国彦无论是对用于管押的“公款”，还是杨的“私费”，都要“揩油”的事情，都报告了毛人凤。毛人凤为缓解矛盾，又改派白公馆的看守所所长张鹤接任了龚国彦，并在伙食上略加改善。

有了这许多过节，杨虎城一定有戒心，经三人商量后，决定就说“老头子”要见他，为了他的安全起见，准备带他飞往台湾。要使他相信，非周养浩莫属。

8月底的一天上午，毛人凤又与徐远举、周养浩进行了周密的策划，毛对周说：“白公馆有行动员，你回去后找他们谈话，要做秘密案子除用枪外还有什么办法，但不要告诉他们是什么人。你同他们谈后告诉我，我和徐远举再召集他们商议决定，还要他们履行宣誓手续，以保秘密。”

周养浩当时住在磁器口中美合作所杨家山戴笠的住宅，他当即向白公馆的负责人陆景清打电话，让他把执行行动的人找到他家。当时去了三人：看守长杨进兴和另外两人。周养浩向他们重复了毛人凤的意思，杨进兴就说：“不用枪就只有用刀。”周养浩问：“用刀不是也要叫喊的吗？”杨答：“刀插进肚子里不拔出来就不能叫喊，连刺几刀就完事了。”同去的两人一听，连忙说他们没有经验。杨进兴见他们有畏怯之意，就说有个老手叫熊祥，他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的行动组长。周养浩立即表示：“好的！”并报告了毛人凤，毛人凤同意。让他先去贵阳，由毛和徐远举约杨进兴、熊祥商量。毛人凤甚至连行动经费、联系方法、交接地点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应采取的措施都一一作了交待。

一切准备就绪，毛人凤、徐远举和周养浩三个大特务分别行动。毛、徐亲自召见杨进兴、熊祥，要他们当面宣誓绝对保守秘密，完成屠杀任务。

9月1日，周养浩带副官郑文松去贵阳，对杨虎城说：“大概因战事逼近，总裁关怀老先生之安全问题，所以迎接回重庆召见后可能乘专机飞往台湾”。杨虎城相信了。

9月6日下午，周养浩率张鹤、郑文松及看守杨虎城的6名特务，将杨虎城及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振美和宋绮云夫妇及他们的儿子宋振中6人，由贵阳押解往重庆，在距重庆一百多公里的东溪，周养浩以天气尚早为由让杨虎城在此休息。按照原定计划自己与郑文松先行，大约7点在距重庆8公里处的海棠溪见到在那里等候的杨进兴。杨进兴出示毛人凤的手令：“养浩兄：某人等交由杨进兴同志率领回渝，兄可先行过江回家休息。以炎手上九月六日”。（以炎是毛人凤的化名）。周养浩见手令后回家，郑文松与杨进兴留在海棠溪的趸船上等候张鹤押解杨虎城一行。

深夜十一点半，杨进兴、张鹤押解杨虎城等6人到达屠杀地点——磁器口“中美合作所”松林波戴笠住宅右侧的小屋，熊祥、王少山等凶手紧随其后。杨虎城刚进屋，就被凶手用利刃插入胸膛，他

惨叫一声“啊唷！天啊！”又被凶手向要害处连刺数刀，倒在地上。与此同时，杨拯中在左边房间刚放下行李，被埋伏的凶手将利刃插入腰部，大叫一声“爸爸”，再也喊不出声，倒地气绝。

宋绮云夫妇及杨振美、宋振中四人被带到戴宅的警卫室，先以同样方法刺杀宋绮云夫妇，两个小孩见状狂声呼救，即被残杀。

6人尸体由张鹤带队员掘坑掩埋，从屠杀到掩埋前后一个半小时，一场秘密杀害杨虎城将军的罪恶行动，就这样结束了。事情结束后，郑文松打电话告诉周养浩：“事已完成”。

杨虎城的遗物由张鹤、郑文松查点封存，仅有美钞十余元，英镑二三十枚，坏金表一只，手表二只，玛瑙珠一串，金戒指一只，金挂牌一个，眼镜架等杂物。

事后，毛人凤向“有功”人员颁了奖。奖给周养浩、熊祥、杨进兴、王少山等银元各200元，张鹤150元，其他人员包括助手、司机等每人30至50元。

周养浩从旧法律观点看杀害杨虎城的整个过程，他认为主凶是毛人凤，他是参与人，只是执行命令。后来当管理员帮助他弄清他与毛人凤的关系及为什么要派他执行时，他才通了，是真通。他曾说过，杀杨虎城的这些过程只有他才能说清楚，因为他参加了三人商谈，是他去贵阳接的杨虎城，而且骗术高明，想象发挥，完全是自觉行为，从法律上看是犯罪的主观要件，无法推托，也否定了“我不杀杨虎城，别人也要杀他”的观点。杀死杨虎城等6人后的事他也清楚，一句话，全过程都清楚。这样，他心里的死疙瘩总算解开了，背上的包袱也总算卸了下来，再也不念“剪不断，理还乱”了。

◆自暴自弃

衡量战犯改造表现的好坏，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交代自己的罪行，即交罪；一个是认识自己的罪行，即认罪。至于学习、劳动等，都是与此有关的。

周养浩的长期评语总是交代了一些罪行，但反动立场比较顽固，改造表现较差，有时还具体到他遵守监规（规定、章程等）也差，劳动也不好。周养浩平时在学习上，话不多，到了非说不可时却总是说得很极端，如对党的肃反政策，他说是“打击报复，是不人道的一种手段。”对林彪事件，他说“林彪死，什么帽子都扣得上”。所以，他是经常遭到批评的，而他的顽固立场却没有改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破罐破摔，自暴自弃，我行我素，任凭他人评说，一切依然如故。

周养浩在狱中很少与人交往，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吟诵古诗词，以此来度过那漫长的难熬的日日月月。周养浩在不同的时期，选择不同内容的诗词吟诵，以表达他的感情。他在被捕后的二三年内，思想悲观，对前途失去信心，把主要的心思放在思念亲人上，不时流露空虚、迷惘的情感。他吟唱最多的是李太白的“将进酒”和李后主的调寄“相见欢”、“虞美人”等诗词。

周养浩背诗词不是整篇整篇的背诵，而是喜欢哪句背哪句，“将进酒”这篇长诗，多少次都是重复两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似乎这几句能恰当抒发他当时忧郁愁闷，不能自拔的心情，借吟此句，发泄出内心的叹息。周养浩是爱喝酒的，也许是当囚犯无酒可饮的缘故，所以他从不念后面那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

其实，这首诗除了悲愁外，还有乐观的一面，就是诗的中间部分，有名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周养浩不比李白，他不爱幻想，在他的心里，这一辈已经结束，不会有什么“还复来”，可能就是这种态度造成他自暴自弃，不求特赦。

周养浩一生杀人如麻，毁掉无数个家庭，他对自己的亲人却是十分眷恋的。尤其是在狱中，孤寂难奈，更是经常想起自己的妻子。每每一到这时，他便采取吟诗的办法寄托。他吟诵最多的是调寄“相见欢”和“虞美人”这两首。他诵“相见欢”时有两种情况，想念妻子时

诵整段：“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而在考虑像如何交代杀杨虎城将军的问题时，则脱口而出只念两句：“剪不断，理还乱”，有时重复又重复，就念这六个字。

周养浩唱“虞美人”时，唱法多，曲调无穷，而且只单独唱“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最后两句，这两句他从重庆唱到了北京，受到无数次的批判，到北京后他很少唱，在看了电影《祝福》后唱过一次。就被“同学”提出：为了使你更好地认识错误，找出对共产党怎么那么多“仇”的根源，你最好还是把全文念出来，以便大家帮助。

没办法，他只好念：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念到此不念了。有人问为什么不念完？他漫不经心地说“不就是那两句吗”。有人又说，“对了，你平常也唱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怀念老婆了！”“不错，我是想念我的内子。”他若无其事地答道。“什么内子？”七嘴八舌地又把原来要批判的主题叉开了。宋希濂说了一句“内子就是妻子嘛”。

有一位平常说话就尖酸刻薄的同学说“妻子就是妻子嘛，他就跟别人不一样，什么内子，我还以为是私生子哩。”坐在一旁的管理干部刘福印开口了：“不要把问题扯远了！”

刘福印听出那人想在人格上污辱周养浩，他明明知道内子是怎么回事，也知道周养浩有一个私生子，他是故意在挑逗，这是不允许的。但批判会是严肃的，他也不便直接批评这位同学，就插了那句话，制止事情继续发展下去。会场气氛顿时凝重起来。

批评会开过，对周养浩来说，跟没开一样，他不但继续吟诵古诗词，还唱起了有关的歌谣。有一首叫做“落花流水”的歌，他就经常唱，而且唱得有感情，歌词是这样的：“春来不久，要归去也，谁也不能留。别恨离愁，付水落花流水共悠悠。”据说他怀念母亲、怀念妻子时都唱。

周养浩因吟唱古诗之事,经常给自己带来麻烦。他唱《金陵怀古》时,被人批评为“怀念蒋介石”,他唱“苏武牧羊”时,又被人指为“思想顽固、不思悔改”。

◆峰回路转

周养浩前后结过两次婚,发妻在浙江老家,后妻在台湾,子女成群,六男六女正好一打。发妻生的两个女儿都在浙江工作,长子周子权当时是国防部二厅特务,后来去了台湾。他的真正爱妻是毛人凤的侄女毛超群,她携四男四女去了台湾,像他这样人口众多的家庭都能去台湾在当时很少见,这要得力于毛人凤的帮助。在他被特赦的前一年毛超群病逝于美国,他在监狱里痛苦不堪,为此事哀愁不尽。

1975年征求他释放后的去向时,他曾表示不愿回浙江,正好,有政策规定可以回台湾,他就整天一人独坐卧室,反复推敲“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几句话,通过多方观察,最后他看出共产党确有诚意,毅然报名,得到批准。没想到台湾阻挠,滞留香港。

滞留香港时,他言行谨慎,很少说话。与定居美国的四个女儿中最小的周华联系上了,而且周华主动地虔诚地向他表示愿意赡养他,其余三个女儿开始都没有表态。周养浩是个心事很重的人,他想得很多。为什么在台湾的儿子,在所有定居美国的女儿中,只有周华态度积极。她能办成吗?他想其他子女是怕连累还是养不起?或者是女婿不同意?他很灰心。但长留香港不是办法,去台湾不行,再回大陆不愿意,也只能选择去美国了。

周华后来给他办好了赴美的手续。至于去了后会怎样,他根本来不及考虑。在临走时,他特意向香港中旅社表示:去了美国如果无法生活,还要求返回大陆。中旅社负责人当即答复:来去自由,回来后照样欢迎,安排工作。

周养浩是抱着这种“去了再说”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到达美国的，去了后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的女儿、女婿、儿子和朋友热烈地欢迎了他，他的生活从此发生了转机。

周养浩到美国只想安度晚年，凡属涉及台湾的事一概不谈，谢绝记者访问，想方设法避免新闻界找到他。这样也可使家人得到安全，至少避免一些麻烦。事实上，原来在美国的三个女儿和在加拿大的儿子，对周养浩去美定居都不表态，只有小女儿敢作敢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台湾当局从中作梗。他们也怀疑过共产党是否真的让他们的父亲去美国，后来事实证明了他们的怀疑是多余的。所以，在周养浩兴奋的同时，他和他的子女们没有忘记共产党，周养浩当着众人的面，当着子女的面，饱含热泪地说：“我们真有这么一天家人团聚了。我们能有今天，首先感谢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政策。”并嘱咐他们：“我和你们一定要牢记这一点，这就叫作饮水思源，不能忘本！”他的子女们回答：“爸爸，你放心，我们早已明白了，我们会牢记在心的。这不仅是爸爸再生的大恩大德，也是我们儿女们的最大幸福，我们由衷地感谢，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来日方长，我们会感恩的”。

周养浩在美国的十几年，安定、幸福，1990年逝世，终年84岁。他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国家统一的事，他对段克文的行为表示不满。当段克文在美发表污蔑中国政府的言论时，他说这是“胡说八道”，认为段克文“不是东西”。

3. 深明大义的沈醉

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就所犯罪行而言,决不比徐远举、周养浩少,也是论罪当诛的大特务。他在军统生涯的18年中,杀人无数,曾一度被称为“煞星”、“亡命之徒”、“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等。但被俘后的沈醉,却比前二者明智得多,无论交代、认罪、学习、劳动,都表现得十分积极,用自己的努力,洗刷了自己罪恶的灵魂。

◆ 起义投诚

与前两人不同,沈醉是起义投诚过来的。沈醉参加起义,这中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沈醉是在卢汉起义的强大压力下起义的。保密局将沈醉放在云南站当站长,主要任务是监视卢汉的行动,必要时暗杀卢汉。这是蒋介石在1949年大势已去而准备坚守西南半壁时所布置的一着要棋。沈醉在云南的工作几乎每天都要向保密局长毛人凤汇报,他们间的“热线”一直通到台湾。

在云南暗杀杨杰将军的事没有得逞后,毛人凤很不满意,接着又派去亲信周养浩(西南特区副区长)、保密局本部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总务处少将处长成希超等加强对云南政局的控制。这样,徐远举、沈醉、周养浩之间的工作关系复杂化,军统三剑客互相提防着,为避免杀身之祸而提心吊胆。

在云南形势紧张时,卢汉准备起义,有一天沈醉突然接到要他立即去卢汉家中开会的通知。沈醉有预感凶多吉少,反复思量着到底去不去?去,可能回不来,不去,更危险。他最后决定去,但作好了两手准备,其实是作好了回不来的准备,把一切工作向副站长胥光辅作了交待,要他在他回不来的情况下准备应变。所谓应变,就是保

存实力,销毁档案,跑到驻云南的国军中去,如果能回来则更好。

果然不出他所料,他被卢汉的卫队扣留在卢汉家。同时被扣的还有从淮海战役逃跑后任第八军军长的李弥,驻云南的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等人。他们被扣后,非常紧张,以为卢汉要杀他们,后来卢汉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支持卢汉的起义行动,这几位才松了一口气。在强大压力下,别无选择,他们只好发表拥护起义的通电,沈醉当时向驻云南的所有军统特务发了手令:命令所有军统内外勤人员及一切公开和秘密单位的工作人员拥护卢汉起义,这就是后来将沈醉作为起义人员的依据。

但沈醉宣布拥护起义后,并未真心背叛国民党,他和余程万、李弥等人准备反扑。当蒋介石命令空军轰炸昆明市区时,李弥、余程万的军队也向昆明发起了进攻,沈醉的部下有一部分也在市内准备里应外合。失败后,沈醉又被当作为战犯关押了起来。

这期间还有一个插曲,就是沈醉宣布拥护起义后,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等大特务在同一天——12月10日被捕。据说,周养浩、郭旭是沈醉带人去逮捕的,当他们一同被关押在重庆时,周养浩要痛打沈醉,恐怕是为了这个原因吧。

这件事,沈醉被捕后没有正式提出,可能是他觉得自己罪孽太大,而且又是在卢汉的高压下起义的,起义后又想卷土重来,所以他自己也觉得说出来不是那么理直气壮。而且沈醉对部下的起义手令长期压于档案库里,没人提出来,所以这件事就鲜为人知,直到1956年中央“十人小组”制定关于起义投诚人员的规定,沈醉这件事才公布于众。

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时,为了区别起义投诚人员与特赦人员不同,体现党的不咎既往的政策,把当时在押的河南省政府主席兼一二七军中将军长赵子立、三十八军中将军长李振西等25人按起义投诚人员予以提前办理释放手续,并让他们以干部身份参加对这批特赦人员的接见。之后,像天津市市长杜建时(第三批特赦)、六十二军中将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林伟俦(第三批特赦)、五军中将军

长兼独立师五十师师长李以助,还有沈醉等一批人,凡属有起义投诚情节并有相应证明的,都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了。

沈醉是会审时度势的,他被俘后,从一开始就作出了大胆的决定:将过去的罪恶全部交代,争取一个好的前途。于是,他和别的职业特务不一样,把自己的全部问题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倒了个精光,而且还揭发别人的问题,不但有悔过的表现,还有立功的表现,就这一点而言,他是正确的。他深知共产党的政策,而且又决心与旧我告别,思想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在行动上,也就积极配合,主动改造。

在关押的特务中,沈醉是表现最好的,他没有抵触情绪,主动交待罪责,学习上也十分认真,希望能彻底清除自己的旧思想、旧观念,虽然身患眼疾、痔疮仍坚持写交待材料,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劳动中,沈醉也是一马当先,他在战犯中算是年轻力壮的,参加了缝纫组、理发班、挑饭菜组等,可以说是任劳任怨。在整个关押改造过程中除了想念他在香港的爱妻粟燕萍外,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用在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上。

沈醉能做到这些,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毅力的,一方面,他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过去,解剖自己,塑造新我;一方面,他要有持之以恒的态度。这种努力不是一天两天就行的。所以说,沈醉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艰苦的努力换得了光明的前途,他作为职业特务头子第一个被特赦了,光明前途是自己争取的。

◆安度晚年

“文革”中,沈醉与董益三一起又被关入秦城监狱,一呆又是5年,1972年,才被释放。这五年,沈醉不但没有抱怨,反而觉得心安理得,认为当时在监狱最安全,否则说不定哪天会被造反派打死(当时安排在政协的不少人都被打过,外地还有因受不了迫害而自杀的),所以他坐牢很有经验,能随遇而安,顺势而生,能吃能睡,一顿能吃

五六个包子或三四个窝窝头、馒头，倒在床上就睡，身体不但没有得新病，体重还增加了几斤。

在1975年会见特赦人员时他以统战对象身份参加，他的老同学新朋友开玩笑地说：你真发福了，红光满面，羡慕！沈醉当时十分硬朗，谈笑风生，不像是62岁的人。他还是那样健谈，谈起话来别人插不上嘴。后来，他跟工作人员说，他第二次进秦城监狱以后，工资一直停发，言下之意应该补发，但他没有直接提出，然而态度是认真的。此事有关人员向领导反映以后，立即写了个补发工资的请示报告，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批准同意，他和董益三都补发了一笔在当时数量很可观的工资。

沈醉晚年一直从事写作工作，写回忆录，回顾一生的经历，尤其是关于军统内幕和作为战犯被关押时的奇闻异事，经过整理，出版成书，为我国史学界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他于1996年因患肺癌在北京去世，终年83年。

4. 军统“三剑客”内讧

既是“三剑客”，就应当是英雄所见略同，行动步调统一，协调配合默契。当然，他们在被逮捕之前是这样，每次要“处理”谁，都是各司其职，可是作为战犯关押以后就不同了，沈醉与徐远举、周养浩闹过不少矛盾，沈醉与周养浩甚至长期不说话，像仇人一样。

◆ 祸起萧墙

1950年“三剑客”同时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宋希濂、王陵基、李犹龙、钟彬、廖宗泽、孙渡、王靖宇等也都在那里。这些“大人物”如今被关在同一间牢房内，以前各自的“老爷”脾气很难收敛，加上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自有不同的心情，发生一点小事，谁也不肯让谁，就这样磕磕碰碰，矛盾不断。那时，他们每个人都在考虑着同一个大问题，就是政府会不会杀他们。长期搞职业特务的几个人，尤其敏感，虽然表面上都客客气气，但心里却提防着，说话做事都特别小心谨慎，怕有人向政府打小报告。

比如，每人填写的“登记表”就互相保密，就是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他们互知底细，自己填写的表格也不让对方知道。至于写交待材料，更是小心翼翼，有时对同一个问题如何写，不免探听一下对方写的口径时，也是转弯抹角，听话听音，真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不管怎么说，表面上也算能基本和平共处。

有一次，却发生了一件大事。粗心的审讯人员把周养浩的一份供词让他签字时，中间夹着对他处理意见的草稿，处理意见写着建议判处死刑，还有沈醉的揭发词句，周养浩看后胆战心惊，以为必死无疑了。魂魄落定以后，想起了沈醉的揭发词，他怀疑是沈醉出卖了他，一定是沈醉的揭发置他于死地的，沈醉对他的所作所为，是一清

二楚的，想到这儿，他怒火冲天，顿起杀心。

周养浩走到监房，宋希濂、徐远举、沈醉都在，他看着沈醉，眼睛充满了血丝，嘴唇紧闭，咬牙切齿，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徐远举知道，周养浩在杀人前总是这个样。只见他拿起手边的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他几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边砸边骂。说时迟那时快，宋希濂伸臂一挡，凳子落地，周养浩正要来第二次时，凳子已被宋希濂踩得死死的。

宋希濂忙把周养浩拉到一边问是怎么回事？房间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谁也不吭声。这时，沈醉、徐远举已经明白了八九成。因为在周养浩被审讯人员叫出去之前，徐远举、沈醉都在自己的供词上签了名、按了手印。周养浩后来出去也肯定是干这个，他之所以回到房间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直奔沈醉，说明周养浩发现了自己有严重问题，而且与沈醉有关。

徐远举和沈醉都是特务出身，有这个经验，宋希濂直逼周养浩说出原因时，他们两个只是互相对视了一下，沈醉便低下头，擦自己的眼镜。此时无声胜有声，宋希濂虽是职业军人，但他也猜到沈醉可能做了对不起周养浩的事。等周养浩气消以后，沈醉开口了。他说，我是交待我的问题，有联系的人和事也得说清楚。我们的事，你不说，共产党也知道，我们这些人反正活不了，共产党不会饶恕我们，我杀人最多，杀人如麻，交代杀一个与交代杀一千是一样的，倒不如竹筒倒豆子，记得杀多少说多少，涉及谁就是谁。

沈醉这一说打不紧，在一旁的徐远举开腔了：我是个洋油筒脾气，各人说各人的最好，不能像有的人那样，如果出卖别人，对不起，我饶不了他！

这是在暗示，徐远举支持周养浩，警告沈醉。沈醉对徐远举的话，没有直接硬顶，也没有作任何解释和表白。他有所顾及，目前大家的脑袋都悬着呢，说掉就掉，万一他们二人联手，杀了自己，那死也算白死，所以他对徐远举态度很好，到北京功德林和秦城监狱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还过得去，而对周养浩，确切点说是周养浩对

他却一直是横眉冷对。

在长期的监狱生活中，他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可很少在一起交谈。有时周养浩谈到与沈醉有关的事的时候，他总是有意避开，像没有沈醉这个人似的。而沈醉，也像周养浩不存在似的，后来著书立说，写文章，内容涉及到很多人，就是不提周养浩。直到周养浩1975年10月去美国定居，1990年在美国去世，而沈醉1996年在北京逝世，两人还没有解开疙瘩。

◆引火烧身

由周养浩、沈醉的矛盾又引发出徐远举与宋希濂的隔阂。当时宋希濂挡住周养浩的板凳之后，徐远举除说了那句支持周养浩、警告沈醉的话后，还对宋希濂说了一句：多管闲事！

徐远举与宋希濂没有直接共过事，他比宋希濂小七八岁。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的，他是七期的（武汉分校），毕业后很快就加入了复兴社，一直搞特务工作，而宋希濂一直搞军事。

在徐远举看来，周养浩要把沈醉砸死了那才痛快，他最恨军统内部变节的人，他认为沈醉变节了，单凭他说的“竹筒倒豆子”就不能忍受。他判断：沈醉肯定把他们两个牵进去了，判周养浩死刑，肯定也会判他死刑。因为他们几个本来就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论罪他甚至比周养浩还要大。

周养浩实施破坏中共《挺进报》、破坏中共四川地下党、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制造重庆“一一·二七”血案、暗杀杨虎城将军等，都是受他直接指挥的，周养浩有一分罪，他应有两分，判周养浩一个死刑，应判他两个死刑。所以他痛恨沈醉，沈醉能讲这些事，他该打，打死打伤都行，打死活该，打伤给他一个教训。

宋希濂这个人本来就爱打抱不平，眼看要发生“血案”了，出于本能的反应，随手阻拦，完全是“条件反射”，根本没有帮谁、偏谁的意思。当他听到徐远举的责难时，没有当一回事，也没有跟徐争辩，

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一直到了功德林，他才意识到与徐结下了很深的怨。

当时对战犯的审理没有成形的政策，对民愤大的，就主张严惩，民愤小的，就暂不处理。于是，当时押在重庆的王陵基、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人，当地群众都主张杀掉，因为他们欠下了大笔血债，按照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感情原则，理所当然地要清算他们。所以，当时不仅是周养浩，对王陵基、徐远举、沈醉，都提出过处以死刑的意见，还有的提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这个意见报到公安部，公安部报告中央时，中央来了个“暂缓处理”的精神。这一暂缓就把这些人都留下了，就有了后来的“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政策，就有了从1959年开始的特赦，结果，到1975年，在押国民党战犯全部特赦。

当时的生死，只在共产党的一念之间。在这一特定时期，每个人都是敏感的，狐疑的，别人不经意的一个眼神，一个举动，都似乎在暗示着什么，气量小，疑心重的徐远举更是如此。他不但怀疑沈醉，也怀疑宋希濂，觉得宋希濂好像在政府面前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对宋希濂特别愤恨。

徐远举的逻辑是，宋希濂阻止周养浩打沈醉，至少是同情沈醉，同情就是同伙。徐远举还有一个逻辑，自从宋希濂向他们讲述了他与陈赓的会见，并让他不要有思想包袱，多看点书等话后，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徐远举一直在捉摸，认为陈赓向宋希濂打了“保票”，宋希濂肯定不会死，而宋希濂也知道沈醉出卖他们也可能留下一条命，这样就是同类惜同类，宋希濂同情沈醉。这又是多心，可是对职业特务的徐远举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判断。

◆明争暗斗

徐远举唯我独尊，对自己看不惯的事就吹胡子瞪眼睛，而且说起话来尖酸刻薄。对宋希濂有意见后，就处处找他的别扭。在重庆时，陈赓看望并宴请宋希濂，事后，宋希濂向他们叙说会见的情况时

非常兴奋，徐远举听了认为宋希濂客观上在“巴结”共产党，想以个人情谊解决自己的问题，因此讽刺挖苦不断。而且徐远举思维敏捷，讽刺宋希濂是“送终”将军，就是他的杰作。

宋希濂是一代抗日名将，哪里能容下这种侮辱！他认为徐远举处处捕风捉影，侮辱他的人格，他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奉陪到底，于是采取了软硬兼施、以软对硬、以柔克刚的办法。结果，徐远举每次挑起事端，每次以失败而告结束，徐远举本来就患高血压，经常弄得血压升高，宋希濂暗喜。而且，当徐远举快要发脾气时，宋希濂常再额外加一点“催化剂”。

有一次晒衣服，徐远举把别人晒的衣服挪开，把自己的搭上，正好被宋希濂看见了，他装作没看见从徐远举身旁走过。在一次生活会上，那位被挪开衣服的主人提出：我晒的衣服挪动了位置，我旁边晒的是徐远举的衣服，说明是他挪的，这样很不好。徐远举反唇相讥：你看见了？你有千里眼？

坐在一旁的宋希濂冒出了一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说话慢条斯理，目不视人，像一响闷雷轰在了徐远举的痛处。徐远举很敏感，他知道来者不善，那天从自己身边走过没有吭声，就是为了找机会报复，今天这个机会他当然不会放过。想到这里，他决定不跟他纠缠，于是把话题一转，对那位主人：你如果一定认为是我挪的，为什么当时不提出，退一万步讲，就是我挪的，又有什么了不起？下次你把我的挪开，就是了！

徐远举就是这样，无理也要争三分。在狱中，徐远举还经常吹嘘自己才思敏捷，过去审讯共产党人如何有办法。宋希濂听到后不放过，马上接道，“无非是一拍三诈，到头来血压升高手冰凉！”搞得徐远举哭笑不得。

◆宋希濂说,我愿跟徐远举握手言欢

徐远举与宋希濂、周养浩与沈醉之间的矛盾,也引起了改造所管理员的注意和重视,他们觉得这样“冷战”下去也不是办法,应通过某种方式作个了结。于是,采取生活会的方式来解决。

生活会能把每个人的“死问题”都揭发出来,也能掌握每个人的“活思想”,它成了改造战犯思想、世界观的重要途径。而且往往是所方人员不参加,而由他们自己去明辨是非,自己解决问题,一句话就是“自我革命”、“自我改造”。

生活会由他们自己组织,每次都有“主席”主持,有专人做记录,每人事先按会议前拟定的主题发言,别人提意见,主席总结,自己表态,最后把小组总结和个人签字的文字材料上交所方。如果一次会议能解决问题更好,一次解决不了的第二次,第二次还解决不了就第三次,直到解决为止,每次都按上述程序进行。

由沈醉当主席、徐远举当记录的一次生活会开得很有意思。徐远举最先发言,做记录的一般是第一个或最后一个发言,他是个急性子,不做记录也往往先讲。

他按准备好的材料,先检查了自己的消极悲观思想和抵触情绪。认为自己坐牢已经这么多年了,该交代的问题交代了,但政府还说不够。如果按广泛的联系面讲,当然不够,那不知要交代到何年何月。有时政府工作人员讯问一些与己无关的问题,不讲就受到责备,思想上有抵触情绪。有时觉得有前途有希望,但一想自己罪恶大,问题复杂,对前途又失去信心,所以情绪忽高忽低。

他的意思很清楚,认为自己再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了。至于说交代得还不够,那是与己无关的问题,是个无底洞,如果就这一点而论要关押他,那关到什么时候都有理。至于前途问题,实际上在说没有前途,所以他要求结案判刑,去劳动改造。

应当说,他这个想法具有代表性。这些被关押的战犯中,国民党

党、政、军、警、宪、特各部门人员，他们的罪行各不相同，入狱后的改造态度也各不相同，但无论是有什么问题，问题多大，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希望审讯人员提审，希望早结案，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最好判刑劳改。长期的思想改造，使他们觉得是在受煎熬，在触及他们的灵魂，有时甚至使他们痛不欲生。而思想改造实质上就是要改造他们灵魂深处的东西，让他们彻底抛掉旧思想、旧观念，转变整个世界观。此时，徐远举非常清醒，明知不会马上结案，更不会让他去劳动改造，但他还是作为一个思想问题提出来，显然是对长期关押不满，只是没有直说。他厌烦交代问题，也没有直说，事实上，他还有许多问题没有交待。

在谈完自己的问题以后，照例要谈他与别人有关的事。徐远举说，我是个洋油桶脾气，在学习上生活上经常表现烦躁不安，感情冲动，加上骄傲自大，对人尖酸刻薄，冷嘲热讽，与同学发生纠纷。尤其对宋希濂，往往因为小的误会和个性作风不同，自白公馆到现在，一直存有意见，随时发生争执。我向宋希濂说明误会，表示道歉，以后决不发生争执和闹无原则纠纷，并请同学们监督。

这个平时尖酸刻薄，专门讽刺控告别人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居然给宋希濂道歉，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是很不容易的。他把与宋希濂的矛盾归结为“小的误会和个性作风不同”，他是想把大事化小。

徐远举说他们之间是“个性作风不同”不无道理，一个是性格外向，眼里容不下半粒沙子；一个是性格内向，深沉老练。如果戴着有色眼镜看对方，徐远举认为宋希濂阴险狡诈，宋希濂则认为徐远举浅薄浮躁。两人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

徐远举自知他这个黄埔七期的不是一期的对手，不如采取主动自己下台阶，于是就有了上述的道歉。

宋希濂深知这位不可一世的学弟的为人，徐远举这个人是很少认错的，非常爱面子。即使自己有错也不会认，而且无理也要争三分。

这次，徐远举主动向宋希濂道歉，按照徐远举过去那么多次的讽刺挖苦，宋希濂要给的适当地回击谁也说不出来。可是，他没有

这样做，得饶人时且饶人，不要得理不让人。这样也可以“团结群众”，免得背个“意图报复”的恶名，于是他采取了“高姿态”。

他说，徐远举自我检讨，坦率地说出了他对我有成见及成见产生的根源，有的过去检讨过，有的与事实稍有出入，有的是他误会了，旧帐一笔勾销，不再计较。

话不多，很有份量。别人听不很清楚，当事人心里都明白。三个“有的”是把问题分了类。比如说到桌面上的“送终”的事，说不到桌面上的“陈赓接见”的事，既可以在桌面上说也可以不在桌面上说的诸如宋希濂八面玲珑之类的就更多了。所有这些都是徐远举的“成见”，成见就是偏见，偏见当然就是错误的了，错误的东西也就有其产生的根源，宋希濂也把它联上了。这些“旧帐”是记在宋希濂的“帐簿”上的，现在统统由徐远举自己“清算”了，宋希濂当然要表个态“一笔勾销，不再计较”。宋希濂的这番话，令徐远举无话可说，其他人更无话可说，还称宋希濂有涵养。

宋希濂见徐远举不吭声，在坐的同学对自己的发言有的点头，有的插话称赞。在这种情况下，他以检讨的口气提出了三点保证：一是今后决不背后批评徐远举。二是今后讨论问题如与徐意见对立，我根据我的理由发言，决不与徐同学发生“对口曲”和争执。三是我以最诚恳的态度对徐远举表示道歉，并愿与他握手言欢，在投靠人民的新生大道上团结起来。这一条，多少给徐远举以“面子”，所以当小组会“沈主席”总结时，鉴于徐宋矛盾解决得比较圆满，也就未提他们之间的事了。

◆沈醉说，希望周养浩不要再发生问题

解决完徐远举与宋希濂的矛盾后，该解决沈醉与周养浩的矛盾。周养浩首先发言，他的发言分为检讨、原因、自我批评、思想建设几部分。在检讨部分，无论内容和观点，几乎与徐远举谈的一样。他也就是说问题都已交代了，经反复思索，“实在没有东西了”，因此消极

等待,希望能早日结案处理。他也说自己胸襟狭窄,性情暴躁。

但他声明,从前他不是这样的,也许是自尊心在作祟,也许身体有病,也许想家……所以,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和批评,尤其是与事实不符,在这种环境下,就应当看作是陷害,就不能容忍。他解释为什么不能容忍的原因,他认为说话应有证据,没有证据而乱说是不能容忍的。他又补充说,他是学法律的,对人对事不凭证据就成了盲从。

他在分析批判自己这种思想时,又做了一个注解:对别人意见应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而在“思想建设”部分,在谈到今后怎么办时,他又说了一个让人去猜想的题目:要寻求一种方法,找到一个主动赎罪、靠拢人民的机会和途径。

最后他说:只有把过去的问题交代清楚,无隐瞒遗漏,把旧思想和习惯消灭干净,才能把新的好的思想接受过来。

宋希濂、徐远举、沈醉越听越不是滋味。尤其是沈醉,听出了弦外音。周养浩说的陷害,不能容忍,虽然指的是在重庆发生的事,不要盲从,是在劝告沈醉。而他所说的要求一种方法,找到一个机会、途径,其实是在指别人。指谁?他不会说。别人也不会猜疑,猜疑出是谁也不会说出。如果有人“对号入座”,对周养浩来说那是最好不过的事,就达到了目的。

沈醉的发言与徐远举和周养浩都不相同。他没有说自己的问题交代得差不多之类的话,也没有谈有消极悲观的思想,而是说要消除被杀的顾虑,不问个人前途,无论是检讨部分还是思想建设部分,都是谈自己,没有弦外之音,直接了当。关于他与周养浩之间的矛盾他似乎是带有一定的解释性。他有一个观点:三千年的封建罪恶,二十年的军统血海深仇,如果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那是清算不了的,他只能负他那部分责任。对此,为了争取活下去,他表示要继续交代问题,如1949年与毛人凤闲谈的阴谋计划未交代,他所知道的港澳边区的特务活动及个人与毛人凤的关系的清理。

这种说法是无懈可击的。关于三千年和二十年的问题,谁也不

会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他是在说,各有各的帐,共同欠的帐分清细目,该谁负责谁负责,不能都推在他一个人身上。他这是在解释他交代问题的原则,也在提醒别人不要把共性的问题往他身上推。因为沈醉比徐远举、周养浩都有名,在人们心目中好像除了戴笠、毛人凤,就只知道沈醉,因为他杀人太多了,是有名的军统杀星。如果有人要减轻自己的问题而往沈醉身上一推,那是非常轻松的,也容易使人信以为真,而沈醉确实也有这个感觉,所以他不只一次地谈到三千年与二十年的问题。

更无懈可击的是他谈到与毛人凤闲谈时谈到的特务潜伏计划,屠杀计划,包括重庆“一一·二七”血案的屠杀,那是周养浩在场的,也是毛人凤受蒋介石之命向徐远举布置过的,而且有的是执行了、成为事实的,沈醉不交代行吗?徐远举、周养浩不交代行吗?也许是因沈醉先交代了,徐、周后来不得不交代而痛恨沈醉吧!

沈醉在谈今后怎么办时,与他的检讨部分一样具体,他谈到要增强对政府的政策的了解以消除怀疑,放弃对旧生活方式的留恋,严肃生活纪律,禁止搬弄是非和阴险恶毒的天性,纠正自私自利的劣根性和狭隘偏见的思想,等等。大家听了以后提了些意见,总的认为不错,于是成了好典型。就这样,又经过几年努力,沈醉成为军统特务中最早特赦的一人。



十六、战犯七批特赦出狱



1959年底功德林监狱第一批战犯特赦大会现场

1959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这条新闻标志着特赦战犯工作正式启动。自1959年12月4日特赦第一批战犯起,到1975年3月19日,战犯分七批全部获得特赦。

1. 特赦前的准备

特赦战犯的基本程序是：关押战犯的所在省公安厅提出在押战犯的罪行、表现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公安部审查，经处理战犯领导小组同意，再报国务院审批。国务院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特赦令，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实施。

◆毛泽东建议特赦国内战犯

处理战犯的工作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对此十分重视，许多工作他们都亲自过问，亲自部署，并作过很多重要指示和批示。尤其是周恩来总理，他对国民党的重要战犯和一般战犯都非常关心，战犯的许多大、小事都是由他亲自批示的。具体工作由处理战犯领导小组负责，罗瑞卿、孔原、徐冰、徐子荣等人是这个小组的核心成员。基础工作、侦察工作由公安部负责。

对于国内战犯的处理，经过多次调查、审查、讨论，最后决定分期分批特赦释放。公安部在审查国内战犯过程中还做些零星处理，如原来在地方关押后又集中关押判过刑的，有的刑期已满就要做刑满释放；有的刑期未滿而身体有病的也可提前释放或保外就医。

1957年1月，公安部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对在押战犯的处理报告，提出对国民党洛阳少将行政专员刘焕东等12名战犯的患病情况的处理意见，经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商定，对其中11人保外就医，还有一名因判过刑，改判后也保外就医。

毛泽东主席对这个报告作了重要批示：不但这些人应当处理，其他战犯凡犯罪较轻、表现较好的都应考虑判决释放，因为关了七八年了，犯罪较重的和严重的以后也要处理。

同时,公安部向中央作了关于在押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的处理方案的报告。当时在押的国民党战犯871名。按首要战犯,罪行较重和严重的战犯,罪行较轻的战犯和罪行较轻微的战犯标准分成四类,对第一类和第二类中的一部分,抓紧审查,稍后处理;第三、四类和第二类中的一部分大约有500多名拟于1957年底、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宽大处理,予以释放。

经处理战犯领导小组审查决定,按中将师长、军长、副军长、兵团司令、省主席、省党部书记长及特务中的重要分子的标准,确定了65名首要战犯。他们是:

方靖、孔庆桂、文强、王耀武、王陵基、王靖宇、王泽浚、王凌云、王秉钺、米文和、刘嘉树、刘镇湘、孙渡、孙楚、宋希濂、宋瑞珂、宋清轩、杜聿明、李仙洲、李以勋、李汉章、李九思、李益智、李帆群、李佩青、李猷龙、范汉杰、罗历戎、庞镜塘、牟中珩、周振强、周养浩、胡临聪、严翊、张文鸿、沈鹏、沈蕴存、陈金城、陈长捷、陈士章、郑庭笈、卢浚泉、何文鼎、林伟俦、岳焯远、马励武、马瑛、莫德宏、高建白、徐远举、郭旭、康泽、黄维、黄淑、梁培璜、曹天戈、曾扩情、章微寒、庄村夫、汤尧、杨文瑛、杨光钰、廖耀湘、廖宗泽、韩浚。

除以上65名外,在此之前病亡的首要战犯和在此之后比较重要的战犯还有:

张淦、王冠、王绪镒、汪宪、陈琪、陈林达、胡靖安、张严佛、郭一予、方既白、左挺、刘治寰、徐钟瑞、孙天放、秦绍观、袁鸿逵、章履和、宋相成、杨安铭、邹明新、薛补石、谢膺白、董益三、李蕃候、金汉鼎、周觉民、周建陶、姜铁心、姜湘龄、姚步烈、马策、覃道善、陈远湘、陈章、何崇校等。

当然,一些职务不在上述范围之列,但在国民党军队里属实力派人物的也属此类,比如十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青年军二〇六师少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等。

随着国庆十周年的临近,处理战犯的工作紧锣密鼓。对战犯是叫特赦,还是叫大赦,当时也引起一番争论。大赦是在特定条件下对

在押罪犯一律赦免，即把罪行都赦免了。而特赦则是不赦免罪行，只是改恶从善的才予以赦免（刑罚），是局部的赦免。公安部最后决定采用特赦。1959年8月，毛泽东写给刘少奇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三十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十年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决议一下。

处理战犯四人小组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在公安部拟定的方案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讨论。中央领导同志针对公安部的报告，按照改恶从善的标准，作出了分期、分批每年特赦一批的中央指示。这个指示在特赦战犯的全过程中始终起着指导性作用，自1959年后，基本上是每年特赦一批。特赦战犯的政策及步骤日趋完善。这个计划，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迫中断。

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建议，请对特赦战犯作出决议：

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

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9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主席的建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在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国家主席特赦令公布后,在同一天,又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特赦罪犯的指示》。

这个《指示》强调了在建国十周年特赦罪犯是适宜的,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并分析了之所以适宜的原因,主要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胜利,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人民的觉悟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良好。同时,党对罪犯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各类罪犯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恶从善,多数人在向好的方向转化。

《指示》还强调,我们的特赦,是以罪犯改恶从善为主要标准,不同于我国历代的大赦和国际上的大赦。而改恶从善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服法,确有良好的实际表现;二是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

特赦战犯的各项具体条件为：战争罪犯，关押已经满10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特赦；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缓刑时间已经满一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无期徒刑或15年以上有期徒刑；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服刑时间已经满7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指示》对罪犯的教育问题和特赦的组织问题、宣传问题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和部署。

公安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刘少奇主席的特赦令，向关押战犯所在地的辽宁省、山东省、陕西省、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发出通知，要求按特赦令的条件（与中央指示同）列出战犯名单，逐个审查送批。

1959年9月25日，五个省（自治区）的公安厅报上名单后，处理战犯专案小组向彭真并毛泽东、中共中央写了专题报告。报告指出，当时实际关押的战犯数字为856名，其中国民党首要战犯66名（病亡1名，比前述的67名少1名），非首要战犯742名，伪满战犯39名，伪蒙战犯9名。

报告初步提出，拟对144名战犯分三批予以特赦释放。第一批50名，国庆前释放，包括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曾扩情、杨伯涛、邱行湘等人；第二批50名，包括首要战犯王耀武、宋瑞珂、胡临聪、卢浚泉、罗历戎、沈醉；第三批44名，包括宋希濂、李以勳、陈金城、庞镜塘。后两批准备国庆节后放。另外，也提出释放溥仪、溥杰等人的意见。

◆政治协商战犯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遵循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原则，在各次工作中互相配合。国内外许多重大事件，中共中央都要征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对战犯的处理政策决定也是如此。

为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战犯的处理意见，专门

召开了一次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罗瑞卿和谭政文作报告，周恩来两次发言，在向党、政、群、军等系统征求意见的同时，也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进行政治协商。会上的气氛非常民主，与会者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充分反映了各方面的意见。对于罗瑞卿和谭政文的报告，与会者听了后欢欣鼓舞，并纷纷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党的英明、伟大的决策。

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颇有影响的程潜，他毫不避讳地说，在这种场合发表对处理国民党战犯的意见感到很惭愧，觉得不便说话。他在国民党的政府和军队中都担任过高职，与共产党进行过长期的斗争，而且在1948年12月陕北权威人士谈战犯问题时，他是被点名的43名首要战犯之一，在任湖南省主席起义后才对他的过去既往不咎。他的发言主要是代表民革中央拥护罗瑞卿的报告和周恩来的讲话，认为党的处理战犯的方针政策很好，听了感到兴奋。

针对罗瑞卿提出的拟释放的名单，程潜认为释放宋希濂（原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是恰当的，他指出宋希濂为人忠厚，不锋芒毕露，应获特赦。根据特赦条件和宋希濂改恶从善的实际表现，公安部于1959年12月4日将其第一批特赦。

程潜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影响深远，他带头发言后，会场上出现了踊跃发言的场面。蔡廷锴指出，他同意政府对范汉杰（原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的处理意见。虽然范汉杰在福建事变中，曾出卖过十九路军，差点致蔡廷锴于死地，胸怀开阔的蔡廷锴不计前嫌：“范汉杰与林彪是黄埔的同学，范要求见林彪，林彪对他说‘你好好修养’，没有见范。而我见了，并安慰他。虽说中央统战部在调查他的历史罪恶时，我曾把他出卖十九路军的经过写了书面材料，现在我撤销这个材料，对他的仇恨不算帐，同意释放他。”范汉杰是在1960年11月28日获得第二批特赦。

除此之外，蔡廷锴还提议将国民党六十二军中将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林伟涛和军风纪视察团中将团长金汉鼎释放，原因是二人

并非蒋介石的嫡系。根据特赦条件,林伟铸于1961年12月25日被第三批特赦,特赦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常委,后移居加拿大。身居国外的林伟铸仍坚持爱国立场,为祖国统一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而金汉鼎未及特赦在狱中病亡。在会上,蔡廷锴点出的在押战犯人数比别人多,而且直言不讳,坦诚相见,他发言后会议气氛更加活跃起来。

傅作义开场表示,政府对战犯的处理政策自始至终是正确的,是对人民有利的事,他坚决拥护。傅作义与毛泽东主席曾单独谈过,也为对战犯予以宽大处理给中共中央提出过书面建议。他说:“我为这些人乞求过,要求对他们宽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与他们同病相怜。我的历史,走过的路与他们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我最后看清了前途,敢于冒险,下了准备牺牲的决心。”

谈到“冒险”,傅作义有感而发。“我由于冒了险,成了座上宾,他们由于当了替罪羊,成了阶下囚,应该对他们实行宽大。”傅作义是在北平和平解放时,起义投诚,为人民立了功。但是,他的心没有平静过。他从接受改编那天起,其内心的愧疚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他为仍然被押着的同僚、属下,无论是单独谈也好,写书面报告也好,曾多次要求对他们宽赦。

傅作义要求宽赦还有一个理由:在国民党军队,军人是职业性的,只会服从命令,不了解政治,也不准学习政治,高级军人如此,一般军官更是如此,不可能对政治前途加以选择。这样,他们一来受蒋介石严格控制,二来又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怕过来后杀头,现在台湾的一些人之所以怕回大陆也有这个原因。

傅作义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多次对中共中央提出过建议和要求,向毛泽东主席当面提过宽赦战犯,但由于那时刚建国,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必须分清敌我,所以,他的建议未予采纳。况且那时要放他们,人民也不答应。

傅作义还提出对在押的战犯实行“渡”的政策和方法,把他们“渡过来”。显然,这种提法与我们党处理和改造战犯的政策没有共

同之处,使战犯成为新人是不能简单的“渡”的。他甚至打了个不恰当比喻。说我们国家取得独立后可以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对社会对人类都有好处,对个人也有好处,比如对资产阶级我们用了和平转变的方法过渡,荣毅仁照样给国家做事,家庭生活也不坏,何乐而不为呢?

傅作义的观点是,今天不只是作为社会主义的敌人资产阶级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作为民主革命战争的现行犯也能渡过来,这对世界能起很大的影响。认为我们是“渡人”的而不是“绝人”的,只要能渡过来,大家都可合在一块儿走,我们就是人类大家庭。

傅作义认为如果宽大释放在押的国民党人员,对台湾的心理影响也会很大,他说这一点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人可以作为例子说明。进而提出了一个设想:国共进行第三次合作。这不是不可能的,他分析了北伐和抗日时的两次合作都成功了,这条路走得通。他建议:双方派代表谈判。他认为,台湾固然是美帝操纵,可是台湾是否愿意做美帝的走狗不一定,蒋介石投降也好,自杀也好,总比做美帝的走狗好一些。

傅作义认为应把处理战犯和放人到台湾这两件事分开来谈。释放战犯应当作为政策对待好,而不是作为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对待,如果是这样,释放的人也许不一定敢去台湾,去了也许被扣押杀掉,不一定能起作用。而作为政策看,还可以多放一些人,这样自然对台湾有影响。同时,这么做,对我们的政权巩固更有利,因为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动力越大,阻力越小,要扩大团结面。

傅作义、蔡廷锴的发言,激活了会场的气氛,侯镜如、卫立煌、龙云、郑洞国、刘斐、翁文灏等参加会的每个人都纷纷谈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共同的观点是认为党对战犯问题的政策“不是宽大无边,而是伟大无边”。在押战犯与这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或多或少都有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曾经是他们的部下或同僚,他们当然希望那些人能被宽大释放。当然有些民主人士与那些战犯也曾结下私

仇。对此，卫立煌呼吁不要在这些问题上牵扯，要服从大局，服从客观形势，这个大局和客观形势就是要以和平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为出发点，就是不能原谅某个人也应先停下来，将来在和平解放台湾中谁贡献的力量大谁的罪恶就可能抵消。

发言者一般都涉及了处理战犯的政策和工作及它们的关系问题。落实到具体人时，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像康泽、杜聿明、王陵基、沈醉这些人罪大恶极，不应释放，但从这两个方面考虑又觉得可以释放。

有人提出，如果放康泽，共产党内部就会一定反对，因为他一贯反共最激烈。要宽大杜聿明，云南一定反对。要宽大王陵基，四川人一定不答应。而要放沈醉，恐怕全国人民不会同意，因为他是毛人凤的助手之一，杀人很多，罪恶大。但提到黄维时会上不只一人提出应该放他，理由是：他是陈诚的嫡系，放出来对陈诚有震动。

陈诚是国民党第十八军的第一任军长，黄维是第三任军长。黄维被俘后他的妻子蔡若曙带着子女经香港去台湾找陈诚，陈诚给了她一个“闭门羹”，不得已她又返回大陆。周恩来总理很关心，对他的家人也很关心。那时黄维也很有条件获得释放，但是，他自己在狱中表现不佳，以至到1975年释放全部在押战犯时他才获得特赦。

两天的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会上民主气氛极浓，各民主党派畅所欲言，对他们的意见，也尽量采纳。对于放的问题，没有异意都同意，而放多少，放谁，如何放，意见不尽相同。经过讨论，对罗瑞卿的报告提出了修改意见，经过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是由邵力子提出的，他说对罗瑞卿执行中的两处“此外”有点意见。第一处说：“此外，各地公安机关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还搜捕了一批隐匿在社会上的前国民党军人，在各地劳动改造机关进行改造。这些人中多数是因为现行反革命活动被捕的，他们的名单现在正在进行清查。”

邵力子指出：“这‘多数是因为现行反革命活动被捕的’，至少还有少数是因为以前是反革命被捕的，这与有现行反革命活动不同，

对解放以前的罪行，虽然未交待，但叫他交待后也可以从宽处理吧！我听说上海、南京就有些人是这样，解放后一直没有走，后来被捕了。我心里起疑问，过去说不咎既往，为什么人家不走又被捕了呢？我希望如解放后除现行外，一直在新政权下工作或好好住着的，即使过去有罪行也不要逮捕，这样才与只要弃暗投明不咎既往的政策相符合。”

第二处说：“此外，还有一些罪行较轻、刑期将满并且已经得到一定改造的罪犯，都将在刑期执行完毕的时候按期释放他们。”邵力子认为，这个“此外”在文字上是否份量较轻些，如果他的罪很轻，刑期已满，那么释放是当然应该的，不着重说明也要如此办。为了体现政府的宽大，是否改为“除罪行较轻、刑期已满、已经得到一定改造的人释放以外，对罪行轻，表现好，刑期未了的予以提前释放。”

周恩来总理对邵力子提出的问题评价很高，认为他善于抓逻辑，并指出应对原文加以修改。

根据邵力子的意见，对原文作了改动。第一个“此外”，说了多数是因为现行反革命活动被捕的，而少数没有交待，后来改成：“多数是因为现行反革命活动被捕的，少数是因为有历史罪行在土地改革运动和1950年到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逮捕的”，这就说完全了，并说明他们的名单正在进行清查，还加上准备按照实际情况分别处理的内容。

第二个“此外”改为：“还有一些罪行轻、刑期将满并且已经得到一定改造的罪犯，不一定都等刑期执行完毕的时候才释放他们，也可以宽大处理提前释放他们。”

这样，罗瑞卿的报告在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中央各部、委、局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军队部门时，这两个“此外”均用吸收邵力子意见后的改稿。这充分体现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肝胆相照的原则！

2. 战犯大批出狱



沈醉(左)与文强(右)、郑庭笈(中)

对全部在押战犯,中共中央原定每年特赦一批,特赦的同时对少数判过刑的予以减刑。从1959年开始到1966年,基本上是落实政策每年特赦一批。“文化大革命”期间,特赦工作被迫暂停,到1975年将全部在押战犯予以特赦,这样,共特赦了7批。856名战犯的去向如下:特赦589名,刑满释放65名,在押期间亡167名,另案处理10名,按起义投诚人员释放对待25名。

◆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9次会议通过“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决定指出：

会议讨论了毛泽东主席所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特赦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会议一致同意这个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条第十五项规定，决定：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同日，刘少奇主席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特赦令如下：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十年的英勇奋斗，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极为良好。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改造，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为了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庆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辉

煌成就,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一、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关押已满10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二、反革命罪犯,判处徒刑5年以下(包括判处徒刑5年)、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判处徒刑五年以上、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二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三、普通刑事罪犯,判处徒刑5年以下(包括判处徒刑5年)、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判处徒刑5年以上、服刑时间已经达到二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四、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罪犯,缓刑时间已满1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无期徒刑或15年以上有期徒刑。

五、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服刑时间已满7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个命令,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执行。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特赦改恶从善的首批战犯》通告。通告中说:

特赦令在9月17日公布后,人民政府战犯管理机关对在押的战争罪犯,进行了全面的严格的审查,最后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并决定首批特赦释放33名,其中包括有原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罪犯和原属于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还有原属于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

这些战争罪犯过去在反人民战争中,对国家和人民都

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他们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关押已满十年。十多年来,他们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感召下,已经悔悟认罪,并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根据这种表现,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决定予以特赦。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战犯管理所召开了有全体在押战犯参加的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的战犯名单,并给他们发了特赦通知书。特赦大会气氛严肃,被特赦的战犯情绪激动,他们表示无限的感激,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使他们改邪归正,获得新生,并决心继续改造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未被特赦的战犯虽有些失望,但也表示要加速改造,争取早日获得特赦。

第一批被特赦释放的33名战犯中,原属国民党的有30名,其中首要战犯8名,其他非首要战犯22名,另外2名伪满战犯,1名伪蒙战犯。他们是:

- 杜聿明 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
将副司令
- 王耀武 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
- 曾扩情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 郑庭笈 国民党四十九军中将军长
- 宋希濂 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
- 陈长捷 国民党天津市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
- 周振强 国民党浙西管区中将司令
- 卢浚泉 国民党第六兵团中将司令
- 杨伯涛 国民党十八军少将军长
- 邱行湘 国民党青年军二〇六师少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
- 赵金鹏 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上校参谋
- 杜聚政 国民党二十五军四十师上校副师长
- 周震东 国民党徐州总司令部定国部队中校副支队长

- 叶杰强 国民党七十二军二三三师六九八团上校团长
唐 曦 国民党七十军参谋处少校科长
白玉昆 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建军会少将课长
贺 敏 国民党晋冀区铁路总局总务处长
孟昭楹 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议
廖缉清 国民党内调局西南办事处代主任
杨怀丰 国民党山西省新闻处长
曹钟麟 国民党天津市民政局长。
徐以智 国民党南京中央训练团少将团员。
甄肇麟 国民党第九十九军少将高参。
刘化南 国民党北平行营少将参议
罗祖良 国民党第六兵团四处少将处长
李宝善 国民党七十七军三十七师少将师长
陈启銓 国民党十二军上校高参
董世理 国民党闽南暂编纵队一支队上校副司令
王中安 国民党六十四军一五六师四六八团上校团长
蔡射受 国民党一一六军二八七师政工处上校团长
爱新觉罗·溥仪 伪满洲国皇帝
郭文林 伪满洲国第十军管区中将司令官
雄努敦都布 伪蒙锡察盟全军副司令

3. 战犯的反映

特赦的消息在功德林具有爆炸性威力。盼了十年的好消息从天而降,许多人难以控制内心的兴奋,使这个原本井然有序、风平浪静的群体顿时沸沸腾腾,波涛汹涌。

◆一谈未来就色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内形势的一步步好转,改造战犯政策也日臻完善。战犯们已经了解了不杀、不辱、不审、不判的宽大政策,对自己的脑袋不用再担心了。这件大事解决了以后,着实轻松了一阵子。但是,他们毕竟是经历过风雨的人,改造所中那单调乏味的生活很容易使他们厌倦。

只知道不会死,但将来会怎么样,还是一片迷茫。所以,一想到未来,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沉甸甸的。有的人甚至产生了干脆杀了算了的想法。一刀杀了,可以一了百了,省出好多麻烦事,也不用为未来担惊受怕了。

有一次,在秦城农场劳动时,徐远举和沈醉坐着聊天。徐远举无意中用手一指:“瞧那新盖的一片楼房,不就是你我下半生的归宿点吗?”沈醉一抬头,一排灰色两层楼正在盖瓦,在它的附近还有一些两层楼有前后凉台的单元房子,有一座已有几个农场干部搬进去了,可以肯定,这不是为管理干部修建的。而那一排正在盖瓦的没有凉台,很像单身宿舍,看上去倒很像为他们建的,也就是战犯们得到宽大处理的养老地方。

他们俩当时也很满意,不管怎样,这总比监狱或农场的集体宿舍要好得多了。因为当时更多的是绝望,对未来根本就不抱什么希望,以为一辈子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生存下去,他们怎么也想

不到像宋希濂、沈蕴存、沈策、郭旭、陈士章等，还能去美国安度晚年。

沉寂的生活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捱着，每天重复着前一天的内容，没有半点生机，仿佛人也跟着迟顿起来。突然有一天，徐远举的一声大喊：“好消息！”如春雷一般敲响了寂静的天空，也给每个人都带来了春的气息。

那是1959年9月16日下午收工之后，徐远举照例去管理员办公室取报纸（他是负责义务分报纸的）。他看了几眼手上的报纸，突然不断地大叫：“好消息！”他这么一叫，立刻把所有的战犯都吸引了过来，连正在分菜的值日同学，也把菜桶放下，徐远举大声朗读起来，其他人则肃立静听，这种场面平日是绝对没有过的。

徐远举大声读道：

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当“特赦”两个字读出之后，大家心为之一震，正当人们都还沉浸一片寂静声中时，忽然有人大叫一声：“这下好了，我可以和老婆在一起了！”

只见国民党晋陕边区挺进纵队中将司令宋清轩，大叫一声之后，把上衣全部脱掉，向附近的树林狂奔而去，一边跑一边重复叫着这句话，他早已跑出了平时规定的活动范围，也毫不觉得。宋希濂叫他回来，他还是一个劲地边跑边叫。

9月中旬，北京已入秋，中午虽热，早晚却要穿毛衣，宋清轩裸着上身，在树林中狂奔乱跑时，带队的一位科长着急了，倒不是怕宋清轩逃走，而是担心他会摔伤碰伤，也怕他光着上身着凉，便跟在后面叫他回来，宋清轩却越跑越高兴，谁叫也不听。文强从人群中窜了出来，径直去追宋清轩。

他一边追，一边喊：“刚才读的特赦消息是假的！”文强知道，宋清轩是一时过度兴奋，神经有点失常，他希望通过告诉他消息是假的，使他清醒过来。谁知尽管他一个劲地说消息是假的，叫他不要相

信,而这位杂牌部队的将军还是在边跑边叫。文强只好跑到他的前面,一下挡住他的去路,对方才仰天大笑起来,可能是从山里吹来的一阵凉风,使他猛地清醒过来。

◆颁布特赦令

9月18日,又是一个纪念日,那天报上正式公布刘少奇主席发布的特赦令。管理所负责人可能怕再发生别的意外,这次没有让犯人们先看,而是在午睡起床后,把报纸送到各小队去学习座谈,并一再嘱咐大家要头脑冷静。

那天报上的头版头条新闻,便是刘少奇主席颁布的特赦令。第一条是: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满10年而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毫无疑问,每个人都自认符合这一条。令人奇怪的是,在座谈时,竟很久没有人发言。可能是每个人心里都有太多的话想说,但又不知说哪一句好。其实,无论千言万语,最后总能汇成一句:我符合特赦标准。

讨论会在学习组长带头发言后,就如决了堤的洪水一样,一泄千里,不可收拾。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有意安排的,公布特赦令那天刚好是阴历的八月十五,是和亲人团圆的日子,这样,那天就更有意义了。

公布特赦令第二天中午,公安部孙处长带了一大批新闻记者和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来到秦城农场,然后召集战犯们在农场前的办公室学习特赦令,记者忙着在一旁拍电影、拍照。当时,许多人都踊跃发言,兴高采烈地谈着特赦感想。整个会场,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接着,又拍劳动场面,战犯们一到果园,似乎忘了是在拍电影,每个人都很认真地投入到劳动中,非常自然。摄影师抢拍了许多精彩的镜头。

摄影师和记者走了之后,秦城农场又沸腾了。大家议论纷纷,许多人都认为国庆前一定可以得到特赦,拍这些片子一定是为特赦作

宣传。

9月24日,战犯们照例在地里劳动,又有许多记者和摄影师来到地里为他们录相,还给许多人单独拍摄了不少照片,下午又到他们住地拍摄下棋、打扑克等许多文娱活动的镜头,估计是认为上次拍的还不够,这次补拍一些。这就更增加了大家的信心,一定快特赦了,看来宣传的规模还不小。

当时,每个人都是兴奋的。彼此之间的矛盾也都暂时隐退了,见了面都大谈特谈特赦。但高兴之余,也未免有点担心。因为有许多人,特别是军统特务以前曾残害过许多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出去以后,人民会原谅他们吗?会不会遭到别人的报复?这种想出去又怕出去的矛盾心情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背在许多人身上。

9月25日上午,又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李科长通知战犯们收拾行李,准备回功德林,这无疑是要回去等着特赦了。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便准备回去了。

回到功德林,那些没有去农场劳动的老弱残兵,知道最近几天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去了两次农场,也为之兴奋,大家一致认为国庆前,都会得到特赦,可以到外面过国庆节了。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漫长的等待了,好不容易捱到9月30日,管理员召集大家到学习室,满以为要宣布特赦,谁知是让他们学习9月1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

学习这篇社论,等于给连日来兴奋过头的战犯们当头一盆冷水。因为社论里许多话是很值得推敲,而这些人们只看到“特赦”两个字,根本没有心思去仔细研究它,社论里说得很清楚,“确已改恶从善的一批战争罪犯与反革命分子可以得到特赦。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

许多人仔仔细细一琢磨,便泄了气,原来社论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一批”而不是全体,一批释放了,还有一大批将作为在押战犯继续改造,这一下使不少人的高兴劲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真是大

煞风景。

突然，又有人发现特赦令的第一条，“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关押满十年”，自信也达到了“改恶从善”这一标准，又高兴起来了。

1959年10月1日，这一天是个喜庆的日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纪念日。战犯们也有幸一同参加国庆典礼，一大早，他们就集合坐车，乘车由功德林驶往公安部。那时路上早已人来人往，热闹异常，可见半夜就开始活动了。几十万人的大游行，这还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每个中国人都欢天喜地的。

战犯们被安排到公安部专门搭的正对着天安门城楼的看台上观看典礼。典礼开始了。首先是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大会开始，并作了简单的讲话，接着是检阅部队，当机械化兵和重炮车隆隆驶过天安门时，许多战犯把头垂下去，触景伤情，“败兵之将”，这个耻辱的名字又一次深深撞击了他们的心扉。

晚上还有国庆节的盛大晚会和焰火，战犯们没有回功德林，就在公安部的图书馆吃饭和休息。当几位山东同学去翻阅山东的《大众日报》时，看见该报在9月25日已刊登山东特赦战犯的消息，大家更是欢天喜地，认为北京在国庆节后就会特赦。

◆第一批特赦

10月2日学习座谈十年国庆感想，几乎每天都在学习。10月5日，又继续学习特赦有关文件，大家认为这样抓紧学这些东西不久便要进行特赦了，都很高兴。

正当大家兴高采烈之时，10月10日，管理员宣布改学周恩来的《伟大的十年》。改造所里又一阵骚动，徐远举在墙报上贴出一篇题为“好事多磨”的短文，他借批评某些同学的这种想法：特赦令颁布快一个月了，越来越使人感到失望，10年时间已够长，还要加上一段时间来拖延，太不珍惜战犯的光阴了。说这是一种抵触思想，应当有一正确认识……他的这篇文章刚一贴出来，质问他的墙报一张接一

张,不少人要他把说这话的人交出来,有些人则指出这是借别人之口发自己的牢骚。说实在的,他们这种思想在战犯中占大多数,只是别人不说罢了。

正在此时,10月20日又宣布要战犯们回秦城农场,帮助农场搞秋收的结尾工作。除了进行水稻脱粒外,还得挖一些树坑,每人挖一个,要求挖长宽一米,深一米二的大坑,以利于树的根系在下层伸展。

在秦城农场的日子,要比在功德林好捱得多。在农场里,活动自由,空气新鲜,多少有几分自由人的感觉。所以一晃,一个月便又过去了。11月25日,宣布要进行参观,主要是参观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等十大建筑。参观完了,又去十三陵参观明朝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的那座地下宫殿。

参观对思想改造有重大作用,所以政府不惜花费人力财力和时间,安排他们去参观,这次把北京的十大建筑看完还不算,又把附近名胜古迹也游览一番。参观的目的是想通过参观来转变犯人的思想,所以每次参观后,都要开座谈会,既谈感想,还得联系实际,怎样加速自己的改造,所以说参观对思想改造是大有好处的。

1959年12月4日上午,大家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特赦大会。特赦大会的会场布置在功德林监狱一座小礼堂,礼堂上方是一幅鲜红的布条,上面用白纸剪贴了“特赦战争罪犯大会”的几个大字。左边是“我们的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右边是“劳动改造与思想改造相结合”。战犯们按顺序坐下,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宣布特赦名单,最高人民法院首席法官从座位上缓步走到讲台边,拿出握在手中的名单。

他先看了看台下,便开始念名单,几乎是一字一顿。台下气氛十分紧张,每个人都绷紧了脸,竖直了耳朵,生怕听漏一个字。“杜聿明。”“有!”“宋希濂”“有!”回答的声音十分响亮。接着念出王耀武、郑庭笈、曾扩情、陈长捷、杨伯涛、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第10名之后,说“以上10名,符合特赦令第一条规定,予以特赦”。这时台下的

人凡没有点到名字的,几乎都不同程度地轻声叫出“完了!”这当然不是说首席法官念完了名单,而是说自己完了,没有希望了,盼来盼去,只盼走了十个人,这未免太残酷了。这声“完了”是由内心发出的绝望声。

接着是由特赦人员和家属讲话,公安部首长讲话。没念到名字的人当时就垂头丧气,哪里还有心情听什么讲话。首长讲完话后,管理员让庞镜塘代表在押战犯致辞。真亏这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在这种绝望的心境下,还能凑出几句相当体面的话,总算把这一尴尬场面应付过去了。这时,新闻记者的照相机,电影制片厂的摄像镜头都对这10位新公民拍个不停,台下都失望极了,“怎么只有10个?”一片质问声,可见有多失望。

回到寝室绝大部分人是倒在通铺上一语不发,有的在用力摔东西,这一下子一切都变了。仿佛天地都旋转了一样,真是一场令人“大失所望”的特赦会。

4. 我比他要强得多,为什么不特赦我



1963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四批特赦人员及家属合影

只特赦10人,有如当头一棒打得其他人头晕目眩,仿佛从火炉里一下子掉进了冰窖,失望、伤心、悲痛,更多的是不服气。凭什么只放他们几个?这是战犯们清醒后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几乎每个人都在暗问“我比他强得多,为什么不特赦我。”当时战犯最普遍的思想是认为官越大,罪越重的人可以先得到特赦。

◆官大罪大先特赦

这主要是指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这几个人，不但官大而且罪大，杜聿明在淮海战役时，坚决不投降，连毛泽东亲自写的劝他投降书，他当时连看也不看，连拿这文件给他看的人也被他大骂一顿，最后逃走时还下令施放毒气等；宋希濂也是与解放军顽抗到底而被俘，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就是由他派人执行枪决的；王耀武也是顽抗到全军覆没后化装潜逃时盘查出来的，红军的重要指挥员方志敏，就是被他抓住而处死的。这一笔笔账都被他们清算出来，所以再把那十个人抓回来，他们才能心理平衡。

所方也了解这些思想，也能体会到战犯们的感受，但是如果不及纠正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下一步改造根本无法进行。于是，就让分组在小组长的带领下，把大家的思想抖出来，自己加以解决。一些聪明人马上转舵，还说思想通了，但通了也得有个正当理由，是怎样想通的。

正当大家找不出一条理由说明真正解决了这种被认为是错误的思想时，倒是上将王陵基说了几句：“啥子官大罪大，还是需要不需要。”他的话还没说完，有人马上指着王陵基说：“如果官越大罪越大的便可以先得到特赦，那为什么19号（王陵基的代号）同学没有第一个特赦呢？”接着又有人说：19号是我们当中惟一的上将，杜聿明等人是中将，论官19号是最大的，也有人说论罪谁也比不过他，他是老牌子军阀，他在重庆当卫戍司令的时候，有名的“三三一惨案”就是他一手制造的，大人死的且不说，仅仅小学生就死了不少。

还有人说了王陵基过去的一些劣迹，有一次，几个女学生牵一条小狗，在狗脖子上挂了一块牌子——王灵官，这是四川人恨他时为他取的这一凶狠的外号，王陵基一气之下，命令手下的卫士们，当街把这几个女生的裤子扒开……正在这时，管理员便提出这些足够说明问题，不必再举例子了，这样才避免了节外生枝。

战犯们大都懂得举一反三的道理，所以举了一个王陵基还不过隐，便又举了官大罪大的康泽。因为康泽是与戴笠齐名的大特务头子，他在江西围剿红军时他的别动队员被红军抓去几个，他就把抓到的几个红军胸膛剖开，取出心肝去祭奠他的部下。为了说明“真正”解决了官大罪大便先特赦的所谓糊涂思想，又把孙楚、孙渡举了出来，孙楚是阎锡山的副将，自然够得上官大罪大了。孙渡不仅当过兵团司令和热河省主席，并且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在滇军围追红军时，但任过围追总指挥，自然也是官大罪大的了。

经过这样一再举例，这一错误思想问题算是基本上澄清了，但学习组长们又问上一句：还有别的什么思想？这一问，又一个严重思想冒出来了。

“这次特赦，是为了对台湾工作，特别是对陈诚工作。”这是指特赦了陈诚的旧部十八军军长杨伯涛、洛阳警备司令兼青年军二〇六师师长邱行湘，这二人都是少将，相比之下官既不大，又不有名，不过都是陈诚的老部下。

这一错误思想，当然也得澄清。但有了第一次经验后，这次就容易得多。因为如果说特赦是为了对台湾的陈诚做工作，那为什么不把黄维特赦出去呢？黄维是陈诚手下最得力的助手。陈诚当了国防部长，黄维便任后勤副总司令，而且在最后把自己的嫡系部队都交给黄维，这种关系比杨伯涛、邱行湘当然密切多了。何况陈诚手下的中将军长还有方靖、覃道善、宋瑞珂等和陈诚的关系都比杨、邱两人要深得多，如为了对陈诚工作，应该把这些人先放出去。

◆不请自来的第二批特赦

第一批特赦的十个人走了以后，监狱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虽说有不少人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想通，但也只是一时发发牢骚，因为政策上已经明确规定，分会批特赦，早走晚走都是走，在监狱已经住了十年，也就不再在乎多这一年、两年。所以，没过多久，一切又都

回到了从前。

天下事往往是很奇怪的，你越是急着盼它，它偏偏不来，而不再去想它时，它却又突然出现。

1960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国务院第105次会议公报，说第二批特赦战犯的名单已送交人大常委去审议了。这一好消息，又迅速传遍了整个功德林，但引起的轰轰却远远没有第一次大。许多人经过了第一次打击，这回也不敢奢望了，害怕希望越大，失望也会越大。

1960年11月28日下午，全体战犯又走到了那熟悉的会场，讲台上的横幅和两边的对联，与第一批特赦时一模一样。也还是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念特赦名单：李仙洲、罗历戎、胡临聪……，他还是那样一字一顿，生怕念错。许多被特赦的人都是十分惊讶的。没有料到会轮到自己。功德林里又一次充满了欢天喜地的笑声。

以后，依次第三批、第四批……一直延续下来。

5. “文革”中战犯特赦中断

1959年起,特赦战犯的工作按既定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押战犯都表示要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争取早日得到特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时间,狂风骤起,一切秩序打乱了。在这种大气候下,人心惶惶,特赦战犯工作也就无法正常进行。

◆“文革”中的遭遇

1966年9月22日,周恩来收到公安部党组的《关于今年拟不特赦战犯的请示》。请示的内容主要是说:自1959年以来,先后特赦了6批国民党、伪满和伪蒙战犯,基本上是每年特赦释放一批。当前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因而不宜在这个时候将在押战犯特赦释放出去,很有必要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阶级斗争的大好形势下,加强对在押战犯的教育改造。建议到1967年再考虑第7批特赦战犯问题。这个报告当时除需毛泽东、周恩来同意外,也要经过林彪、康生审看得到了批准。

报告中把在押战犯当作“革命对象”、“牛鬼蛇神”,在横扫之列。而且毛泽东主席稍后又发过一条“最高指示”,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继续,所以停止特赦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不仅如此,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所向,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担任要职的各部门、各级的领导人,从国家主席到村党支部书记,大批大批的人都在打倒之列,横扫之列,更何况这些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伪蒙战犯呢?

“左”的潮流是很难阻挡的,随着运动的不断扩大化,它的触角伸向各个角落,不管对的、错的,只要被触及灾难就在所难免。处理战犯的方针和教育改造战犯的政策都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这时,

原来负责战犯工作的领导人、负责人，如罗瑞卿、徐子荣、刘复之、凌云、姚伦、慕丰韵等却成了众矢之的。无一幸免，每个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批判他们执行了一条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与国民党“和平共处”的投降主义路线，等等。

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当时关押战犯的秦城监狱、抚顺战犯管理所和西安、济南关押战犯场所的军管会，在实际工作中一改说服教育方法，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战犯专政，变本加厉。几个地方的在押战犯诚惶诚恐，谣言四起，有的说党和政府的政策变了，特赦无望；有的说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挨整，何况我们呢；有的认为自己是专政对象，处处要小心谨慎，好汉不吃眼前亏；也有的认为过去放出去的比自己还惨，还不如不放出去的好。人心惶惶，战犯们食不甘味、寝不安榻。

战犯们本来精神负担就很重，长期以来，共产党对战犯的实行的是不杀、不辱的政策，在交待问题时，也是和和气气，采取自愿的原则，从不逼供。但这一时期这些外调人员采取各种手段，挤“活”材料，他们瞪目伸舌，不堪忍受。

给他们扣上各种帽子是随心所欲的，“车轮战”、“疲劳战”是经常有的。精神上如此，物质上更糟，“文革”期间战犯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生病者增多，也得不到及时治疗。他们怀念过去的政策，怀念过去那和气的管理员。但是，经过共产党和风细雨滋润过的这些战犯，没有辜负党的长期教育。他们咬紧牙关，决不说半句昧良心的话。

尽管如此，他们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仍然有组织地系统学习了马列、毛泽东的著作，编写和提供了国民党党政军特各个方面的资料。不少人也自觉地改造自己，从正反两个方面清理自己的思想，巩固了改恶从善的成果。

而在前六批获得特赦的人员中，许多人境遇还不如这些在狱中的。因为“文革”中无论怎样乱，毕竟还有一条不准冲击监狱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监狱反而比外面更安全。因为在社会说不定哪一路

的造反派要找他们的茬,随时有被“专政”的可能。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原安置在北京的沈醉和董益三要求再回秦城监狱,他俩在秦城又生活了一段时间,确实比在社会上安全,这样,对在押的人员又是一个影响,使他们能安心学习、改造。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主要是老干部)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有的坐牢,有的致残致死,有的不堪忍受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领导处理战犯工作的人,也因莫须有的各种罪名抓进了监狱,而且关在同一监狱,与战犯只有一墙之隔。监狱的工作人员讥讽说:“共产党、国民党一个样,自己盖监狱自己坐,这不知是什么世道!”

共产党内的干部受到冲击、迫害,在押的战犯和释放人员当然逃脱不了厄运。

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因病死亡的战斗有59名,这些人有正常病亡的,但大部分与生活、治疗条件有关。而在押的战斗中病亡的,在此期间共有103名。其中,1966年6名,1967年10名,1968年14名,1969年15名,1970年11名,1971年10名,1972年12名,1973年11名,1974年11名,1975年3名。

释放后病亡和在押期间病亡的首要战犯共10名。他们是:

- | | |
|-----|------------------------|
| 沈 鹏 | 国民党陇南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 |
| 汤 尧 | 国民党陆军中将副司令兼八兵团司令 |
| 马励武 | 国民党整编二十六师中将师长 |
| 米文和 | 国民党第四绥靖区中将副司令 |
| 廖宗泽 | 国民党军统局川康区区长 |
| 刘嘉树 | 国民党第十七兵团中将司令 |
| 莫德宏 | 国民党第四十八军将军长、湘桂黔护路中将司令 |
| 徐远举 | 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
| 杨文琼 | 国民党整编七十二师中将师长 |
| 王泽藩 | 国民党第九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兼陆军四十四军军长 |

◆ 福将刘嘉树

在病亡的首要战犯中，周恩来总理直接过问的有徐远举和刘嘉树。徐远举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下面介绍一下刘嘉树。国民党第十七兵团中将司令刘嘉树，因脑溢血于1972年3月3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病亡，时年68岁。公安部当天就报告了中央。周恩来总理对战犯们非常关心，许多战犯工作都是他亲自指示的。文革中也不例外，非常时期，他更加关心战犯们的生活。在13日作了重要批示，要公安部“对全部在押战犯写一政治情况报告，提出各个处理方案”报中央。

刘嘉树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周恩来对他很熟悉。刘嘉树早年就患有脑动脉硬化病，虽经多次治疗，还是时好时坏。而且他又十分肥胖，走路都有困难，往往是走两步歇一歇，气喘嘘嘘，上气不接下气。每次有关战犯的病情报告，都少不了他，这就更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

在一次政协会议上，也有人提到他的身体不好。郑洞国还提出要特赦他，理由是除身体因素外，他与黄杰的关系很好，以前是黄杰的部下，同事很久，可对台湾的黄杰产生影响。

刘嘉树作黄杰的部下有一较长时间。那是1946年黄杰任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军官训练教育长的时候，刘嘉树任中训团的中将总队长，专门训练团长以上的军官，为蒋介石培训骨干。

还有一段就是程潜、陈明仁在湖南通电起义后，黄杰接任了湖南省主席兼长沙绥靖区司令和第一兵团司令，任命刘嘉树为湘西绥靖区中将司令，后又为第十七兵团司令（原司令为侯镜如，后去香港，最后回北京定居）。

刘嘉树在战场上也是坚持到最后的，程潜在湖南通电起义时，曾试图说服刘嘉树和当时的长沙绥区参谋长李默庵，与他一起起义，但这二人都坚决反对，刘嘉树当时态度还很强硬，曾当面质问过程潜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在起义问题上程潜手下采取了自

愿的原则，所以在刘嘉树坚决反对下，程潜就没有再坚持，而是放他走了。刘嘉树在黄杰的指挥下逃到了越南，后来黄杰辗转到了台湾，刘嘉树却在1950年在越南边境打游击时被俘，成了战犯。

由于这件事，程潜在民主座谈会上没有提刘嘉树的名字。其实刘嘉树在监狱里对程潜存在幻想，他认为他们是同乡，只要程潜说一句话，说不定就可以出去。

正是因为这个想法，那时还发生一个笑话。有一次，报纸上登政协委员名单上，有刘家树这个名字。刘嘉树以为一定是程潜帮他说话了，因为他曾经叫过刘家树。于是，他马上报告管理员，经过核实，刘家树是另有其人，与他没半点关系，当时弄得他非常没面子。事后还有人开他的玩笑，说：你改名叫“陈嘉树”好了。陈嘉树者，陈果夫之公子也。

刘嘉树为人随和，人缘好，在监狱中很少与发生争执，这可能与他的经历有关。刘嘉树是个大事不糊涂，小事不计较的人。他很少在正面战场作战，而善长作后方的工作，如培养军官、参谋长等，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升迁。最后还是升到了十七兵团中将司令，独挡一面。所以他一直被称为“福将”。

刘嘉树的死亡给在押战犯带来了福音。“文革”中，在押战犯的死亡率比过去都高，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他们大都年龄较大，体弱多病，再加上生活水平下降，管理方式粗暴，有的甚至出现了对他们搞逼供信，进行人身摧残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公安部开过座谈会，周恩来还对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战犯连续死亡问题作过长篇批示，都无济于事。

刘嘉树的死亡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针对刘嘉树的死所作的批示则是明确要公安部对在押战犯的政治情况和处理方案提出报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即，特赦工作再次提上日程。

于是，一切工作围绕着特赦去做，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瞬息万变，四届人大的召开一拖再拖，一直到1975年，特赦工作才有眉目。

刘嘉树的死,引起周恩来的重视,周恩来的批示又引起公安部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刘嘉树的死从上到下都引起了巨大震动。

刘嘉树死后,从中央到各有关部门,从周恩来到长期负责这项工作的原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统战部负责人童小鹏等,都提高警惕,尽量避免类似事件发生,他们最担心的是怕黄维再病亡。当时黄维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几乎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为防止意外,监狱当局采取了特别的措施,随时注意他的饮食、睡眠和情绪,并为他 and 少数几个职务高、身体差的人改善伙食,稍有比平常重一点的疾病反应,就住医院治疗。当时公安部的负责人也非常紧张,生怕出现紧急情况,都希望早点特赦他们。

刘嘉树死后,又有不少人相继死去。特赦工作的步伐大大加快了,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个特赦令发布,特赦全部在押战犯。虽说是党的政策赦免了他们,但刘嘉树的死也是个催化剂。正因如此,有些知道内情的特赦人员,都为九泉之下的刘嘉树祈祷。

1994年2月,刘嘉树在台湾的儿子刘逸闽到抚顺战犯管理所领取了父亲的骨灰后,带回台湾安葬。当刘逸闽接过干净的骨灰盒,打开看了父亲的骨灰,感动得流出了热泪,他除了感激,感激,再感激外,一句话也说不出!刘嘉树虽然没有赶上特赦,但他得到了无数人的祝福和安慰。

6. 准备全部特赦

“文化大革命”期间，天下大乱。公安工作也难以幸免。从1949年新政权建立到1966年“文革”开始，17年的公安工作路线、方针、政策一概被否定，党的战犯工作也被破坏了。1975年，“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左”的政策逐步被纠正，释放战犯工作重新提上日程。

◆周恩来亲自批示

“文革”中对战犯管理所实行军事管制。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秦城监狱、济南战犯管理所和西安战犯管理所，都在军事管制之下，对在押战犯程度不同的进行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周恩来总理对战犯工作更加关切了，他多次提醒公安部注意，在押战犯的健康状况。所以，当抚顺、秦城监狱、济南、西安等地的战犯死亡时，按“文革”前的老规矩还是要上报的，不敢隐瞒。

由于战犯的死亡人数逐年增多，公安部于1971年5月给周恩来写了一个《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死亡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根据“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的报告着重写的。报告写了两个问题：一是报告了从1966年8月至1971年2月死亡战犯的数字；二是在押的人中有相当数量患各种疾病和病危的。还提到不让这些人过早死掉，以便挤“活材料”。

周恩来总理对这个问题作了长篇批示：抚顺战犯管理所，政治工作本有成绩。改造日本战犯，尤为显著。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公安部工作不下达指示，也不派人下去检查，因此，许多战犯病亡每年增长，证明工作水平日益下降。而辽宁省“革委会”人保组报告，对有严重病的并无急救治疗办法，对其他患者也无紧急防治，只说不

让这些人过早死掉，以便挤出“活材料”；派去的人也只为深挖“活材料”，一句也未提到如果改造得好，应体现党的政策，给他们以“特赦”的出路。否则，他们会说：大战犯特赦了，小战犯关到死；外国战犯特赦了，本国战犯关起来。这是不合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无材料可挤。重点应是改造，给出路。

周恩来总理在“文革”那样，特殊的年代，在他那高强度的工作下，竟然在公安部报告的第三天，就作了如此长的批示，可见他对战犯工作的高度重视。

正是这个批示震醒了当时公安部的领导人，面对周恩来的尖锐批评，他们意识到这是个重大的政治和政策问题，不能调以轻心。于是立即召开了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会议学习讨论周恩来的批示。

会议决定：召开战犯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于5月31日至6月6日在北京饭店举行，由李震主持，邀请了当时关押战犯的辽宁、山东、陕西、北京4个单位的负责人和有改造战犯任务的河北、山西、广东、四川省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参加，来的基本上是军管干部。虽说座谈会的范围不大，但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从这次会议起，公安部 and 关押战犯的几个地方的领导人，感到战犯工作与其他公安工作不同，这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和关心的工作，丝毫马虎不得。

这次会议是个新的起点，从此，停滞了五年的战犯工作又重新抓了起来。自那以后，有关战犯的工作一直在抓，无论是关押着的，还是已释放的，都有专人负责搜集、掌握他们的资料。更重要的是，特赦战犯的工作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上特赦一批。可以说，由于周恩来亲自抓战犯工作，在当时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之下，对战犯的改造和处理，尤其是应尽快处理，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借此机会，于桑、刘复之两位公安部老领导提出将原管理战犯工作的人落实政策，予以归位。

1971年6月28日，“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向周恩来写了一个《关于加强改造战犯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军管以来，下面虽然

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我们没有督促、检查和作必要的指导,加上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战犯改造工作存在突出的问题。”报告集中列举了三个突出问题:

一是对改造战犯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思想改造工作做得很不够。有人认为把战犯看好、管住,把活材料“挤”干净就行了。对于落实毛泽东“给出路”的政策想的不多,怕“混线”,取消了组织战犯参观、看电影、听广播、看报纸,与家属通信和会见家属等作法。所以战犯产生了很多疑虑,认为“生活降低了”,“管得严了”,“政策变了”,“活着出不去了”,等等;

二是管理方法简单生硬,搞形“左”实右。说下面有人认为对战犯就是得狠点,态度要硬点,说话声音要高点,离得要远点。这“四点”是对毛主席“忠”的具体表现;

三是战犯死亡情况比较严重。有的对重病者没有采取急救办法,说什么“贫下中农得病,有时都住不上医院,还抢救战犯?”有的医生也不敢给他们看病,怕说“立场不稳”,“思想右倾”。

这三个问题,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对于如何贯彻周恩来的批示,报告提出了五条意见:

一是要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改造战犯和其他罪犯的教导。认为要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在一定条件下,在敌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以后,敌人中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教导,认为这是改造战犯的路线问题,必须执行。同时认为这也是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的思想武器,做改造战犯工作的人必须树立这个坚定的思想。

二是要加强对管教干部的教育,要使干部懂得:“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关键,路线、方针、政策是要由人来执行的。而且针对诸如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军管干部换得勤,新手多,又不懂政策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要把原来做管教工作的干部选调一些回来。这一点,报告送上去还未等周恩来批示,公安部就责成各地抽调干部。抚顺战犯管理所原所

长金源,当时正在干校劳动,被指名调回来。同时回来的还有另外6名老管教员。山东、陕西也调了几人回来。

三是要认真贯彻“改造第一”的方针,遵循“要把犯罪的人当人,对他有点希望,对他有所帮助,当然也要有所批评、斗争”的精神,重申在改造战犯工作中,必须实行政治思想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阶级斗争与革命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政策。“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恢复让战犯们听广播、看书报、看电影和必要的参观等活动,允许他们与家属通信和会见家属等。

四是搞好战犯的生活管理,恢复了医疗制度,病重者可以住院治疗。提高生活费,如粮油标准,增加副食品供应。

五是建议在四届人大召开时特赦一批战犯。这一条很重要,从这次会议和这个报告开始,一直到1975年全部特赦在押战犯,对特赦战犯的舆论和准备工作从未间断。但由于政治形势的多变,四届人大召开后也未能实施特赦战犯的工作。

这个报告虽没有批示,但在公安部引起了重视。

◆最后的准备

林彪事件以后,政治形势一度好转,特赦战犯的事又提上日程。鉴于前述报告未见批示,1972年2月,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又向周恩来写了《关于特赦和刑满释放战犯管理教育工作的请示报告》,主要反映了已经释放战犯的情况及今后管理意见。报告递交上去没多久,即3月3日,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国民党第十七兵团中将司令刘嘉树病亡。周恩来见到公安部关于刘嘉树的死亡报告后批示:要对在押全部战犯写个政治情况报告,提出各个处理方案报中央。

主管战犯工作的副部长刘复之当即把周恩来的指示向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人保组组长作了传达,同时也给山东、陕西的有关负责人作了传达,要他们提出在押战犯的政治情况报告。各地都遵照执行。

遵照公安部下达的凡涉及战犯的问题事事向公安部报告的指示,辽宁省革委会主管公安工作的副主任在调查抚顺战犯管理所军管组违反政策的问题后,向省委和公安部写了专题检查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说该所“发生了一些严重的问题,犯了严重的错误”,如实地列举了军管会违反政策的具体事实。其中最突出的有4个问题:污辱、打骂和体罚战犯;违反财物管理制度,动用战犯存放的衣物;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严重,不按规定管理战犯;骄傲自满,极“左”思想严重。

刘复之亲自修改、斟酌这个报告,并多次与辽宁省通电话,核实情况,做思想工作,使他们真正从思想上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引起足够重视,并将这个报告专题报周恩来。对于各地报来的材料,他指示预审组提出处理方案,并提出这个方案应该从两方面制定,一方面要对地方报来的材料进行研究,提出刑满释放、提前释放、减刑、监外就医、继续关押5种办法进行处理,并要附上花名册。花名册的项目要研究,不能太简单,也不能太繁琐。另一方面对于特赦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应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负责这件事,并要让搞过特赦工作的人参加,准备向中央报告,于四届人大前后实行特赦。

6月,以中央公安部核心小组的名义向周恩来写了一个《关于对抚顺战犯管理所军管组的工作检查报告》,主要是将辽宁的检查报告附去,说明全部战犯的政治情况和各个处理方案,正在研究各地报来的材料,综合后再呈批。

这个报告没有批示,受当时政治条件的限制,四届人大也没有按预定的时间召开。

这期间,有不少被关押者的家属给中央、周恩来和毛泽东写信,并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各种关系能让毛泽东、周恩来看见。功夫不负有心人,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写的一封信毛泽东看到了,信上反映刘建章身体患病,一天只能喝3次水,每次只一杯,一天只给“犯人”放风一次,一次只30分钟,要求按照党的政策对待他。

毛泽东看信后,在1972年12月18日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

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与此同时,周恩来给李震、杨杰(原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吴庆彤(原国务院值班室主任)指示,要他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

将刘建章保外就医,送医院治疗,通知刘淑清及其子女去看望刘建章;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来送国务院批;请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在年内对北京地区的监狱再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一一列举出来,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人员公布,如有犯者,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公安部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后,立即向北京地区的监管场所的干部原原本本地传达,并毫无隐瞒地向在押人员宣布。还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到秦城监狱,检查那里的工作,向在押人员逐一传达。在押战犯了解了这个批示后,个个兴奋不已,神采飞扬,认为党的政策“又回来了”。

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973年2月,公安部召开了全国监管工作会议,进一步传达贯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

随着政治秩序逐渐好转,召开四届人大的呼声越来越大,处理战犯的工作也就迫在眉睫。年底,公安部搞了一期在押战犯思想动态的反映,主要反映他们盼召开四届人大,盼特赦。周恩来在这期反映上再次作了批示,要主管政法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告诉公安部,将全部在押战犯列表报国务院,要求对表的项目和用途都写得明确、具体。要求在表上注明每个战犯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被捕(俘)年月、判刑时间、政治表现、身体状况,以便在四届人大后特赦。还专门说明此事在1973年毛泽东指示过。

特赦战犯的准备工作的紧锣密鼓,各种表格、系统材料、单份材料,成批成批地印刷。公安部预审组有几个人专门负责对在押的300多名战犯进行一一审查,提出处理意见。表格全部填好后报送周恩来审批。周恩来指示:请公安部继续进行准备,以便以人大后送中央、主席批。

公安部再次向关押战犯的省公安厅发出的电话通知,要做好特

赦的一切准备。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发出公告：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兼任公安部部长。这对于被“文革”打乱，并逐渐恢复的社会正常秩序来说，是个转折点，对于战犯特赦来说，更是一个转折点。

公安部对300多在押战犯提出的处理方案是：特赦、刑满释放、提前释放（刑期未滿者）、保外就医和继续关押。由于分类处理的人数和名单经常变，报告中没有写明各类的具体人数。但几次研究和报告中，总有继续关押的一类，送给周恩来的报告和表格中继续关押的是13名。他们是：

- 徐天任 国民党第二军特别党部少将书记长，押山东
郭吉谦 国民党第五军少将副军长，押抚顺
黎宗铭 国民党第二兵团政工处少将处长，押抚顺
樊迅 国民党华中“剿总”豫鄂皖边区自卫军少将副司令，押抚顺
- 翁羽 国民党第九军三师一三八团上校团长，押抚顺
刘衍智 国民党二兵团六军二十八师八六一团上校团长，押抚顺
李清国 国民党七十二军军部中校参谋，押山东
周养浩 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押抚顺
谢代生 国民党军统局广西站站长，押抚顺
邱沈钧 国民党防部二厅通讯总所少将所长，押山东
张百龄 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热河站副站长，押山东
杜超群 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办事处副处长，押秦城监狱
沈觐康 国民党厦门市警局局长，押秦城监狱

名单后还附有继续关押的主要理由，即现实政治表现不好，是由关押单位提出的。之所以提出对他们继续进行关押，既不是根据职务高低，也不是依其历史罪恶大小，主要考虑的因素还是政治表现。在最高层领导人讨论时，对他们的情况经过多次反复的研究，按照以往的特赦标准，他们确无改恶从善表现，所以怎么也通不过。在

讨论时也尽量注意到能宽、能放的都放,但最后还是13人怎么讨论都通不过。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看到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的这个《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和准备给人大常委的说明后,作了长篇指示,大致意思是这样的: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是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指报告中继续关押的13名)。强迫他们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指战犯)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指报告中安置在农村的已释战犯生活费用每月15元至20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多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他们放下武器25年啦!

这个指示,使战犯的处理一下子变得简单化了。很长时间准备的分类处理材料全部作废,所有战犯一律特赦,待遇一律相同。接下来就是如何组织特赦工作一件事了。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华国锋问施义之:“所有的名单是不是全了?不能再留在口袋里啊!”施义之拍了拍口袋风趣地说:“口袋里光光的(指一个不剩),全部列上了。”

毛泽东的指示下达后,公安部用最快的速度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起查明了在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被俘获的国民党战犯及其处理情况。

遗憾的是,就在讨论全部特赦战犯的过程中,又有5人病死了。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批阅的战犯名单是323名,而到毛泽东1975年2月27日的批示,名单变成了318名。这五个人是:

孙天放 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参议,死于1974年12月26日

朱始营 国民党广东保安四师少将参谋长,死于1974年12月28日

胡始翰 国民党军统局第一处少将处长,死于1975年2月8日

杨显 国民党新编第八军少将军长,死于1975年2月25日

韦德 国民党第六十四军少将军长,死于1975年2月26日

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要施义之保证在特赦令公布之前,不能再死人了,尤其是黄维,要采取一切措施不能出任何问题。施义之也最担心再死一个不好交代,于是通知4个地方要有专人负责全部在押战犯的生活和医疗。这之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杨显、韦德这种人算不算特赦。因为特赦与不特赦是完全不一样的,特赦了算公民,不特赦算战犯。讨论了很久后,决定他们这种人不在特赦战犯之列。

在这318人中,将原属起义投诚的25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其实,这25个人早应落实政策,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他们起义投诚后被怀疑有新的罪行而一直未予处理而拖下来了。有的纯粹是漏掉了,或来不及审查,一赴未予处理。这25人是(不书职务):

赵子立、李振西、赵凌霄、任献庭、张亚东、程守之、綦岱峰、杨一华、刘文潮、金超、周藩、潘克智、邬国贤、杨非、张西铎、朱占魁、严中英、李世荣、廖谋、吴行中、乔诚、唐容川、李心恺、陈效潘、贾璜。

他们中职务最高的是赵子立和李振西,赵是国民党一二七军中将军长兼河南省主席,李是国民党三十八军中将军长。

把25人单独提出来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上述指示精神办的,是历次特赦所没有的。同时,罗青长还提出,对右派分子要一律摘帽,这是中央精神。在全部特赦释放在押战犯后不久,中央决定对全部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在清理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被俘国民党人员时,在讨论起义投诚人员时,又提出在全国劳动改造机关(监狱)还关押着大批国民党人员,有的职务相当高,这批人也要宽大释放。

◆ 释放全部战犯

特赦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当时大常委二次会议定在3月20日前召开。为了使全部特赦工作既有声势,又有条不紊,将25名起义投诚人员的处理与全部特赦战犯分开来,以落实党的起义投诚政策,中央决定于3月10日专门召开一次全国“四长”会议。“四长”即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局长(当时还没有恢复厅的名称),统战部长、法院院长和民政局长。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举行,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决定释放25名起义投诚人员,二是为全部特赦战犯做好组织、安置、宣传等工作。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参加会议的除上述“四长”外,中央各有关部委、总政、总参、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近300人参加。

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会议,这是一次成功胜利的大会,全会思想高度统一,全体与会者表示要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华国锋在会上作了一个报告,主要内容是传达贯彻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全部特赦的部署。公安部负责人施义之在会议结束时作总结讲话,主要是进一步明确特赦工作的意义和落实会议精神的具体做法。

会议结束的当天,公安部预审组电话通知抚顺、山东、陕西三地,指名起义投诚的人员要在第二天,即3月11日到达北京,由中央统战部接待、安置。

3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

按照惯例,国务院总理要向人大常委会作特赦说明,由于周恩来病重,改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作了专题说明。

华国锋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最近指示,把在押战犯

全部特赦释放。它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表明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更加安定、团结，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这对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促进台湾人民爱国斗争，都具有重大意义。”

他说：“多年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改造了大批战犯。已经特赦释放和刑满释放的战犯，大多数表现是好和比较好的。有的人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现在关押的战犯，经过长期教育改造，都有了不同程度改恶从善的表现，感激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挽救。这是毛主席对战犯改造政策的胜利。”

他宣布：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其中有国民党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他再次重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每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的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100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送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总理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和华国锋所作的说明，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

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执行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分别在抚顺、济南、西安和秦城监狱召开特赦释放大会，宣布特赦名单，发给特赦释放通知书。各个特赦会场气氛热闹非凡，感人至深，哭声、喊声、笑声交融，“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当黄维、文强、陈旭东、胡靖安、李九思、王秉钺、庄村夫、宋清

轩、汪宪、王绪镒、陈士章、刘镇湘、沈蕴存、章微寒、周养浩、岳烛远等领取特赦通知书时，都流出了感激的眼泪，就连从不流泪、从不服输的黄维也热泪盈眶，从会场到宿舍一直感动不已，激动的情绪无法平静。他写诗表达了当时的心情：“党恩浩荡给再生，宽大改造换我魂，恩上加恩新生后，誓献余生为人民。”

管理所还向被特赦人员补发100元零用钱、一套新制服装，并将他们寄存的怀表、手表、金银、外钞、衣服一一退回，当看到管理所将东西保存得那么好、那么完整时，大家感到非常惊奇。李九思戴上手表后感慨地说：“共产党办事就是认真，我最佩服这一点！”

这次特赦的人数为历次最多，报纸上列出名单的有62名，包括黄维、李九思、庄村夫、宋清轩、汪宪、王绪镒、郭一予、陈士章、王秉钺、刘镇湘、文强、胡靖安、陈旭东、周养浩、岳烛远、章微寒、沈蕴存等，他们都是国民党的首要战犯和职务较高者。

秦城

战犯改造纪实

Qincheng Zhanfan Gaizao Jishi

这是《秦城纪实系列丛书》中的一部，集中介绍作为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的一些基本情况，第一批进入秦城的犯人的改造情况。

本书真实！可信！可读！

ISBN 7-80199-128-1



9 787801 991287 >

ISBN 7-80199-128-1 / D · 38

定价：28.00元